

大国转型

(The Great Nations in Transition)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转型：大国角色变化的成败 / 窦国庆著. —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7
(中国国际战略丛书)

ISBN 978-7-5162-0922-6

I. ①大… II. ①窦…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4775 号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版统筹：赵卜慧
丛书策划：石松
责任编辑：刘姝宏

书 名/大国转型：大国角色变化的成败
The Great Nations in Transiti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作 者/窦国庆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010-63055259
http: //www. npcpub. com
E-mail: mzfz@ npcpub.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 开 710 毫米×1000 毫米
印 张/17 字数/225 千字
版 本/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62-0922-6
定 价/39.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神圣的母校：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以及梦开始的地方——伟大的陆军第一集团军和英雄辈出的尖刀七连。

序

PREFACE

如果战略问题被当作科学，其价值就是使用别人研究的成果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战略问题被当作艺术，那么其价值在于用独创的成果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推动历史经验延续容易被拘束于一事、一局、一隅的一孔之见，也容易陷入为取悦大众而取悦大众的肤浅当中。强大者从来都是善于和敢于超越历史的。

所有大国的沉浮所蕴含的涵义只有一个：防止失败必先防止僵化，而防止僵化就要不断实施国家转型，即善于改变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趋同，而能够在趋同中成为引领者的都是那些积极主动实现转型的国家。因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永久保持一个角色，尤其是在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也许，当我们发现时代开始改变时，时代已经发生改变了。正如中国近代那些有识之士认为的那样，中华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其实世界本身就一直是变局，推动变局的是人不断更新的需要，也是变局本身赋予人角色不同的需要。

培养自己的活力，不是要排斥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是要认识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对手和朋友的身份差异，但却不能简单复制和频繁出现。习惯于墨守成规的战略思维使国家陷入

僵化的厄运并无限循环，而习惯于超越历史、打破常规的战略思维却使国家在变局中不断实现优势。

国家转型，首要一点在于战略思维，战略思维代替不了许多功能，它之所以处于转型的首要位置是因为战略思维如何运用决定着转型的路径效率和能力塑造。战略思维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活力能否得到激发。

现实世界上有两种战略思维：一种是国家需要转型时，再考虑如何转型来获得主动。另外一种转型成为国家在每个历史阶段中的常态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决定了国家不同的命运：前者使国家成为变局的适应者；而后者使国家成为变局的推动者。

虽然任何一个国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历史，但就像世界上没有两条同样的河流，也没有两段相同的历史。所有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反思历史经验、敏感地预判未来，使自己走向下一次胜利。积极的转型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战略优势，它使自己针对时代的变化，作出比朋友和对手更新的反应，而不仅仅是更快的反应，永远置对手于无所适从、置朋友于景仰崇拜。

转型应当是个性的塑造。虽然要遵循基本的客观规律，但不能将规律当作教条而成为它的奴隶。要形成优势就必须有别人没有的能力，或者使别人不敢也不能使用优势的能力。开辟新的道路，是转型的基本原则。转型战略的塑造，必须首先学会挑战现有规则，对现有规则的禁锢理解得越深刻，对其挑战的力度会越大，就越难令对手和敌人模仿、超越和研究；令对手总是看到自己的过去，而看不到现实的、真正的自我。

聪明的战略思维运用规则，伟大的战略思维创造规则。国家转型是一项伟业，而转型的战略思维则是伟业中的伟业，不仅要运用规则，更要突出创造规则。脚踏实地只能满足于一个高度，而攀岩登山则会由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不仅需要脚踏实地，更需要攀岩登山。

窦国庆

2015 年 4 月

前言

FOREWORD

中国急需转型战略

对于大国而言，最难的不是自弱势为起点的“韬光养晦”的励精图治，而是在实力地位不断变化时的“预判、规避风险和创造、抓住机遇”。因为实力地位不断变化，需要在战略设计和战略举措中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力地位而不断调整，如果仍然立足于旧位势来设计新位势时的未来之路，那么无法实现自己不断改变的真正利益。国家真正的风险正在于此。历史上的大国，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教训要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经历大起大落的命运。角度转变的战略比起由弱到强转变的战略难度要大得多。这是目前中国最为忽视的战略问题。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战略牵引已经发生变化，处于国际格局中角色转变的微妙时期，无论其角色的战略定位，还是实施路径，甚至是遭遇具体和偶然问题之解决，都应当超越历史前人。

大国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多种多样，安全、发展、地位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制度和文化的存亡问题、领土主权的边界得失问题、经济能源的贸易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治世者要将它们条分缕细地一一处理，无疑就会像要陷入无法摆脱的泥潭当中的老虎，有劲使不出，还会越挣扎越危险。避免风险和抓住机遇是所有治世者的难题。

从历史经验出发，解决这个难题有两种模式：一是就事论事型。即当风

险与机遇来临时，只是应对事情，在应对事情中规避风险和抓住机遇。二是整体规划型。即在对利益诉求和格局发展的大势的判断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战略设计和制定战略举措，对于多种风险与机遇有着预置式的解决之道，把压力推向对方、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仅仅局限于前者模式，即使每件事情都应对自如，那么国家也会陷入机会主义者的思维，难以长久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随着每件事情的解决，所有国家都无法不面临这样的局面：每经历一件事情，自我变革的动力便增加一分。当事情的解决不断积累时，自我变革的动力便使自己处于自我变革的门槛之上。

如果仅仅去追求后者模式，那么治世者务必具有清醒、长远的眼光，准确把握别人难以洞察的大势和敏感抓住别人易于忽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大师反而因为高深而陷入孤立，难以培塑具有正确执行力的治世团队。

所以，我们不能说，前者使自己处于被动应对之状，就弃之于不顾；后者主动设计就完美无瑕。前者模式容易被接受和采纳，而后者模式的成功却不仅需要智慧、眼光和坚韧之毅力，而且还需要“上天垂青”般的运气，否则将很可能流于形式。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治家和秩序构建的大师、政党和某种政治制度能够做到后者的模式。因为客观来看，所有大国面临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大师能够将两种模式结合得更加完美。

这两种模式结合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转型，即不断根据自身实力地位的发展变化，敏感地着眼于不断变化的格局来谋求自身的最佳位势。大国中兴难，难的不是增强实力地位，难的是根据不断增强的实力地位而不断谋求最佳位势，以实现持续的中兴。近代的德国和日本在由旁观者和羡慕者的身份加入强国俱乐部后却遭遇惨败，战后致力于和平发展，重新进入国际舞台中心；苏联由一个欧洲边缘的大国俄罗斯诞生而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一极，可谓风光无限，然而，最后也不战自垮。这些大起大落的民族命运，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以旁观者的心态，以自我价值和位势来分析其经验教训，无疑是对历史经验财富的误用。我们应当学会站在它们当时、当时的立场上考虑为什么它们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应对，对未来的局势它们是怎样思考和推动举措的。因为我们现

在也处于一个实力地位快速变化的历史阶段，而且当前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快得多，如果我们再用以前的心态和立场来应对和设计未来的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无疑会使我们难以谋求到最佳位势，这样，历史教训不仅可能重演，而且之前付出巨大牺牲得来的成就可能也会功亏一篑。

中国今天面临的根本挑战不是由弱到强，而是实力地位不断变化而带来的身份重构，存在着历史经验和未来创意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美国在从孤立向国际化转变的时代，德国在俾斯麦时代，法国在黎塞留时代，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代，各个大国之所以能完成角色转变，无一不是在自身历史经验和未来探索中获取平衡的。

如何在角色转变中塑造自己是中华民族当今首要课题。角色转变期充满着各种风险，否则世界风云也就不会这样变幻了。法国、德国、俄罗斯这些国家虽然强盛，但纷纷在角色转变中迷失，从而酿成大错，并非它们自身不够成功，而是它们似乎不擅长角色转变。

法国在黎塞留时代转变角色成功，由一个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阴影下的二流国家变成欧洲秩序有力构建者，之后便很少有成功的角色转变，无论如何努力，总难以逃脱对欧洲和平和均势的破坏者角色。先是路易十四四处征伐，使法国成为欧洲众矢之的；再是拿破仑独力支撑法国大革命后的孤立危局，最终战败；经过休养生息，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有所起色，但不久又败于雄才伟略的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最终沦为二流国家。从此之后，法国只能跟随英国，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胜，但国力和自信已经在强大的德国面前耗损殆尽，致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便耻辱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时代又期望成为独立后的欧洲中心，但在美国成为西方盟主的情况下，它的影响力总是有限，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造成被动。

德国统一后，由欧洲强国中最弱势地位突然成为欧洲政治中心，心态似乎因突变而丧失应有之理性。在俾斯麦去职后，开始四面树敌。先是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同时对英、法、俄展现咄咄逼人之姿态，与英国展开海军竞赛、与俄罗斯交恶于东欧、激化法德世仇，最终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

希特勒野蛮扩张，同时与美、苏、英大国为敌，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陷于冷战之中的国家分裂。

俄罗斯亦是如此，从欧洲边缘崛起后，不断向四周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成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又由欧洲边缘大国，变成地跨欧亚大国，最终变成欧亚大陆之强大陆权中心、世界一极的身份，但苏联在战略上完全继承俄罗斯衣钵，无任何变更，最终于冷战中陷入中、美、日、欧的包围，在内外交困中陷入巨祸。

这三个海陆大国角色转变不成功是因为，作为陆海大国，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们比美、英、日等纯海上国家，更难超越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历史经验，而且，不同的国际位势，导致其地缘政治优劣转变，从而导致情势巨变，而自己却以以前之经验应对新鲜情势，如何会不遭遇曲折，甚至挫折？

世界各国，最成功的莫过于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角色的转变成功使它们能够把握自我，而不是像法、德、俄那样在角色转变中出现动荡和起伏。

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步入转型的门槛。面对当今它们的成败得失时，必须想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从世界范围看，每一个大国在其崛起进程中，无一例外地遭遇其他大国打压、邻国疑虑，确保安全和拓展利益的矛盾凸显，中国也是如此。因此，中国迫切地需要以开拓性的胆识和创造性的视野，以更大的战略突破和更高的战略着眼，实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转变的优势和主动。

龚国庆

2015 年 2 月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 001

俾斯麦时代：构建根基不牢的大陆体系 002

威廉二世时代：交错中的冲动与误解 021

• 第二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 037

吉田茂时代：战败后的重生 038

田中角荣时代：开拓者的起步 049

中曾根时代：跨越历史的门槛 058

小泉纯一郎时代：历史与民族命运的回归 067

• 第三章

大起大落的苏联 从巅峰到末日的起伏 075

赫鲁晓夫时代：以攻为守的代价 077

勃列日涅夫时代：顶峰时的脆弱地位 085

戈尔巴乔夫时代：自陷末日 094

• 第四章

江河日下的英国 不屈的地位重塑 107

危机时代：风光不再时的主动作为 113

缓和年代：实力依旧时的深沉 132

• 第五章

身处巅峰的美国 从被动走向霸权 137

尼克松时代：以退为进的缓和 139

里根时代：重振国威的灵活反攻 148

小布什时代：制造不可预见的动荡 160

• 第六章

成败难评的法国 守护历史与开辟时代 171

戴高乐时代：老英雄的民族梦 174

萨科奇时代：新时代的调和者 183

• 第七章

把历史当镜子 对中国的启示 193

如何向强者学习转型 195

如何形成战略思维优势 206

如何获得地缘政治优势 212

如何超越民族传统文化 223

如何处理安全与和平 238

• 注 释 245

第一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

历史上鲜有一经统一便令世界为之一震的国家。德国便是这样一个少数国家。雄才伟略的俾斯麦利用了普鲁士在欧洲列强中的传统弱势和欧洲均势体系的漏洞，使德国得以统一。然而，德国的统一并未超越普鲁士的天然地缘政治条件，纵使精明、冷酷的俾斯麦也难以避免德国陷入自己织下的网中，当威廉二世执掌德国时，在缺少理性的民族自豪感、缺乏磨练的个人性格的催化下，强国之路变为歧途。

德国一经统一，便使欧洲为之一震。以前强大的法国是欧洲大陆治乱与战和的晴雨表，而今变成了德国。比起法国，德国有更强的军力和经济、更多的人口。当所有大国都将焦点由法国转向德国时，反而使德国不如普鲁士那样能以灵活的立场与位势来经营自己的安全。以前的普鲁士是大国构建的秩序的边缘者，它只能是适应秩序的改变与转换，而难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德国却不是如此。德国再也不可能是秩序的适应者与追随者，而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参与者与塑造者。

使大国走向成功的力量总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历史惯性。德国的统一是建立在普鲁士强大的陆军、勤勉的国王，以及雄才伟略的俾斯麦在大国间成功地纵横捭阖的基础之上。所以，统一后的德国，其命运走向不能脱离对自身实力的自信、治国者对形势变化的判断，甚至是否之后出现具有同等程度的雄才伟略的人物。然而，如果连续两代都出现同等程度的雄才伟略之人，那么这个国家绝对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幸运儿。

俾斯麦时代：构建根基不牢的大陆体系

德国是在欧洲充满了对它的不安全感、冷眼质疑，甚至是敌对的情势下

统一的。普法战争已经使法德世仇难以消解；普法战争之前的普奥战争使德国失去了奥地利这个强大的盟友；英国和俄罗斯两个左右欧洲均势的侧翼大国开始将德国视作主要威胁。

德国的直接威胁是法国，遭到普法战争削弱的法国已经无力单独对抗德国，需要英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因此，德国应当主要关注英国和俄罗斯。英国仍然奉行“光荣孤立”，对于一夜之间强大起来的德国，不可能采取极端的压制举措，只会冷眼旁观。俄罗斯对于西部边界的敏感、扩张野心，以及在斯拉夫民族中保持强势地位的诉求，随着德国的统一也开始变得强烈。英国关心的是法、德、俄三者能否形成新的均势，或者三者是否会破坏原有均势。俄罗斯关心的是德国统一对俄罗斯西部安全与其在东欧地区的地位有何影响。显然，德国在没有强力盟友的情况下，如果咄咄逼人，则会受到英、法、俄三个欧洲大国的共同遏制而陷入危险的孤立。而如果德国对既定秩序“低头”，早晚会导导致法国重新强大，这使德国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等到法国强大后再孤注一掷地与其搏斗，要么在法国强大之前以向英国和俄罗斯让步的代价不断孤立法国。两种情况对德国都不可能是最优选择。

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便是在左右为难中构建在历史上被称为大陆体系的欧洲秩序的。大陆体系其实是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均势体系这座“纸棚屋”的“裱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均势秩序之所以能够维持和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欧洲大陆大国间均势获得英国的认同。二是欧洲大陆大国中，受到拿破仑战争伤害最大的俄罗斯、奥匈帝国、普鲁士三个欧洲大陆大国对法国“宽宏大量”，吸收法国进入大国协调体系。然而，这两个原因都难以持久，这主要是因为，在战胜拿破仑法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俄罗斯具有更加强烈的向东扩张的野心。普鲁士获得了长期的和平，集中精力进行军队改革、优化国民教育，国力在欧洲大陆和平中不知不觉地增长。奥匈帝国虽然是欧洲均势的主要推动者，但是经过连年战争消耗，治国者的主要精力被欧洲政治事务和民族矛盾牵扯，难以像普鲁士那样提升国力。所以，欧洲均势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基于既定实力地位，约束了未来的实力增长者，最终导致未来实力增长者不满足于现状而自行其是。欧洲大陆大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但其作用只是减缓了未来实力增长者打破既定秩序的步伐，并未消除

它或它们打破既定秩序的决心。所以当最具躁动性的俄罗斯在东南欧扩张有可能伤害到英、法等海上大国的势力范围时，欧洲均势体系便开始动摇。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足以说明欧洲均势体系的脆弱。英、法与俄罗斯开战，不仅是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共同秩序的颠覆，还使共同秩序成为所有欧洲大陆大国的束缚，以致所有大国均对其不满。法国利用欧洲均势体系制造了和平休养生息，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使法国开始了重振欧洲大陆中心地位的努力。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欧洲均势体系便是为防止法国东山再起而构建的。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暂时停止了在东欧咄咄逼人的举动而专心向亚洲扩张，这样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对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力弱化。奥匈帝国和普鲁士这两个利用欧洲均势体系避开英、法、俄三个大国的倾轧的较弱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既不能站在英、法一边，又不能站在俄罗斯一边，左右为难中，只能坐看欧洲秩序地动山摇。尤其是奥匈帝国的地位极为尴尬，秩序的擘划者面对秩序被动摇而无能为力。

如果法国赢得了普法战争，那么英法之间的历史极有可能延续争霸状态，那样，欧洲的历史也只是重复，不具备真正的颠覆性意义。但残酷的现实是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而且造成德国统一，欧洲大陆实力格局遭到颠覆。以前，欧洲大陆秩序的变数仅限于法国，而德国统一后，欧洲大陆秩序的变数取决于德国与俄罗斯。

德国正因为刚刚统一便成为欧洲大陆政治中心，所以，它不能决定或者构建新秩序，但能破坏既定欧洲均势体系。俾斯麦的伟大在于可以预见德国“破坏作用”后的风险。德国无法像英国那样“超脱”于欧洲大陆斗争的漩涡，也无法像俄罗斯那样可以在某个时期只需要专注一条边界，而在另外一边专心于扩张。德国既不能向既定的边界后退，也不能将边界外推。只能利用各种复杂交织的矛盾构建重叠的联盟体系。

从直接威胁来看，德国必须围绕孤立法国，防止法国与英国特别是与俄罗斯结盟。所以，德国构建的大陆体系的主轴就是安抚俄罗斯，其战略举措就是“三皇同盟”^[1]。因为英国不希望改变“光荣孤立”的传统，所以，在英德同盟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德国必须利用英俄矛盾使二者互相牵制。这其实是对欧洲均势体系“漏洞”的修补，而不是秩序颠覆后的重新构建。

当然，德国不可能使英、俄感到德国是“安分守己”者，而是俾斯麦的克制与理智使德国享有暂时需要的和平。英国照样可以利用欧洲均势体系自由地拓展全球殖民体系，而且，德国推动构建三皇同盟，帮助英国遏制俄罗斯向西、向南扩张。俄罗斯可以利用和平与其西部边界外矛盾的暂时缓解，既专心于向亚洲扩张，又可以持续保持对东欧、中欧的影响力。俾斯麦构建的大陆体系使英国和俄罗斯可以坐享其成，而不是解决欧洲均势体系产生矛盾的根源，功能只是暂时掩盖了矛盾。拖延矛盾的代价就是矛盾早晚会激化至无法调和的地步。俾斯麦的大陆体系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使法国失去行动的自由权。法国时时刻刻地成为英国与俄罗斯压制德国的重要筹码。所以，德国的中心地位是在迎合、安抚英、俄，而不能对它们产生主动性影响。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德国与法国竞相发展与英、俄的“友好”，当然是因为德国的强大而使其更加主动，但并没有改善德国的安全地位。

时刻想着报普法战争之仇的法国因此而获得两个显而易见的巨大机遇：一是使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和俄罗斯认为，德国有进一步压制法国，从而破坏欧洲均势体系的野心。二是德国与俄罗斯关系破裂的可能性时刻存在，特别是德国可能基于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与利益，在东欧、中欧事务中偏向于奥匈帝国时，俄罗斯必将自行其是。从欧洲地缘政治的现实出发，有利于法国复仇的两个机遇都可能出现，而且当一个机遇出现，则意味着另外一个便自动生成。德国成为欧洲的政治中心，反而使德国受到限制。

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不利于德国。德国国内因为普法战争胜利，在被法国民族压制几百年后，民族主义情绪骤然爆发。在这种情绪的喧嚣中，治国者是利用权威来平息非理性意见，还是迎合国内民族主义使德国的战略更加外向，成为决定德国民族命运的关键。俾斯麦的权威可以保证平息非理性民族主义，但不能保证后来也有同等程度的权威来平息事端。作为一代治国和治世大师的俾斯麦，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作为宰相，也不可能解决好这一问题。

有人认为：“在俾斯麦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这样的观点显然只看到了俾斯麦纵横捭阖的风光表面，却没有看到德国在心态上的孤立和地缘政治处境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德国

自己也被自己的大陆体系所束缚，这反而使英国和俄罗斯，甚至是法国具有比德国更多的自由权。

当法德危机于 1875 年爆发时，德国处于欧洲风暴中心，英国和俄罗斯均站在法国一边，俾斯麦已经明显地感知到，德国不能利用力量优势向法国发动战争。从这一点出发，德国面临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德国只有克制保持所谓的中心地位，否则便会招致“群起而攻之”。

俾斯麦是清醒的，但毕竟是他咄咄逼人的言论挑起了危机，纵使其真实意图只是通过恐吓打消法国复仇的念头。结果，“德国的阴谋迫使法国人做了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思想准备。”^[2] 俾斯麦的恐吓言论不仅没有恐吓住法国，反而使法国利用俾斯麦的恐吓言论在欧洲挑起了各个大国对德国舆论和外交攻击。这反映了法、德这对世仇，谁更加强势，谁就可能更加孤立。欧洲侧翼的英俄对于法德两国而言，是必须争取与保持稳定态势的根基。然而，法德危机对于德国最大的影响不是欧洲大国在外交上向德国施加压力和欧洲舆论对德国的惊恐与口诛笔伐，而是使德国产生了这样的心理：欧洲没有人希望德国强大。德国人对欧洲的敌意由此而生。这决定了德国在欧洲大国舞台上孤立的心境，在更加保守的心态上，自信逐步变成了民族自负与孤傲。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均与所有大国为敌，即使不是根源于此，也是自德国统一之初便直接导致这种结果。

俾斯麦主张：“应该努力公正地和热爱和平地来运用我们的强大力量，以便缓和我们变成真正的强国引起的不满情绪。”^[3] 无疑，俾斯麦是冷静的，也是灵活的。基于德国的险恶处境，他的意图就是：“在同一时期内保持不同的选择。”^[4] 所以，他构建大陆体系时有意地讲究重叠和复杂，先后缔结了三皇同盟、德奥罗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等同盟体系。实际上，德国在每一个同盟内都承担了相应的义务。这种同盟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防患于未然，最大的失败就是一个同盟松散导致其他同盟松散，使得德国面对矛盾时，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当中，不仅难以消弭矛盾，而且还使德国承担了超过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作出过多的承诺。大陆体系中的各种同盟，其作用只是大国之间暂时妥协的产物，俾斯麦的作用就是推动大国在需要妥协时，找出妥协的条件。

大陆体系既没有化解欧洲西部的法、德矛盾，而且还故意人为地掩盖中欧和东欧的民族矛盾。权宜之计被当作战略安排来运作，最大弊端就是令同盟之外的大国享有更大的战略自由，而同盟体系内的大国看似处于多数支持地位，然而失去了最需要的战略自由，当自身需要战略自由权时，又不得不以破坏同盟条约为代价。因为它在掩盖矛盾的同时，使得导致矛盾的根源日益顽固。可见，重叠、交叉的联盟体系决定了构建者必须是那些理性、灵活、权威兼具的大师才能驾驭，然而，悲剧性的事实是，俾斯麦并未“把领导国家时可能做到的或不可能做到的事告诉任何人”^[5]。所以，他一旦离职，后续者能否具有大师般的理性、灵活、权威将会是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巨大考验。后来的历史证明，俾斯麦去职后的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秩序的擘划者，都是形势发展的随从者。

有人认为，欧洲大陆大国共同价值观在欧洲均势体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欧洲大陆大国甘心于均势体系。这无疑是“事后诸葛亮”。从当时的欧洲政治现实看，相同价值观的力量从来没有超越过现实政治和实力的博弈。自从三十年战争后，欧洲所有战事的爆发，都是因为实力的博弈，价值观只是每次实力博弈后的寻求暂时和平的手段。而且，欧洲均势体系之所以强调价值观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拿破仑法国并不遵循当时欧洲大陆大国的主流政治制度，为了防止各自国内出现拿破仑法国的政治制度，王朝之间“抱团”来巩固封建制度，防范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共同价值观并没有发挥想象中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国之间争斗的武器，正因为大国之间利用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或者利用敌对大国国内政局不稳而开始动摇同盟。

俾斯麦要维持德国的中心地位，就必须保持大陆体系的稳定；而要保持大陆体系的稳定，首要的就是要稳住俄罗斯；而稳住俄罗斯，又需要利用英国对俄罗斯的制衡作用，同时不能激化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矛盾；而要发挥英国对俄罗斯的制衡作用，又不能使英国人认识到德国将会破坏欧洲大陆平衡；而要避免英国认为德国不会破坏欧洲大陆平衡，德国又需要在法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复仇情绪面前保持克制；而在战败国面前保持克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和政党间压力却又令俾斯麦头疼。在必要时，面对不满的国内民众和政党，俾斯麦不仅需要安抚，有时又需要迎合，发表强硬表态；而发表强硬

表态的结果，又可能导致英国、俄罗斯的不安，一旦英国和俄罗斯不安又会被法国所利用，使德国在欧洲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俾斯麦大陆体系，其实它打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而不是织了一张具有弹性和灵活操作空间的巨网。德国为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走上与欧洲为敌的道路便是必然。俾斯麦的冷静与克制只是延缓了德国在统一后的自大情绪而导致的灾难，俾斯麦本身也解决不了德国的问题，因为他制定的大陆体系的战略本身就有问题。

德国一心想稳住俄罗斯，反而使俄罗斯既可以更加主动地利用法德世仇来牵制德国。在俄国看来，“对一个充满怒气的法国的担心将会使德国表现出安静”^[6]。而且，俄罗斯也可以利用东欧矛盾向德国抬高同盟价码。德国既然必须保持克制，又使英国仍然坚持“光荣孤立”，拒绝德国对英德同盟的提议，导致德国难以利用英国制衡俄罗斯。其实，德国不应当令自己成为欧洲的政治中心，德国应当将政治中心让与俄罗斯，这样可以使英国认为欧洲大陆平衡的最大威胁是俄罗斯，而使德国获得来自英国的支持。而且可以利用奥、俄矛盾在二者之间待价而沽，甚至还可以使法国为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付出更大的代价。然而，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俾斯麦个人性格、国内的政党斗争都不允许德国在经过数百年分裂与屈辱后将好不容易获得的地位拱手相让。

俄罗斯在西部安全中最敏感的莫过于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的广大平原地区毫无天然屏障，非常容易遭到来自西部强国的威胁。德俄关系的稳定对俄罗斯而言是有利的。然而在 1875 年法德爆发危机时，俄罗斯几乎是带有恐吓式的言辞来反对德国，令德国在法德危机中处于尴尬地位。这一结怨，使 1876 年到 1878 年爆发的近东危机中，德国没有像往常那样支持俄罗斯。也许此时，双方至少有一方已经认识到德俄关系已经由普俄时的王朝联盟向实力博弈转变。德俄之间的普俄历史延续基本上已经宣告结束，而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并未形成，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二次“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并不是一种新的关系状态的共同界定，而只是新的关系状态稳定前的妥协。这种妥协不是如第一次“三皇同盟”那样肯定双方旧的实力地位，而是束缚了各自新的实力地位的形成。从德国统一后的历史来看，俄罗斯从未因为俾斯麦的亲俄立场而放弃利用法国制衡德国的努力，俄罗斯至少有一个从

未后退的立场：法国不能再遭到德国的削弱，法国可以、甚至是必须保持欧洲大国地位。对于这一点，将法德世仇置于德国安危高度的德国，对俄罗斯自然要进行和平的反制。也就是说，“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既不可能防止德国力避的俄法同盟，又使德国的自由行动受到诸多条约约束，尤其是在处理和利用奥俄矛盾时，德国丧失了最为需要的灵活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俄罗斯可以利用德国亲俄立场来胁迫德国，破坏德国与其他盟国的关系，因为《再保险条约》与德国其他盟约中所做的承诺相悖。

同时，丧失了在欧洲大陆上行动自由的德国，也难以获得英国的支持，因为英国不仅难以跳出“光荣孤立”的框架，更不可能在俄法结盟垄断欧洲大陆之前，便与一个弱者结盟来保证欧洲大陆均势。何况，如果德国同时与俄法对抗，不威胁英国利益，英国倒是乐见其成。当俾斯麦的继任者发现德国此类问题，再实施“新路线”^[7]时，便已为时晚矣。德俄关系在俾斯麦离职之前，已经使德国丧失行动自由，而《再保险条约》不再延续，使德国的行动自由丧失殆尽。

俄罗斯一直都认为中欧应当成为权力真空，或者权力均衡，主要是防止法国在中欧取得支配性地位，普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写照。当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虽然对于普、奥的中立立场颇有微词，但是也没有强迫普、奥改变中立立场，以防止它们倒向法国，使法国进一步恢复到拿破仑时期在中欧时的地位。然而，当德国统一后，法国主导中欧的威胁已经不存在，而且变成了俄罗斯潜在的盟友。德国虽然看到了这点利害，但也无法稳住俄罗斯。只是当俄罗斯因为要专心向亚洲扩张，从而需要西部边界稳定时，德国可以利用“三皇同盟”来稳住俄罗斯，甚至要支持俄罗斯扩张，而当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最终无法调和时，德国便无法保持中立。如果保持中立，将会同时开罪奥匈帝国和俄罗斯，而如果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国内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又将会使俾斯麦政府面临垮台的危险。

每一个新兴强国在考虑如何趋利避害时，都容易陷入自我的漩涡当中。一方面担心其他国家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实力增长后急于改变现状的冲动。统一后的德国处于典型的国内外环境都无法令自己冷静的历史

阶段，这是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都要经过的阶段，只是因为俾斯麦的出现，德国初生时所遭遇的浮躁得以延迟，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成长中必经的阶段不会到来。

俾斯麦治下的德国是历史上新兴强国中难得出现的、能够自我克制和防范敌对性孤立的典范，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德国逃离历史怪圈。俾斯麦过分专注于法德世仇，总是强调：“谁也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法国再次强大之日，就是和平结束之时。”^[8]正因为高估法国对德国复仇产生的影响。所以，俾斯麦才那么“倾心”于一个时刻容易失去理智并缺乏安全感而处于躁动中的俄罗斯。事实证明，要维护与一个不稳定的大国的关系，除非比它还要不稳定，否则只能处处受制于它的不稳定，失去了对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也失去了在秩序中的位置，或者只能拥有一个空虚的头衔。俾斯麦是以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为代价而“俯身”于俄罗斯的，也就是说，只要俄罗斯的举动可能导致奥俄矛盾或者德俄矛盾，那么德国就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让步，要么翻脸。这两种选择无疑使德国处于两难的衡量当中。让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难以平抑；翻脸，法国便会乘机利用。

俾斯麦之所以将德俄关系作为德国安全与地位的根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从个人的历史经验中仍然把德国当作扩大版的普鲁士，而不是一个新型大国。在历史上，普鲁士受影响的两个大国就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普鲁士从七年战争开始，便开始与奥匈帝国争夺德意志民族的领导地位，普鲁士一直利用俄罗斯来制衡奥匈帝国。普鲁士无法与俄罗斯、奥匈帝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普鲁士一直是俄罗斯的依附者，俄罗斯也乐于看到普鲁士与奥匈帝国之间明争暗斗。这种历史传统延续至俾斯麦时代。当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担心人口数量处于优势的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加入德国后，将取代信奉新教的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将奥地利并入德国。德国没有将奥地利并入，足以说明俾斯麦并不是要创建新型德国，而只是扩大普鲁士。当然德国没有并入奥匈帝国，也就没有颠覆当时的欧洲整体战略格局，这意味着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历史积怨在德国统一后开始化解。试想，如果德国将奥地利并入，则是对欧洲均势体系的剧烈颠覆，可能立即导

致俄罗斯与法国结盟。俾斯麦没有并入奥匈帝国是从普鲁士的传统出发，而不是超越普鲁士的传统，这说明俾斯麦从内心中仍然是欧洲历史经验的传承者，而不是超越者。

二是欧洲大国当时都是既定历史与现实的继承者。德国既无法化解法德世仇，又无法与英国结盟。取得暂时的和平艰难，而取得世仇的谅解更加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德世仇的和解也是建立在法国谋求美、苏之外的独立地位与德国已经战败而失去发动战争意志和能力基础之上。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诸多大国历经残酷之实力博弈，世仇早已溶入骨髓，每一次战争之后的和平都是权宜之计。法国不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始作俑者，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受益者，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法国的基本战略便是保持德意志分裂，尤其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更是利用德意志民族分裂对其百般羞辱。普法战争是普鲁士历史上首次在双方独立进行的战争中战胜法国的一场战争，统一后的德国不可能将世仇释怀，无论是统治层还是民众，都有置法国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态。德国对法德世仇的担心和实力增长后的自负使德国不可能摆脱世仇的观念来运作自身的战略。而英国看到俾斯麦并无破坏欧洲大陆均势的意图，也就乐于继续坐享欧洲大陆均势给自己带来的海外自由。实际上，英国对于德国统一是矛盾的。英国既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恢复到拿破仑时代的地位，也不希望德国的出现导致欧洲大陆均势遭到破坏。然而，英国那时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德国，而是俄罗斯，德国一旦与俄罗斯保持友好，甚至在统一之初便向俄罗斯示好，很难使英国相信德国会成为制衡俄罗斯的帮手。所以，德国无法动摇英国“光荣孤立”的立场。基于这样的格局，德国自然会延续普鲁士时代继续亲俄的立场。

德国应当着手推动奥俄之间在巴尔干矛盾上的妥协与解决。俾斯麦希望利用奥俄矛盾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促使德国不能开罪于任何一方，只有对两边不断作出承诺方能保持影响力。当矛盾激化时，德国却无法再行“善意”中立，陷入被动便是必然。比如，俄土战争之后的柏林会议，俾斯麦为了制约俄罗斯，联合英国与奥匈帝国迫使俄罗斯交出在战争中得到的部分领土，这使俄罗斯认为俾斯麦假意支持俄罗斯，实际上是在背叛俄罗斯。俾斯麦的亲俄政策令其很少从中获益，反倒是增添了自身的负担。虽然“三皇同盟”

之后得到保存，但是只是基于各自暂时避免矛盾激化的需要，而不是矛盾根源的解决。当《再保险条约》于1890年期满时，俄罗斯主动提出续约，这可以证明，俾斯麦时代的德俄关系令俄罗斯感到“满意”，而威廉二世拒绝在既定条款上续约，这也反映了威廉二世对俾斯麦时代亲俄政策的不满。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再保险条约》并没有指出俄罗斯在法德之间的明确义务，相反使俄罗斯得以利用《再保险条约》，不仅用法国问题牵制德国，而且还使德国在奥俄矛盾上失去主动权。

德国在欧洲左右逢源时，需要强化俾斯麦的个人权威，因此，出于巩固个人权威的考虑，德国国内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出现过多的自由色彩。德国便成为了“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9]。这种国家受着容克思想的影响，国内采取自由主义经济，而对外却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国内现状使俾斯麦所有的内政外交均是为了“维护传统统治精英的优势地位，维持迄今受保护的社会等级和专制权力结构”^[10]。俾斯麦在建国之初尚能压制海外殖民的呼声，因为他认为：“一方面建立和维持殖民地的成本，往往超过殖民母国所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德国的海军也缺乏足够的力量去保护遥远的殖民地。”^[11]但随着国内专制制度对自由经济的压制，当出现经济发展瓶颈后，俾斯麦不得不“顺应潮流”，开始赞同在海外开展殖民活动。因为德国的经济实力雄厚和国内开展海外殖民活动的热情高涨，所以，德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这个庞大的殖民体系不仅象征着德国正式走出欧洲，实力伸向海外，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的传播使德国受益，而且在获取新的更大的市场之后，德国的战略视野也开始越过了欧洲的边界。然而，德国建立庞大的殖民地是在英国陷入与法国的海外殖民争夺和俄罗斯争夺中亚时进行的，并不是强大海权的结果，俾斯麦也没有抓住时机发展海上力量，等到威廉二世发展海上力量时，最佳时机已经丧失。

对于德国而言，诸多大国中，最需要稳住的大国莫过于英国，德国应当将主要精力置于英国之上，只要英德关系稳定，即使法俄同盟出现，德国也可以使英国看到法俄联合主宰欧洲大陆的后果。而且法国与俄罗斯都担心独

自与德国对抗，反而使英国认为维护德国地位有利于欧洲大陆均势。

出于私利的战略，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具有足够的生命力，取决于战略家对明确具体的国家利益的认知。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俾斯麦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明确具体的，但也是狭隘的。他极端地希望没有偏见、不受感情左右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在当时的欧洲，为现实利益的单纯考虑的战略思维大行其道，但没有一个政治家像俾斯麦那样对国家利益的认知那么明确具体。赤裸裸的现实利益交换，其战略互动的结果仅仅能备一时之需。在俾斯麦心中，德国利益就是两个：一是防止法国复仇，二是防止出现反德同盟，其余均与德国无关。这种近乎神经质的褊狭心态，使德国以己度人的程度比所有国家都要深，最终导致德国孤立于欧洲大国之外。

德国孤立于欧洲体系之外还有根本的经济原因。德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对境外市场依赖和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建立庞大的殖民体系后，德国经济又飞速发展，巨大的经济发展辐射到与德国邻近的中欧，这势必与俄罗斯、奥匈帝国在中欧产生经济利益矛盾。俾斯麦的亲俄政策最大的弊端就是使俄罗斯的诸多内在因素中，不稳定性因素只是得以扼制，而并没有消除。俄罗斯内在独特的地缘和文化也许决定了俄罗斯是所有大国中最具不确定性的。而德国试图安抚、拉拢俄罗斯，只是在满足俄罗斯不断增长的胃口，通过安抚、拉拢的方式来稳住俄罗斯，实质上是与虎谋皮。俾斯麦对俄罗斯过软，而后来者威廉二世对俄罗斯又太硬，德国在前后对俄罗斯政策上缺乏灵活性，导致自身战略陷入僵化。

德奥同盟也许是德国运作得最为成功之举。奥匈帝国是距离德国最近的大国，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态度可以被英国、俄罗斯视为德国野心限度的试金石。德国与奥匈帝国同为德意志民族，德国如果对奥匈帝国像对法国那样，在打倒的基础上再踏上一脚，不仅欧洲难以接受，可能德国国内都难以接受。

当德俄关系于柏林会议开始恶化后，德奥同盟便自然出现。俾斯麦无非是希望制约俄罗斯，使俄罗斯回到以前的德俄关系当中，防止俄罗斯与法国结盟。从后来的历史看，德奥同盟的确起到了震慑和制约俄罗斯、法国的作

用，因为俄罗斯在奥俄矛盾尚未解决时，又忌惮德国的实力，而且需要专心于在亚洲扩张，所以俄罗斯并不愿意与法国结成同盟而与德国敌对。然而，这纯属德俄之间的短期交换，德国丧失了对俄罗斯长远的影响力，而且德奥同盟使“早已虫蛀了的奥匈帝国旧帆船”^[12]成为德国的负担，而不是帮手。

俾斯麦明白德俄关系利害的核心，他认为“不能允许奥国被摧毁或依附于俄国，因为俄国政策的骄横性质使德国难以单独在同一大陆和俄法睦邻相处”^[13]。所以，他将制约和稳住俄罗斯的希望寄托于德奥同盟上。但这只是在奥俄之间进行平衡与牵制，他并未想过或者试图努力来解决二者的矛盾，使自己终将面临着二选一的僵化境地。因为俾斯麦没有主动推动矛盾的解决，使奥匈帝国只能利用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对同盟的依赖，由德国提供安全保证，这导致俄罗斯对德国只是有限妥协，并未作出真正让步，反而令俄罗斯不受同盟的约束，利用法国向德国复仇心理来向德国施加压力。

当然，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可不只是在它的西边，它在南边和东边都受到英国的战略挤压。所以，俄罗斯不愿意与德国处于敌对状态，并希望利用德国来缓解来自英国的压力。而且，考虑到俄罗斯和远东和中亚的利益，俄罗斯也相信德国在俾斯麦的统治下，并不会像英国那样毫无退让。

自从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几乎所有的困扰都来自于俄罗斯。德奥同盟同样是缓解德俄关系恶化的灵活举措。但是大陆体系的弊端就在于，当一个同盟建立时，便意味着必须要建立更多同盟来保证该同盟的可靠性。俾斯麦作为一个同盟大师，仍然不能脱离这个定律，约束别国的同时，也使自己被同盟义务捆绑。当然，德奥同盟使俄罗斯利用法国来向德国施加压力的意图暂时落实。因为在英俄矛盾白热化的情况下，如果俄法同盟出现，那么德奥同盟便容易扩大到英国。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法国是否愿意因为俄罗斯而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存在巨大冲突风险的情况下损害与英国的关系，答案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不保险的。

也许有人认为，德奥同盟具有防止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矛盾得以谅解的考虑，这无疑又是简化的对抗性思维在作祟。奥俄在巴尔干的矛盾根源深刻而复杂，即使双方存在同等强烈的谅解意愿，也需要长期的谈判与博弈，在这一长期谈判与博弈中，德国也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操作空间来游刃有余地在

两边进行平衡，以提高自己对两边的影响力，这显然要比利用同盟来形成复杂“网”来约束所有人都要有利。可见，欧洲最终爆发大战，并不是因为缺乏构建秩序与体系的大师，而是解决矛盾的难度超越了秩序的需要，以致最终让希特勒这样的人酿成巨祸的方式使欧洲和整个世界陷入战争的灾难。

“条约应该在可能的事件进程已经是可以预见的时候缔结。”^[14]俾斯麦把德国几乎所有的外部安全都置于组建同盟上，这意味着俾斯麦必须时刻关注着危机，必须与时间赛跑，在危机出现征兆之前通过同盟和外交场合来弭平危机。既然如此，德国便丧失了使用任何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意味着德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所以，每次出现危机，尤其是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巴尔干矛盾激化时，往往是法国“挑事”的最佳时机。俾斯麦的同盟之策只是应之时之急的战术性安排，对于矛盾的解决毫无裨益。

当德国与奥匈帝国因为德奥同盟而增加安全感时，俄罗斯自然会受到震慑，但俄罗斯又缺乏足够的意愿与法国结盟。俄罗斯的两难心态使俄罗斯对德国的质疑与日俱增，而又暂时无法与德国走向敌对。所以，德奥同盟可以看作是俾斯麦对德俄关系恶化的补救，也可以看作是奥匈帝国增强安全感的举措。但其效果的产生不是因为德奥同盟本身，而是英国使俄罗斯更加忌惮。如果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问题得到和解，那么俄罗斯可能不会被迫再次同意“三皇同盟”。将俄罗斯作为主要防范对象的德奥同盟和俄罗斯的“三皇同盟”，这时已经成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暂时妥协，而不是像第一次三皇同盟那样，其目的是维持稳定。此时的三皇同盟，是两个军事盟友（指德国和奥匈帝国）与另外一个共同防范对象的同盟，本身就预示着同盟随时瓦解的命运。同盟内部分歧时，每次都会形成固定的二比一，足以使另外一个孤立者不满，一旦它获得其他外援，这种同盟便宣告结束。因为从某种程度上看，第二次三皇同盟使俄罗斯面对德奥同盟时有一种遭到胁迫的感觉。

德奥同盟的出现说明，在奥俄之间，德国选择了一个强者作为主要对手，拉拢一个弱者作为帮手。从一般的战略举措逻辑来看，这无疑再正常不过。但是从当时欧洲政治现实来看，俾斯麦要么没有充分考虑奥俄矛盾对德国的影响，要么无法充分考虑奥俄矛盾对德国的影响。德国能够用于制约俄罗斯的大国中，只有奥匈帝国一个可以为之所用。这不仅是因为德奥两国同

文同种，而且还因为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巴尔干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需要强大的德国作为外援。德奥同盟显然更加有利于处于弱势的奥匈帝国，一旦奥俄矛盾激化，就预示着德国必须为奥匈帝国“火中取栗”，否则，不履行德奥盟约的德国将会由于示弱而刺激其他大国“得寸进尺”。同时，如果德俄矛盾激化，奥匈帝国却难以成为德国的帮手。

俾斯麦利用了俄罗斯与英国之间在中亚和远东存在诸多矛盾的有利时机稳住了俄罗斯，利用了德奥同盟产生的对俄罗斯的一定的震慑。但这并不是依靠战略压制和实力博弈，而是一个大师非凡的战略设计，只是俾斯麦的战略设计从来没有致力于根除导致俄罗斯不稳定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俾斯麦的对俄战略具有战术性效果，而丧失了战略性效果。德国仅凭一己之力甚至德奥同盟未必能够使俄罗斯“老实”，欧洲单个国家中，英国是对俄罗斯产生最大震慑的国家，因为德国的强大军力常常遭到法国复仇而分散。所以，对于德国而言，最重要的应当是英德关系，而不是德俄关系。德国无须通过三皇同盟，或者不需要同盟的形式也可以稳住俄罗斯，只是德国并没有利用英国这一有力杠杆。这说明陆权新兴大国如果缺乏海权支持，早晚会受到其他陆权大国联合遏制。这同样也说明，大国之间最难稳定的是与距离最近的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距离最远的国家的关系。

普法战争已经震惊了英国，下议院在野党领袖迪斯累里在辩论时说：“法德战争意味着德国的革命，其政治影响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必须表明，我们能应付新的、尚难辨识的危险……力量的平衡已遭到彻底破坏，对于这一重大变化的后果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英国。”^[15]然而，英国并没有放弃“光荣孤立”，而是“静观其变”，使德国存在相当大的机会来重新考虑地缘政治安排，然而，俾斯麦并没有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极佳机遇，相反仍然是策略性地希望用英德关系来制衡德俄关系。他把所有大国当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把德国自己当作棋手。这只能体现俾斯麦的战略眼光与精明，是构建秩序的大师，但绝非秩序的变革者，地缘政治思维并没有突破欧洲大陆的局限性。所以，俾斯麦不能缔造和平，只能延缓战争。俾斯麦也许意识到、也许没有意识到德国自身也是同一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即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仍然把德国当作棋手，而不是棋子。

实际上正是每个欧洲大国都把自己当作棋手，把别国当作棋子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实力博弈越来越赤裸裸，越来越令人窒息，而又无法退却，最终失去了妥协与弹性的空间。

有人认为德国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了“半个霸权”^[16]，其实德国谈不上霸权，欧洲秩序的决定者仍然是英国和俄罗斯两个侧翼大国，尤其是英国。从某种意义上看，俾斯麦的亲俄和限俄简直是英国不用承担结盟义务的帮手，所以，英国乐享其成，既不用改变“光荣孤立”立场与德国发展更为亲密的关系。因为即使不与德国结盟，德国也会在欧洲大陆上试图稳住俄罗斯，不让俄罗斯来破坏欧洲大陆平衡，当德奥同盟建立后，英国更是可以利用德奥两个大国共同制衡俄罗斯。任何不破坏欧洲大陆均势的大国博弈，对于英国而言，越剧烈越有利。如果英国与德国缔结同盟，那么俄罗斯与法国会立即成为同盟，或者英国为了遏制德国，推动组建法俄同盟，那么孤立的德国则更加倚重英德关系。这两种选择当中，无论哪一种都对俄罗斯不利，因为它们都会使俄罗斯单独面对德、奥两个大国，即使战胜德、奥，其欧洲大陆地位亦会因为德、俄两败俱伤而被法国取代。

俾斯麦的对俄战略只是菲特烈大王对普鲁土地缘政治战略的修正。德国最需要的是稳定的欧洲大陆，而俄罗斯却是欧洲大陆最不稳定的大国。基于此，德国自然最需要稳住的國家是俄罗斯。普鲁士的菲特烈大王就明示过：“政治的首要原则是尽力与其最危险的一个邻国结盟。正因为如此我们与俄国建立联盟，只要联盟继续，我们就有一个自由的后方。”^[17]但时代已经变化，这条战略原则只适用于法国和奥地利是普鲁士的主要威胁时。而统一后的德国的主要威胁并不在于法国和奥地利，而是俄罗斯，虽然德国不可能与法国化解历史积怨。对于一个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便在欧洲大陆上纵横捭阖，而且地位高于德意志民族的法国而言，普法战争的失败是不可接受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一味选择孤立法国，无疑是在意图捆住法国时，也想使欧洲大国明白：影响德国的方式至少有一种比较有效，即令法国成为制衡德国的有力杠杆。

任何可能使法国恢复或者刺激法国复仇的做法都会使德国进退两难：要么将对方推向法国的一边，要么在既定立场上退让。这都是德国难以接受而

必须面对的现实。与一个强大的邻国为敌，其压力会导致自己失去在更大问题上的灵活性与主动性。

令其他大国望而生畏，容易满足自身民族自尊心和强化自信心，但也容易使对方产生敌意而令自己处于两难境地。尤其是德国，西边与法国的仇恨无法化解，且无心化解；东边与俄罗斯在奥俄矛盾上只能左支右绌。德国的僵化可想而知。

法德矛盾使双方都无法成为解决矛盾的受益者，而是积累矛盾的受害者。真正的受益者是英国和俄罗斯。这与今天的东亚秩序又何其相似。当两大强国相争乃至导致战争时，受益者也会变成受害者。

俾斯麦对法德世仇的无法化解导致的恶果就是德国在两边战略都推动了灵活性。俾斯麦向俄罗斯外长哥尔查科夫表白：“如果德国的一个好朋友要求他，为了保持他们相互之间更好的友谊就要把俄国当作敌人来对待，那么，德国一定要和这个朋友保持距离。”^[18]也就是说，德奥同盟的目的就是迫使俄罗斯必须加入到三皇同盟中的迂回之策。然而，因为总体格局的僵化，最终使德奥同盟成为真正的军事同盟，而俄罗斯反而可以自行其是，甚至与法国结盟，这无疑是德国对俄的失败。当然，失败不是根源于对俄罗斯的判断上，而是利用格局的方式上。

俾斯麦将俄罗斯作为联盟体系的主轴，一切均围绕稳住和制衡俄罗斯而进行，但举措过于随意化，以致许多同盟失去均势格局节制。构建均势者，最终破坏均势，从这个方面讲，俾斯麦的节制只是宣示德国非好战，而不是内心具有节制的能力与真正的战略定力。多个同盟的重叠使基本的价值原则变成短期的务实心态，这无疑又促使同盟各方以极端现实的心态对待同盟。这种心态支配下的同盟，其可靠性和严肃性其实已经荡然无存。因为缺乏所有利益相关大国的集体协商，所有矛盾只能依靠个别大国从中以所谓的游刃有余的纵横之术来缓和，反而使固有矛盾继续固化。俾斯麦的成功只是证明了所谓的均势体系的失败。

德国统一对欧洲均势体系最大的冲击不是主人代替主妇，而是欧洲均势体系的构建者沦落为欧洲大国秩序“牌局”的观望者。以前欧洲均势体系的中心位于奥地利，而克里米亚战争后，又有在巴黎重新出现的迹象。而普法

战争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处于尴尬地位的奥地利已经认识到自己更加无力与统一的德国来延续普奥关系，必须以一种新的模式来界定德奥关系。因为奥匈帝国已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大国。奥匈帝国西连德国、东连俄罗斯，与德国同文同种，而与俄罗斯在巴尔干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奥地利只能利用德国这一新兴强国来抗衡俄罗斯。奥地利必须依附于德国才能勉强维持名义上的大国地位，奥地利能做的事情是尽可能使德国认为德奥同盟是德国战略同盟体系中最为可靠的。无疑，从后来的历史看，奥地利是成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大同盟集团的形成便是佐证。而且奥地利对于奥俄之间在巴尔干的矛盾的使用可谓利用大国矛盾的经典。奥俄矛盾的存在使德国始终认识到如果因为奥俄矛盾而放弃奥地利，德国很可能在德俄关系上处处被动。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前后的对俄战略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变动。俾斯麦亲俄立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使得德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在俄罗斯对德战略中并未反映出来。俄罗斯仍然以对待普鲁士的心态来对待德国，并且“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19]。这样的互动至少会造成一种恶果：当对方出现一个超出己方的心态的举动时，出乎意料会导致对对方意图破坏现状和威胁的过分误判。而实力地位的改变必定会出现超出惯常心态的举动。

德国亲俄立场不是内心亲近和战略立场一致，而是稳住和制衡。所以德国不但利用组建德奥同盟来震慑俄罗斯，而且推动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签订“《地中海协定》”^[20]，意在从俄罗斯南方出海口上制约俄罗斯。德国悄悄参加《地中海协定》后，又在《再保险条约》中向俄罗斯承诺，德国支持俄罗斯在地中海问题上的立场，无疑，俾斯麦此举实质上是鼓励俄罗斯向黑海和地中海扩张，从而与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发生矛盾，使俄罗斯和英、奥、意均需要德国作为平衡手。

然而，这样的设想只适合于危机不爆发时，一旦危机爆发，德国在俄罗斯和《地中海协定》缔约国之间便只能左右为难。德国在俄罗斯与英、奥、意之间互相矛盾的立场，不仅使俄罗斯认为德国在出卖自己，还失去了与英国合作的可能性。这样，德国在德俄关系中处于僵化地位时，又难以获得英国的谅解，所以当俾斯麦的继任者推动新路线政策时，只能向英国让步，但

并未获得英国与之进行对等交换。1890年7月，德国与英国签订《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时，以东非部分殖民地与英属北海赫尔果兰岛交换。德国虽然作出重大让步，但仅仅获得了英国与德国的暂时友好，而且又为英德未来地缘政治斗争和殖民地冲突埋下了伏笔。

德俄关系的断裂不是俾斯麦对俄战略的错误，而是德国和俄罗斯追求赤裸裸的现实利益的极端利己者互动的必然结果。当俾斯麦将俄罗斯作为大陆体系的主轴时，便已经决定了德国面临着俄罗斯始终将法俄同盟作为制约德国的险境，而俾斯麦富有技巧的同盟运作一直在化解俄罗斯给自己带来的压力，这相反给俄罗斯增加了压力，最终难以避免德俄关系暴露本质的结局。法德危机中俄罗斯先吓阻德国威胁法国，再是在近东危机中，德国在柏林会议中令俄罗斯沙皇甚至认为那是一次俾斯麦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尽管俾斯麦极力声称他“对俄国所作的贡献，比起俄国自己的外交家所作的总和还要多”^[21]。俾斯麦后期，德俄关系已经到达极限。德国认为俄罗斯随时可能迎合法国组建法俄同盟，而俄罗斯认为德国在奥俄矛盾中必定会偏向于奥地利。而英国又以作壁上观为荣，如此的欧洲，看似中心位于德国，实则根本没有重心。

俾斯麦判断大国威胁时，仍然沿用普鲁士时期的思维方式，在获得更加强势的实力后，保持冷静和克制是应当的，但对法国和俄罗斯的举动比普鲁士时期更加敏感，这反映了德国的地位来之不易，也反映了德国并未成熟到可以驾驭欧洲格局的地步。德国、俄罗斯其实都不具备驾驭欧洲格局的意志与能力，真正最具这种能力的是英国。俾斯麦的成功是德国在统一过程中并未受到英国与俄罗斯的强力干扰，而这又并不是单纯的俾斯麦式的成功，而是英国和俄罗斯都不希望法国继续强势恢复到拿破仑时期，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传统弱势地位没有引起英国和俄罗斯足够的警觉而使俾斯麦获得成功。俾斯麦的失败之处就是过于看重俄罗斯而失去了与英国更加良好互动的机会。俾斯麦的失败使后来者在无法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失去了与俄罗斯保持弹性的机会。

俾斯麦的个人性格非常适合危机时代，而不适合危机之后着手根除危机的缓和时代。每一个新兴大国，在初始阶段无一不被伟人的个人性格和

其对偶然事件的应对所掌控。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统一的可能性一点也不会比他担任普鲁士宰相时小，只是进程问题。因为在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小邦之间已经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甚至出现了欧洲首个地区性关税同盟，甚至还可能不用王朝战争的方式统一。但俾斯麦这一伟人的出现，使德意志民族身上固有的铁血意志和理性思想在可能的最短时期内迸发出来。在这个最短的时期内如此辉煌，也许连俾斯麦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何况普通的德意志民众。但是在德国统一之后不久，他便提出：“无论如何我们在将来需要的都不仅仅是作战的军备，而且还需要有正确的政治眼光以便使德国这条航船通过种种同盟的激流。”^[22]可见，俾斯麦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从这一点看，他超越了路易十四、拿破仑，超越了查理大帝和腓特烈大帝，但还没有超越欧洲的历史，因为他从来都只是黎塞留、卡尔斯雷、梅特涅等均势体系构建者的翻版与模仿。俾斯麦的历史作用只是将欧洲历史舞台的主角进行了转变。然而，正是这一主角的转变，才开始了整个世界的巨变。正是因为俾斯麦的理性与克制，使英国认识到德国的出现只是另外一个法国而已，并没有敏感地意识到德国对欧洲大陆均势平衡的必然破坏作用。英国并没有将英德关系置于应有的地位予以重视，所以，英国也就不可能想象到德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破坏比之前的拿破仑法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俄罗斯还要强烈。俾斯麦的出现是在为世界性巨变做准备，如果没有德国这一强力挑战，也许英国被美国取代的历史进程不会只限于短短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从这一意义上说，德国改变了欧洲，为美国的崛起与称雄作出了最合理、最公正的注脚。

威廉二世时代：交错中的冲动与误解

威廉二世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又为普鲁士贵族的尚武精神所感染，年仅29岁便已经担当刚刚统一仅9年的德国，自然具有老臣俾斯麦难以理解的复杂情感和雄心壮志。威廉二世提出的世界政策，反映了德国实力日益增长时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的喷发，但也深深地带有威廉二世的个人

痕迹。俾斯麦之所以冷静而克制，并且注重德俄关系，其本质就是要求德国不能冲动，否则容易四面树敌。

威廉二世既没有俾斯麦在民众和政党中的威望，也缺乏俾斯麦的战略定力。当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处于激昂状态时，尚有俾斯麦可以驾驭，而一旦俾斯麦去职，被压抑的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处于亢奋之中。这种情况下，雄心壮志且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威廉二世岂能没有“士气可用”之心。“顺应民心”不仅是帝王驾驭时局的有效方法，而且还能彰显雄才伟略。

威廉二世其实也看到了危险，看到了俾斯麦时代德国的软肋，受制于一个根本不稳定的俄罗斯，所以威廉二世开始热衷于英德同盟。然而，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只希望与德国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进行有限合作，对于同盟毫无兴趣。而且，德国已经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利用英法、英俄矛盾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建立起广袤的殖民体系，这一巨大成就使英法、英俄矛盾暂时平息，并使英国有精力对德国日益扩大的殖民体系予以密切关注。此时的德国如果能低调行事，那么英国拒绝德国结盟提议的方式也许不会令德国感到羞辱。如果没有感到羞辱，威廉二世也可能不会在之后那么咄咄逼人。

俾斯麦亲俄政策的后果就是使德国因为俄罗斯而日益丧失自由行动的空间。威廉二世既不愿意在俄罗斯面前感到被动，但也不愿意与俄罗斯决裂。所以，在《再保险条约》到期之后，威廉便着手构建新的德俄关系条件，这些条件又使在德国面前总是处于心理主动的俄罗斯难以接受。因此，德俄关系失去条约保护，这又给时刻想复仇的法国以推动法俄同盟的机会。德国之于俄罗斯，只是希望随着德国国力的增长对俄罗斯有所制约，而俄罗斯并不买账，仍然根据俾斯麦时代的德俄关系来构建德俄关系。德俄关系的破裂，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俾斯麦对俄罗斯的影响过于敏感，甚至有所高估，以致俄罗斯从来不愿意在战略层面上对德国有所妥协，俄罗斯的这种心态延续到了威廉二世时代。

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作为欧洲政治中心的代价是失去了对周边大国的战略自由权。其后果却由不可能完全延续俾斯麦政策的威廉二世来承担，而威廉二世又矫枉过正，这是一个新兴强国的悲剧。新兴强国的奠基之人，通常能够冷静、克制，经过多年的政治风浪与磨练，而新兴强国的继承者，通常

锐气十足，往往容易出现这样一个情势：即使没有失去对国际格局与实力地位的正确判断，在落实理性战略的具体言行中也会显得不合时宜地咄咄逼人。

有人认为是威廉二世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导致了德国陷入与英、俄、法同时对立，威廉二世个人在德国的战略转向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应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历史往往夸大个人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中已经被证明失败的战略，其失败战略的制定和贯彻都应当由主要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威廉二世也许有好大喜功之特质，甚至是色厉内荏。但是，俾斯麦对德国民族主义的激发使德国再也不可能分裂，即使是在后来长达 59 年冷战的分裂状态，德国仍然重新统一，这不得不归功于俾斯麦对德国富有理性与激情的构建。然而，俾斯麦是在“梅特涅的体制中培养成人”^[23]，自然会带有非常深刻的均势与同盟的痕迹，而且深深沉醉于均势与同盟的现实政治当中，势必又会受到均势与同盟的局限而不自知。俾斯麦也许认识到了梅特涅体系的弊端，但仍然指望用梅特涅式的均势与同盟方式来解决德国的问题，如何能够成功呢？如果俾斯麦能够以解决欧洲的问题来解决德国的问题呢？历史已经过去，但后来人却可以从中假设而使自己站在远端更加清晰地观察历史。

极端的利己者，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习惯性地忽视世界格局的大势。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况看，德国对于世界格局失之于理性的分析，并不是始于威廉二世，而是始于俾斯麦。世界上主要矛盾是英俄矛盾，而德国尚未对如何利用英俄矛盾进行全盘规划与运作，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地自顾安危。

俾斯麦的如意算盘是“除法国之外，所有强国全都需要我们；并且利用它们互相倾轧，尽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们结盟来反对我们”^[24]。然而，当所有强国都需要德国时，德国也就更加需要其他强国的配合。而现实是，并没有哪个强国甘愿“配合”德国。当俾斯麦离职后不到一年，法国与俄罗斯签订了同盟协约，次年又签订了军事协定。俾斯麦极力阻止的反德同盟已初具雏形。

也许如果俾斯麦将用于稳住俄罗斯的精力与资源用于如何运作英德关系，那么也许德国能够获得比后来更多的来自英国的支持。然而，俾斯麦只

是着眼于应边境安全之急来构建秩序，也就因此没有将英国置于适当位置。俾斯麦也曾极力推动英德同盟，但却是在与俄罗斯恶化后如此作为，英国又怎么可能为德国“火中取栗”呢？英国为什么不乐见于德俄恶化呢？这使德国在德俄关系恶化时，只能成为欧洲最容易陷入多线作战的强国。因为法德世仇使德国无法与法国保持灵活立场，使得德法关系日益僵化，而德国与法、俄两个欧洲大陆大国关系陷入僵化，英国又不可能在认为德国威胁到欧洲大陆稳定的情况下，像七年战争时期支持普鲁士一样支持德国。德国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消除英国人认为德国是破坏欧洲大陆均势的始作俑者，这一问题直到威廉二世时代才得以强化。

当俾斯麦离职之后，德国面临着的情况是这样的：西部的边境是渴望复仇并已经开始恢复的法国，东部的边境连接着日益对德国开始厌恶但又担心德国的俄罗斯。这样的德国，自然会想到英国，而此时的英国不仅与法、俄等利益冲突有所缓和，而且根本不愿意与德国站在一起与法俄对抗，因为这无疑是英国为德国“火中取栗”。

德国日益强大之时，整个欧洲和世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俾斯麦离职的1890年前后，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经济快速发展；日本经过30年的明治维新，国力已经开始在东亚地区增强；中国（当时的清朝）经过洋务运动也开始出现国力恢复之状；英国和法国正享受着全球殖民体系的红利；俄罗斯不仅在亚洲专注于扩张，而且也在东欧、南欧扩张。德国崛起与英国、法国崛起时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英国和法国崛起时，都是当时的既定大国处于争锋之时：英国崛起时，正值西班牙和荷兰争锋；法国崛起时，正值三十年战争；俄罗斯崛起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在1890年前后，既定大国之间虽有矛盾但远未激化，甚至还有妥协之可能。而且，德国周边矛盾缠身。如果德国仍然沿用以往的大国方式来解决，无疑是“用老曲唱新戏”。德国所处的年代是群雄并起，是正在积蓄力量也在酝酿矛盾的历史时期。“德国对于欧洲的均势来说太过强大，而对于整个大陆的霸权来说，又太过于弱小。”^[25]

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历史当中，任何一个在突然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变得强大起来的国家，都像德国那样，满怀着雄心壮志来宣扬国威。德国皇帝威

廉二世 1896 年宣称：“德意志帝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帝国。”^[26]此时，德国的确拥有令人自豪的底气。德国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在它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时，英国、法国、俄罗斯正在吃着“先发者”的“老本”。

力量强大总是伴随着利益向外拓展，德国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其国内的战略视野却没有随之相应扩大，而只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针对单个国家具有更加主动的意味。德国要么只盯着俄罗斯、要么只盯着英国的战略思维方式，在由内而外膨胀的民族自信心的催化下，对外举措变得令所有大国都感到了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由于俾斯麦的冷静与克制，使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其主动的、显著的咄咄逼人的举措与言辞之间的反差，刺激了其他大国的敌对心态。

俾斯麦去职后，“德国的专业外交官中几乎所有人都一致反对再签《再保险条约》”^[27]。德国无法再延长德俄关系的《再保险条约》，因为德国再也不希望自己在把握主动权时却需要仰俄罗斯鼻息。而且从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来看，“德国完全有理由依靠英法、英俄之间的竞争而不会出现他们之间持久的相互理解，英国迟早会要求与德国或三国同盟结盟”^[28]。德国那个时期作出如此判断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历史学派的观点来看，英国始终在坚持光荣孤立的立场，德国与英国结盟的提议不可能得到积极回应。所以，德国的新路线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也有人认为德国不应当改变俾斯麦的大陆政策。然而，当时的德国面临的现实大陆体系使德国丧失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需要的灵活性。

英德之间没有同盟并不是因为英国与德国没有共同利益。而是德国对危机的认知与英国对危机的认知大相径庭。德国一遇到紧张关系或者危机便可能作出激烈的反应，而英国遇到紧张关系或者危机时便立即作出激烈反应的可能性比德国要小很多。同样程度的紧张关系，德国暴跳如雷的时候，英国可能正冷眼相待。英法之间在 1893 年和 1894 年爆发危机时，德国认为英德同盟可以推动实现，但英国仍然在衡量利弊。

从威廉二世的个人情况来看，他既受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受传统的普鲁士贵族精神的熏陶，是德国统一并快速强大起来的见证者，也是德意志民族历史的继承者。拥有“转型一代的双重人格，是处于威廉一世和俾

斯麦时期的旧普鲁士世界与大工业社会的现代世界之间过渡的一代人”^[29]。丘吉尔和后来的基辛格等人对于他的个人性格特点均作出过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是威廉二世的好大喜功和冲动易怒、色厉内荏使德国丧失冷静以致四面树敌。然而，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便认为威廉二世的个人性格和思想对形成反德同盟的作用被夸大了。

即使德国对英德结盟的提议没有得到英国的积极响应，德国不再延长《再保险条约》，德国的安全形势同样不会恶化。德国的问题是形势平稳时过于高调，令人担心它导致的威胁，而当危机爆发时，又极力避免危机升级，令人看到德国既无力、又无心来应对一个强大的包围德国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既令人害怕，又使人看到其虚弱的一面，这样它孤立于强国林立的欧洲便是自然之事。如果德国在平时尽量低调，不做欧洲政治中心，并且在危机时敢于发力，甚至有可能令所有国家都担心被德国各个击破而争相与德国友好，那么德国的困境可能不至于如此孤立。

威廉二世在德国走向孤立的错误不是颠覆了俾斯麦的大陆体系，而是颠倒了国家与军队的关系。使德国的军政决策体系中，“不是军人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进军，而是政治家不得不根据出击计划调整政策”^[30]。有人认为，德国颠倒国家与军队的关系是因为军事家主导了政治家。而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只是政治家推脱责任的一种蹩脚的托辞。施利芬计划着眼于两线作战实属对法俄同盟威胁的应对，因为德国面临的欧洲大国格局的确出现了法俄同盟的可能性。军队自然要着眼于最坏的可能性进行准备。政治家并不是根据作战计划和设想与法俄敌对，而是在法德世仇并无缓解，又与俄罗斯的矛盾无法缓解的情况下，德国政治家只能面对这种事实。这种事实使得施利芬计划对事实的预判显得非常合理。僵化地将“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作为教条，影响了后人对历史感知的正确性。

德国 1871 年统一时的《帝国宪法》第 17 条中规定了皇帝下的所有命令，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应由首相副署，如果皇帝与首相意见矛盾，首相意见则具有更大的决定性。这个规定使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自由政治色彩。在俾斯麦担任首相期间，威廉一世和继任者菲特烈三世都非常严格地恪守宪法。而威廉二世时期，随着俾斯麦离职，后任首相无论是才干

还是威望都只能望其项背。这种局面使威廉二世皇帝大权独揽，首相成为皇帝意志的执行者，而不是国家的重要决策者之一。威廉二世的任何决策都无法得到制约，尤其是充满着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辞，使以满足“选民”为宗旨的国会只能随声附和。这样的德国无疑是强大的。因为无论是俾斯麦时期，还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战略决策体系都只有一个核心，而不是多个利益团体的争吵不休。然而，这样强大的国家，其命运依然取决于顶层对国家实力与国际格局之间权力关系的认知。权力集中有利于国家实力的增长，但不一定有利于国家实力的正确使用。权力集中没有有效的制度来保证战略决策的稳定性，使德国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期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战略，最终令德国自己不知所措，在各种矛盾的可能性中选择导致自己走向孤立的错误策略。

无论德国怎样稳住俄罗斯，俄罗斯仍然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座“火山”。基于俄罗斯不安全的现实，德国只能将对俄战略定位于德俄开战后德国应当怎么办。这又是对俾斯麦对俄战略的矫枉过正。德国军方的错误就是把潜在威胁当作现实威胁来准备，导致在实际举措上刺激潜在威胁过快而变成现实威胁。德国军方僵化的军事准备就是只看到俾斯麦对俄战略的弊端，而没有看到俾斯麦对俄战略中无奈背后的明智。正因为俄罗斯不稳定安分，他才极力避免刺激俄罗斯。德国军方可以在不刺激俄罗斯的情况下疏远俄罗斯，而不是要么盟友、要么敌人的简单思维。

正因为这样的僵化思维，使军队作战计划和战争准备也失去了灵活性，变成如果不打“鱼死网破”式的两线战争，就要束手待毙。这种思维又决定了德国要么与俄罗斯关系恶化，要么在俄罗斯面前退让，使德国最终失去了与整个欧洲大陆进行抗衡的空间。

德国与英国的真正决裂不在于法俄开始接近，而在于德国高调发展海军。《海权论》的出现，符合了威廉二世追求雄心壮志的政治心态和标新猎奇的性格特征。德国在普鲁士时代从未成为过海上强国，甚至连对海上实力地位的追求之心都未产生过。而统一后的德国，工业实力大增，具备了发展海上力量的基础，德国发展海军比之于法国、俄罗斯等传统大国更加令英国感到刺眼。当然，德国发展海权本身并无错误，在一个大国全球争雄的时代

里，没有海军不可能参与大国争霸当中。

但是，德国发展海权并没有突破自己的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具有欧亚大陆当中最具明显优势的地缘政治位势，可以采取“双头鹰”政策，一边在欧洲扩张、一边在中亚扩张、一边又在亚洲扩张。法国人直接面向大西洋，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多个港口。法国如果与英国矛盾解决，或者处于未激化状态，英法两国的和平使法国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而德国不仅在陆上易遭攻击，而且在海上也仅仅依赖一个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而且意大利与德国同时独立，德国不可能从意大利那里轻易地获取更多的出海口。德国如果大张旗鼓地发展海军，并没有足够的先天条件。德国忽略先天条件发展海军，出现的错误就是错误的海权目标。

德国发展海权以英国为敌。暂且不论英德之间的海上力量差距，只要看到英国即便不进入德国北部海域也可以封锁德国海外贸易，而德国不仅要在确保陆上实力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远洋力量，而且还要在英国随时可能干涉的情况下控制局部海域。这样艰巨而庞大的任务，使德国必然与英国产生军备竞赛。

仅仅从德国的地缘政治先天条件出发，德国也不能与英国在海上出现对抗，德国发展海权的气势汹汹一再促成对德国不利的英德海军竞赛。德国并不是不知道这一利害。然而，德国认为可以悄然无声地快速发展海军，在英国感觉德国海军巨变之前，难以产生必要的敏感。这样的设想无疑是天真幼稚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不可能察觉不到德国快速发展的海军力量，而且会在高估德国海军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强化优势。“两强标准”^[31]由此而出。德国发展海权，直接将英国当作假想敌，使德国既不可能防护近岸海域，更加难以远离出海口。其实，德国有一个优势，德国只要控制出海口，英国便难以集中力量封锁德国。因为德国只要近海安全，英国海上优势便难以对德国产生威胁。

但是，威廉二世宣称：“德国的世界政策，将为商业船队和海军的发展所支撑，德国的未来在海上。”^[32]这使德国发展海军的目标偏离了德国的实际需要，使英国不仅强化对德国附近海域的海上军力部署，从而使德国难以控制出海口，而且使英国控制德国的出海口割断了德国与海外的力量联系。

当德国将中国胶州湾据为己有，并在非洲与法国之间爆发两次摩洛哥危机，完成了震惊世界的“豹的跳跃”时，德国便彻底与英国决裂。

德国之所以运作英德关系失败，主要是高估了英国与法国、俄罗斯的矛盾。俾斯麦时代的德俄关系束缚了德国的手脚。威廉二世看到了德俄关系使德国丧失了他想要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但没有估量到如果在这种基础上破坏德俄关系现状，将使德国更加孤立和被动。英国利用法德世仇来平衡法德，利用德俄关系使德国与俄罗斯互相牵制，而且防止法俄同盟使欧洲大陆出现战略失衡，德国只要不破坏现状，便是英国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杠杆。英国不需要德国来激化矛盾，相反，当德国激化与法俄的矛盾后，反而使英国担心有一方获胜而主宰欧洲大陆。而德国在破坏德俄关系后，激化欧洲大陆矛盾的责任自然会被认为是德国。

德国破坏德俄关系必须以向英国让步为代价来换取英国的支持。其实这对于德国而言是巨大的损失，根本原因不在于德国的好大喜功，而在于德国自统一以来便将德俄关系置于不应有的高度予以重视，以致在德俄关系的运作上失去了灵活空间，维持关系使德国日益感到失去主动，不维持关系则损失更大。这只能使德国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左右徘徊，在两边都难以获得足够的主动与利益。德国的问题出在与英、俄难以同时获取平衡上，总是因为远俄便亲英而向英让步，或者因为亲俄远英而向俄让步。其实，这样的局面是“德国的自不量力造成的。它的胃口比俾斯麦还要大，可又没有俾斯麦这样的人”^[33]。

威廉二世不是俾斯麦、不是老毛奇，更谈不上威廉一世，他仅仅是一个继承者，而不是全新民族事业的开创者，所以，只有比先辈们走得更远、创建出更大的作为，才能树立权威。在军队面前要更加铁血和比先辈更加强调纪律；在国会和民众面前，要更加激进；在政府面前，要表现出更大的雄心。总之，威廉二世需要时时处处表现得更加主动与激进来迎合“人心”，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威廉二世继承的是一个失衡的德国，“铁血宰相的统一，完全是为帝国的巴耶赫一个虚假的民主体制，俾斯麦体制培养出来的是普鲁士政权的三大支柱——专职王权、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34]。这决定了威廉二世要想将自己变成真正的掌握德国的权力拥有者，必须做到既要驾驭德国

统一之后高涨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又要以军国主义的姿态来控制军队，同样又要表现出贵族精神中的尚武与铁血。基于此，看似好大喜功的“世界政策”便是必然。因为这样的对外咄咄逼人的政策有利于威廉二世树立国内的权威。

当诸多决策需要处于如此地位与心态的皇帝拍板时，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成为皇帝迎合人心和众多权力部门角力与妥协的产物。处于俾斯麦职务上的宰相继任者，因为德国的利益不断拓展和政策不断变化，需要处理比俾斯麦更多的事务，职责范围倒是扩展了，但继任者并不具备俾斯麦的能力、威望与忍耐精神。德国在俾斯麦去职之后，威廉二世在国内谋求最终驾驭的迎合之术使得德国在国力增长的同时，各种力量派别和思想派别也走向混乱。“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在过去的年代里在各国的国家政策中都普遍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使得它们不惜冒全面冲突的危险，而执意追求它们认为可以达到的目标。”^[35]此时的德国几乎像一辆有好几双手紧紧掌握方向盘的豪华车，一遇到哪怕是一点阻力，便要改变行驶方向，而豪华车的弱点又是经不起任何碰撞，一旦有哪怕丝小的剐蹭，都会令车主产生过度反应。

一个缺乏权威而又对权威如饥似渴的皇帝、不断高涨并日益难以压制的民族主义、俾斯麦高度集中的决策权威的离职、对德国的利益所在缺乏清醒的判断，这四个因素决定了德国在威廉二世时代的莽撞和激进。威廉二世缺乏历史性的威望来整合与协调国会、军队、政府各自的利益诉求，也没有使俾斯麦的大陆体系的思想衣钵演变为德国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而且，德俄不再签订《再保险条约》和法国开始复苏使德国外部威胁越来越大时，在高昂而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德国政策变得激进便是合理的结果。

驾驭局势并不仅仅要成为局势的助推者，也许是局势的“反对”者。顺应民心并不一定必须成为决策者的首要权重因素，决策者顺应民心应当比民众想得更远。对于威廉二世来说，最大、最根本的失败是因为意图驾驭局势而成为局势的盲从者，只知道一味迎合民族主义情绪和各种权力机构，并不知道如何压制它们的冒进，以致显得自己好大喜功。

拥有好大喜功的心态，在战略设计时就会处处表现得主观臆断。威廉二

世意图征服欧洲，再征服海外。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设计从臆断的角度看，算作“合理”。但是，他的设想是先击败法国、再使英国屈服，尔后征服俄罗斯。这种战略安排仍然将法德世仇和德俄关系置于不必要的紧张位置。如果以俾斯麦时代的整体国家政策来实施这样的设想，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威廉二世的整体国家政策想法更大，就不能局限于欧洲大陆的眼光来进行战略设计了。俾斯麦时代，德国的立足点是欧洲大陆，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立足点是全球。所以，德国先征服欧洲大陆，再行海外之攻略。而威廉二世的战略设计，在没有重创俄罗斯之前，便希望使英国屈服，这无疑是在制造英俄两大强敌。从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看，也的确如此。德国要想征服欧洲，第一步必须征服法国后立即征服俄罗斯。看似法国对德国的复仇之心从未泯灭，但法国不可能在德国与俄罗斯开战之前对德开战。而且即使德俄开战，德国只需要在东部稳住俄罗斯战线，便可倾注军力压垮法国。因为相对于法国而言，俄罗斯要越过东欧、中欧的泥泞、沼泽才能威胁德国，而法国则直接与德国接壤。德国将法国威胁看得过重，而轻视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又高估了俄罗斯的抵抗能力。德国攻击俄罗斯时，即便受到法国攻击，法国也难以有效威胁德国本土。德国的目标应当是在使英国屈服之前征服俄罗斯，而且尽量避免与英国的矛盾扩大。

威廉二世设计的征服海外战略中，当英、法、俄全部屈服之后，要么唆使美国与日本开战，德国坐享渔翁之利；或者唆使俄日开战，与俄罗斯共同瓜分日本；或者推动美、德、日彻底取代英、法、俄共同主宰世界。可见，威廉二世的全球策略多么昧于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的现实：德国距离日本相隔欧亚大陆，如何与美俄共同瓜分日本？美国怎么可能将英国排除在外，而与德国单独同盟？如果德国征服俄罗斯后形成德俄世仇，俄罗斯怎么可能抛弃地利而与德国共享日本？可见，威廉二世完全是身拘于一隅而心却异想天开。

这其中的关节点是英国。当威廉二世拒绝与俄罗斯延长《再保险条约》时，是希望利用英俄矛盾来获得与英国的结盟机遇。当然，英国也不可能如此僵化地看待英俄关系和英德关系。俄罗斯因为德国拒绝《再保险条约》，立即与法国走近，而德国因为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又处于法德世仇的

敏感期，德国已经在欧洲大陆丧失了灵活的战略运作空间，在英国不可能为德国“火中取栗”的同时，再加上德国极力发展海权，对所有国家都咄咄逼人，使英国认为德国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加直接与严重。

德国在英德同盟问题上碰壁后，德国又转向俄罗斯，因为支持俄罗斯使英俄矛盾加剧，而且可以减少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当然，德国开始是幸运的，德国重新转向俄罗斯时，正值俄罗斯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争夺，英国利用日本牵制俄罗斯，会使俄罗斯需要德国的支持。但是，德国并没有利用好这一支持。当德国支持俄罗斯在远东牵制日本时，尤其是当俄罗斯战败于日俄战争后，其实对德国而言是天赐良机。然而，当英法都在争取俄罗斯不要倒向德国时，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开始激化，使得当英、法、德都在争取俄罗斯时，俄罗斯倒向了英、法。至此，两大同盟相继成立，双方再无回旋余地。

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其实是开始冰释法德世仇的最好时机，因为俾斯麦对法国的孤立使德俄关系和英德关系处于平衡状态，德国既可以利用英国来牵制俄罗斯，也可以利用俄罗斯来牵制英国，这使法国已经被边缘化，难以利用三者之间的矛盾而向德国复仇。法国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奥俄矛盾，使德国开罪于俄罗斯。而在威廉二世时代，俾斯麦去职之初，俄罗斯便希望与德国延长《再保险条约》，这无异于使法国最后的希望破灭，然而德国却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使法国可以利用俄罗斯对德国的防范之心。试想，如果威廉二世同意延长《再保险条约》，并开始冰释法德世仇，那么德国则全盘皆活。一是可以使英俄两大强国均无口实来介入法德关系，甚至无力挑动法德新生矛盾。

然而，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大国之间无论是从心态，还是从应对格局压力，甚至是国内民众压力的传统上，德国既无法向法国妥协，法国亦无法放弃对德复仇。德国在法德世仇问题上只能拖延。拖延的代价就是使英俄两国可能阻止它们和解，而且很可能在英德关系和德俄关系上制造紧张局势，使德国和法国难以冰释前嫌，甚至出现缓和都不可能。因为普法战争后，德国对法国的羞辱，使德国永远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不可能摆脱的战略阻力，德国必须将法国削弱到难以获得其他大国需要

的地步，也就是说，使法国永远成不了大国。而法国只有具备制衡德国的真正实力与可能，英俄才会反对德国继续压制和削弱法国。俾斯麦比威廉二世更加明白均势对于欧洲的意义和欧洲对于德国的意义。然而，俾斯麦也没有解决欧洲大国间的世仇和历史矛盾问题。俾斯麦防止欧洲大国矛盾激化的方法是克制，而威廉二世使用的方法是恐吓。这两者都无法最终解决问题。德国无法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这是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的根源。

德国在威廉二世时代，对于主要对手的界定总是模糊不清的。当俾斯麦去职不久，德国认为俄罗斯与法国是德国的主要敌人，德国需要英国来制衡法俄同盟，因此极力推动英德同盟，而当推动英德同盟的希望落实以后，却全然不顾法俄已经形成实质同盟的情况，新的首相基于长期以来的个人信念，对威廉二世提出：“对于德国来说，英国是最危险的敌人……即从长远来看，英德冲突不可避免。”^[36]

俾斯麦的战略是稳固的，但仅从策略层次看是明智的，而威廉二世无论从策略看，还是从战略层次看都缺乏稳定性。这源于德国实力的增长使欧洲格局出现变化，而不仅仅是某个历史人物的作用。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开始便缺乏稳定的欧洲战略，而依赖于伟人对国家命运的掌控。当巨匠离去之后，掌权的虽仍然是精英，但都是没有经过刻苦磨练的才俊，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他们能否识别机遇与陷阱，而他们的心态和才干并不完全能够担此重任。

对德国民族性格的塑造源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两大历史阶段：一是从拿破仑战争到1848年革命。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德意志民族历经战乱和屈辱，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民族知耻而后勇，开始了以军队改革为突破口的民族改革，德意志民族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不仅保留了严谨、服从、理性、荣誉感，而且开始探索从封建制度到先进的民主制度，虽然德统一后不像英法那样彻底，但却是将民族本源与外来思想和制度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民族之一。1848年革命无疑是开创德意志民族性格的“门槛”，正是这次革命，从激发知识分子开始，整个民族开始了自由思考，而且开始了由弱者心态向强者心态的转变，从知识分子开始，再到贵族阶层和市民阶层，“民族

团结”成为民族共识。一个民族走向巅峰时的心态是将昂扬与冷静结合得最完美的时期。从拿破仑战争到 1848 年革命，德国心态就是走向巅峰时的心态。虽然那时的德国还难以看出要从普鲁士那个欧洲大国中最弱的一个脱胎换骨而来。然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需要休养生息，德意志民族享受到了宝贵的和平，境内刚好出现了思想进一步繁荣和制度优化再造的稳定环境。德意志民族境内各邦开始在经济和贸易上形成关税同盟，在政治上日益消灭了各自为政的小邦体系，而开始了邦盟体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两大集团就此在德意志境内形成。其实，二者中任何一个统一德国全境，都会使德国拥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地位，德国同样会震惊世界。

作为德国而言，其最大利益不是四处树威，而是处处调和。这一点俾斯麦显然是洞若观火，而威廉二世则是受到德国实力增长的蒙蔽，而无视格局对于德国的阻力。德国的战略核心应当是尽量减少外界对自己向海外拓展的阻力。这需要德国对所有国家不是对立和敌对的心态，而应当是妥协与平衡的心态。然而，在那个时候，“主动友好”容易被看成退让，不仅难以向国内交待，而且会容易导致外国提出更多的、最终会超出承受范围的要求。或者，“主动友好”被认为是伪善而不可能获得具有实质意义的回应。德国仍然是基于威胁的心态，而不是重新推动欧洲秩序的心态。从俾斯麦之前的历任治国者，直到威廉二世，“长期以来将俄国巨大的潜在优势（领土规模和人口）和快速增长的工业经济看作是对德国的重大威胁”^[37]。然而，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俄罗斯也最有可能成为德国坚定的盟友。俄罗斯面临着德国最直接的威胁，这不仅源自于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而且与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具有严重矛盾的奥地利是德国的民族兄弟，俄罗斯对德国的防范之心其实并不比法国轻松。实质上，此时的德国在法德世仇无法冰释的情况下，更加要化解俄罗斯对德国的担心。而要化解俄罗斯对德国的担心，首先，要开始主动缓解法德关系，使俄罗斯对法俄共同对抗德国的意志弱化；其次，德国需要安抚奥地利，至少不能让巴尔干半岛矛盾迫使德国在奥俄之间“二选一”；再次，德国在运作英德关系时就不能太热情。然而，当德国失去了诸多内外条件时，这些举措都不可能推动。德国利用英国来减少对德俄关系的依赖，是建立在德国因为德俄关系倍感束缚的基础

上的。

民族稳定心态和性格才能使战略趋向于成熟，那么影响战略的各种因素，如实力地位、利益诉求和历史传统、当权者个人因素，才能互相成为推动战略良性发展变化的协调之力，否则，诸多因素使国家利益和当权者对具体偶然问题的错误极端的认知将会大行其道，从而使战略成为投机，要么走向僵化。从俾斯麦直到威廉二世的德国来看，德国并没有稳定的心态，至少不如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心态稳定，这固然和它们三者已经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稳定的国际位势有关，然而，这却是一个发展变化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大的世界的情势的鲜明反映。在一个加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当中，后发者越来越难以保证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保持冷静。因为它面临的世界不是像以前那样按部就班，而是日益纷繁复杂。外部压力和诱惑更加多样时，年轻的德国在古老的自豪感、优越感和不安全感的支配下，就像一艘刚刚起锚便先后落入两个性格和行为都迥然不同的掌舵者手中的船，日益驶向了风浪越来越大的大洋当中。俾斯麦和威廉二世，他们二人最大的成功是前者缔造了德国，后者团结了德国，使德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仍然屹立于中欧，成为世界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尤其在冷战时，德国分裂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不同发展模式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后，仍然在冷战结束后实现统一。不得不说，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均功不可没。而他们最大的失败就是从来没有在德国的民族性格中完成新的塑造，以策略者，甚至是投机者和莽夫的心态来实现德国的雄心壮志。

德国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成功的挑战者，其成败得失仍然取决于能否对既定国际格局加以利用从而趋利避害。德国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欧洲的新主人，而仍然是一个主妇，行持家之事而无持家之权。俾斯麦寄托于在英俄和奥地利之间左右逢源，并不旨在改变欧洲均势，当然能够使德国在欧洲风头正劲。而威廉二世其实并无改变欧洲均势之意志，其个人雄心壮志无非是美好愿望罢了。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战时便可看出，只是出于“面子”需要，而使自己骑虎难下。当然，德国转型的失败带给欧洲和世界的却是动荡和危机，从这一角度看，德国的崛起为美国做了“嫁衣裳”。在德国统一之前，也仅仅只有拿破仑法国使英国处于最危险当中。而在俾斯麦和威廉二

世时期，英国没有感到直接威胁，便开始构筑反德包围圈，这在英国的历史上是霸权地位弱化的象征。法国挑战英国的失败，使英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德国挑战英国的失败使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显然反映的是一个历史的潮流：既定格局的受益者，必须令既定格局潜在的破坏者同样成为受益者。英国没有做到使法德共同成为受益者，而美国比英国做得更好，但同样出现过历史错误。德国的愿望是成为格局的受益者，而不是颠覆者。然而，它给人的印象就是实实在在的颠覆者形象。

一方面，德国从心底里感到面临着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的被包围危险，这是普鲁士历史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不安全感的延续，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德国在久经战乱和屈辱后，重新一跃而起，其中的民族自豪感难以以朴素的语言来形容。在这两种心态的支配下，德国能否保持自我克制与冷静，的确是一个难之又新的挑战。所以，此时德国民族性格也是欧洲大国中最难以驾驭的。至少从这点看，威廉二世要花费比其他欧洲大国的同行们更大的精力来驾驭德国。德意志民族在哲学、数学、音乐艺术、军事等各个领域，处于当时世界的显著位置。德国的民族性格，其多样化的复杂程度是所有民族中都难以想象的：严谨并富有想象力；讲究诚实、纪律和秩序但又容易因孤傲而轻视其他民族和种族。这就反映出时而充满着豪情，像个浪漫主义者，时而充满着理性，像个极端的务实主义者。俾斯麦时代和威廉二世时代的对比恰好印证了上述矛盾。

在欧洲长期的历史中，德意志民族是欧洲的主导性民族，而在民族国家成立之后，德意志民族并没有建立起自己强大的统一国家，反而饱受大国摆布甚至欺凌。自豪感与危机感复杂交织的德国，自然容易盲动。德意志民族没有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之前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再加上位于四战之地的中欧，在饱受战乱之后的统一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逐步走向盲动。德国统一后被德国民众认为仅仅是民族的崛起，而不是新型国家的成立。这种心态是任何一个经历了诸多波折和屈辱后重新强大起来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染上的。这种心态使德国在大国矛盾重重和格局不稳的情况下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强大起来的德国如果走向战争，便是世界之祸，而如果走向和平，则是世界之福。

第二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

冷战开始时，日本一片废墟，冷战结束后，日本又是一片繁荣。地少人多，灾害频发，先天条件如此之差的日本在短短五十年内，便如此大起大落，日本战败后，忍耐精明、善于学习和创新，在困难时不忘远大的志向，在吉田茂、田中角荣时代成为日本的财富之源。但当日本在中曾根时代开始重新定位自己时，日本命运的怪圈又重新出现了，小泉纯一郎时代是日本第二次命运循环的开始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本，是对东亚秩序主导地位的争夺者，也是对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影响者。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成为美国占领下对抗苏联和遏制苏联的桥头堡，成为一个冷战的受益者。为什么日本能够在强势时走向失败，而在逆境中又能走向成功？当今的日本能否摆脱这个历史怪圈？这些疑问的答案，不仅存在于国际战略格局演变中，存在于日本如何利用大国博弈中，更存在于日本根植于内心的战略心态中。日本民族勤劳、富于忍耐的精神，在一个先天不足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内心难以培育民族优势感，始终是以一个抗争者的心态来支配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但当它走向失败时，又是以服从者的心态支配自己。当今，当日本处于新的历史拐点时，其走向如何取决于在抗争者和服从者之间寻求平衡吗？还是摒弃抗争者和服从者的心态，走向一个真正的大国心态。

吉田茂时代：战败后的重生

世界上总是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的民族命运的转折与起伏，有时战胜国反而会陷入困境，而战败国却获得了更大满足，并且利用自己的弱者地位处处

掣肘战胜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如此，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亦是如此。冷战时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可能在美苏两大阵营中左右逢源。因此，日本必须在使美国感到美日同盟坚如磐石的基础上，主动加入国际社会，争取有限的行动自由和自主空间。这是决定日本能否在战后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基础。也许正是在这个阵线分明的状态下，使日本不仅展现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的优点，而且日本民族性格中那些精明忍耐、善于学习的优点也得以显现。

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之初，日本的命运开始受到美国、苏联、中国的共同影响。如果没有冷战，那么日本便可能处于三个大国的共同主宰之下。然而，冷战爆发使美国必须加强对日本的控制与改造，使日本成为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有力支撑。新中国加入了苏联阵营而脱离了与日本的接触，中国台湾因为国民党战败，更是与日本共同成为美国在冷战的全球部署中的重要棋子。因为早在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节节败退时，美国便已经认识到“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1]。

当美国开始改造日本时，实质上使日本面临着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次重生的重大机遇。明治维新使日本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文化，使日本利用了近代中国的衰落和欧美大国的重重矛盾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使日本走上黷武战略，这其中的根源有三个：

一是外部条件。从近代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几百年间，国际社会信奉弱肉强食，军力竞赛和武力解决矛盾是所有强国的首选，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将所有大国都卷入矛盾的漩涡当中。日本成为强国之后，自然不可能用东方传统的“仁义道德”与西方国家保持“和为贵”。日本先后与英国有过三次结盟，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反共同盟，其实不是日本加入到西方社会，而是日本利用西方欧美大国的矛盾从中渔利的权宜之计。日本从未认为自己能与西方大国和平相处，融入到国际主流社会当中。

二是内部条件。日本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明治维新，并于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几千年来在自己面前总是傲为人师的中国，再于1904年打败了西方强国俄罗斯。在短短不到四十年间，日本由一个饱受西方羞辱和近

邻蔑视的人见人欺的弱者变成了强者。于是在整个民族心态上，出现了褊狭的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中的弱点被误认为是导致自己强大的精神财富。褊狭的民族自豪感和在当时因为地少物稀带来的危机感，变异为日本总是处于武力解决争端的极端立场。

三是近邻中国。中国自近代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在生死边缘与变革图强两条路径上徘徊。地区中的最强国没有稳定的战略立场，自然会导致地区秩序处于动荡与风险当中，东亚地区便是如此。中国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始终在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压力下左支右绌、闪躲腾挪，而且历经晚清的戊戌变法、宪政改革，又历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混乱与内战，根本无力来推动东亚地区稳定的秩序，这使日本产生了企图称霸的觊觎之心。中国的贫弱成为日本盲动与嚣张的诱因。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美国的改造，上面这三个条件无一存在。日本在经历过生死边缘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又面临着第二次重生的机遇。

首先，冷战开启，美国成为西欧国家盟主，而且西方国家相对于中苏社会主义阵营，拥有更加发达的经济与科技。当美国需要日本和西欧共同对抗中、苏时，日本已经无须考虑西方国家给日本带来的战略压力。日本不仅可以尽享强大的美国的保护，而且还可以利用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团结诉求，更加便捷地融入到国际主流社会，与世界上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和平相处。这对于日本而言，无异于巨祸之后的巨福。如果没有冷战，美、苏、中共同主宰日本，日本能否尽享西方国际社会团结和共同复兴之机遇，实属疑问。

其次，日本政体得到美国改造，是日本战后最大的红利。日本内部政治制度虽然保留天皇，但却真正实现了君主立宪政体。政府不再对天皇极权负责，而只是对国民负责。日本除保留天皇这一国家象征外，几乎全盘按照西方制度建立了国体，尤其是和平宪法颁布后，日本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辩论，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国家命运被少数极端分子把持的局面。日本政府首脑需要经过公开选举产生，日本没有、也不允许拥有军队，也就可以专心于经济、科技、教育等国内的基础建设。日本通过

享有几乎没有安全威胁的外部环境，而使自身严谨细致、勤劳、善于学习与创新的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次，美国在苏联和中国均需要日本的情况下排斥它们对日本产生影响。苏联需要日本，不仅是想利用日本缓和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紧张关系，也想通过发展日苏关系来分化美日同盟的压力。内战后的新中国需要利用日本来获取国际认可，而中国台湾又与日本属于同一阵营。中苏结盟使中国专注于国内问题，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诸多企业获得大量军用订单而开始重新繁荣。日本的战败使日本必须进行自我变革，而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和冷战的开始，使日本可以在远离漩涡的情况下，在美国的羽翼下开始真正的“韬光养晦”。

既然日本仰美国鼻息，那么就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在冷战格局下，美国最需要的外部援助是帮助其遏制苏联和中国，而吉田茂的个人政治取向又与美国的要求相契合。他在1949年的自由党大会上宣称日本“将高举反共、民主主义的大旗，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追求人类的幸福，在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完成复兴国家的任务”^[2]。这一表态，无疑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立场的反映，而且极为明确地表示日本要将自己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这成为美国对日本进行“宽大”处理的重要原因。例如，在日本赔偿问题中，美国确立了惩罚性的“拆迁赔偿”原则，即“日本保存在其领土外的所有财产，应该按照有关盟国当局的决定移交，除维持和平的日本经济以及对占领军的供应所必需的物资和设备外其余一律拆迁”^[3]。实际上，这对已经崩溃的日本经济并无影响。

日本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美国的首肯，同样也会得到美国的帮助。有人统计过，吉田茂会晤麦克阿瑟总计有75次，每次均由吉田茂首先提出；吉田茂任首相的五年内，每周至少有两次通信。日本当然不仅是因为战败的自卑而处处仰仗美国，而更是主动利用美国，获得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有的军事占领都最终使占领国如疲牛拉车。军事占领不仅意味着占领国承担着被占领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之责，甚至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帮助它来发展经济和理顺政治关系，而且还容易导致占领国军政人员与被占领国

普通民众的对立情绪。这个难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加之朝鲜战争给美国造成的压力，使美国日益感到美日之间需要重新界定外交关系。作为日本而言，对于美国的军事占领，既需要美国来抚平战争创伤，也有心理上的无奈和压力。吉田茂担心，美国军事占领使日本难以被国际社会接受，而且日益丧失自主的国民精神状态，甚至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基于这样的互动，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设想便浮出水面，“《旧金山和约》”^[4]就此出台。

吉田茂认为《旧金山和约》是公正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宽大的和约”^[5]。旧金山会议召开背景无疑对日本是有利的。朝鲜战争在使美国日益感到中国志愿军的压力时，在政治上也导致冷战加剧。美国期望日本不仅是对抗苏联和中国的重要防线，而且还应当是美国进入欧亚大陆东端的重要桥头堡。如果日本的立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出现哪怕一些微小的波动，都会影响冷战双方的心理反应。日本在美国冷战力量体系中的位置突然间增大，可能令日本决策者都出乎意料。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避免了被美国宰割的险境，而且在美国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压力，特别是台湾海峡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使得日本战略地位得以提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需要对日本有些类似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扶德抑法的做法。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改变世界性的地缘政治斗争规律，而且欧洲的“陋习”向东转移到了亚洲。

吉田茂就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史特莱斯曼，利用战胜国的弱点来增强对它们的影响力，从而减少战败后的损失，甚至为战败复兴创造机遇。《旧金山和约》使日本作为战败者，既避免了德国式的分裂，也避免了像意大利那样承担过多的战争偿付。当然，美国轻而易举地在日本取得驻军权利，在保护日本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控制。

日本不可能不把国家安全交给美国。从根本的战略力量对比看，如果日本要自己承担国家安全责任，即使是很少一部分的国家安全责任，都容易出现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战后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承担国家安全责任将会拖延日本复兴经济；二是承担国家安全责任使自己的对外行动处处受制于美国，而且使美国又多了介入日本处理发展经济与军事问题的支点。最重要的

是苏联和中国因为朝鲜战争也不可能跨过海洋来干涉日本。日本将自身安全完全交给美国，对于日本是无奈之下的明智。

日本通过美国的保护，而且有正当的理由（如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和经济实力有限、男性人口数量不足等），避免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军备当中，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科技、教育等基础性建设。所以，日本正如吉田茂婉拒美国希望日本重建军备的要求时所说：“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决定兵力数量。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负荷过重，它就会累垮。”^[6]

应当说，美日同盟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是双赢，而不是一赢一输，意义更为深远的是，美国与日本以这种形式媾和，开启了一个战胜国处理战败国的新模式，这个模式在历史上从未出现，却在美国与日本之间出现了。这说明，三十年战争确立的主权平等独立原则已经开始真正实现，即使它没有改变实力地位差异导致的强弱之势。在欧洲近代史上，不断出现战争兼并和领土鲸吞，胜利者要求失败者割让领土甚至吞并之、大国吞并小国的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这对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居然没有出现领土吞并与转让。不得不说，这是国家关系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

一个战败者，并没有完全牺牲主权，甚至居然还有所收益，这似乎是命运对日本的垂青。其实，即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输掉太平洋战争，仍然控制着太平洋西部和中国东部，也不可能在战争之后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机遇。美国对于日本的保护和控制、利用，对于日本而言是战败后的意外。然而，日本的转变却是因为犯下巨大的战争和战略错误而出现的“祸福相依”，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战略自觉，所以必然以丧失主权和长期的行动自主权为代价。

日本利用美国保护和控制产生的最大红利不是无须付出代价而坐享安全，而是利用与美国政治上的协调，通过美国与西欧国家取得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且加入西方的经济体系，在自身勤于学习的基础上，利用西方对能源和市场的依赖，稳定自身的能源供给并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日本在西

欧和东南亚、美洲大陆，利用与美国的协调，不仅发展经济，而且在政治上开始逐步改善自身的历史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在战后初期遗留的历史形象。从1964年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会开始，日本不仅凭借美日同盟广泛深入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且实现了经济腾飞，于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如果美国与苏联、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那么日本的地缘战略价值将会减少，因为三个大国无须为对方的威胁而增强地缘条件中的缓冲区。而美国与苏联、中国处于敌对、敌视状态时，日本作为中间地带的价值便会凸显。对于美、苏、中而言，得日本者，便得西太平洋之主动权，向南则压制中国台湾与中南半岛，向北则紧扼美苏间的白令海峡。美国利用太平洋战争和苏德战争，在日本的占领问题上，对于苏联形成压倒性优势，又因为冷战，使苏联难以利用日本来制衡美国。而美国则可以利用日本来遏制苏联和中国通向远洋的通道。

日本与台湾地区构成了美国冷战前沿中的两大钳形攻击手。而日本是这两大钳形攻击手中的主要一支。因为台湾当局的弱势地位和与新中国近在咫尺的位置，使美国在弃台和保台之间徘徊，而对于日本，美国绝不能后退。吉田茂似乎看透了这一利害关系。而且他还认识到苏联和中国，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战略诉求都迥然不同，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早晚会势同水火。所以，日本开始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故意制造苏中裂痕。

其实，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是日本无法回避的。从吉田茂内心来说，日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对于日本具有重大意义，但鉴于美国孤立中国的意图，只好将中日关系搁置。因此，在《旧金山和约》通过后，日本对苏联态度强硬，并对中国不理不睬，这也正是美国所需要的。这使日本在苏日关系的运作上获得了美国的放行。在苏日建交的问题上，日本不仅获得了苏联重新的外交承认，而且还成功地使中国认为自己遭到苏联的背离与伤害而独自与自己的仇敌发展外交关系，这一举措使美国倍感满意。日本运作苏日外交关系和中日关系既是日本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日本获取美国允许下的行动自由权的实现。

这样的结果就是日本可以在美国的允许和督促下积极发展日台关系。发

展日台关系，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难以南下变成了易于南下。日台关系发展，又使日本可以利用海外投资和发展出口来修复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日台关系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受到影响，对日本算是长远之举。而且，对于日本而言，当时的新中国虽然可以从中苏同盟中获得支撑，但是并没有出现与美国缓和的迹象。日本发展日台关系无疑使新中国与日本之间无法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因为台湾问题存在于中日之间，那么其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两国。

虽然旧金山会议上，新中国代表和台湾当局都没有受到邀请，但当时朝鲜战争正处于激烈的战事当中，美国自然希望日本与台湾当局建交。吉田茂自然明白内在的利害关系，“万一日本因贸易和其他经济上的利益，而同北京政权之间建立某种友好关系，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将不得不发生很大的动摇”^[7]。吉田茂在1951年12月24日发表了著名的《吉田茂书简》，向美国承诺不承认新中国政权，媾和对象是台湾当局。

此时的吉田茂虽然迫于美国的压力而不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吉田茂因为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更大的利益空间，而且并没有放弃与新中国对话的渠道。因为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使日本在英国方面获得了外交支持与谅解。而英国则是对拒绝承认新中国政权这一立场持保留态度的。所以，日本可以通过与英国的协调来为中日关系的运作留有余地。

在与台湾当局正式启动媾和程序前，1951年3月，吉田茂与来访的何应钦说：“从所谓中日事变到大东亚战争止，日本始终以蒋介石总统领导的国民政府即中华民国为交战的对方。战争结束后，由于蒋总统的宽大处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和侨民才得以安全回国。”^[8]但是过后他又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9]从个人政治倾向来看，吉田茂属于极端反共分子，在日本宣布战败后便对天皇说：“如仅就战败而言，尚无须为国体而忧虑。以维护国体的立场来说，最堪忧虑的，与其说是战败，毋宁说是由于战败而可能引起的共产主义革命。”^[10]然而，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又要求他突破自身政治立场的局限性，争取拥有众多人口的新中国作为伙伴。

日台关系从来就不可能超越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对日本巨大的诱惑和潜在的政治、安全影响。当美国参议院顺利通过对日媾和条约后，日台媾和便立即开始。当时的台湾当局急需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来孤立新中国政权，所以在日台关系上作出巨大让步，希望日本在日台关系的运作上彻底孤立新中国。日本当然在政治和姿态上也需要如此迎合台湾当局，尽管台湾当局提出：“日本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国全部领土的主权。”^[11]而且在历时两个多月谈判中，举行了18次非正式会谈和3次正式会谈，最终却在旨在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台条约中隐晦地提出：“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之下的全部领土。”^[12]这种表述使得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承认取决于台湾当局将来能否成功地控制全部中国领土。如果能，则日本便可以因为支持台湾当局而获得中国整体的外交资源，如果不能，那么日本也可能在适当时候不受台湾当局限制与新中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日本在日台条约后享有一个战败国难以获得的自由权和灵活立场，史无前例。这不仅取决于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这一大的战略框架，而且台湾当局也需要争取最大的国际承认来“代表”中国。所以，在赔款和外交问题上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日本在新中国与台湾当局之间进行取舍是在冷战夹缝中和美国压力下的妥协退让，当然也在妥协退让之余为以后的运作留有余地。这获得了美国的首肯。当吉田茂公开表态称：“这个条约是日本和现在统治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我方虽然希望将来签订全面的条约，但此次签署的条约，并未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13]美国认为这是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和约，不涉及领土安排，只限于现在或将来事实上国民党能够控制的领土范围。这也反映出美国在对待东亚秩序问题上，利用日台之间的和约来制约台湾当局的意图。因为台湾当局能够控制多少实际领土，实际上取决于美国的帮助。

战后初期的日本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因为冷战爆发和加剧失去了一个重新构建关系的历史契机。这使得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史芥蒂和积怨不可能像法德那样，至少因中日之间达成谅解的外部环境缺乏而导致主观意志的削弱。日本因为战败而在美国的控制和保护之下，中国因为国家安全和生存的

需要，实行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中日之间本来在历史上仇恨未解，战争刚刚结束又分属两大敌对阵营，双方均丧失了灵活立场来运作关系。然而，中日诸多历史争端因为冷战而隐藏，并不代表可以得到双方共同的对等默许。中日双方在努力表现出自身的独立地位时，又不可能按照自身期望使矛盾朝着有利于解决的方向发展。接着中日双方分别与美苏达成同盟，都是因为同盟能够满足战后各自的需要，而中日双方却又因为各自的同盟，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利益。但是，从双方的地缘政治条件来看，日本要远远优于中国。中国在战后初期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而且主要的力量短板也在海上。因此，根本无力解决遗留下来的海岛问题。而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下，基本上只有政治和心理上的外部威胁，而无实质性威胁。苏联和中国不可能在海上突破美国对日本海的控制而威胁日本，而日本却可以在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冷战总体部署中享有比较大的自由来筹划和准备海岛和海洋争端。中国虽然具有中苏同盟的支撑，但因为缺乏足够的海上力量，便在心理上处处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和影响。中国不仅无法走出海洋，而且因为海洋的压力，在内部经济建设和内陆安全上受制于人。所以，从同盟角度看，双方客观环境的对比说明了美日同盟使日本得到了所期望的本国领土安全的同时，得以利用本来应该用于军备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而中苏同盟虽然在经济和科技援助上具有实质意义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地缘政治意义。针对战败后的日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仍然强调中苏要“加强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互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14]。中苏同盟并没有使中国获得地缘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中国仍然受着海陆的双重威胁，同盟只能满足暂时的安全 and 经济恢复的需要，而日本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威胁。这既是由双方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的，也是由各自不同的历史造成的。

随着冷战的加剧与深入，中日之间的隔阂没有机会消除。然而，两个国家有一点是趋同的：二者都希望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显然比日本先行多年。中国的独立自主不仅始于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五千年来民族文化的积淀，而且来自于地缘政治斗争导致的压力。对于中国而言，苏联显然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只是利用中苏同盟使中国成为东欧那样的卫星国。美

国从新中国刚建立起便处于敌对关系当中。海陆双重压力下的中国必须走向独立。日本自从受到美国改造之后，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安全压力，日本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科教，二是利用美国的地位走进西方国际社会。日本不需要考虑国家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在没有自己独立制定的宪法、没有对外宣战权、没有自己的法理意义上的军队的情况下，日本需要考虑的方面只是集中于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发展。所以，冷战时期，日本是在安全威胁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正常发展的，而中国却只能在不断受到来自两个最强国家的安全威胁下进行国家建设。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历史积怨的催化下，使中日之间无法取得任何层面的心理认同，这就决定了中日之间如果走近，那么也仅仅是现实利益上的互相需要。

日本在战后初期，需要美国的帮助以恢复经济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日本要重返国际舞台，在外交上更应当唯美国马首是瞻。所以，在中美敌对的大背景下，中日之间即使互相需要，也难以进行正常的国家间交往。然而，中日之间的贸易并未完全中断。中日之间的贸易对于中日都是贫困者之间的互相“取暖”，其意义对于中日两国而言更加特殊。因为经济困难的日本需要中日贸易，尽管规模较小。但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中国的敌视，同时又需要复兴日本经济，迫使日本中断中日贸易而转向开辟东南亚和南亚市场，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甚至当英国等英联邦国家拒绝与日本就入关问题进行谈判时，美国承诺降低向日本降低关税的国家进入美国的关税。可以说，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加入了世界大市场，使之在进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上，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自此，当吉田茂时代结束时，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拥有主权独立的国际法理地位，同时，也利用冷战的全球格局开始在美国的控制之下重新走向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是，日本已经具备了复兴经济和发展科技的内部条件。但是，这也决定了日本既然成为了冷战的受益者，其任何举动都不可能超出美国的需要和允许。

田中角荣时代：开拓者的起步

日本借助冷战中遏制苏联、中国的地位和自身努力，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获得了黄金般的发展。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科学技术非常发达。日本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科技大国，同样也是能源消耗大国。而此时，日本仍然局限于亚洲、中东和欧美，甚至是非洲的“商人”角色和美国的“跟班”角色。而经济和科技的腾飞必然增强政治作为的期望感，日本处于一个自身命运的十字路口。

自从朝鲜战争停战以来，冷战不断加剧，美苏之间的直接危机就有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在东亚先后出现过两次台海危机。随着冷战的加剧，美苏之间的战略态势也基本稳定，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西欧国家。它们利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对自身历史的反思，日益走向共同市场和政治上加强协调的方向，尤其是法德两大欧洲世仇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冰释，这使西欧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再次复兴，随着西欧复兴，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等地区在经济上已经连成一片，从而走上了形成全球化市场的快车道。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西方享受最大红利的时期。而反观苏联、中国和东欧，先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和中苏同盟破裂，再是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华约成员国先后发生政治动荡。其实，从整体形势看，冷战格局下美苏之间的战略态势已经开始走向明朗了。然而，越南战争的爆发和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不仅蒙蔽了美国的战略视线，也蒙蔽了苏联的战略视线，它们几乎都认为越南战争的泥潭会令美国丧失冷战胜利的机遇。所以，处于被动中的美国开始寻求与中国共同对抗苏联，开始希望并且推动经济复兴后的西欧与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推动的这两大举措，激活了西欧、日本和中国，使它们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调整自身的战略运作。对于经济腾飞的日本而言，美国在冷战中的被动使其获得了美国的部分“松绑”。具有更多“自由”的日本在一个快速多变的、各种力量中心开始多样化的世界里，追求的作为再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和科技领域了，即使日本内心只局限

于此，现实也不可能了。

日本所有的首相都必须在美国的允许下发展中日关系，所以当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因为尼克松访问中国而启动后，日本也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开始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自然会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历史问题；二是台湾问题。然而，当时中日两国面临的不同形势决定了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以致这两大问题成为中日两国关系中经常出现的、挑动双方甚至世界神经的根本因素。

20 世纪 70 年代初，新中国利用相对于台湾当局强大得多的综合实力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支持，成为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中国成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少数几个大国之一。然而，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中国也面临着苏联日益明显的安全威胁，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中国需要美国来对抗苏联的急切程度并不比美国需要中国来对抗苏联的急切程度小。所以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中美之间的敏感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而是被搁置起来，因为中国通过对抗苏联来确保安全的诉求超越了对台湾问题、东南方向安全的考虑。中美双方均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采取了现实主义立场，自然会影响到日本和西欧国家。在美国之后，接踵而来的日本与西欧当然也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采取了现实主义立场。

中国与日本邦交正是双方现实利益趋同的反映，本质上是权宜之计，而不是旨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全面的战略安排。出于民族自尊心和政府信誉感，新中国自然需要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表态，然而，基于现实主义立场，新中国政府不可能在急需外部支持来对抗苏联时，延缓邦交进程。对于新中国而言，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问题上既然启动了，就宜快不宜迟。而日本不仅面临着开发巨大的中国市场的不可抵挡的诱惑，而且希望尽量避免在历史问题上陷入道德下风。因为以日本的性格，它容易认为，一旦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处于道德下风，那么会导致心理被动，而最终处处受制于中国，最关键的是如果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向中国“低头”，不仅难以向美国“解释”，还容易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台湾问题更加令日本感到敏感，台湾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已经世人皆知，

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分治，使日本难以真正接受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虽然日本政坛有诸多重要人物一直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是，日本也有许多人认为，台湾不能轻易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日本在中日邦交进程中，关于台湾问题，总是外交表态和实际举措很难一致。

如果日本不仅在外交表态上支持“一个中国”，而且在实际举措上支持中国大陆统一台湾，那么日本既在美国面前难以“交差”（因为日本不可能脱离美日关系框架考虑对华政策），而且难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分治两部分之间谋求利益最大化。日本政府对新中国提出的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主张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没有以明确的态度表示接受，日本也承诺终止日台官方关系的进程与推动中日邦交的进程同时发生，但没有承认日台官方关系从最初就是无效的主张。

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五十年，在美国保护下的台湾和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难以脱离真正的历史纽带和利益交往。日本跟随美国保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立场，既有正式的外交表态，但又提出模糊不清的辞令，既满足了中国大陆的心理预期，也为后来在台湾问题上保留灵活立场提供了余地。

对于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新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也获得了日本的尊重。然而，两个新生的国家，尤其是历史问题和敏感问题存在于其中时，是不可能具备足够的内外部条件将其全部解决的。中日之间现实的安全需要和利益诉求得以满足，对于中日双方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虽然一穷二白，但其影响力正在蒸蒸日上。新中国的立场对冷战的重要影响，使之在建国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抗争者变成了秩序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日本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控制、保护和改造下，从战争废墟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也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了以战争方式难以获得的地缘政治成果。日本成为冷战最大的受益者，这一判断不为过。

中日邦交对于日本的意义远不止经济实惠，更大的意义在于日本获得了

中国的道德谅解，中国不会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与侮辱，但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使自己打破孤立而走向国际舞台的同时，也使日本获得了更大的战略机遇。当日本先后与苏联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后，这意味着日本在心理上开始摆脱“战败国”的心理，而且根据冷战格局的变化，不断努力以克服自身天然条件的不足。日本虽然依旧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必须与美国保持协调，甚至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亦步亦趋，但是日本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全球视野。日本获得了新中国的谅解，是日本战后继吉田茂时代后，又一个门槛性的跨越，也是作为日本历史中新的开拓时代的起步。

美国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重新获得了冷战主动，而日本凭借着经济优势、科技优势和地理优势，使中日邦交成为日本国力崛起的加速器。日本的战后转型成功的起点是吉田茂时代，而成功的标志是田中角荣时代。

田中角荣时代的日本并不可能摆脱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框定，因此，日本也是在田中角荣时代由美日同盟下的服从者变成了对美日同盟的利用者。因为美日同盟的存在和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坚持，从某种程度上看，使需要利用美国的帮助来减缓来自苏联的压力的中国，不能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日本“逼得太紧”。由于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谅解和搁置，日本在中日恢复邦交的初始阶段，收益大于中国。

日本理解、接受新中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并没有因为中日邦交而使台湾的实际归属得以确认。这主要是日本受制美日同盟的立场获得了中国的谅解。虽然中国强力反对美国和日本可能旨在鼓励“两个中国”的任何举动，但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左右摇摆与逢源，成为两岸之间和中美、中日之间出现异动的主要外部因素。

中日邦交使中日二者都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对于中国的市场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中苏分裂之后的冷战时期，日本是唯一可以与新中国和台湾地区均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的邻近国家。原因不仅是台湾当局需要日本的帮助，中国大陆亦需要日本在国际舞台的支持。中日邦交可谓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所有与日本有关的亚太地区的难题。正因为中日邦交，使日本在美国的冷战格局中的地位也开始上升。

如果在中日邦交中，中国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持僵化的“必须获得

最后结论式的解决”，那么中日邦交的进程也会极为困难，对于急需争取西方支持对抗苏联和获得更大的国际舞台的中国而言，压力会不同寻常地增大；而日本也可能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不仅使美国对日本的观感有所触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强化日本因为侵略历史而处于道德低谷的印象。日本之所以打开新的局面，中国着眼于长远的灵活、务实的立场功不可没。

日本战后的转变之基由吉田茂奠定，而转变之路确是由田中角荣发展与西欧的关系开始的。因为美国、日本、西欧本属同一同盟体系。强化往来本就是必然之举。而且，西欧和日本的复兴对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是有利的，因为美国需要的是全球化的大市场和自由贸易，而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对于生成全球性大市场和推动自由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西欧和日本的复兴也使美国在世界经济整体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这更加加深了美国丧失世界首强地位和失去冷战胜利的危机感，反而促使西欧和日本在美国冷战战略决策中具有比以前更加突出的位置。

日本可以在对外战略方面具有比以前大得多的自主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日本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对美国反而是有利的。随着日本的产品走向全球，日本与西欧之间的贸易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它们之间的问题也不断凸显。日本与西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全球化大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日本与西欧日益增大的贸易使日本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需要付出高昂的战争代价来谋求自身利益，当然，西欧也不需要从军事上防范日本。但是，鉴于美国仍然强大的综合实力，日本与西欧不可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力量中心，而只是与美国之间增强可以协调和商量的话语地位。所以，当美国允许日本、甚至希望日本与西欧协调贸易问题后，日本与西欧之间问题的解决显然能使美国、日本和西欧具有更加长远的利益，虽然现实矛盾显得过于尖锐。

美国之所以希望日本强化与西欧的关系，就是想在自身的领导地位开始松动之时，利用西欧与日本的互相竞争来加以牵制，使日本和西欧均需要美国居中调停，从而仍然可以保证美国的西方盟主地位。所以，旨在“对抗苏联、牵制西欧、控制日本”的“基辛格设想”出台，对于日本和西欧而言，不仅有了新的外交空间，也有了新的条件限制。日本与西欧的关系虽然仅仅

是同盟体系的内部关系，但日本与西欧之间关系变化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同盟体系内部。日本与西欧关系的变化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但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塑造，而且如果美国没有新的全球战略格局，就不可能减少越南战争泥潭造成的压力。

因为美国需要新的全球战略，日本的新战略也应运而生。此时的日本面临着两大机遇：一是可以发展军事力量。因为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日本并没有规模型的军事力量，日本在越南战争中就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仅仅扮演着后勤基地的角色。因此，日本可以避免浪费大量资源于越南战争。而当美国需要日本在对抗苏联中发挥更大作用时，日本便获得了开始发展军事力量的良机。二是扩大海外市场增强了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本不仅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获得了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而且对美国的经济冲击甚至使美国国内出现了对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舆论声音。

而日本与西欧的关系代表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模式。日本与西欧在政治和外交上都以对抗和遏制苏联为共同目标，然而在经济上又成为竞争对手，所以，日本如何运作与西欧的关系影响到美国如何推动新的全球战略。而且，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日本发展与西欧的关系，也有利于防范西欧作为一个整体来排斥美国。

日本发展与西欧的关系必须符合美国的需要，这是日本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原则框架。当田中角荣于 1972 年赴西欧访问之前，必须亲赴美国试探美国的原则底线。其实田中角荣赴美国的实质意义并不是试探，从一定意义上看是赴美“领旨”的。当他原则上接受了基辛格设想后，才能赴西欧发展日本与西欧的关系，而且必须要不遗余力地宣扬基辛格设想。因为如果日本难以遵守或者配合基辛格设想，那么日本就难以获得美国的支持，而日本贯彻基辛格设想，也有利于自身谋求新的国际地位。

然而，日本与西欧发展关系并不可能如美国和日本预料的那样顺利。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讲，快速发展的西欧需要日本这个更大的市场，而希望扩大与日本的经济与贸易，但是日本对西欧的出口和投资对西欧的本土企业

与市场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是西欧对日本发展日欧关系最强的消极因素。西欧与日本成为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经济强劲的竞争压力。日本的企业和科技产品占据了绝对的强势地位。日本要推动日欧关系，这一问题无法绕开。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西欧，特别是 70 年代的西欧也是出现最强烈的“独立”于美国的倾向的时期，西欧对于日本的态度自然更加期盼：一方面，希望日本在经贸领域内让步以减少经济压力，并获得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希望出现新的日欧关系，使西欧可以继续增强对美国的独立性，从而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西欧的这些期待，自然与日本的期待有所重合，但日本仍不可能脱离美国的全面影响而完全与西欧步调一致。

西欧国家不希望日本获得与之对等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在日本经济持续强势之时。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西欧国家认为日本是战败国，从历史感情延续的心态看，西欧确实难以接受日本拥有与其对等的政治地位；二是西欧国家认为日本是一个受到美国严格控制的国家，并非正常国家，如果与日本处于对等的政治地位，等于是违背自身独立倾向的诉求；三是如果西欧国家承认日本具有对等的政治地位，不仅增强了美国对西欧进行控制的心理优势，而且意味着西欧在经贸领域将可能面临来自日本的更大的竞争压力。所以，更加紧密的日欧经贸关系会使本来就日益增大的经贸竞争压力持续增大，而且日本带着基辛格设想，等于就是“帮助”美国矮化西欧，日本必将困难重重。而且，日本在对待西欧的策略上也出现了很大问题，从而导致被动。

田中角荣访问西欧的第一站选在法国是导致被动的开始。法国是西欧国家中独立于美国倾向最明显、与美国走得最远的国家。法国自从经济复兴以来，一直强调以欧洲为中心，独立于美国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甚至不惜在美国的极力反对下与新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当日本提出发展日法经贸关系时，尚可成为讨论的问题，而当日本带着极强的美国色彩进行提议时，自然会使法国认为，哪怕是有一丝松动的立场也会导致法国追求独立地位的愿望受到外界质疑。所以，当蓬皮杜总统在会见田中角荣时，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是欧洲自主开展与美国对话的时期，关于是否与日

本共同对话，还没有考虑。”^[15]日本也许有这样的考虑，既然法国是西欧国家中独立倾向最明显的国家，那么只要软化了法国的立场，其他国家的立场就更容易软化了。其实，这反映了日本昧于西欧国家的政治现实和历史文化，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难以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西欧当时的情况是：英国仍然遵守着美英特殊关系，并且在美国与西欧之间成为桥梁和矛盾的缓冲与协调者；联邦德国是冷战对抗的前沿，是诸多大国中受到冷战格局的最大束缚者，联邦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16]，旨在将自己由对抗前沿变成将影响力向东欧和苏联延伸的前沿；法国退出北约海军甚至是军事指挥体系，只保留在北约的政治成员资格，而且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推动了法德和解，使法国与联邦德国在西欧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由于联邦德国在冷战格局中的地缘价值，联邦德国对美国亦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力。西欧三大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各自不同的地位与价值，实质上都有自己稳定的立场，只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协调罢了。日本首站选择法国，只是增加了本就很大的难度。

也许，日本首站选在联邦德国可能会获得相对多的成果。因为联邦德国比之其他西欧国家和日本不仅具有相似的心态，而且联邦德国是受到日本经贸压力最小的国家，抑或带给日本的阻力不像法国那样明显。最为关键的是，联邦德国对美国的影响比“闹独立”的法国要大。如果日本在西欧国家中，将重心置于联邦德国，那么可能更容易获得美国的支持。

但是，联邦德国对日本的政治地位诉求的支持也是存在疑问的。那时的联邦德国已经开始实行新东方政策，在西欧内部的影响力开始显著上升。更加重要的是，新东方政策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这意味着联邦德国作为战败国，在战争结束后开始逐步取得应有的“独立”地位了。然而，联邦德国在冷战后，可以以一个新型国家的身份与体系外国家发展关系，而日本却不具备与之相应的外部条件和视野。这注定了如果日本要想仿效联邦德国的做法，就不能生硬地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而是令经济优势自动生成政治影响力。日本主动找西欧不如让西欧主动找日本。

日本主动找西欧，其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意图路人皆知，刚好被西欧当作迫使日本作出经贸让步的最佳时机。而且，日本首相出访西欧比起西欧

领导人来到日本更加令美国关注日本的举动。美国希望日本与西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合作，但不愿意看到日本与西欧扩大合作会损害美国对它们的影响力。日本与西欧既愿意合作，又出现矛盾，美国自然乐见其成。

日本政府认为：“鉴于欧洲重要性的提高，日欧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大。”^[17]这一判断是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的。但是，日本在执行对欧战略中所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视野的狭窄使日本只能达成部分目标。相反，日本在西欧问题上没有完全成功，反而使日本难以利用经贸优势像西欧那样追求在美国领导体系中更加独立的地位，日本越往外走就越需要美国，越受到美国的控制。

日本在西欧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成果，但是换来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表态。西欧表达了与美国、日本加强合作的意愿，虽然仅仅限于非军事方面，甚至连联合宣言都没有制定，但的确是日本自战败以来，在重新加入新型国际社会后再试图扩大影响力的新的更大的努力。如果说，日本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与中国开始邦交正常化进程是日本在追求现实利益和利用战略格局的应时之举，那么日本主动发展与西欧的关系，是彻底改变战败国形象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苏联和中国因为冷战格局的束缚，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与日本处于对立当中，分别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实质意义只是现实需要，心理认同并不明显。然而，日本与西欧之间经过重新构建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开始相似，这无疑对于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加入国际主流社会具有非常显著的价值。日本开始逐步塑造自己的新形象。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中国、苏联、西欧等大国间四处树敌，而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归还冲绳，并且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在几大力量之间可谓游刃有余地争取最大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更主要的是政治利益。

日本仍然在所有事务中受到美国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日本的对外战略完全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属物。日本一方面必须接受美国像主人般的地位，又要学会在有限的空间内争取自己的独立发言权。所以，田中角荣时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起点，虽然晚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起点，但更加早于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令美国非常难堪。而且当1974年爆发石油危机时，

日本对于美国的一些呼吁置若罔闻，竟然“擅自”与中东产油国，甚至和苏联走近。这说明为了自身利益，日本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了。

日本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美国日益需要中国和日本，尤其是当美国、西欧、日本和中国四大力量构成了对抗苏联的一条线时，美国必须保证日本和中国有一定的独立行动能力。所以，对于日本的独立性既有压制的一面，也有鼓励的一面。二是日本对美国的经济竞争，使美国不得不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有所缓解。而且对于争夺中国而言，日本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使美国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经贸和投资来影响中国，甚至促进中国接受美国一直坚持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三是西欧的独立性在增强的同时，美国一味僵化地坚持美日同盟关系，而不对日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松绑”，那么美国面临的来自日本的国内激进力量的反弹压力会更大。

中曾根时代：跨越历史的门槛

中曾根时代不仅是中曾根任首相的历史时期，而是从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日本开始争当政治大国的时代。提出“战后总决算”^[18]口号的中曾根时代是战后日本“首次公开正式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时代”^[19]。中曾根首相在刚刚担任首相的第一次国会施政演说中便雄心勃勃地提出：“我强烈地感到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上，我们应该认真探讨今后应向何处去，应确立新的前进方向；为了适应时代的激烈变化，对于过去的基本制度、结构等等，应以新的眼光，毫无禁忌地予以切实的更正。”^[20]这意味着日本在先后实现经济复兴和经济、科技崛起后的又一次跨越式转型的枢纽。中曾根首相在他本人著作中认为：“所谓战略，一般就是指对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进行规定的综合性判断与计划。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战略，国家战略从其目的上可以分为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内政战略等。”^[21]在此之前，日本当权者从来没有将战略理解得如此全面，都是仅仅强调一个方面，虽然他们的举措通常包含着复杂的综合因素。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战略突出武力因素，冷战开始后的战略

突出强调的是经济和科技崛起因素，而至中曾根时代，日本战略已经在思维上突破了以前的局限性，成为日本整体国家建设的全面路线。不得不说中曾根时代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时代使日本在战后首次拥有了真正的转型的各种基础和设想，至此，日本完成转型的举动有了基本的蓝图。

日本在经济和科技崛起之后，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政治大国，而且也自认为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后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没有对外宣战权和不能拥有军队，并且用于自卫队的经费不能超过 GDP 的 1% 上限。二是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日本的经济科技实力名列前茅，但并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受到“联合国宪章中敌对国条款”^[22] 的约束。

任何一个在经济、科技上取得超群成就的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追求更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作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心态其实是正常之变。事实上，日本不仅具有成为政治大国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还遇到了令联邦德国和意大利都感到羡慕的外部条件。当美国脱离越南战争泥潭后，正好处于国力的衰退期，苏联正处于力量和冷战态势的顶峰阶段。联邦德国作为战败国，虽然经济复兴，而且在政治上从国际社会获得了比日本更多的谅解。但是，联邦德国面临比以前更大的安全压力，而且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日益严重。当对苏联执强硬立场的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后，美苏立即陷入僵化，而且随着苏联领导人频繁更换，作为冷战中心的欧洲，其形势出现比以前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比以前更加倚重日本来向苏联施加新的压力。日本在美国冷战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更主要的是，自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双边经贸与科教交流快速发展，中日之间的历史积怨被双方现实利益需求所掩盖，日本处于国际位势中最佳时机。中曾根时代的日本，没有与周边的“麻烦”，而且日益被美国倚重。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的竞争压力使美国不得不在政治上出现让步和松绑的迹象。然而，美国联合日本，甚至是东亚地区，虽然是以遏制苏联为目的，但又不希望出现一个独立性明显而且拥有强大的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的日本，脱离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甚至与苏联亲近。所以，只要美国对苏联保持强势遏制，日本便不可

能独立行事。

当经济与科技发展至世界领先地位时，日本的心态是复杂的，当然也是现实战略格局的反映。一方面，日本想从美国控制下的有限的“空间”脱颖而出，享有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日本无法绕开美国的强大影响而成为一支独立力量。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日本既要追求和平，又要突破《和平宪法》。这无疑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重大挑战。首先，日本从来没有自己的原创性文化。日本在近之前，以汉唐学生自居，通过学习汉唐文化，然后对其进行改造；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几乎在文化和制度上全部模仿西方，虽然根植于自身历史传统的民族性格并无本质变化，但是始终并未在坚持民族特色与兼收并蓄中寻求有效平衡，以致在战略上总有危险冒进之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过美国改造，然而仅限于政治制度方面。从这些历史脉络看，日本对于自身角色并无明确认知，除武力扩张之外，对于如何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可谓开拓了全新时代。所以，日本必须明确新的立国宗旨，在国际社会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怎样扮演。中曾根时代之前的日本并无经验可循。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都是在发展至“瓶颈”阶段时冒险使用武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步调一致地跟随美国，对于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一直处于被动应付局面，只能将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当作长远的战略安排。在这个方面，近邻的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动中、美、苏大三角，使日本感到自叹不如。

日本富于功利心的精明之举往往使自己处于战略被动，这是中曾根首相对日本历史所作出的最深刻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使日本结束了“武力求地位”的时代，并开启了与强者为伍的时代，中曾根时代则是开启了成为新兴强者的时代。此时的日本，开始了各种复杂心态共同支配下的有些混乱的战略。战败国地位长期化和美国改造并没有彻底摈除日本民族中的危机感和荣誉感，但经过美国改造后，日本的民族心态中又新出现了和平主义。所以，从中曾根时代开始，日本始终在继承传统与追求和平的心态下忽左忽右。这样的结果使得向往“正常”的日本从来没有“正常”过。

战后处于美国管控下的日本，对于日本最大的伤害莫过于两个方面：

一是使日本当权者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对美国俯首帖耳，“丧失了为制定自己长期的国家战略而创造稳定且牢固的政治基础的觉悟和努力”^[23]。要么因此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导致军国主义余孽时有出现。前者使日本失去了主动设计日本战略与命运的大师，而后者总是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道德低谷，难以清洗侵略国形象。无论哪个极端，都有利于美国强化对日本的控制。当日本失去了自我的战略设计时，那么对美国的依赖自然会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而日本时常出现的军国主义余孽，又使美国根本不需要过多的精力就能以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为借口来压制和控制日本。

二是国民失去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由此而导致的民族危机感。日本之所以由弱国变成强国，国民举国一致关心国家命运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支柱。而在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岛国心态的作用下，异化为自私和冷漠，丧失了民族和国家的荣誉感与集体主义精神，对于日本而言，陌生、甚至从内心排斥的西方“民主”制度被强加于身后，日本并未完全接受，只是承认它对于战后恢复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对于日本未来的政治制度，日本并未坚持。这是日本国民精神力量下降的必然结果。这样的社会土壤使日本出现民族性的精神衰退和对国家命运关注度的下降。所以，当日本政治家提出新的战略设计时，日本国民要么冷漠视之，要么高喊着极端口号简单排斥。这是日本首相更换频繁的国内原因。而且，在政治层面，日本首相由国会直接选举而出，所以，围绕首相人选成为各个党派争夺利益与“声音”的焦点，首相便成为各个党派和各方势力的协调者，而不可能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规划者和设计师。

麦克阿瑟的《和平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九条第二款是对日本最大的限制。中曾根首相提出坚决对其修改的主张，他是日本战后首个对麦克阿瑟制定的《和平宪法》中部分内容公开提出质疑并提出具体修改意向的首相。这预示着日本的新型民族主义思潮正式成为官方主张：即将西方式的现代民主观念与日本民族传统思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层面进行融合。这种融合成为日本新的转型的起点性与基础性战略框架与基本指向。

但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大量消费着资源，拥有强大的出口能力，掌握着大量的国际收支盈余”^[24]，已经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地必须转变自

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作为。其中，日本与美国之间由利益交换变成利益融合，成为日本必须要完成的转变，但这又不取决于美日关系，而是取决于日本在全球中的角色定位，尤其是在东亚的角色定位。

转变需要日本的自我驾驭，尽管艰难，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日本推动自我转变也对美国、中国等对其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产生非常大的触动。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出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虽然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日关系的性质和中日格局并没有出现质变，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在培育导致质变的诸多量变。

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美国可能是最大推力，也可能是最大阻力。东亚可能是首要舞台，也可能是最后舞台。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都是日本实现国家转型无法绕开的强力因素。

美国要变成推力，日本就必须成为东亚的主导者，而日本仅仅是东亚的边缘国家，那么美国很有可能变成阻力。这其中，中国的倾向对于美日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促使日本对中日关系变得愈加敏感。

当美国极力维护冷战格局而遏制苏联时，日本具有基石性意义，美国如果对日本失控，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是失败的，东亚的失败会动摇美国对西欧的领导地位。每当日本增强了经济和科技实力，而国际地位有所上升时，美国都要对其进行部分松绑，又要在另外一个方面加固。所以，日本能否真正地成为正常国家，取决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美国衰落，才会出现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跳板”。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成为冷战格局中一股新的对抗苏联力量并日益明显，中日之间因为现实利益而暂时将历史问题和其他遗留问题搁置时，日本要走向“独立”所面临的基本条件也开始复杂了。美国成为日本走向独立无法绕开的因素。美国强势的实力地位产生了稳定的立场，不希望日本“失控”。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实力地位也随之上升，成为日本心中一个无法预知的变数。当美国更加需要中国对抗苏联时，日本只能继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与中国继续友好，同时，日本也越来越紧迫地感到，有必要在将来潜在的中日危机中“未雨绸缪”。所以，中曾根时代使中日友好达到了战后的高潮，而高潮的表象之下，日本也开始预防着与中国的

未来争夺。这预示着中日均受到现实格局限制，也都成为突破既定格局而存在着的越来越大的隐患。

中曾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将“不做军事大国”^[25]当作日本战后实现国家转型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当日本需要在政治领域内提高自身发言权时，重新走向军事大国只是时机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突破军费不能超过 GDP 总量 1% 的限制，这意味着日本战后重新走向国际舞台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通过单纯地发展海外经贸与外向性科技来走向海外，而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不断在军事与安全上打破限制为起点的。冷战结束，日本并没有因为敌人消失而失去发展军事力量的借口，反而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时开始走向海外。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国家安全发展，开始大步重新走向海外。

但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慢慢显现，对中日双方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本来，冷战使中日之间本来通过经贸和文化交流导致可能实现的政治谅解和心理认同变得不可能。因为中日双方当时处于冷战格局中，各有角色和功能，当意识形态仍然无法逾越时，角色的不同，自然会阻碍双方走向历史性谅解。随着美苏之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缓和，中国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盘战略地位出现微妙变化时，中日双方对对方的心态也出现微妙变化，但是无论多么微妙，中日双方都对对方的长远意图难以接受。

中日双方的历史阶段不同，也导致中日在友好的背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中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弱国，日本是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因为中国需要日本的经贸与科技、管理经验，解决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日本不像中国那样迫切地需要发展经济，对它来说，更迫切的是争当政治大国。所以，当冷战行将结束时，日本时任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世界新秩序应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时，这意味着中日两辆列车“同轨运行”时代的结束，只是争端并没有显现而已，但实际上已经出现僵局。

日本位于美国、俄罗斯、中国三个大国之中，日本的态度与立场对三个大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既可以成为跳板，也可以成为屏障，对于日本而言，如果三者之间存在对抗性矛盾，日本便可以在三者之间长袖善舞，而如果三者之间并无矛盾，甚至非常和谐，日本就必须避免与任何一个大国走向

对抗，因为在三个大国非常和谐的情况下，与一个大国走向对抗，会导致自己极大的孤立，从海外进口所需能源和发展海外贸易便会受到极大约束。冷战时，日本依附于美国并利用美国与苏联、中国的矛盾确保了安全，而当中日开启正常邦交之后，美国、中国、日本同时对抗苏联，使日本的利益最大化，而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苏开始缓和、中苏开始正常化后，日本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中美之间彻底超越意识形态，并且避免美苏那样的冷战，那么日本极有可能同时成为二者的附庸。尤其是近在咫尺的中国，对于日本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日本与中国之间名为历史问题，实为海权问题。获得海权，必先控制岛屿。中日之间因为复杂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实质问题的核心因素就是海岛主权归属。

追究海岛问题的历史责任并无实质意义，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如何在海岛主权问题上占得先机，怎样驾驭大局。中日之间从冷战结束前开始的暗斗，也许在双方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

此时，日本的优势在于经济，而劣势是只有经济，当日本经济的腾飞带来政治雄心时，日本的文化制约了本身在世界舞台上的作为。日本作为资源稀缺和严重依赖海外的国家，要想成为政治大国，在军事问题难以使美国松绑的情况下，必须增加海外对其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认同。然而，日本却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极为“精明”，过于计较现实利益的得失，除非有需要，日本才主动交往，没有需要，日本便不予理会。这来自于日本文化中的狭隘与现实。当海湾战争时日本拿出13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资助多国部队作战时，日本被认为是花钱买石油安全，并不是在为国际社会出力。日本没有，也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赞誉。

然而，此时的中日关系，对日本有利的是，中国处于一个困难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困难，而且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政治问题，中国受到深度的波及和影响，可以说，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末期使日本得以在中日关系中获取主动，不是因为日本的强大，而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瓶颈期。而当中国度过一段困难时期后，尤其是1992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中国又重新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而且这次融合更深远和更全面。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当然也使日

本在开始受益的同时，也感到了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大竞争压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日之间经贸和投资飞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在政治层面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热度。但这不表示双方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出现差异。当然，如果说差异的话，也是中日双方对对方的期望存在差异，而不是对中日关系本身的认知存在差异，中日关系已经存在战略博弈，只是双方认为时机并不是对自己更加有利而已，所以中日双方都没有掀开自己的战略底牌。

对于日本而言，由于“台独”问题的出现，中国在台湾海峡上的军事努力使日本在日益担忧之下，加快了走向海外的步伐，而这又使中国更加担忧日本。中日双方因为日本走向海外而背离了亲密，又在“台独”问题的催化下走向海权竞争。

当双方持续着经贸以满足双方物质利益时，政治层面的无声博弈已经根植于心，而且影响到了双方对对方的意图的判断。中国对日本的认知从未从历史中走出来，而日本也从未在历史中汲取教训，继续将中国界定为穷弱之国。而当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即将过去之后，日本猛然看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巨人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并且时刻保持着对历史问题的警醒时，日本的选择并不多。因为冷战的结束，中美并没有因为共同威胁——苏联的消失而立即开始走向对抗，虽然中美之间麻烦不断，但是中美之间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后，出现了巨大的贸易增长。美国出于天然的现实利益诉求，更不愿意将中国推向苏联式的敌对立场，而中国需要避免过分刺激美国敌对心态影响到经济和科教等正常的国家建设，美国是唯一可以令中国失去外部稳定发展环境的国家。

中美之间并没有因为台湾问题而失控，日本不可能利用美国来帮助自己对抗和遏制中国。所以，日本与中国对抗并不是日本的最佳选择。但是，日本也不愿意实现关系的平稳，中日关系的平稳意味着日本只能束手无策地坐看中国走向强大，而使自己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夹在中美之间毫无作为。对日本来说，在中日关系中对抗和平稳都不是最优选择，日本的左右为难可想而知。而且，令日本最为不快的是，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战略定力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日本无法因为中国犯错误而获得中日之间的主动权。

但是，日本在美国全球霸权格局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改变，而突破本土防卫型的战略，逐步走向远海。其中之一就是，开始公开对钓鱼岛和争议海区的实际控制，激起众多争端。应当说，日本利用经济和科技优势，利用了美国对日本战略定位的改变，在中日无声博弈中占据了一定的先机，但是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主动地位，更加谈不上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效应。日本加快推动走向海外的军事步伐，是建立在美国的控制日益严格的基础上的；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并没有获得美国首肯；中国也没有为日本的举动而过度反应，仍然坚持着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断走向强大。

日本走向正常大国就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谋求正常地位，而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努力效果。因为中日关系从来没有超越中美关系与美日同盟的框定。实质上，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取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国意识到日本的战略价值。如果中国屈服于日本，或者日本屈服于中国，或者中日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展双边关系，无疑是在撬动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尤其是当苏联解体之后，欧洲陷入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重构当中，美国难以将主要精力用于亚太地区时，更加需要中日关系处于微妙的矛盾与合作共存的状态。美国不仅需要日本走向海外成为它的助手，同样也需要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市场，所以，美国在巩固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仍然在中日之间待价而沽。这就是中日之间难以互相认同，导致历史问题和海洋、海岛争议问题在中日之间不时浮现的根本原因。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乏力，处于低潮期，急需重振民族自信，对于日本而言，再也不可能通过压制中国来谋求信心重振。但是，日本争当正常国家却建立在这一错误的思维基点上，即必须压制中国，使中国难以反对日本，这样日本才能迈过正常大国的门槛。实际上，日本过分与中国亲密或者过分与中国疏远都对其不利，因为两个极端都为美国所不容，日本在美日同盟关系中谋求提高地位的空间会非常小。最明显的就是1992年日本启动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一体化谈判时，“由于美日同盟的束缚，以失败而告终”^[26]。日本的弱点在于美日同盟使日本难以把握战略平衡。而当日本走向海外，不得不使中日海洋和海岛争议问题浮上水面时，可供日本选择的变得更少。

小泉纯一郎时代：历史与民族命运的回归

小泉纯一郎时代是日本在可供选择日益减少时努力挣脱束缚的开始。小泉纯一郎时代的日本面临的情况是，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日本的产品、科技蜚声海外。日本是冷战最大的受益国，在冷战中仍然倚重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走向海外。日本拥有充足的底气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然而，日本也存在着巨大的短板。

日本走向海外的意志越强烈，美国的影响就越大。日本在海外走得越远、越深，越需要获得美国的赞同。而日本在走向海外的步伐加快并更具主动性时，中国的担忧日益明显，导致中日关系降温的速度也日益加快，而日本面对中日关系日益增大的压力，也对中国施以更大的反作用。俄罗斯在经过苏联解体后的低潮期后，国内形势开始走向稳定，日俄双方的北方四岛问题开始升温。这些因素导致日本加快走向海外的步伐，所拥有的国际自由空间越小。中、美、俄对日本的影响与压力与日俱增。

在中曾根之后，从来没有一个首相像小泉纯一郎那样获得强势的政治支持，小泉纯一郎的个人风格是战后首相当中“最不尊重”美国设立的“内阁制”的，然而，小泉纯一郎维护美日同盟的态度却是最为坚决和彻底的。小泉纯一郎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其在日本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发展低迷后获得了超高的民众支持和舆论支持，小泉纯一郎经常将以前的决策方式和模式束之高阁，权力集中的迹象非常显著。以首相为主导的决策体制是小泉纯一郎时代赋予日本的最大转型动力。

以前的首相，除去吉田茂之外，其余皆为派系妥协的产物，甚至在划时代的中曾根时期，中曾根亦将主要的决策能量用于协调各种派系之中。而从小泉纯一郎开始，因为权力集中而使国家的整体战略取向日益明显。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就是，小泉纯一郎时代的日本，对于国际局势变化的反应比以前更加敏感，决策速度也比以前大部分时期要快，对于打破战后束缚的声调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高。小泉纯一郎坚决将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对外战略的基

石，以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且其最大的战略效果，不是因为获得美国的支持而对一些事件进行被动反应，而是在针对事件进行主动变化时仍然获得了美国的理解甚至是放纵。小泉纯一郎使日本由单纯的跟随者、被动应对者，开始向主动变化者，甚至是部分问题的引领者转型。

小泉纯一郎时代要使日本加快在国际社会中的转型步伐，获得国内民众和公共舆论支持是前提。然而，对于小泉纯一郎而言，日本民众的支持影响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当小泉纯一郎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和舆论支持时，小泉纯一郎要推行自己的主张会遇到比所有前任更少的阻碍。另一方面，日本民众经历了战后的“民主改造”，经济发展繁荣，在西方文化、制度成长中，日本传统民族文化导致日本民族性格发生了变化。日本开始将西方文化、制度融入自身民族传统的同时，使自身民族传统开始在继承传统与吸收西方思维方式中左右摇摆。日本一方面宣称和平主义，另外一方面，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人数也在增长。日本社会的分裂反映的是日本民族性格转变中经历着必然性的分裂，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性格转型中必经的阶段，刚好小泉纯一郎遭遇到了。正在经历着性格转变的民族，却又出现了一个固执的，对变革又有些偏激的领导人，注定了这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多事之秋。

然而，当中日关系开始快速冷却和美日同盟出现升温时，“9·11”事件的爆发，打断了美国改变全球战略的正常节奏，使美国骤然将全球战略重心移至中亚和中东地区反恐。这似乎使日本看到了大步走向海外的机遇。因为美国拉长反恐战线的同时，需要日本在越来越长的战线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不断催促日本，甚至逼迫日本加快走向海外的步伐，这使日本具备了实质性的海外军事部署和行动能力。然而，从长远战略看，美国在全球反恐战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日本作为仆从者的地位得以固化，日本的正常国家梦必须以新的思维来落实。因为美国反恐使美国加深了对欧亚大陆的渗透，配合之于北约和美日同盟，美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反恐，使日本战略远景变成了美丽的“海市蜃楼”。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认为世界中心已经由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世界应当由美、日、欧来主宰，其中，美国管理美洲、欧洲管理非洲，而由日本来管理亚洲，这一明显的以旧的思维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新秩序设想，在美国通过反恐强化对欧亚大陆的控制

的战略下，被撞击得粉碎。

当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虽然日本紧跟美国，拓展了与沙特等亲美国家的关系，而且还通过参与伊拉克重建，发展了与新伊拉克的关系，从而获得了更为可靠的石油供给。随着日本对石油，尤其是对中东石油的日益依赖，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既定石油供给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需要。因此，日本对于另外一个产油大国——伊朗的需要也日益紧迫。然而，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反恐和反核扩散力度的增强，美国加紧对伊朗的制裁迫使日本难以从伊朗获得期望中的石油收益。可见，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使日本既必须跟随美国的“便车”，同时也受制于美国的“便车”，而不能自主选择“下车”。作为冷战中发展最快、国力增长最明显的国家，雄心壮志在短短十年内便破灭，个中滋味只有日本自己心知肚明。

日本在冷战时，利用美国和西欧的市场与贸易赢得了经济的复兴与繁荣，当日本处于经济发展的低谷和东亚成为新兴市场时，日本不可能回避这一经济重新发展的新动力源。作为经济和科技大国的日本，其在东亚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和平时期的经济科技发展而有质的飞跃。这主要是由日本的目标和自身定位错误导致的。小泉纯一郎时代的日本已经难以满足于美国在东亚的“看门人”，甚至美国称霸全球的助手。当小泉纯一郎提出成立“东亚共同体”^[27]时，意味着日本谋求东亚，乃至亚洲主导地位的正式宣告。日本以前要想称霸太平洋，必须将美国排斥在外，令日本在亚洲充当主宰者，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要想成为亚洲的主导者，又存在日本难以摆脱，甚至必须对其依赖的美日同盟，而且，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高速发展后，日本想要主导亚洲的难度，比当年日本意图用武力征服亚洲的难度还要大。

首先，日本谋求亚洲的主导地位触及到，甚至越过了美国坚持的美日同盟的战略底线。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发展和推进政治民主的舞台，如果亚洲被一个国家所主导，那就意味着美国要离开亚太，或者被亚洲排斥。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世界经济第二强国，如果成为亚洲的主导者，那么美日同盟就面临着进一步改变的可能。美日同盟体系中地位的改变是美国不可能容忍的。尽管小泉纯一郎一再承诺，日本倡导的东亚共同体

一定会尊重美国在东亚地区事务的独特地位，并且提出吸引域外国家（如印度等），以保证东亚共同体成为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美国仍然不为所动。

其次，中国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进入 21 世纪后，地位日益提高，日本难以绕过中国来推动东亚一体化。但小泉纯一郎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具有明显的排斥中国、制衡中国的意图，令其他东亚国家认为日本排斥中国，使它们不能享受到中国的市场和资本红利的时候，日本倒是可以在东亚区域内独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资本与商机。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不仅无法绕开中国，而且很难获得东亚国家的赞同。也就是说，日本追求的排斥中国、制衡中国，并且“领导”其他东亚国家的构想没有可行性。

小泉纯一郎时代的日本可谓像小泉纯一郎这个人的性格一样，显得棱角分明，恰好在日本转型方向未明之时，出现了一个性格分明的首相，不知带给日本的是福还是祸？然而，无论是福是祸，日本在小泉纯一郎时代的困境再一次表明，没有独立的政治、军事地位便没有长远可靠的利益诉求之权、之力。

美国在全球反恐时代，不仅是不断巩固霸权的时代，也是日本和中国处于战略转型、角色定位的关键时刻。不得不说，双方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美国全球反恐既需要日本也需要中国，这就注定了美国在中日之间的决定性作用。自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决定中日关系的走向和框架边界已经由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的需要变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

而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因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美国需要日本来制衡中俄，也需要日本支持其挺进中亚。当中俄不断强化协作关系，而中亚地区日益在美、俄、中三个大国之间确定平衡路线时，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不希望看到美国在中亚和中俄之间开始非常顺畅的合作，因为这无疑是日本遭到大国孤立的印证，而且日本对于美国挺进中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日本在中亚地区被边缘化，其实质就是日本出力不讨好。另一方面，美国挺进中亚，对于日本来说，是利用美国反恐走向海外，向对自己具有生命线意

义的印度洋延伸的契机。日本可以在与中东发展能源与经贸的同时，拓展在印度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日本走向印度洋，客观上加剧了与中国的竞争，而不是深化合作。

中国需要从中东进口石油，需要从自己的海岸线出发发展海外贸易和进行海外投资，印度洋也逐步成为决定中国安全与发展的生命线。然而，中国对于日本有着地缘政治优势，日本只能走海路，而中国可以海陆并进。日本比中国更加急切，当然也就具有更快的步伐，在海权发展道路上似乎比中国更加具有经验和远见。所以，在美国反恐的年代，日本在发展海权方面仍然相对中国更具优势。

然而，日本在走向印度洋的同时，其弱点也开始暴露无遗。日本向外延伸，其“成本”只会越延伸越大，因为日本需要加强在“日本海—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如果没有历史问题，日本可能不需要花大成本打消别人的疑虑；或者如果日本可以在能源上自给自足的程度高一些，日本的天然脆弱可能就不会被利用；或者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只需要日本，不需要影响日益增大而且距离更近的中国，那么日本也许能以较低的成本来增大和维持影响力。

中国面临着对民族生存具有深远挑战的“台独”问题的制约；中国的海权意识增强需要时间；中国受到美国海上遏制并且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发展使中国难以快速发展海权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确在与日本的海权竞争中处于落后的局面。然而，中国没有在美国反恐年代和日本激化海权竞争是明智的。如果中国与日本展开公开的海权竞争，只能增加自己的成本，把本来可以用来发展经济和科技的资源投入到在中日之间待价而沽的国家和地区，受制于人。彼时的中国在集中精力谋求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同时，其利益重心仍然是发展和繁荣国内市场，海外利益的牵引力还没有增大到能够代替国内市场的地位。中国需要打牢能够确保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中日海权竞争上，日本占得先机、赢得近利，而中国步步为营、力图长远。这样的态势决定了中日之间海权竞争早晚会爆发，而且爆发的时机不取决于日本，而是取决于中国在何时令日本由担忧变成恐惧。

对日本而言，这个心态的变化过程就是近代历史中日本侵略中国的心态

的延续。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当东亚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殖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中日两国便失去了将“邻近”上升为“心近”的外部条件。因为在弱肉强食的近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和市场的巨大需求，拥有丰富能源和巨大市场的中国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对象，作为近邻的日本对中国的能源和市场“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能源和市场只能通过掠夺而来的国际社会，地大物博但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会成为富强起来的日本的掠夺对象。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既是美国对日本的要求，也是日本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需要，而不是日本文化的取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间，中日关系是停滞不前的，因为朝鲜战争造成的中美冲突波及了日本对华的立场。当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益需要开拓中国市场时，中国也需要美、日、欧的支持反对苏联时，中日邦交正常化使中日之间度过了经贸发展、科技交流的20年。但这20年间，历史积怨、民族文化差异、主权争端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只是被当时迫切的现实需求掩盖了。随着苏联解体和经济、科技的崛起，日本自然也萌生了成为政治大国的意愿。然而国内经济停滞不前、政府更迭频繁，使日本感到“有志难伸”。与此相反，中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并且具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与日本的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没有打碎日本的大国梦，却打乱了日本的步骤。尤其是以“入常”为目标的“联合国外交”让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而搁浅，使得日本日益感到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近代以来从未改变过的日强中弱的格局似乎即将发生逆转，这一现实心态在民族文化的发酵下，日益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心理基础。

小泉纯一郎时代的日本，恰好又是美国将力推日本走向海外和控制日本走向海外的两手玩到极致之时。小泉纯一郎要想实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宏伟”抱负，只能利用其个人的民众支持作为推动日本对外转型的基础。而且要不断强化美日同盟，争取美国的支持，至少不反对。所以，小泉纯一郎开始利用日本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几十年后却又突然陷入低谷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便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

个举措。

参拜靖国神社既有迎合日本国内人心，也有引导国内人心的意图。迎合人心是小泉纯一郎谋求获得国内希望再度“开国威于四方”的人的支持，引导人心是小泉纯一郎谋求走向海外，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这一目标，具有更加广泛的民众支持。然而，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却给日本带来了恶果，而且迫使小泉纯一郎硬着头皮，顶着恶果继续按照自己的意志走。

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国对日本造成的压力陡增，而小泉纯一郎又不能示弱，因为一旦示弱，则向国际社会表达出这样一个信号，面临困难的日本已向实力快速增长的中国低头屈服。如果国际社会出现这样一个认知，日本在美日同盟中逐步上升的地位很可能退回到历史漩涡当中。小泉纯一郎示弱还可能招致另外一个恶果：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投资、中东能源大国对日本能源进口这两个关系到日本生命的事务情势可能会急转直下，迫使日本作出更大的让步。

日本不示弱的结果就是日本在“入常”问题、中东能源供给问题、台湾问题上遭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制，而且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右倾使日本在东南亚处于脆弱的地位，虽然东南亚国家需要日本的投资和科技产品，但难以在心理上对日本产生认同，这又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态度，美国并不支持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何况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带来了东亚地区的争端，美国不可能支持日本，导致东亚地区形势复杂化。所以，日本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越逞强，越会感到战略乏力，与中国及其他周边国家进行历史谅解的可能性越小，越容易陷入孤立，最终更依赖美国。当更依赖美国时，日本就更需要逞强以试图提高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这意味着日本又回到了以前那样的恶性循环当中。

今天的日本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但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成功国家，追根溯源，“脱亚入欧”是病根。明治维新时，当日本提出在文化和制度上要“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时，在地缘上又难以改变有一个庞大的中国作为邻国这个事实，难以摆脱西方的影响，加上自身资源稀缺。所以，当日本发动战争时，小战尚可以利用欧美之间的矛盾进行投机和钻营，但因为自身资源受

限而导致大战时，既陷于中国泥潭，又与欧美为敌，才落得今天这个非正常国家地位的境地。日本成功的经验是改革立国，失败的教训是改革脱离了基本的战略实际。日本脱离不了亚洲，也不能完全融入欧美，这是历史上铁定的事实教训。所以，当日本提出“脱亚入欧”时，既与邻为壑，又难融于远强，这使得日本远交近攻不行，近交远攻也不行，以致历史问题和现实矛盾交织在一起，迫使日本必须跳出历史怪圈，方能成功转型。

第三章

大起大落的苏联

从巅峰到末日的起伏

苏联在“二战”结束时，就像当初蒙古帝国一般纵贯欧亚大陆，历经多年血雨腥风的俄罗斯民族开始跨入它的新时代。然而，和平时期苏联似乎仍然延续着血雨腥风中的俄罗斯性格：坚强但冷酷；善于利用机会却又不知如何心怀天下。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不断走强，但又不断走弱。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积重难返的苏联又遇见了里根、布什这样坚定而灵活，并能超越前人的冷战高手。苏联令自己不断走向危险的战略导致了失败。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在其产出国实践遭到失败，却在国外的实践获得巨大的成功。苏联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也意味着俄罗斯民族摆脱了历史上的沙皇制度，走出了自己民族的新纪元。苏联是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出现的，面临咄咄逼人的德国在外扼杀的威胁，还有国内保守派随时可能的反扑，列宁为了保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耻辱性地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条约使苏联“失去了 930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5600 万以上的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 32%”^[1]。而且，在“被割让的领土上有银行 1800 个，其中的收入达 842238000 卢布，占政府总收入的 40%”^[2]。这个条约是俄罗斯前所未有的耻辱。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是“开疆拓土”，期间虽有拿破仑战争时期火烧莫斯科之辱和克里米亚战争之败，然则俄罗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因为在战胜拿破仑军队上具有决定性地位而成为“欧洲宪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虽有败绩，但却使其成为欧洲重要的侧翼大国。苏联一经出现便立即作出屈辱性妥协，这使苏联虽然解决了急迫的来自德国的扼杀政权威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国际社会中实实在在地成为既被敌视又被轻视的对象。然而，苏联凭着自己坚忍顽强的生存意志，先是在列宁时期打破了欧美和日本的联合武装绞杀，后是在斯大林时代完成了由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尤其是在险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并最终成为主要战胜国之一。当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正处于俄罗斯历史上的权力顶峰时期，它开始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强国之一，是两极世界体系的重要一极，这是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身份。

俄罗斯历史中的每一次顶峰都是通过巨大灾难的考验达到的，拿破仑战争之后，俄罗斯经历过多次战败求和，甚至莫斯科被付之一炬，最终成为“欧洲宪兵”。苏联在经历了苏德战争初期史无前例的失败后又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成为世界上决定其他国家命运的两大强国之一。苏联继承了俄罗斯民族在危局中挺立不屈的民族优点，但是在处于掌握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命运的顺境时，应当如何作为，却成为它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重要问题。苏联并没有超越俄罗斯文化和历史延续的巨大惯性。从某种程度看，甚至比俄罗斯还要“俄罗斯”，其最终消失是因为没有完成民族性的自我变革。

赫鲁晓夫时代：以攻为守的代价

赫鲁晓夫走上苏联最高领导人岗位时，斯大林时代奠定的与美国对抗的战略格局已经因为“第一次柏林危机”^[3]、朝鲜战争而固化，虽然苏联的国力不断增强，并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然而斯大林时代的冷战强弱之势并未改变，甚至还更加分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实力亦在增强。美国虽然没有在朝鲜战争中获胜，但因为朝鲜战争而在朝鲜半岛拥有了稳固的“桥头堡”，并且马歇尔计划使西欧经济在战后恢复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随着1949年成立北约后，又将联邦德国纳入北约体系内并予以重新武装。日本因为朝鲜战争中来自美国军方的大量需求，国内经济开始复苏。更重要的是美国、西欧、日本三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可供苏联选择的战略选项并不多，如果与美国一味持续紧张，那么不仅国力不能承受，而且会导致美国更加强硬的反应。然而，如果实施单方面缓和，就意味着让步而致使苏联的政治声誉损失巨大。赫鲁晓夫只能一边增强实力，巩固自身阵营，一边争取到一定成果后再推动美苏同时出现缓和意愿。对于苏联而言，最佳结果就是在倡导缓和后还没有立即作

出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便同等积极地响应。

“三和政策”^[4]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三和政策的核​​心就是承认“各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5]，三和政策并非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之上。首先，他认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作用使“世界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6]。这说明三和政策反映了赫鲁晓夫对时代特征的理解、对世界局势总体发展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核国家，美国亦赞同核战争没有赢家。从这一点出发，三和政策对于美国而言，虽然认为三和政策的根本意图是苏联的斗争策略，但仍然应当作出谨慎的正面回应，以避免被认为是无和平诚意。其次，和平共处被当作三和政策的核​​心，提出“和平共处不仅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不进行战争，而且还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方面进行和平竞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具体的合作”^[7]。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使苏联在冷战格局中获得了一定的舆论和心理上的主动。因为经过第一次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之后，冷战的加剧使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处于经济迅速恢复当中的西欧和日本，自然希望美苏之间实施缓和，以争取更长的时间来恢复经济，赫鲁晓夫提出“合作论”，无疑是向美国“叫牌”，即：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谈呢？再次，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政策使众多亚非拉等新兴独立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让它们看到了苏联对它们的支持，同时在获得经济支援时提高了苏联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古巴）。

然而，三和政策从根本而言只是赫鲁晓夫的一厢情愿。首先，三和政策并不是建立在对战略格局清醒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当时的战略格局，基本态势是美强苏弱，按照任何正常的逻辑来看，美国不可能在没有互信、实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向苏联让步，只有等到苏联作出实质性的、与美国期望相一致的让步，美国才可能作出策略性让步。这是当时的实力对比和国际格局所决定的。而且，赫鲁晓夫也没有像斯大林那般权威，使苏联领导集团其他人支持他主动让步。所以，当赫鲁晓夫提出三和政策时，被美国和西欧认作是苏联实力处于下风时的“缓兵之计”，企图通过发出和平倡议来获得美国的减压，从而利用和平来发展实力，再来与美国“摊牌”。美国并没有相信赫鲁晓夫真诚的和平愿望。其次，赫鲁晓夫对苏联成就过分自信致使其作出错

误的判断。三和政策是对斯大林僵化地看待苏联和西方“势不两立”的超越，但赫鲁晓夫并不像斯大林那样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苏联与西方之间真实的实力对比。正因为他对外部世界的一知半解和盲目自信才能够提出：“哪种社会制度更好，谁的制度富有生命力的问题，将通过在尊重各国人民主权的情况下的和平经济竞赛来决定。”^[8]这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理想化得近似于学术研究性的言语，只能确定无疑地表明赫鲁晓夫忽略了战后西欧和日本迅速恢复背后所反映的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依据苏联拥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作出苏联必将在20年后超过美国的判断。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相同点是：当政时，每遇到一个新的时代，都成为自身经验的奴隶。虽然赫鲁晓夫在判断时代发展特征和提出斗争策略方面对斯大林有所超越，但缺乏斯大林那样的冷静、精明、坚韧的定力。再次，三和政策没有获得最重要盟友的支持。新中国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友。新中国因为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而与美国在东部边界和海岸线上进行虎视眈眈的军事对峙，仍然需要来自苏联的持续支持。作为从近代屈辱历史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于日俄战争、雅尔塔会议、外蒙古问题，以及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次酿成大错的干预等事件记忆犹新，最担心的是苏联与美国缓和会将新中国的利益与尊严作为交换筹码。所以，赫鲁晓夫在没有提前向毛泽东等人打招呼的情况下便宣布三和政策，无疑是不给最重要的盟友面子。这样的举动使本来就对苏联心存芥蒂的新中国领导人既愤怒又担忧，阻止美苏缓和的意图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当新中国开始炮打金门时，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如果支持新中国，那么与美国缓和的意图便会彻底落空；如果不支持新中国，苏联也不一定获得美国的谅解，而且会背上出卖最重要盟友的国际名声。两害相权取其轻，苏联尽管对新中国不满意，但仍然发表了履行中苏同盟义务的声明，以回应美国对新中国的核威慑言论。

三和政策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是按照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来界定苏联的利益需求的，三和政策的提出使苏联获得了相当的战略效应，美苏之间在冷战开始以后首次实现了对话。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之前，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寻找合作、避免危机的新的切入点。但是三和政

策的根本错误在于高估了苏联相对于美国的实力地位，而且还使最重要的盟友可能陷入孤立和危险的境地。至少这两点就预示着苏联的设想难以成功。

从这一逻辑出发，“第二次柏林危机”^[9]和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都是三和政策失败的表象。虽然两次危机的根源不全在三和政策上，但是赫鲁晓夫想通过施加压力来缓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遏制与制裁，从而使得美苏缓和。这样的做法无疑给苏联带来了恶果：一方面，危机爆发的根源和责任不能单方面由赫鲁晓夫负责，但是赫鲁晓夫实际上是危机的直接制造者，这使三和政策看起来非常虚伪，缺乏值得世人信赖的真诚和愿望。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两次危机中都没有让步，反倒是苏联在最后关头先行退让。赫鲁晓夫被西方认为是色厉内荏。苏联在世人的面前暴露了真实的实力地位，再也难以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形成有效震慑。这意味着除非美国衰落，否则苏联不可能在冷战格局中处于主动地位，至多只能利用美国的错误进行投机式的“破坏”。另一方面，因为在两次危机中的最后让步，苏联在中国、古巴、中东亲苏国家，甚至控制得最为牢固的东欧国家中威望大跌。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这是对苏联最大的危险。

赫鲁晓夫当然不能为苏联陷入不利的紧张对抗负全部责任。斯大林与美国之间奠定了战后的冷战格局后，在赫鲁晓夫接手苏联时，两个国家已经像以相对方向行驶在同一车道的两辆汽车。其结局只能有三个：要么一方先行停止来换取对方的停止，以实现双方的安全；要么迟早相撞，双方都车毁人亡；要么其中一辆先行消失。显然，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包括那时的美国，甚至国际社会都看不出美苏之间的结局将会怎样，但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政策的失败和两次危机的爆发，导致出现第一种结局的因素被消除了。美、苏两辆车都停不下来，以实现真正的缓和，最终只能以分出胜负的方式来结束对抗。

三和政策的提出拖延了双方分出胜负的进程，三和政策的失败则说明双方分出胜负的必然性。三和政策使赫鲁晓夫下台时的苏联比斯大林时期结束的苏联具有更好的地位。因为在两次危机结束后，苏联获得了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美国再也不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在

伊朗事件和土耳其事件中那样，仅仅派出先进军舰进入黑海便可以吓阻苏联了，必须通过地位同等的谈判和对话来解决美苏之间的问题。

三和政策本来寄希望于通过和平倡议来使苏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使美苏之间过于明显的强弱之势产生转变。然而，和平倡议之所以“没有获得实质性回应”^[10]，并且爆发了两次在战后最为危险的危机，其根本仍然在于赫鲁晓夫不相信两种制度和两种信仰可以和平共处。赫鲁晓夫坚守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固然值得称道，但因为坚守而僵化，使自身意识形态走向封闭，则会使意识形态的优势变为劣势。赫鲁晓夫在每次向美国提出和平缓和倡议时，都会发表类似于“宣扬思想上和平共处，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11]的言论，使每次当苏联需要美国来“配合”实现缓解时，美国愈加相信苏联的三和政策只是缓兵之计。这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总是习惯地处于守势，这无疑使赫鲁晓夫主动的和平攻势效果大打折扣。

所以，美苏双方除了外交表态和首脑会议之外，在军力部署与军备竞赛、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斗争、心理层面对抗等各个方面开始升级。这足以说明，三和政策并没有使赫鲁晓夫获得自己所希望的结果，也就是说，美国并没有因为苏联的和平倡议和和平攻势而进行对等的和平回应。苏联面临着巨大压力，一方面，如果苏联不针对美国不断强化的遏制与包围战略而采取针锋相对的举措，苏联可能会日益危险，而最终被美国在所有周边地区构筑包围圈，就像一个巨人被捆住手脚一样。而如果苏联利用自己有限的经济和科技实力继续进行对抗升级，那么苏联的经济发展也会遭遇到巨大压力。在赫鲁晓夫时代的末期，当然，他本人也许并不知道，当他提出苏联希望“同其他国家交换本国产品和为了发展国家经济而利用世界上所创造的最好的一切和符合现代科学与技术成就的最好的一切”^[12]时，已经难以挽回战略进一步失衡的趋势。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给苏联埋下了祸根的话，那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苏联不知不觉中与美国走向了无休止的、而且结果未知的军备竞赛。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使苏联如果不对抗，就容易导致衰弱，而赫鲁晓夫的冷战战略使苏联难以把握对抗的方向和主动。斯大林使美苏之间产生危局而不僵化，从而使继任者有灵活操作的空间，而赫鲁晓夫显然没有把握好操作

空间，使美苏之间走向了单纯的实力博弈。另一个方面，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一最重要的盟友，即使“赫鲁晓夫巩固中苏同盟有过历史贡献”^[13]。但是，三和政策的设想并没有获得中国的理解。没有获得最重要的盟友的支持，其战略弱点必将是致命的。如果三和政策能够获得中国的支持或者谅解，那么赫鲁晓夫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心态来运作美苏关系，或者如果赫鲁晓夫不是理想化地提出“三和”式的高尚口号，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实实在在地进行运作，那么中国也许不会怀疑和担心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会像俄罗斯和斯大林时代那样出卖中国的利益。如果赫鲁晓夫理解中国的立场，不是直接与美国搞缓和，而是通过推动中美缓和，使美国承担来自中国和苏联共同的和平攻势的压力，这比苏联单方面向美国发动和平攻势要更加有效。这说明，相较于斯大林，赫鲁晓夫更像国际主义者，而不是赤裸裸的沙皇衣钵的继承者，但是赫鲁晓夫仍然摆脱不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延续，不善于、也不热衷于帮助盟友来解决问题。

当然，三和政策的战略效果既切合了苏联战略地位的实际，也符合世界舞台中各大国日益交织并且亦敌亦友的发展实际。时值西欧和日本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并开始腾飞，尤其是西欧，基于经济腾飞和自身安全的需要，已经出现由依靠美国变成与美国协调的因素，西欧与美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出现分歧便是明证。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不可能使西欧脱离美国，但对于西欧而言，无疑鼓励了西欧独立与苏联进行对话，从而使苏联可以通过西欧影响美国，苏联又多了一条影响美国的渠道。西欧与苏联的双边互动开始频繁起来，这对于缓解苏联西部的安全压力和增加与西欧之间的贸易具有重要作用。在三和政策实施的年代里，既有和平倡议下、首脑外交下的和平氛围，又有两次危机形成的恐怖氛围，“一惊一乍”的过山车式的国际风云变幻使西欧、日本开始寻求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使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开始加入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和政策建立了两个柏林之间的封锁墙，但却打开了东西方之间遭到封锁的心理边界。

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表明三和政策的彻底失败。古巴导弹危机的根源在于美苏日益失衡的对抗格局，美国的军力优势和经济优势已经使赫鲁晓夫感到压力剧增，而且剧增的速度与程度使赫鲁晓夫不断上升的危机感，在侥幸

心态和个人性格中的容易心血来潮特征的催化下，开始秘密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不是反映了苏联的主动，而是反映了苏联的弱势，苏联在西半球只有弱小的古巴这一唯一的亲苏力量。而美国却在苏联东西两端构筑了两大同盟，部署了很多军力。

其实在美苏洲际导弹力量失衡的情况下，即使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的事实被美国接受或者默许，苏联也改变不了美苏之间的对抗格局，其效果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使苏联在心理上获得一丝安慰性的平衡感；二是使赫鲁晓夫个人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即使这两个效果最大化后，美国也不容易在其他问题上让步。一是因为美国让步便意味着使苏联可以得寸进尺，甚至威胁美国在西方和对日本的领导地位，这是美国不可接受的。二是如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从其三和政策的根本态度出发，发出和平倡议的苏联反而在其他问题上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和战略态势的压力，而容易出现让步。

古巴导弹危机完全是苏联处于弱势和倡议遭到否决时无端的冒险之举。也许是赫鲁晓夫低估了美国的决心与实力，也许是美国在猪湾的军事努力遭到失败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被认为“过于软弱”，也许是赫鲁晓夫过分相信导弹的战略影响与效果，总之，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基础之上的。当美国侦察机发现苏联正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并向全世界宣布之后，苏联便面临着两个几乎同等危险的选项：

一是先让步、再迫使美国让步，最终达成仍然是维护美苏之间对抗态势的协议，这不仅意味着苏联失信于古巴，并且要在全世界面前暴露自己仍然处于下风这一短期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这个危险，即使不会使苏联面临的危险更大，也会对赫鲁晓夫的个人领导地位构成威胁。

二是冒着最终可能与美国走向核战争的危险，先是展开局部武装冲突，再逐步升级到全面战争。这意味着苏联不仅在局部战争中丧失周边安全，而且还会遇到更加恐怖的结果，那就是美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届时，苏联可能丧失全面的还击能力，而最终束手就擒。因为苏联在那时根本没有全面摧毁美国的核能力，更别提遭到美国核打击时的报复能力了。

双方都没有意志和胆量来打一场可能导致互相毁灭的核战争，所以最终

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撤除了部署于古巴的导弹，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和不支持任何对古巴的外部入侵。同时，双方还达成美国拆除部署于土耳其的导弹。这样的结果虽然与预想的结果相距甚远，但使苏联在处于道德和实力下风时仍然获得了一些回报，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是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回报。

而且，这些回报不仅是战术性的，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性。全世界、包括美国均认识到，苏联具有令全世界都感到恐怖的能力，美国虽然在心理上巩固了对苏联主动与强势的遏制战略，但基于苏联的不断挑战与和平攻势，也开始出现了与苏联共同防范危机的心理。美苏双方自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令全世界都感到恐怖的危机了。从这一方面说，从赫鲁晓夫怀着侥幸心态和缺乏理性的冒险开始，再到因为害怕核战争而重回理性，的确令全世界感到苏联“不好惹”。以前，美国每次都是僵化地强硬以对，但自从古巴导弹危机过后，也认识到与苏联保持和平和稳住苏联，同遏制战略具有同等的价值。

而且古巴导弹危机对于苏联的意义，其实质不在于美苏之间的新型互动，因为美苏之间的格局没有因为危机而改变，其实质在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解决和赫鲁晓夫上台之初推动与日本、联邦德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等重要缓和性事件进行联系后的价值：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比起斯大林在冷战之初的战略更加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也使苏联逐步摆脱了僵化和封闭的境地，使苏联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胜利的历史成就之后，逐步开始进入世界和国际主流社会。

在美苏双方毫无互信和对抗升级的年代里，有缓和就必有危机。危机的爆发，从苏联方面的根源而言，不是领导人的决策错误，而是苏联在逐步提高国际地位，不断与美国抗衡所必须经历的“坎”。从历史纵向而言，古巴导弹危机暂时使苏联丢脸，却使苏联提高了国际地位。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不仅与美国总统建立了元首热线电话，而且开始利用危机之后的和平快速发展军力，使之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快速缩小。

当然，任何危机性事件都具有鲜明的双面性。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敦促美苏开始了艰难的军备控制谈判和裁军谈判，也使美苏军备竞赛升级。这一

矛盾性极强的双向战略举措，构成美苏之间冷战对抗的基石。如果没有军备竞赛的加剧，便没有地缘政治对抗向全球发展。地缘政治对抗向全球发展又反过来加剧了军备竞赛，当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对抗全球化不断互相“激励”时，美苏双方的心理对抗、意识形态对抗、经贸对抗、外层空间对抗等，纷纷浮上水面。

无疑，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据了上风。因此，美国在冷战的心态上也开始对可能的潜在风险进行低估。无法考证，古巴导弹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于越南形势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最后让步，使美国认为自己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成为主宰者。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时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干将，肯尼迪内阁中的副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麦克拉马纳、中央情报局长麦凯恩、参联会主席麦克斯维尔等。从中可以看出，古巴导弹危机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越南战争的困难与险境。随着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本来已经处于弱势的苏联，可以利用美国陷入泥潭的机会开始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苏联都只是色厉内荏地虚张声势，但是，美国处于重重困难当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勃列日涅夫时代：顶峰时的脆弱地位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历史上，甚至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超越性的历史阶段，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真正成为了全球性国家，军力和经济总量，以及国际地位达到了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程度。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弊病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苏联作为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制度是斯大林奠定的，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使苏联得以生存并且强大起来，然而斯大林奠定的制度却没有在战后长期的和平内进行自我调整和优化。赫鲁晓夫时代曾经进行过改革，但也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力迅速增长不仅掩盖了诸多制度性弊病，而且还使许多人忽略了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当

然，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中，况且还是在连续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时，对制度性的弊病进行批判的官员或者学者，无疑会遭到批判并断送前程。苏联之所以制度僵化，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民族传统的性格和文化，直接原因是领导人都不是按照法定的正常程序产生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任领导人，都是经过危险、残酷和非常规的权力斗争而走上最高位子。经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通过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对既定体制进行重构，要么通过固化既定体制来巩固自身权力地位。如果要以和平和文明方式来改革制度，无疑是将自身的政治安危置于随时出现的风雨飘摇当中。斯大林通过权力斗争成为最高领袖时，苏联正处于巨大的威胁与可怕的孤立当中，自然要集中力量快速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对原有农业化体制进行重构充满着血雨腥风，此体制一直延续到斯大林逝世。通过权力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在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试图对斯大林的制度进行改革，最终失败，并丢失了领导权。而到了同样依靠权力斗争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对制度进行改革的意志和能力更加薄弱。所以，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的鼎盛时期，也是制度不可逆转地快速僵化时期。这说明，苏联所有的成就和危险均来自于制度，而不是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经济和军力鼎盛时期，这是由苏联制度对于工业力量的催生和俄罗斯民族拥有巨大的战略资源两个原因促成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苏联制度造就的辉煌成就，使制度失去了自我调整与优化的能力，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正是因为制度僵化而失去了灵活调整自身冷战战略的机遇。

勃列日涅夫掌权之初，是苏联赢得冷战格局的战略主动最为有利之时。一是国际形势正处于剧烈动荡中，苏联外部安全环境最为有利。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难以自拔，不仅国内矛盾重重，而且西欧与日本的独立倾向日益强烈；中国虽然拥有了原子弹，但是相对于苏联仍处于绝对的弱势和守势当中。东欧国家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的发展，虽然在赫鲁晓夫时代有过政治危机，但是，苏联仍然对它们强化了控制。二是国内形势正处于经济发展和军力发展的高速期，国内政治环境日益稳定。

然而，苏联却丧失了大好局面。勃列日涅夫通过权力斗争上台，如果在掌权之初便像赫鲁晓夫那样主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那么个人领导地位便容

易受到质疑和挑战。所以，勃列日涅夫必须以强硬的姿态和趁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时“撬墙脚”的方式来对付美国，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和巩固掌权之初的个人威信。也就是说，苏联在美国最需要缓和的时候，不断以强硬和扩张之态来转守为攻，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同样需要缓和的苏联失去了最佳的缓和机遇。勃列日涅夫对美国的强硬和主动开始扩张使美国感到压力重重，然而，对于美国而言，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苏联，而且还来自于国内政治压力和盟友的离心倾向导致的压力，美国经济逐步失去了以前的地位。从另一个角度看，苏联其实比美国更加需要缓和。其实苏联的强硬与扩张对于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具有“帮忙”作用：因为苏联不断增加的压力，使美国国内各个党派和民众均感受到必须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从越南撤军，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和战略资源重新置于对抗苏联当中，并且全力摆脱经济地位下降的危险，维护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强势地位。越南战争使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开始分裂，但是尼克松上台后，在从越南撤军问题上取得了比约翰逊总统更多的国内支持，已经证明了苏联的强硬和扩张使因为越南战争而导致国内分裂的美国开始重新团结起来一致对苏。然而，苏联如果主动缓和，无疑又很有可能使美国减少冷战负担，快速地摆脱困境而“卷土重来”。也就是说，苏联对处于困境中的美国缓和，等于就是“妇人之仁”。所以，当美国陷入的显性的困境的同时，苏联也同样陷入隐性的困境。

苏联丧失大好局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与中国爆发武装冲突，由盟友变成仇敌，源自于俄罗斯民族传统中就带有的对周边邻居的天然的轻蔑与怀疑的性格。尤其是当自己处于强势时更加如此。中苏由盟友变成仇敌对苏联产生了比武装冲突还要严重的后果，中美之间暂时将历史积怨和台湾问题置于次要位置，快速走向关系正常化，而且此前，新中国已经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地位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走近和新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使苏联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孤立的局势当中，孤立导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也败招频出。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仍然极力避免与美国正面相撞，却在利用美国、西欧、日本依赖海外市场和能源供应的弱点，在侧翼包围它们。在中东形成

两边阵线，一边亲美，一边亲苏；在非洲，不断支持亲苏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在南亚，发展了苏联与印度的传统关系。这样的后果是苏联战线过长，每个地缘政治板块都需要苏联倾注大量资源与精力。尤其是当苏联要付出巨大的资源来进行军备竞赛时，使苏联背负着越来越大的包袱。而从越南撤军后的美国，虽然国力有所消耗，但仍然保持着经济领导地位，与西欧、日本之间的同盟关系随着具体条件而更新以适应新的实际。

苏联走得越远，战线越长，背负的重担越多，内心对于在美国重新恢复之前获得真正的优势地位的诉求就越渴望、越急切。而且，当苏联的实力处于顶峰时，却没有处于顶峰时的心态，其真正意图不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当然苏联也从来没有过关于世界秩序的任何设想，它的意图只是要求获得和保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及美国对这种地位的承认。所以，当尼克松上台提出五大力量中心说时，“美苏缓和真正开始有了实质性进展”^[14]。勃列日涅夫在掌权之初对美国的强硬，以及并在全球实施的积极扩张，而在国内权力地位巩固后，与美国又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缓和。这样鲜明的对比使美国产生了两种认知：一是苏联并不想、也不敢与美国正面相撞，它所需要的仅仅是美国的承认和巩固周边的势力范围。它在欧亚大陆之外的拓展，无非是机会主义的挖墙脚而已。二是苏联的真实国力不足以支撑全球性的行动，在很多问题上都是虚张声势。这使勃列日涅夫时代充斥着缓和战略只能是权宜之计。20世纪80年代初上台的里根开始利用苏联的弱点。

苏联利用缓和战略和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机会，在军事上拉平了与美国的实力地位。在中东，苏联强化了与阿富汗、叙利亚、伊朗等亲苏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升了在中亚、中东的影响力；而在欧亚大陆之外，苏联介入安哥拉等非洲地区，并且重新武装古巴，将古巴纳入经互会；苏联对中国亦没有放松敌对性的军事部署，在外蒙古和中国新疆、黑龙江边境布有重兵。从各种迹象看来，乔治·凯南制定的遏制战略正在失效，甚至大有强势逼迫美国退回到美洲大陆的迹象。

然而，苏联表面上的冷战攻势真的具有实效吗？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冷战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利用美国真正的弱点：越南战争陷入困境暴露了美国的两个最大弱点。一是国内政治氛围和社会文化难以支持目标不

明、利益不明的对外行动，而且美国的战略文化对于长远利益不够敏感的同时，对现实利益又容易过度敏感。美国政治家受制于国内政治氛围和战略文化。二是美国经济必须依托于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一旦海外市场和能源供给的主宰地位受到威胁，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就会暴露无遗。支持美国国际地位的根本支柱是经济、金融和海外能源。

苏联利用这些弱点的战略技巧可谓非常蹩脚和拙劣。当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时，苏联却在其他地区进行扩张，这等于是使美国从越南撤军减少了一个最强大的阻力。如果苏联将战略重心放在阻止美国从越南撤军上，很难想象美国又会面临怎样一个本已被动却又恶化的局面。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苏联即使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时，也没有意志与美国发生可能导致古巴导弹危机的正面对抗。

美国想从越南体面地撤军，就意味着“体面”成为美国的战略软肋。尼克松按照“疯人理论”发动的空袭，其意图就是迫使北越接受美国撤军时的要求：必须保留南越政权，其后果由越南人民自己选择。美国希望通过北越接受这个要求而获得“体面”，因为这使得美国撤军后，至少在名义上保留了南越政权，而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力量对比决定了美国只要撤军，南越就会被北越打败。从美国保留“面子”的角度看，美国的要求并不过分，但仍然遭到北越的拒绝。所以，当美国加强对北越和柬埔寨部分地区的轰炸时，如果苏联对北越施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援助，比如提供防空武器和隐蔽器材等物资，或者指导北越进行防空作战，那么美国轰炸也许至少会拖上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谈判，如果美国“疯人理论”的轰炸没有奏效，那么可想而知，其局面会多么被动和恶劣。

从历史上看，美军在仁川登陆时，苏联不愿意直接与美军交战，而希望中国参战，在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在最后关头先行退让，这些足以说明，在很大程度上，苏联没有对北越进行使其具备足够抵抗美国轰炸能力的援助，是因为苏联在实力上与美国拉平的同时，心态上还没有与美国“平起平坐”。当然，即使苏联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有利，也不利于苏联利用越南战争拖住美国拨出泥潭的步伐。因为，苏联与中国爆发武装冲突，而使中美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如果苏联援助北越，那么与北越更近的中

国又将如何，虽然具体举措不好预判，但是必定会强化与美国的协调而使苏联既难以援助，又要冒着在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制度僵化的弊病开始显现，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苏联开始高度依赖于世界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才能获得维持国家经济发展和军力发展的资金时，军政领导人也出现老龄化，对新兴技术、新兴思想、新兴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缺乏足够的敏感，也对即将来临的危机浑然不知。这带来了三个恶果：一是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出现运转困难时，苏联经济总量增长连续下滑，苏联日益呈现无力扭转经济的疲惫不堪之状。二是苏联军队只能延续着原有能力的增长轨道发展，缺乏新技术和新型作战方式。三是制度僵化，缺乏对外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认知，以致苏联在国际社会出现了饱受诟病的巨大的道德“漏洞”——人权问题。

这三个恶果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出现，虽然根源不在于勃列日涅夫执政，但是勃列日涅夫的执政风格加剧了这三个恶果，不仅不能解决这三个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三个问题已经成为恶果，而且继续好大喜功式地推行着产生“恶果”的战略。

这三种战略一是与开始从越南战争后“缓过来”的美国“加强对欧洲军力部署的对抗”^[15]；二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加强了渗透”^[16]；三是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尤其在里根上台后，仍然不顾苏联经济与军事实际，强化军备竞赛。不仅被美国利用经济和科技优势“牵着鼻子走，而且还丧失了缓和带来的宝贵的发展机遇”^[17]。

当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时，美国国内各种制度束缚着美国领导人对错误战略的调整与修正，而苏联同样犯有这样的错误。这让人们看到，不同民族的差异不在于制度的差异而在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当苏联无法从制度内部完成自我优化与自我调整时，美国已经完成了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纠错”。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民族文化中自我纠错的能力要强于俄罗斯民族。

“苏联入侵阿富汗”^[18]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冷战战略的顶峰，当然也是走向冷战失败的起点。在战略上，苏联军队仍然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和战后核武器时代的作战理论，苏联在欧洲平原上作战和打核战争的实力不断增强，却忽略了在阿富汗山地、丛林等复杂地形作战的能力。当美国强

力支援抵抗苏联军队的阿富汗游击队时，苏联军队正如陷入越南丛林中的美军一样，也陷入了阿富汗战争泥潭，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军事负担，还有来自自由美国和西方控制的国际舆论的道德“轰炸”。

苏联入侵阿富汗，看似苏联的主动冷战攻势，实际上说明了苏联脆弱的全球部署体系，同时也说明苏联周边一直存在着“安全隐患”。自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柏林问题、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从来没有让苏联对近在咫尺的东欧“高枕无忧”过。苏联构筑柏林墙，甚至在东欧国家出兵维护影响力，反映的不是苏联的控制能力增强，而是控制能力日益被冷战的压力削弱。阿富汗内部的政治变故，使美国讥笑苏联外强中干，本来可以在非洲和美洲建立势力范围，而周边小国却做出反苏之事，这无疑令苏联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影响上感到被动与难堪。

苏联在阿富汗犯的错误，其实与美国在越南犯的错误在本质上如出一辙。美国是在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胜利感的催化下陷入越南的，而苏联是在自身实力膨胀和美国被动时的胜利感的催化下陷入阿富汗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略错误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战略错误都是因为大国面子和对冷战对抗的危险过度敏感，而失去了对地缘政治现实、意识形态意义和安全形势的理性分析所致。

阿富汗虽然地处苏联和印度之间，但其地缘政治价值只能从地图上展现。如果苏联占据阿富汗，向东与中国北部边境的军力部署相接，对中国形成夹击之势，向南则可以与印度一起连接，使苏联突破南亚次大陆而伸向印度洋，紧紧扼住对西方具有生命线意义的印度洋航线，向西，则可以控制中东重要产油区和重要的石油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其实，这样的分析，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或者局外人简单的单向思维。如果苏联完全控制阿富汗，在阿富汗修建机场，使苏联战机可以短时间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阿富汗境内大修公路和铁路，与印度连成一片，伸向印度洋。如果苏联要在阿富汗形成如此庞大的军力部署体系、交通体系和经济体系，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和资源，耗费长期时日。苏联在经济发展日益乏力的情况下能否具有如此国力？即使苏联在短时间能做到，也会使日益具有独立倾向的西欧和日本更加紧紧依靠美国，而不是被苏联的地缘政治优势所绑架。因为被苏联形成的

地缘政治优势绑架，付出的代价和要作出的让步比紧紧依靠美国要大得多。况且，即使美国从越南撤军后，在欧洲和东亚对苏联也从来没有让步，甚至越来越强硬。例如，在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之前不久，北约甚至不顾苏联的警告与反对，决定在西欧部署更多的中程导弹。而且印度洋、霍尔木兹海峡、中东等与中亚、南亚大陆紧密相连的重要地缘政治节点，关系到美国、西欧、日本、澳大利亚众多力量的利益。如果苏联在中亚、南亚“闹事”，苏联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全部走向敌对，这对于以缓和为根本目标的苏联而言，必定是本末倒置。

美国高估了越南的地缘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苏联则是高估了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美国认为越南如果走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多米诺骨牌效应会由中南半岛向亚洲其他地区扩散，然而后来的越南统一后，的确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并没有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使美国的冷战格局遭到颠覆。甚至在越南统一后，因为中越矛盾的出现使美国有了可乘之机。即使阿富汗当局变成亲美者，苏联不出兵，阿富汗当局也会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可能持反苏立场，更不用说采取反苏举措了。而且，即使阿富汗有反苏行动，美国刚刚撤出越南，又怎么可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向比越南更加危险、距离苏联更近的地方进行军事介入呢？美国之所以对阿富汗游击队进行军事支援，主要是因为苏联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如果苏联不出兵入侵，仅凭苏联实力的影响也可以阻止美国利用阿富汗对抗苏联。因为那对于刚刚从越南撤军的美国而言，是更大的冒险。苏联出兵并陷入泥潭后，反而使美国获得了意外的机会。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错误还来源于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度集权的决策制度。1979年，勃列日涅夫年事已高，个人权力的巩固已经使其难以容忍反对意见，并且过分相信和倚重克格勃情报机构。个人专断性决策使苏联在没有全面评估与分析风险与代价的基础上，草率出兵。

当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时，由于他的终身制的领导人地位，使众多富有经验、可以提前担任领导人的其他领导成员，也被熬到了高龄。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几任领导人都因为年高而在任上逝世。领导人更换频繁的后果与苏联僵化的体制，还有入侵阿富汗导致的国际形象孤立，综合作用在一起，苏

联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

也许，如果此时美国仍然处于越南战争综合征中，兴许苏联还有时间来改革僵化的体制，以确保实力的增长。但是此时的美国，执“重振国威”口号上台的里根于1981年当选总统，他也许是苏联的天生克星，使苏联在已经疲惫不堪的状态下，迎来了新的紧张与竞赛。当时代发展到这个历史时期，苏联的“好运”似乎已经用完了，苏联在建国之初面临各个资本主义武装扼杀企图和包围孤立时，恰逢它们被欧洲事务和惩罚德国的问题所困扰，从而使苏联避开了美国和欧洲的锋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希特勒犯下重大错误，走向两线作战，使苏联获得了美国 and 英国两大强国的支持，更加幸运的是日本因为美国的威胁更加严重，没有选择与德国共同攻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冷战开始后，新中国的成立使苏联避免了美国 and 西方力量抵近至它的东部和南部漫长的边境地带；赫鲁晓夫时代，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坚定但却克制使苏联免遭了核打击。其实苏联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美国真的攻击位于古巴的苏联导弹阵地，苏联人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届时苏联将会更加丢脸，甚至彻底失去后来经济和军力的发展机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中苏爆发武装冲突时，苏联需要同时面对中、美两个核大国时，美国却陷入越南战争泥潭。苏联每次面临危险的时候，总是遇到“好运”。当然，我们不是以运气来分析国家战略的，苏联的“好运”是来自民族自身的强大和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地缘政治价值。而当历史车轮行进至20世纪80年代时，苏联在面临困难时，能否还有时间和外部条件令其可以从容地自我纠错呢？

当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时，苏联像一个重病在身的巨人，能力很强，但是身上的顽症因为身躯庞大而更加难以治疗。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开始从越南战争中快速恢复过来。这决定了苏联要么抓紧时间改革以治疗自身疾病，要么在美国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面前低头认输。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的顶峰，也是俄罗斯民族最为辉煌和强大之时。但是历史证明，当民族文化和性格的任何一个侧面发挥至极致时，既可能是力量和权势的顶峰，也可能是令自己万劫不复的“悬崖”。

戈尔巴乔夫时代：自陷末日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苏联最后一个时代。当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拥有了自民族历史开创以来最强大的高度，也是维护生存的成本与风险最大的时代。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日益僵化的体制对苏联最大的伤害是使苏联失去了融入大势所趋的世界发展潮流当中，苏联与东欧还有接受苏联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日益形成整体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体系中的一部分。冷战不断加剧使苏联几乎是以一国之力来对抗整个世界，并使自己受到巨大的孤立。苏联制度已经僵化到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便能达到像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推动工业化时的再度激活的程度。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总体情况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认为：“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入深刻的危机。”^[19] 戈尔巴乔夫最需要的是赢得外部的缓和，真正意义上的缓和也需要利用外部的资本、经验和技術，甚至是思想来解决苏联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苏联的自救已经处于不可能完成的状态。

苏联的弱项是经济，当时的经济体制导致“苏联经济的健康化，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情况”^[20]。而要推动苏联经济进入国际分工体系，首先必须利用苏联的实力地位来获取美苏之间的真正缓和，使美国和西欧、日本同意并且接纳苏联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正常一员。所以，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提出：“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21] 而要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如何运作美苏关系成为核心因素。戈尔巴乔夫认为新的对美国战略的新思维是寻求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寻找和扩大共同点，以便最终实现友好关系。苏联主动与美国缓和的意图非常明显。然而，美好的愿望和符合远景潮流的设想遇到了残酷的现实。如果戈尔巴乔夫遇到的是卡特，兴许苏联不需要作出那

么多的让步便可以实现戈尔巴乔夫描绘的美苏关系的“蓝图”。但是，他遇到的是里根。里根正是打着反对缓和的旗号上台的，如果戈尔巴乔夫一提出缓和之声，里根便立即作出同等的缓和回应，岂不是有损于自己的政治声望。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恰逢里根开始第二任期，毫无连任压力，在对苏联问题上比在第一任期内具有更少的制约。美国不急于缓和而苏联急于缓和，高下之势立见。苏联如果不作出巨大的让步之前，便与美国开展新的、将被拖入更加危险的军备竞赛和冷战对抗当中。这对于塑造改革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而言非常不利。戈尔巴乔夫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苏联的经济已经“难以承受冷战对抗”^[22]，而且苏联仍然有实力来影响美国和西欧走向缓和。但是，其战略设计中却充斥着一种情愿的理想化色彩。理想化色彩在戈尔巴乔夫对美战略的全部领域内都是主轴性思路。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提出这样由高尚的辞藻组成的缓和倡议时，如果美国不表态接受，又岂不是处于道德低谷，而增加发挥优势的阻力吗？

所以，戈尔巴乔夫时代迎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具有友好氛围的缓和，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频繁地共同出现在世人面前，面带笑容，亲密握手。然而，在这背后却是苏联一次又一次无奈地被美国一步步逼至墙角，美国让一小步，苏联必要让一大步。否则，苏联就要面临美国加剧冷战对抗和发力拉大差距的后果。这显示出时间并不在苏联这边，而是在美国这边。对美国的让步也使苏联改善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随着美苏一揽子协议的达成，苏联与西欧、日本和中国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对于苏联而言，具有更多的积极作用，与西欧、日本改善关系可以获得急需的经济支援和扩大互利的贸易往来；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使苏联可以减少部署于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上的庞大兵力。然而，这些关系改善的红利并非可以在短期内缓解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困难。当里根向沙特等产油大国施加压力，以增大石油产量致使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下降，使苏联主要外汇收入萎缩时，苏联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便启动了所谓的“新思维改革”，而且强调低水平的军备平衡，高调宣扬作出让步，这不是正常的超级大国应有的策略。相反，这种新思维和高调使美国看到了苏联的软肋和苏联解决软肋问题的紧迫

心态。戈尔巴乔夫提出：“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23]从中可以发现，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双边推动同等程度的裁军、削减战略核武器，并在地缘政治斗争中撤出自己的力量，仅就这一设想，美国就不可能接受。因为美国已经在经济上占据优势，可以持续地推动冷战，而且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时，又使美国占据了新的技术与军事实力的制高点，如果美国同意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其结果是置自己的优势于不顾而迎合苏联。美国可以缓慢地与苏联谈条件，谈判越持久，苏联就会让步越多。当然，这种责任的根源不能由戈尔巴乔夫来承担，换作任何一名领导人在处理当时美苏之间的问题时，都只能要么继续强硬，并且针锋相对地追求军力平衡，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除非爆发双方都互相毁灭的核大战，否则苏联必败无疑；要么通过自己的主动让步来获取美国减缓施加压力的步伐。戈尔巴乔夫自然选择了后者。

戈尔巴乔夫选择在军备控制和裁军上让步是明智的，但是失误在于没有使美国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让步是以增加对美国的压力为前提的。戈尔巴乔夫没有令美国看到，如果没有苏联的让步，美国便难以取得实质性的冷战成果，而且苏联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将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联系起来，使美国难以利用经济和军力优势来向苏联施加压力。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策略，其实质是争取体面地投降，并且希望美国能够配合，让戈尔巴乔夫可以向国内有所交待。

苏联唯一能和美国对等的是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运作对美战略时，不是先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上让步再谈其他，或者是戈尔巴乔夫将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与其他问题捆绑在一起进行谈判，那么，苏联的压力会减少很多，而美国迫使苏联让步的压力会大很多。当苏联在唯一能和美国进行对等谈判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上“让步”^[24]后，就意味着冷战格局下的地缘政治形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东欧问题和德国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排上日程。既然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得以顺利解决，那么东欧各国的政治取向问题和民主德国的地位问题便需要苏联的“配合”。

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也是苏联的安全屏

障，而民主德国是屏障的前沿。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的地缘政治现实，然而除了斯大林时代之外，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东欧国家都出现过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苏联均是以武力进行镇压，虽然事态最终在苏联强大的实力面前平息，但是爆发事态的根源并未根除，并有新的累积。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时，苏联意在东欧放松控制，这是自赫鲁晓夫使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以来，苏联在处理东欧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出现的第二个历史性节点。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便提出：“每个党独立自主、每个党有权自主解决本国的问题、对本国人民负责，这是绝对的原则。”^[25]接下来，他开始批评苏联以往的东欧政策，认为苏联没有考虑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新问题和新特点，反对和干涉东欧国家的新探索。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时代的最后一代领导人，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在个人观念与视野、对信仰的坚持方式具有本质的区别，这反映的不是领导人个人素养的改变，而是苏联在时代前进中的整体改变。苏联人已经认识到，并且开始将其用于实践当中。即：“主权与独立、平等与不干涉原则成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本身就是 20 世纪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26]当那些旧式领导人离开历史舞台之后，苏联的新式领导人的出现必然会对以往的经验进行修改。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苏联，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和社会。二是利益需求已经不允许苏联维持对东欧的传统控制方式。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等多管齐下的强力控制，是“苏联经济沉重包袱的重要组成部分”^[27]，也是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均感到危险的做法。因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既没有改变冷战以来的对抗格局与战略态势，反而令美国和西方不断使用意识形态渗透宣传和利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分化瓦解苏联的东欧阵营，有时使苏联防不胜防。

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与东欧国家，既是迫于现实压力，也具有主动减负的作用。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苏联只从经济现实考虑来推动苏联与东欧关系向新的方向发展，而缺乏对地缘政治的深刻分析。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即使苏联改变与东欧之间的关系性质，不追求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按照苏联的实力、地缘政治影响力，东欧国家仍然会受到苏联巨大而深刻的影

响。也就是说，只要苏联自己稳得住，根本不需要对东欧国家的政治立场与取向过度敏感，因为它们无法越过苏联的影响而自行其事。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设想是非常明智的以退为进之策。然而，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高估了东欧国家执政党对它们自己国家的控制力与威信，或者在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的改革时，也带动了东欧改革，而东欧改革的结果就是削弱各自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把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简单地带到了党际关系当中，等于是使东欧各执政党在没有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和保护下自行其是，当改革过程中遇到矛盾爆发时，脆弱的执政基础使东欧国家的执政党迅速失去了执政地位。如果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的改革与东欧的改革联接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体系工程，使苏联的改革与东欧国家的改革协调运作，成为整体，那么也许就不会导致各自为政式的改革而失控。

东欧国家的“失控”导致戈尔巴乔夫的全盘规划被措手不及地打乱。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向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影响，而且使苏联民众开始出现心态上的混乱，更加致命的是苏联党内高层开始出现动荡。戈尔巴乔夫处于高层中的孤立位置，致使苏联可能出现更换领导人的重大政治事件。这种可能性又使美国加紧向苏联施压以达成新的协议。

大国从来没有“内部”的政治动荡。当戈尔巴乔夫被苏联其他高级官员软禁在别墅中时，立即引来了美国及西方的谴责。因为美国和西方需要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以贯彻已经达成的协议和推动新的协议，当然这些协议因为有戈尔巴乔夫的存在而日益有利于美国及西方。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就是苏联军方并不赞成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军方高级将领反对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通话内容被美国获悉后，美国决定仍然将戈尔巴乔夫当作打交道的对象，而不是其他人。美国对戈尔巴乔夫被软禁进行谴责，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应。当戈尔巴乔夫回到领导人工作岗位时，苏联其实已经成为美国手中的“玩偶”。当美国又与苏联达成新的军备控制和削减武器的协议后，便代表着苏联的彻底屈服。

苏联的彻底屈服给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政治地位带来了恶果。一是因为让步并没有得到美国相应的回报，导致苏联日益被动，而且一开始让步，便意

意味着后面要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二是因为裁减常规军事力量过于激进，出现诸多国内问题，比如许多退出现役的军人无法安置和军事设施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导致了更重的财政负担的同时，社会问题丛生，军队士气低落。这两个恶果使戈尔巴乔夫开始受到国内高层各种力量的质疑与非议，并且演变成政治动荡。后来的历史证明，苏联党内高层的动荡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当东欧剧变发生时，民主德国地位问题便成为美苏之间新的焦点。德国问题是美苏冷战对抗最直接的前沿，两次柏林危机均不是局部性的孤立事件，而是反映和决定冷战格局的镜子。如果哪方在德国问题上让步，便意味着哪方将会陷入巨大的被动，所以在两次柏林危机后，苏联再也没有意志挑起危机，而美国亦无在柏林问题上刺激苏联的意愿。

1987年6月，戈尔巴乔夫对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说：“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28]所以，可以看出来，起初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而是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两个德国，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并存的政治现实。因为两德合并会“加剧苏联的政治问题，并诱发保守主义的反攻和危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甚至波及他所掌握的权力”^[29]。所以，戈尔巴乔夫反对两德合并。然而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形势开始急转直下。1990年1月底，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驻民主德国部队司令员赫罗梅耶夫元帅，做好将军队全部撤出民主德国的准备，这说明戈尔巴乔夫至少已经决定不反对两德合并。

1990年1月30日，民主德国领导人莫德罗访问苏联，希望戈尔巴乔夫减缓德国统一进程。紧接着2月9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苏联，与戈尔巴乔夫讨论了德国统一后与北约的关系问题，与波兰等国的边界问题等。会谈后，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在苏联、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关于两个德国统一的问题没有分歧，这一问题应该由德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简单地说，主要出发点就是德国人自己应该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知道这是我们的立场。”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由反对两德合并转变成为赞成两德合并。

此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赞成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但是，苏联既然赞成两德合并，自然也无反对统一后的德国选择加入北约，实际上苏联赞成

两德合并就应当做好德国加入北约的准备，因为联邦德国拥有优势的人口和经济综合实力，而且是北约成员国。东欧剧变后，东欧国家争先恐后地与联邦德国发展友好关系，使民主德国执政党在执政乏力的情况下，已经对阻止两德合并无能为力了，民主德国的民众都希望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然后加入北约。而且，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立场。同时，苏联需要统一后的德国对苏联进行经济援助，苏联没有强力反对德国加入北约的底气。其中最关键之处在于在苏联公开赞成两德合并前，便指示撤出驻民主德国的37万军队，而且在两德合并的“4+2”会议上，没有对民主德国或者统一后的德国提出任何保留苏联在德国特权的要求，甚至还承认德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盟友。如果苏联保留驻民主德国的军队或者提出对统一后的德国领土上的特权，或者故意搁置德国与波兰、捷克等国的边界问题谈判，那么德国将会面临要么以损失主权为代价加入北约，要么成为一个中立国家的两难选择。苏联倒是可以利用德国的两难处境将其作为筹码。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在戈尔巴乔夫内心中，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达成协议来结束冷战比苏联的地缘政治地位更加紧迫。苏联希望通过让步来获得急需的来自美国和西方的援助。

当然，不是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使苏联丢失了地缘政治优势，而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足够的国力和意志力来继承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遗留下来的地缘政治遗产。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当苏联需要美国和西方进行援助时，冷战就已经结束了，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甚至苏联解体只是冷战结束的标志，而不是原因。

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使苏联失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但是，苏联并没有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力地位。因为即使德国和东欧脱离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凭借苏联的实力地位，它们也根本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安全威胁，而且东欧的混乱和德国统一后的社会问题，使它们仍然难以忽略苏联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客观上是将一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西方，西方如果要使东欧成为遏制苏联的新前沿，就必须使东欧由混乱走向稳定。东欧如果由西方提供经济援助而摆脱混乱，最大的受益者是统一后的德国。而德国统一并重新强大后，又会彻底改变中欧地区和东

欧的地缘政治格局，存在着潜在的走向威廉二世时代和希特勒时代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潜在可能性变成现实，那么美国就需要对欧洲进行重构，而处于重构中的欧洲，根本无法绕开德国和苏联。所以，如果德国和苏联仍然强大，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将随时面临潜在的地缘政治变故的可能性，致使它们寝食难安。

所以，对于美、英、法而言，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之后，必须要做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必须利用北约来约束德国，将德国牢牢控制；二是继续弱化苏联，使苏联不能利用东欧的混乱和西方对东欧的援助与德国合作。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无疑是致命的，德国刚刚统一，不可能在北约内部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而且又受到制约，苏联失去了最重要的欧洲强国中的潜在伙伴。而且因为美国和西欧再次在经济援助上令苏联失望，苏联已经病入膏肓，其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

世人无法确切地肯定美国在多大程度上确信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之后的苏联可能会走向解体，美国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苏联命运的研判。当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后，戈尔巴乔夫主导制定、并在1990年6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正式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获得通过后，说明戈尔巴乔夫已经认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后，冷战已经确定无疑地走向结束了，苏联已经获得或者即将获得改革所需的外部稳定环境，所以要完全按照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意愿和价值观来改造苏联了。这是苏联走向终结的门槛性决定，因为该行动纲领草案的出台，使戈尔巴乔夫将改革的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道路和意识形态领域。这立即引起了美国学者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布热津斯基更是预测：“有朝一日，党甚至可能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30]这至少说明美国已经看到了苏联走向终结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看到了苏联走向终结的可能性，并按照苏联走向终结来确定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的各种战略，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价值仅仅限于推动已经达成协议的各种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的各项内容，而如何处理剧变的东欧问题等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美国显然越来越难以重视苏联的意见了。所以，冷战末期的美国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它最担心的不是苏联的态度，而是欧洲可能出现的变数。美苏冷战的持续使欧洲的地位日益重要，任何一个

问题在缺乏欧洲参与的情况下都不能得到解决。因为苏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恢复，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关于建立欧洲大厦的倡议得到英、法，特别是统一后的德国的支持。如果苏联与英、法、德构成了欧洲大厦的基石与支柱，那么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将会非常微妙，关系到美国未来在欧洲将会以什么样的地位来享受苏联衰弱的红利。如果苏联仅仅是衰弱，即使是长时间衰弱，凭着强大军力和工业基础、丰富的资源和欧洲和平的外部条件，也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恢复。对于美国而言，虽然苏联衰弱后的欧洲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只要有苏联存在的欧洲，对美国都是潜在的巨大挑战。苏联成为一极的时代因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已经结束，但是美国成为一极的时代却没有结束。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苏联，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成为美国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冷战时，美国需要欧洲的均势，利用西欧为跳板，使西欧与东欧之间形成均势，并且遏制苏联。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德国实现统一后，美国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排斥苏联的一体化的欧洲。但是，必须由美国来主导东欧进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这意味着需要制衡和控制德国，而且还要利用德国对东欧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来推动东欧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二是将苏联纳入一体化的欧洲。美国需要同时制衡和控制德国、苏联，而且当苏联加入欧洲一体化时，苏德之间的合力对于东欧的影响是美国鞭长莫及的。所以，对美国而言，东欧剧变后，要立即控制和约束德国，同时还要进一步排挤苏联，使苏联不能加入欧洲大厦当中。基于此，美国必须继续排挤和削弱苏联。也许美国自己也没有想到苏联输掉冷战会使苏联发生多大的政治动荡。但是，美国在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后对苏联的所作所为的确使苏联陷入比软禁戈尔巴乔夫还要严重的政治动荡，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政坛里名声扫地，叶利钦在苏联政坛崛起，使苏联的主要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开始独立于苏联之外。紧接着，弱势地位的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和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

当苏联解体已成事实时，不得不回看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在国际上，面临美国里根上台后更加强劲的压力；东欧的离心倾向已经由个别国家领导层的权力性诉求变为东欧国家民众普遍性的内心诉求；苏联还陷入到不知何时脱身的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当中。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领导人上台，都

会有强烈的改革愿望。戈尔巴乔夫对深陷危机的苏联的判断是清醒的，即苏联“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31]。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忘记了苏联的地位决定了改革的战略定位，像苏联这样的大国的改革，不应当完全是因为面临的困难而决定改革，改革的本质应当是一个权倾一方的大国不断在国际上追求新的高度。苏联的改革不应当只是自救性质的，而是一个超越自身民族局限性，不断追求新的历史高度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成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人认为他应当受到千夫所指，有人认为他是在顺应潮流。历史的逻辑从来不是由“个人”决定的，当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有为的政治新星在苏联领导层里脱颖而出时，他个人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年龄和改革魄力，曾使他被认为是苏联的希望。然而，戈尔巴乔夫把本来应当追求新的历史高度的改革，变成了自救性的改革。所以，戈尔巴乔夫理想化地认为苏联和其他国家应当超脱意识形态的分歧。虽然这种战略设想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意识形态禁锢国家的对外战略时，往往导致陷入被动，甚至衰亡的悲剧。但是，面临正因为意识形态而起的冷战时代，主动放弃意识形态斗争，无疑是自断臂膀。自救性的改革认知，加上迂腐的脱离意识形态的现实，领导人开始在对方面前处于被动之势，怎么可能不会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苏联在“乞求”缓和与经济援助呢？领导人的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影响到国家战略的情况在历史上常有，而超越了既定体制却是稀有之事。无疑，作为苏联这样的大国，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为苏联奠基的意识形态，这说明苏联的命运必然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国。

当冷战进入末期，美苏双方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因素的扩大。最终胜负的根本原因虽然不是个人因素，但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差异对美苏的最终战略走向起到了历史性的决定作用。“里根了解他的社会之主流动脉，而戈尔巴乔夫则毫不了解。”^[32]里根在其第一任期内对苏联战略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霍夫曼谴责里根是一名“好勇斗狠的铁汉”。他“对外交政策的细节不感兴趣，他只吸收了下列若干基本观点：姑息的危险、共产主义的邪恶和美国的伟大等等”^[33]。也正是由于里根这种个人风格和基本价值观，导致了其竞选总统期间和在第一任期内时，采取对苏联“毫不客

气”的强硬口径和许多具体的战略措施，一度使美苏关系陷入“冰冻”，从而也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划上句号，使苏联在美国摆脱越南战争泥潭后又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作为一名政坛老手，里根在强硬地敌视苏联的同时，在行为上却非常谨慎。上任后，里根从来没有放弃过向苏联领导人呼吁缓和。“软硬结合”其实反映了里根个人的性格特点。从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到支援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抗击苏联侵略，再到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反苏力量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为的就是遏制苏联所谓的“扩张”。而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的“缓和倡议”，都是在重大的、旨在取得对苏战略优势的计划得以完成或者获得国会通过后提出的。

从历史表象看，是戈尔巴乔夫向西方的让步断送了苏联。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对戈尔巴乔夫的认知很正确，但肯定缺乏对苏联的正确认知。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前访问英国时，在议会发表“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的主旨演讲后，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便认为戈尔巴乔夫“值得信赖”。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后，她干脆自豪地宣布：“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34]这反映出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原因是什么，苏联针对西方的根本心态又是什么。戈尔巴乔夫对西方让步，实质上是苏联在历史上对西方的让步，苏联之所以咄咄逼人，其根本意图也在于与西方实现缓和，最终实现“井水不犯河水”式的和平共处，这严重违背了西方不断寻求扩大市场和能源供给、不断传播价值观的根本利益，所以，西方在总体上是追求使苏联西化，而苏联只是在国力不断上升时，以所谓的进攻之态行防御之实。苏联在心态上，即使是在实力顶峰时，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要超越西方的境界，而西方即使在越南战争的困境中和面对苏联的咄咄逼人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超越苏联的心态。

苏联输掉冷战不是因为苏联弱小，而是苏联的孤立，根源在于俄罗斯的文化。苏联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巨变而超越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俄罗斯民族由弱到强，由最初生长于蛮荒之地的受奴役，仅仅几百年便成为令整个欧洲恐怖的强族，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后，俄罗斯民族开始向东方和西方

同时扩张，战胜了拿破仑后成为欧洲宪兵，战胜德国后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欧洲大陆最强大的高卢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都曾经在俄罗斯民族面前惨败过，雄居于东方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俄罗斯民族是世界舞台上典型的依靠坚韧顽强地将蛮荒之地变成文明之地的强族。俄罗斯的资源是所有民族中最丰富的，它在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军事等领域具有非凡的成就。然而，当英、美两国的文化开始远播全球时，俄罗斯伟大的民族文化却只能局限于自身民族领域内，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很难被人仿效。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罗斯是一个孤立的民族，对四周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和占有欲。不信任感导致俄罗斯对外部的排斥，而占有欲又使俄罗斯以周边国家的仇恨为代价来实现扩张，俄罗斯文化的地域性极强，又难以及时地将“占有”的地区进行文化同化。所以，俄罗斯的民族命运就是：不断扩张，不断遭遇抵抗，不断陷入灾难，又不断在灾难中走向强大。苏联从本质上看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顶峰，也是文化和能力的极限。如果苏联仅仅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超越，而没有完成对民族文化的超越，苏联的命运自然会是俄罗斯的历史翻版。

苏联从弱势和孤立之状起家，成为世界一极，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俄罗斯民族的伟大体现最鲜明的是在苏联时代。冷战时期，斯大林奠定苏联进行冷战对抗的实力地位，苏联已经开始远远超越了彼得大帝时代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战略视野超越了俄罗斯的传统，力量也延伸到了相当的高度，中东、加勒比海都已经感受到了苏联的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是俄罗斯民族第一次走向全球，成为全球性力量。但是，苏联最根本的错误是它以不明智的挑战方式来挑战一个根本不应该挑战的对手，而且显得那么鲁莽和冲动，甚至是自私、自负，尽管也不失辉煌与悲壮。

第四章

江河日下的英国

不屈的地位重塑

英国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成功的国家总是最善于为自己谋利。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利用欧洲大陆的矛盾塑造格局，“二战”时在逆境中坚挺不倒，战后同样利用美苏矛盾格局，成为任何大国都无法忽视的国家。英美的特殊关系即是英国的财富，也是它智慧的体现。从丘吉尔到撒切尔，历经冷战所有的危机和缓和，英国虽有失误和错判，但总能谋取超过实力地位的利益，这种历史值得每个国家研究。

自从英国实行光荣革命以来，有赖于政治制度对商业力量和工业力量的推动，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和科技最为发达国家，尤其是取代了西班牙海上霸权地位后，拥有海上绝对强势力量的英国奉行“光荣孤立”，即平时不缔结束缚自己战略立场灵活性的永久性政治和军事同盟，反对对欧洲大陆具有称霸野心和独大的国家或者同盟集团。先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中，使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成为英国的跟随者；后是和俄罗斯开始进行欧亚大陆腹地的争夺，并屡次成为赢家。英国是通过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来玩转欧洲，从而利用强大的海权来获得全球性霸权。“日不落帝国”由此而来。英国保持全球性霸权地位的基础有四个：一是发达的金融；二是全球性贸易；三是超强的海军；四是欧洲大陆大国陷入矛盾纷争而难以破坏欧洲大陆均势。然而，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对欧洲大陆均势产生了比法国和俄罗斯还要大的冲击，美国和日本崛起开始在海洋上不断动摇英国的海权根基。在金融和贸易领域，更加年轻的美国似乎是“学生超过了先生”，利用英国与欧洲大陆大国的纷争，美国的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也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并拥有了最大的经济总量。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虽然均成为战胜国，但战争的消耗已经使英国不再拥有“日不落帝国”的尊贵地位。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德、苏三个欧洲大陆大国形成均势或者都因

为战争消耗而羸弱不堪，英国的战略地位也许并没有达到危险的地步；如果美国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得疲惫不堪，那么英国也许还可以重新争夺全球性霸权地位。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势已经清晰可见，当苏联红军直逼柏林和美国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时，中国成为独立的战场，以前各个殖民地各自拥有了信奉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英国面临的形势是：在欧洲大陆，苏联成为唯一的一个大国，如果不是盟军诺曼底登陆后解放了西欧，并且进入德国，苏联可能会趁势进入西欧，将西欧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美国已经通过对德国和日本作战、援助英国和苏联作战，成为拥有超强海上军力和运输力量的“海上霸王龙”。当然，仅仅是安全威胁还不是最主要的，更加主要的是，英国因为战争背负了巨额债务而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坐在大俄国熊和大美国水牛之间的可怜的小英国驴”^[1]在未来的世界上将承担何种角色？怎么找到有利的位势？如何在新的世界中趋利避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英国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深思熟虑。而战争结束之际，在英国对美国解放欧洲的战略影响下降的同时，又同苏联爆发了传统的英俄地缘政治斗争，这不仅是历史的延续，还有意识形态对抗的新因素。

当战争结束时，英国面对的是分成两半的欧洲，以德国为分界线，西欧是美、英占领，还有法国，东欧则完全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从理论和理想化状态而言，美、苏、英三个主要战胜国如果在欧洲继续和平相处，持续战时同盟，将对三方是最有利的。然而，三个国家都没有超越历史经验的束缚。尤其是英国和苏联。英国仍然希望欧洲大陆形成均势和主导南欧、地中海，以维持英国的殖民体系；苏联则是俄罗斯的扩大版，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希望形成涵盖东欧、波罗的海海域、黑海海域、西北太平洋部分海域的“安全区”。也许没有意识形态的对立，美、英与苏联可能超越历史以延续战时同盟，因为美国毕竟希望形成集体安全体系。然而，罗斯福总统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逝世，对苏联毫无直接接触经验的杜鲁门总统上台后，将个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感知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塑造战后国际秩序的决策当中。英国不仅出于欧洲大陆均势的传统需要，而且出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仇恨而希望欧洲避免被强大的苏联所独霸。这样，英国与美国形成

了对苏联一致的认知，即必须避免和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向全欧洲扩张，而苏联传统上对西欧和西方缺乏安全感，加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立场，也开始与美英由战时同盟走向敌对。

此时的英国，其利益需求已经再明显不过：英国必须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如果美国对抗苏联的意志下降，那么也要在美苏之间制造对抗氛围和诱因；英国必须保持西欧作为巨型的桥头堡的作用，以作为和美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前沿；英国人必须利用美国的全球力量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全球地位，包括中东、地中海、印度等。这些利益诉求的牵引导致了“三环政策”的出现。三环政策是英国丧失全球领导者地位后保持重要影响力的战略性努力，这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转变，还是观念、心态和行为方式的主动转变。

三环政策的出现，其起点应当是罗斯福的逝世和杜鲁门上台。罗斯福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是威尔逊主义的现实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威尔逊主义，对世界蓝图的描绘过于理想化。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将其理解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战败国也不可能利用威尔逊主义来获得公正的战后地位，战胜国也不能利用威尔逊主义来获得期望中的收益。总之，威尔逊主义处处碰壁，作为最终妥协的产物，《凡尔赛条约》根本没有在美国国会中表决通过。罗斯福吸取了威尔逊主义的教训，除了采纳其基本教义之外，还根据战后大国的实力地位，设想了四大警察制度：美、苏、英、中。四大警察在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中发挥主轴性作用，互相协调以推动全球性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

四大警察制度有比较大的理想主义成分。一是忽略各个大国在不同地区中不同地位的实际。由美、苏、英、中来协调推动所有国际问题的解决，假如四个大国在处理欧洲问题时，因为中国在欧洲国家中并没有较强影响，可能会拖延解决欧洲问题的时效。再比如处理美洲问题，显然，中国和苏联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二是抹杀了不同大国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利益诉求。同一问题中，各个大国之间仍然按照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不同的利益诉求来处理问题时，容易久拖不决。比如，当东欧出现问题时，苏联作为东欧国家的实际控制者，是不可能允许美、英、中来插手的。

尽管四大警察制度具有理想化成分，但在当时却是一个超越了历史经验

的国际制度安排。首先，四大警察制度可以将大国间的矛盾在同一框架体系内解决。以前的英俄矛盾、中俄矛盾、中英矛盾等历史长期问题的解决可以避免走上无休止争斗的老路。其次，减少了弱肉强食的可能性，尽管不可能将其减少至零。虽然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牺牲了中国的利益而换取苏联出兵攻打日本关东军。但是战后四大警察制度一旦建立，苏联对中国进一步的贪欲也会得到有效遏制。

然而，四大警察制度一提出来便遭到私心特别严重的英国和苏联的反对。它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四大警察制度使英国和苏联受到束缚，甚至会出现丢失既得势力范围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成为警察之一时，它们内心更是难以接受弱小的中国与它们平起平坐。英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以强者自居，而一直轻视被自己打败的清朝，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国仍然定格于清朝。苏联根本就不希望在日本和德国被打败后，在它南部直接接壤之处又出现一个比日本和德国国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拥有更大潜力的大国。因此，苏联和英国尽它们一切可能来压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反对四大警察制度。但是，因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和罗斯福总统崇高的威信使丘吉尔和斯大林不便于公开反对。但是，罗斯福总统逝世后，杜鲁门接任总统。英国和苏联便根本不把四大警察制度的设想当作未来战后秩序的基本内容。

当杜鲁门主义和丘吉尔富尔敦演说出现时，当随着年龄老去而对地缘政治斗争现实日益褊狭的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市场时，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前同生共死的伟大盟友成为敌人。四大警察制度与历史失之交臂，说明历史经验在当时还是难以超越。美国作为一个后起之国，对世界事务的设想具有理想化倾向。罗斯福的理想化在于对和平设想得太好，而杜鲁门的理想化在于对自己设想得太好。

杜鲁门对苏联的态度代表着美国的态度吗？当罗斯福向美国民众承诺尽快结束战争并将士兵们带回美国与家人团聚时，便可以反映出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具有市场。战争结束时，美国民众普遍希望军队撤回美国本土。然而，杜鲁门却决定留在欧洲。有人认为列宁、斯大林、希特勒等个人对历史的作用比美国 and 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个人作用要明显的多，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难以受到制约。西方领导人个人的历史

作用一定根植于当时的国民愿望当中，并且具有影响和推动国民愿望的意志力与威望。杜鲁门不具备罗斯福的威望，但是意志力却比罗斯福更加强，强大到改变了推翻罗斯福的初衷，坚定地苏联走向对抗。杜鲁门对苏联强硬的立场使英国看到自己的国力江河日下时的重要战略支撑。杜鲁门的个人意识形态对苏联产生仇恨，根本不愿意与苏联合作，其内心的根本态度就是必须强硬地对待苏联。而对苏联同样仇恨，还与苏联存在地缘政治斗争压力的英国，便有机会利用杜鲁门对苏联的天然仇恨为自己谋利。

此时的英国再也不可能独力来构建欧洲大陆均势，如果要构建欧洲大陆均势，就必须紧紧跟随美国来影响美国，利用美国来遏制苏联。从这个角度看，冷战是英法、英俄、英德的欧洲格局的延续，因为加上了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而成为全球性陆海对抗。

三环政策是英国面临外部环境和自身力量的变化时的主动作为，而且是抓住和利用战略机遇来维护自身大国地位的成功之作。因为它使英国成为西欧国家中冷战最大的受益者。当美苏冷战开始时，美国需要英国的精诚团结，苏联不能忽视英国的地位，西欧亦不可能脱离英国而自行其是。英国从一个欧洲大陆均势的受益者成为冷战对抗的受益者，不仅在于它的战胜国地位，而在于“知道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2]。

英国如果不主动将欧洲大陆均势主导者的地位让位于美国，那么英国将承担超出自身国力许可的重任。而且，如果不使美国来承担它让位下来的重担，那么苏联就有可能掌控欧洲。英国将会面临历史上一直避免的欧洲大陆遭到独霸的危险局面。

英国必须紧紧依靠美国，不仅有对抗苏联、防止苏联独霸欧洲大陆的意图，而且具有平衡西欧、增强对美国影响力的意图。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与美国和苏联平起平坐的西欧国家，自然在战后是西欧国家中对美国和苏联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当英国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同样需要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时，英国需要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援助。英国利用战时同盟来构建英美特殊关系，不仅需要英国对美国进行支持和影响，而且英国可以作为美国与西欧之间的桥梁来增强对美国的影响力。西欧国家之间存在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贸易问题和市场配额问题等，如果英国能够帮助美国在推动

西欧统一大市场上起到平衡矛盾和发挥桥梁的作用，那么英国无疑也可以保持自己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特殊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利用美英特殊关系使英国增强对西欧的影响力。

危机时代：风光不再时的主动作为

丘吉尔是三环外交的构建者，作为深谙历史的学者型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个人并不是幸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超乎寻常的起伏的从政道路和当战争胜利在望时被英国民众选下首相职位，特殊的经历使丘吉尔不仅具有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策略，而且还使丘吉尔成为对英国国家命运理解最为透彻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从而成为英国历史转折点时的巨人。当丘吉尔“断定苏联人已划分了欧洲，企图把他们控制的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分离出去”^[3]时，便认为：“战后初期的英美特殊关系与战时同样重要。”^[4]

这说明，三环外交从本质上是英国传统均势战略的升级版，它从来没有摆脱过遏制欧洲大陆独霸者的根本战略目标，只是以前是英国主导欧洲大陆同盟或者脱离同盟，而在战后必须仰仗于美国。

三环外交从本质上之所以是英国传统均势战略的升级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构建者的个人视野。任何战略家的战略思维边界都受制于战略家本人视野的局限性。丘吉尔酷爱历史，尤其是英国的历史，但几乎不去了解、学习西欧之外的历史，对于东欧、俄罗斯和美洲大陆的历史知之甚少，而对西欧历史的理解却深入骨髓。作为一个坚信英国历史、价值观和顽固仇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丘吉尔的战略思维边界无疑仅仅是对英国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对现实变化的敏感认知上，当然，主动性仍然是英国战略思维的优点，即总是善于“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从不放弃主动性的任何机会”^[5]。二是美国仍然遵循着当年英国的战略思维的轨迹，希望欧亚大陆上存在对抗苏联的前沿。如果美国决定了要阻止苏联共产主义扩张，那么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就决定了美国必须将西欧和中欧、东亚作为桥头堡。欧亚大陆保持均势对于美国正如欧洲大陆均势对于英国那样，如果欧亚大陆被苏

联共产主义力量所控制，那么美国将处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面包围的危险当中。英国既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又和苏联存在对抗性矛盾，作为美国而言，自然愿意对英国比其他西欧国家更加“高看一等”。美英有些像英德对抗时的英法。

当然，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西欧和美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对西欧、美国和全球战略格局的判断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英帝国、英语世界和联合起来的欧洲，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在这三环的每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6]从此可以看出，英国不是如战后日本那样对美国亦步亦趋的“跟班”，而是建立在尊重美国超强地位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的平衡者与协调者。

三环政策塑造的英国作为平衡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使英国即使不用付诸战争也保持住了除美、苏两大超级强国之外的一流大国地位，甚至“可以与美、苏这两个头等强国同乘一架飞机”^[7]。

首先，英国与美国形成特殊关系，不是一味迎合美国，而是影响美国。从美国和英国的实力地位和战后影响力而言，美国无疑是强者，而英国无疑是弱势一方，但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英国人立即认识到：“如不能完全改变美国的政策，那么就必须屈身扮演一个顾问和仲裁者的角色。”^[8]因为美国对于全球的战略思维经验不如英国那样丰富，尤其是海陆大国的地缘政治斗争经验，美国人需要向英国人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英双方就反攻欧洲大陆的方向与时机问题，大部分都是以丘吉尔的意见为主。而美国因为在作战指挥权、后勤保障问题上有强大的国力与军力支持才能保持主导地位。战后初期的美国，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前，对于如何构建西欧并没有成熟的考虑，倒是富有欧洲斗争经验的英国对美国如何构建新的欧洲提供了先导。在希腊和土耳其、伊朗等问题上，美国几乎是被英国牵着走上了与苏联对抗的道路，虽然美国本身就想强硬地对待苏联。

南欧、地中海原为英国势力范围，作为世界上背负了最多债务的英国无法维持战前的殖民体系。如果不把它们交给美国，那么就可能落入苏联手中。苏联如果在掌握东欧的基础上，又掌握南欧、中东，那么意味着英国与

之前所有的殖民体系的通道将全部被苏联紧扼。美苏之间的强硬对抗使英国所希望的欧洲大陆均势成为现实。而作为欧洲大陆均势的始作俑者，英国则处于最佳位势。

其次，美英特殊关系可以使英国利用自己在美苏冷战对抗格局中的有利位置来谋求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力。统一欧洲不仅是英国的反苏堡垒，同时也是处理与美国关系的后盾。战后的英国要想在美英特殊关系中保持较强的影响力，英国就必须强化对西欧地区的影响力，如果失去了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力，便会在本来已经弱势的地位中更加弱势。所以，当美国推动成立北约时，这显然既是英国在美国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也是英国提高对西欧影响力的好机会。英国利用1947年与法国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以及1948年与法、比、荷、卢建立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时的领导地位，在美国与西欧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极强的协调作用，当然也有“自私”的“小领导作用”。英国无疑会有居高临下的心态，因为英国的战胜国地位必然会对其他受到凌辱的西欧国家具有心理优势。所以，英国在美欧之间既有协调和桥梁作用，还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又是协调者所必需的。

再次，英国是付出了较大代价的，不是美国的恩赐，所以，英国对美国保持影响力，也是美国必须要承担的同盟义务。美国在英国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按照协议，英国将在本土研究原子弹的成果和科学家送到美国，而美国却不需要向英国公开核秘密和分享核技术。在经济领域，根据马歇尔计划，英国必须向美国定期提供财经运行情况。英国在受制于美国的同时，也使美国日益需要英国。

对于英国而言，三环外交的支柱看似是美英关系，而实际上取决于英国在美国与西欧之间、美国和苏联之间如何确定自己的角色。

当然，英国主导西欧是非常困难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心态上，英国与西欧并非一条心。因为英国在历史上一直奉行欧洲大陆均势，刻意与西欧各国保持距离，这使英国总是被西欧国家认为是“英国人”，而不是“欧洲人”。这种心态使英国在扮演除美国之外的西欧主导者时非常吃力。二是英国在西欧没有强力的帮手。法国是非常勉强地成为战胜国的，而且它是西欧地区的主要战场，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影响力都遭到巨大的破坏。如果英国

可以通过影响法国来实现对西欧的主导作用，那么英国将会顺利得多。但是，英国既无足够的经济援助能力，也无同一的民族心态来与法国共患难。因为英国“对过去历史的感情由于教育和媒介的影响要比法国强烈得多”^[9]。

当然，西欧对于英国的战略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英国首先与美国形成特殊的同盟关系，那么英国亦可抬高自己的地位与西欧各国签署协议，再通过与西欧各国的协议，在美国和西欧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英国可以通过自己与西欧的关系，抬高在美英关系中的地位。通过将美国、英国与西欧三者构建为同盟体系，英国构建新型欧洲大陆均势的设想才能宣告完成。

危机时代是英国在战后的国际角色的奠基时代，一是形成美英特殊关系，二是利用美英关系，帮助美国推动成立美国、英国和西欧的防务同盟体系。通过两个方面的运作，使英国在美国和西欧之间成为不可或缺的桥梁和协调者。美国不可能脱离英国而独自推动西欧的防务同盟体系，而西欧也不可能离开英国的协调落实西欧共同体的设想。

但是，从英国的总体命运来看，丘吉尔时代也是英国的“日落时代”。英国的全球殖民地处于崩溃状态，在埃及、伊朗、印度、南非、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面临着脱离英国殖民体系的压力。英国如何在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中既迎合时势，又不致失去影响力。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国家，英国在维护全球秩序方面的成功与失败不仅是英国或者欧洲的历史，而且还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历史。在英国建立全球殖民体系的300年间，既有野蛮的武力，也有其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文化思想。各个殖民地在长期不断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时，也因为世界格局的风云动荡，不断激发民族主义思潮，几乎所有英国殖民地中都出现两股交织的思潮。一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潮。其结果就是殖民地的封建王朝制度受到强力挑战，新型国家的建立成为大势所趋。二是根植于本土的民族主义思潮。其结果就是外来的西方殖民国成为众矢之的，谋求民族国家独立地位的努力此起彼伏。这两股思潮对英国构成了不可阻挡的大潮，英国必须放弃殖民者的地位，但是又给英国提供了保留影响力的空间。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那些争取独立地位的领导力量或者领导者都受到过西方思潮的影响，甚至本人接受的主流教育就来自西方，比如印度的甘地等人。

英国既要放弃殖民地位，又要保留其影响力，最佳办法就是英国必须主动承认殖民地变成新兴国家的强烈诉求，而且要对其有所帮助，同时，在帮助的过程中要对其未来事务保持影响。所以，当英国推动成立的英联邦于1949年经过协商后，决定不再将是否宣誓效忠英国君主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任何国家只需正式宣布承认英国国王是英联邦国家联合统一的象征和英联邦元首，就可以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应当说，英国推动成立英联邦反映的是英国殖民地战略与政治技巧的成功，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殖民思想已经成为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英国通过英联邦不仅可以保持全球性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而且在美苏对抗的格局下，英国利用英联邦使之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从经济领域看，英国在战后恢复经济需要英联邦广大的市场，所以，英国在推动英联邦成立时，对于自身经济和全球性态势的稳定均有积极作用。

当然英联邦本身也具有致命的局限性。英联邦建立的基础是英国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符合英联邦国家自身日益扩大的利益诉求和日益强化的内心尊严期望。仅从这点便应当知晓，英联邦并不是英国的战略基座，因为英联邦国家不可能在英国出现困难的时候对英国进行实质性援助。后来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便是明证。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对处于被动的英国口惠而实不至。印度干脆利用英国陷入危机时开始谋求退出英联邦。

英国的三环外交政策刚刚推动之时，恰逢危机频频爆发之时，两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等。危机是英国提高自身地位的良机，相对于其他西欧国家而言，“英国从未在战争中遭受过失败，至少不是它的欧洲大陆邻居所普遍经历的那种失败”^[10]。所以，危机对英国提高在美英特殊关系中的地位，对于保持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既是英国影响美国的有力杠杆，也是美国必须获取英国支持的基本条件。

第一次柏林危机因为英国当时正处于战后经济恢复的起步初期，不可能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即使当时出现最危险的时刻，也是苏联利用常规兵力的数量优势在欧洲平原上发起向东的攻击，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上发起有限的攻击。苏联如此的军事行动对英国不仅没有直接威胁，而且在两个海洋方向上，英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一样占据绝对优势。基于经济恢复的需要

和安全威胁不大，英国对美国并没有进行主动性影响，只是与美国协调立场，并且为美国提供空中援助行动的机场和物资屯集地等。英国还劝说同样处于战后恢复期的西欧国家支持美国既坚定又克制的空中援助行动，并且为可能爆发的美苏直接武装冲突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从第一次柏林危机开始，英国便成为美国的首要助手，其主要作用就是帮美国维护欧洲大陆均势、遏制苏联。第一次柏林危机使西欧感到在苏联威胁下必须团结，也使西欧看到了美国的实力与决心。所以，第一次柏林危机使美国对西欧领导地位的考验获得了西欧的认可。当然，英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作为也令美国感到满意。英国对于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价值已经突破了战时盟友和军事基地的范畴，已经走向心理领域。美国需要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英国在欧洲来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

然而，英国自身利益又与美国是相异的，英国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需要行事，英国在与美国协调的立场上，总是有意无意地保持一定的足以影响美国判断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取决于自身的安全威胁和与自身的利益关联程度。而英国唯一的安全威胁是苏联，与自身利益关联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仅限于欧洲。如果苏联没有威胁到英国，或者危机并不是在欧洲爆发，英国仍然希望超脱地置身事外。但是，当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对抗早已突破欧洲范围时，全球均被冷战格局卷入时，作为另外一个全球性国家的英国能够置身于外吗？

美国将欧洲作为冷战的战略重心，推动与西欧实现防务一体化，客观上也使西欧成为世界的紧张之源，这是因为苏联随时可以用柏林地位问题、西欧的经济恢复和繁荣问题牵制美国。基于西欧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友、受保护的对象、巨大的投资市场，那么对西欧进行武力威慑和对西欧采取和平攻势，均可以使美国感到美欧分化危险。所以，美国更加在乎西欧的立场，而西欧国家中，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又无疑是英国。本质上，英国的态度便是西欧的态度。

当苏联于1949年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后，英国和整个西欧都感到恐慌，苏联的核武器造成的心理阴影使西欧不仅更加需要美国的保护，也希望避免刺激苏联。所以，当朝鲜战争爆发时，英国是追随美国出兵参战，但是当美

国警告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时，英国和西欧几乎都感到了来自苏联核报复的可能性，所以，不由加紧了与美国的协商。

当朝鲜战争爆发时，几乎整个西方都认为是苏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一次将共产主义扩张行动推向高潮的“阴谋”。如果朝鲜半岛落入苏联之手，那么不仅刺激苏联在欧洲的对抗中形成的心理上的主动地位，而且还增加了顺势向欧亚大陆东南端扩张的可能性。如果如此，那么便会危及到英国对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地位。所以，英国非常希望并支持美国出兵。

当然，最终英国不仅支持派出“联合国军”，而且自己也出兵参加了“联合国军”。此时的英国，如果从单纯的军事和经济方面考虑，出兵到朝鲜参战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英国正在进行战后裁军，国内可以提供给朝鲜战场的机动兵力不足，而且英国在亚洲殖民地的军队没有规模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鲜战争长期化，英国便难以充足地提供兵力支持。在经济上，英国需要努力进行战后经济重建，如果出兵将会分流相当部分的、本来可以用来恢复经济和民生的宝贵资源。

然而，最终英国政府并没有单纯地按照军事和经济因素来进行战略决策。英国出兵参加联合国军，是为了提高对美国在战场上的影响力。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作出重大决定时，都无法绕开英国而自行其是。因为只要影响了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行动，必定会影响到美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走向。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出兵“对于提高英国的地位，加强英美合作都是极为重要的”^[11]。

英国出兵对美国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而进展顺利时，英国对美国扩张心存的疑虑难以影响美国超过三八线。因为当战场形势有利于联合国军时，英国人提反对意见使未来的美英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更加容易忽视英国人的意见。而当中国出兵，美国遭遇前两次战役失败后，英国便强化了对美国的影响，最明显的事件就是后来当朝鲜战争长期化后，杜鲁门宣布将积极考虑使用核武器时，英国首相甚至提出要举行首脑直接会谈，通过种种努力对美国产生了影响，使美国承诺如果决定使用核武器，一定会和英国进行磋商。

英国出兵朝鲜战争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战场价值，但对陷入战争长期化

的美国而言，不仅是政治上的支持，而且使美国时时刻刻要考虑到欧洲的形势。英国使美国在没有被朝鲜战争影响到战略重心的欧洲的同时，也使西欧没有因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长期化而丧失安全保护。英国在朝鲜战争中出兵，不仅对于英国的安全与地位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西欧也具有积极意义。英国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苏联在西欧有可乘之机，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担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一样。

英国在朝鲜战场上体现出来的对美国的影响力和影响的技巧，已经超出朝鲜战争之外。当苏联最终也不希望朝鲜战争长期化时，就是通过英国驻苏大使提出希望尽快开始进行关于朝鲜半岛停战的谈判。虽然最终英国被排除在停战谈判之外。但是，英国在朝鲜战争中对美国的立场既有支持，也有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朝鲜战争使各个参战国和有关国家向更加危险的方向滑行。当然，美国在朝鲜战争停战后，开始对那场战争反省后发现，英国在诸多问题上对美国的“提醒”和反对，都是符合当时的战争实际的。

英国推动美英特殊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英国领导世界近三百年，突然沦落为自己后辈阴影下的次要地位，这种滋味是难以接受的。令英国难以接受的不是地位的下降，而是每个新兴大国对原有大国既得利益天然性的颠覆。苏伊士运河危机便是这条规律最典型的注解。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最后结局是使英国人彻底认识到：“必须承认美国人的领导地位，并且跟随他们，至少不与他们关系破裂。”^[12]

英国没有美国式的国际主义，也没有美国那样宽宏的全球战略思维，但是英国对于自身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处理危机、进行局部战争时的冷静与理性，的确是美国在冷战之初所缺乏的。虽然朝鲜停战谈判没有英国参加，英国也不是主角。似乎给世人的感觉是，英国的耀眼光环正在被美国、苏联和中国掩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朝鲜战争后，美国日益需要英国。因为朝鲜战争后，美国并不甘心在朝鲜停战时首次在一个不是胜利的条约上签字。所以，美国做了最令苏联担心的事情——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且推动北约吸纳联邦德国为正式成员。

实质上，苏联对于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吸纳联邦德国为北约的正式

成员，并没有太多的使美国和西方无法应对的反制手段。苏联唯一可以利用的只有处于民主德国境内的西柏林。第一次柏林危机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行动已经表明了美国领导下的西方是不会有在苏联的威胁之下退出西柏林的。而且赫鲁晓夫当政时的苏联提出的三和政策，并不希望爆发紧张局势。然而，当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而没有受到苏联的有效反制时，对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也几乎处于漠视状态，这令赫鲁晓夫感到非常有必要为西方制造难题。第二次柏林危机由此爆发。

赫鲁晓夫称：“西柏林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毒瘤，必须进行外科手术。”^[13]并同时发出美、英、法必须在六个月之内撤离西柏林的“最后通牒”^[14]。在此之前，当苏联要求美、英、法从西柏林撤军时。由于美、英、法和联邦德国各自面临的安全威胁和西柏林在它们政策体系中的地位不同，而在应对时出现了分歧。美国仍然坚持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外交地位，而且仍然把民主德国当作苏联的代理人，保持低层次的正常接触，既可以保持进出西柏林通道的畅通，也可以对苏联的强硬表态不作回击，美国的策略是有进有退，不温不火，但实质上是对赫鲁晓夫的要求置之不理。联邦德国作为美、英、法三国占领西柏林的最大受益者，自然不希望美、英、法离开西柏林，因为那样不仅意味着联邦德国影响民主德国的渠道少了重要的一条，还使自己单独成为冷战对抗的前沿，风险和代价难以承受。法国在戴高乐担任总统时，开始追求法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并且刻意对美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所以，对苏联的要求既不愿意冒险与苏联爆发正面冲突，又不愿意失去处理危机的灵活性。而英国希望对民主德国予以外交承认，并且留在柏林与民主德国接触，“因为西方没有任何人肯为承认民主德国而进行一场战争”^[15]。

然而，当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后，形势骤然紧张，作为领导的美国的意见便得以显现。美国提出，如果西方进出西柏林的通道受阻，西方将考虑使用有限的武力方式，如果不奏效，那么将视情况再定。这种应对无疑是没有将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当回事。因为使用有限武力仍然不能保证进出西柏林通道时，就意味着武力的使用必须升级。而武力升级的后果便可能是直接的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最终发展为全面战争。应当说，美国的应对举措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又使苏联有了缓冲和退让的余地，同时还照顾到联邦德

国的心理，即美国不会放弃联邦德国。也许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美国最终迫使苏联让步使美国一直认为苏联在虚张声势，所以才提出如此应对举措。但是，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这些直接面对苏联强大军力的国家却并不会这样认为，它们仍然是将全面战争的风险置于第一位的。最后四国协商的结果是，虽然不赞同美国提出的武力使用举措，但一致坚决拒绝苏联将西柏林通道交给民主德国，而且还向苏联明确表态：“和平与安全需要美国军队留在西柏林和联邦德国。”^[16] 这样的表态，虽然比直接表明有限武力使用更加具有灵活性，但显示了自己坚定的立场。这样的效果使苏联感到，要么谈判，要么就准备发动战争，将压力推向苏联。

其中对反对有限武力使用的回应，英国的反对至关重要，因为英国提出了合理的分析。有限武力不仅难以达到军事威慑的目的，而且会使苏联处于要么自失其言地让步而导致难堪，要么干脆用武力冒险的两难选择当中。无论哪一种，苏联的回应将使西方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西方也没有做好与苏联大战到底的准备。英国的分析应当是合理的，既考虑到了盟国的底线，又考虑到了苏联可能的回应，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最终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国提出的最终回应方案照顾了盟国的意图，是盟国中强硬主张和温和主张的折中。

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意见过于考虑自身，而美国在西方又显得过于强硬，英国的作用就是既坚持西方留在柏林的立场，又要与苏联展开谈判以进行交流。所以，因为西方整体处于强硬立场，坚决地表明不会撤出西柏林，而苏联也不愿意冒与西方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当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暗示“六个月撤出西柏林”的“最后通牒”只是指示性的时，意味着苏联愿意谈判。英国时任首相麦克米伦立即抓住了这一机遇访问苏联。当然，英国首相在紧张氛围尚未解除时访问苏联无疑是“就柏林问题、与之相关的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与苏联进行讨论，以此来试着评估苏联的观点和意图”^[17]。既然英国和苏联愿意谈判，双方必定会达成共同的谈判意向，而且英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苏联表示：“将在一定程度上修订他们以前关于柏林问题的意见。”^[18] 英国可以肯定苏联与西方的底线是一致的，即“如果爆发战争，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苏联都一样

是灾难”^[19]。

然而，当英国首相从苏联回到西方与联邦德国和法国通报访问结果时，却遭到冷落慢待。联邦德国当时不愿意推动与民主德国统一，因为那样将会使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任美苏摆布的玩偶。所以对苏联向英国提出就德国统一问题和柏林问题进行谈判，而且认为英国同意谈判便意味着承认苏联之前的挑衅行为。法国当时致力于推动法德和解，需要得到联邦德国的支持，而且希望保持对美国的独立性，所以对英国的访问结果没有正面评价，因为法国认为既然苏联想谈判，西方便应当保持强硬。也许法国忘记了柏林危机爆发时希望保持行动灵活性的考虑了。

英国的访问结果获得了美国的认可，因为既没有放弃留在西柏林的立场，又不致爆发新的紧张局面。所以在各种妥协下，英国的努力获得了基本认可。虽然后来的美、英、法、苏四大国外长会议无果而终，但是，苏联的“六个月”的最后通牒却没有导致危机升级，只是僵化，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危机其实已经进入结束的阶段了。最后，在准备西方首脑和苏联领导人的高峰会议前，虽然发生了 U-2 飞机事件，打破了高峰会议的正常部署。但是，英国在美苏之间居中调停，使得美国和苏联同时看到了英国的战略价值要高于法国和联邦德国。美国更加倚重英国，而苏联又可以增加一条与西方打交道的有效渠道。英国在冷战中超越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就此奠定了。

英国之所以能够在美苏之间充当缓和剂和协调者的作用，主要还是利用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底线。美苏不约而同地认可英国的调停，说明它们姿态强硬的背后，都在谋求可进可退的立场，努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同时，英国对苏联的真实意图的判断是客观和理性的，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的苏联，其意图仅仅是希望与西方谈判，而不是爆发全面对抗，或者奢望西方退让，这在后来的几次危机中得以证明。这种正确的判断和理性的运作使英国成为美苏之外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这一地位令法国和联邦德国望尘莫及。当然，它们不赞同英国的意见，代表的是它们关切自身利益的方式与英国不同，而立场与英国并无根本差异。当法国努力推动法德和解并且追求独立的欧洲地位时，它们更加愿意时时刻刻表现出与美、英的不同，但这并不

代表它们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所以第二次柏林危机使英国在西欧处于一个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法德排挤的地位。这反而使英国在美国与西欧之间的团结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

英国在美苏之间的缓和作用反映了冷战双方的困境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德国的地位与现状。这样的结果也使苏联人看到，如果迫使西方对民主德国予以外交承认，那么就意味着苏联可以强化对东欧的控制。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是英国乐见其成的，因为它意味着美国更加需要盟国的力量支持。而且，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对德国分成两部分的事实更加固化，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又少了一个潜在的对手。当然，英国的这些诉求都不是主流，主流是英国能否使美英特殊关系得到美国在同等程度上的认可，不能总是由英国对美英特殊关系说得多，而美国说得少。当然，只要欧洲存在最终不导致全面战争的危机，英国的作用就会不断上升，而美国会日益看到英国的作用，同样，苏联也会看到。美国对英国日益重视是因为英国对苏联意图的判断总是具有更多的理性和更大的合理性。苏联对英国的重视是因为英国通常会为苏联后退找出台阶。

当柏林墙危机爆发时，第二次柏林危机尚未结束，很容易使人判断，苏联仍然在继续采取最后通牒时的举措，以单方面解决柏林的地位问题，迫使西方军队撤出西柏林。然而，英国在分析苏联在柏林墙危机前后的政治和军事表态后，认为苏联修筑柏林墙，其直接目的是阻止源源不断的民主德国民众越过柏林的分界线而逃向联邦德国，内在的心理诉求是对西方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初期拒不让步而最后苏联自己主动提出谈判的“补偿”。因为英国看到，如果苏联在首脑峰会搁浅后的紧张局势中，并没有向东柏林或者附近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和部署。这说明苏联并没有准备导致新的紧张，只是担心如果再不阻止民主德国的人逃向联邦德国，那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将会颜面扫地。

从危机突然爆发的规律来看，判断危机的走向不是看领导人在危机之前的和平表态，也不是频繁的外交接触，更不是报纸媒体的大肆宣扬，而是根据具体的军事部署的变化来判断。显然，英国在分析苏联修筑柏林墙的意图时抓住了要害。而且，英国更加深刻地看到了苏联控制边界的实质，苏联仍

然希望通过谈判确定柏林定位的问题。苏联抱着这种目的，那么西方面临的压力就不会是实质性的。一是西方没有必要担心苏联通过制造新的议题来限制、甚至关上谈判的大门。二是苏联担心联邦德国通过制造议题来阻止美国对苏联的谈判意图进行肯定性回应。

英国的角色对于美国而言，其价值就在于当美国不能反对联邦德国的强硬立场时，由英国来说服联邦德国接受最终双方谈判的意见。因为美国压制联邦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而表态的意见，无疑会影响自己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威信，尤其是联邦德国刚刚加入北约不久，美国更不能简单地压制联邦德国的意见。而英国不需要有像美国那样对领导地位的考虑，英国相对来说，可以更加“中立”和“客观”地来分析判断。

所以，对于西方而言，对苏联最大的威慑是保持团结，而保持团结最急切的要务是使联邦德国不能担心西方让步而过于冒进地制造刺激苏联的议题，来给谈判设置障碍。所以，当联邦德国希望盟国同意取消民主德国颁发的通往西方国家的临时旅游签证，作为反击民主德国施加边界控制的反措施时，英国便立即予以修正。因为柏林墙的修筑并没有对西方造成直接的影响，反而使世界看到了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封闭与不受欢迎。再者，如果同意取消民主德国颁发的通往西方国家的临时旅游签证，那么会使民主德国受到损失，对西方产生误解，并刺激民主德国，可能使西方在未来的谈判中失去影响苏联和民主德国的一条举措。联邦德国之所以强硬，是因为联邦德国不能接受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任何让步。所以，英国人既坚持立场，又不失去灵活性的提议立即被联邦德国接受。而一旦联邦德国接受，法国便也无法拒绝。

所以，在柏林墙危机过程中，英国既反对西方发出没有包含谈判意向在内的声明，也支持一定程度上的有限军事行动。理由有两点，一是危机导致世界舆论不会欢迎不含谈判意向的生硬的声明。二是有限的军事行动不仅可以迎合那些强硬派，提升西方士气，而且能向苏联表明决心。当然，英国支持有限军事行动也是有限度的。当美国希望英国从联邦德国驻军中抽调整装营时，英国只是象征性地抽调了少量装甲车。英国使西方看起来既团结，又各有立场，使苏联既难以获得进一步行动的口实，又无法拒绝谈判。

西方人不让步使苏联人感到难堪而需要对方主动提出谈判，而美国人也骑虎难下，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必须尽早主动寻求对苏谈判”^[20]。所以，当美苏都需要最终谈判时，英国自然是第一协调人。

当柏林墙修筑起来时，西柏林展示西方文明和繁荣的“橱窗”作用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东西柏林之间进出通道的关闭反而有利于西方强化在西柏林的存在。因为柏林墙使东西通道关闭，民主德国的人不能去联邦德国，而联邦德国不需要再承担苏联越过分界线进行行动的压力。西柏林可以在更小的安全压力下进行发展和寻求更大的繁荣。柏林墙的建立反映的是苏联和民主德国的落后和不自信，当然也反映了西方从未放弃过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口诛笔伐、武力恐吓和心理“收编”。

基于英国的立场和美国的实力，尽管在谈判之前法国表示过反对，但是由于联邦德国已经接受谈判的立场，那么由英国推动的，以美苏为主要对手的谈判便由此拉开。当然，在冷战时代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美苏之间达成的任何进展也许相对于解决危机所需要的进展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美苏双方总需要在中间存在一个缓冲器和协调人，英国成为最理想的人选。当然，英国成为缓冲器和协调人，对于美国而言是幸运和必须的，英国帮助美国使整个西方“既显示力量的团结。又在采用可能的解决办法方面带有灵活性”^[21]。而苏联却缺乏这样重要的盟友。当然，中国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友，但是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对峙使苏联不仅难以获得中国的缓冲作用，而且苏联对中国的错误战略使中国甚至成为苏联的障碍。从这个角度看，苏联的问题在于没有相当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助手。

英国之所以可以使柏林墙危机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仍然得以缓和，实际上仍然是冷战双方都不愿意爆发全面战争，而且导致紧张事态的意志比起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之初更弱而不是更强。所以，英国的价值在于使双方不需要等到危机恶化至战争临界点时才追求妥协，因为那样的风险双方都难以接受。既然危机总会最终出现妥协和谈判，倒不如采取更加务实和灵活的姿态，在对方之前争取谈判地位和进行妥协时的主动权，以为后面更大问题的解决预留出更大的空间。

英国在美苏之间的有效协调为英国带来了复杂的影响。随着西欧经济的

复苏和战后经济的繁荣，英国在西欧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国和联邦德国两个西欧最大的国家在开始推动历史和解时，恰逢英国在屡次危机中颇有建树之时。西欧共同体的出现使英国既担心被排挤在西欧发展机遇之外，又担心如果加入欧共体会影响美英特殊关系。

无论是美英特殊关系，还是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对于英国而言，它们存在的根本意图是寻找一个能够发挥其领导作用的舞台，借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声誉。当欧共体成立时，美欧之间因为法国推动法德世仇和解和追求对美国的独立性而出现隔阂增大的倾向，英国既不可能脱离美国，也不可能完全“行走”于西欧之外。于是，两难之下的英国又开始走平衡路线。

虽然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使英国在美苏之间的缓冲与协调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同盟体系内，英国的协调作用反而没有明确的目标。柏林墙建立前，英国便提出加入欧共体。从逻辑上看，这对于美欧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对于美国而言，英国加入欧共体，可以使美国形成对欧共体的新的影响力。而欧共体在英国加入后，既增加了一个经贸伙伴，而且还可以通过英国对美国形成新的影响力。当然，英国加入欧共体也有反作用，欧共体因为英国的加入而出现新的矛盾，使欧共体内形势更加复杂，对于美国而言，英国加入欧共体或许使欧共体更具独立性。

战略的价值就是在多种可能性中，推动形势向自己期望的情况发展。对于英国而言，在美国的支持下顺利加入欧共体是最好的结果。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美国自然将英国加入欧共体当作加强自己对西欧的影响，平衡法国和联邦德国对西欧事务影响的有利因素。而西欧并非如此，历史上的积怨似乎又出现在了欧洲内部。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戴高乐的个人因素。在戴高乐看来，他自己应当是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那辈人齐名的“领袖”，对于肯尼迪、麦克米伦等“晚辈”并没有足够的平视之态。这种心态在他自己的法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下，日益变成了习惯地与美英保持不同立场的内在动因。所以，当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时，法国几乎是本能地表示反对，尽管反对的理由非常牵强。戴高乐认为英国就是企图主宰欧洲的美国派到欧洲来的“马前卒”，它的“任务”就是帮助美国驾驭欧洲。其实，戴高乐既高估了法国在西欧的地位，而且也低估

了英国的独立性。在当时的西欧，法国必须与联邦德国联合才能确保所谓的欧洲中心地位，然而联邦德国的意图却是利用法国提高欧洲独立性的诉求来争取对美国更加有利的地位，既防止美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妥协，又加强对美国的影响使美国支持自己的诉求。联邦德国最大的担心和诉求不是与法国世仇的和解，而是对美国的影响。如果联邦德国能够平衡美国与法国，那么联邦德国将成为欧洲的中心，而不是法国。英国对于联邦德国的心理，既有传统的欧洲大陆均势的延续，又希望在美国与西欧之间寻求平衡。对于英国而言，联邦德国既然不可能离开美国，那么法德世仇的和解和法国追求欧洲的独立性，对于平衡西欧的矛盾是有利的，英国不需要付出过多精力来帮助美国平衡西欧内部矛盾，而且英国与美国的不同立场在于对待联邦德国的问题上，英国希望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分裂的意志比美国更加强烈。所以，每次联邦德国反对英国时，英国没有对等地反应，而是推动与联邦德国之间进行调和。对于英国而言，用联邦德国来制衡法国是有很大收益的。法国高估自身地位的后果就是使自己在美国 and 英国面前只能当个反对者，最终仍然还是要以过多的代价与美英协商。而低估英国独立性的结果就是凡事都需要使联邦德国占据比自己更加主动的地位来推动欧洲的独立性，其实反而使美国更加容易通过加强对联邦德国的影响而使西欧难以独立。

二是英国具有超越西欧的利益诉求。英国的利益既需要英国和美、欧之间保持平衡者的角色，但基石是美英特殊关系，也包括英国需要在英联邦国家维持影响力。英国加入欧共体不仅是为了这两方面的利益，而是推动西欧一体化。如果为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英法的密切合作来代替美英特殊关系，这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英国加入欧共体会动摇美英特殊关系和弱化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那么对英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况且，英国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更加有利于巩固美英特殊关系和提高对美国的影响力，防止欧共体越过英国而直接与美国协商问题，或者美国越过英国而直接与欧共体协商问题。如果英国成为欧共体成员，那么会利用欧共体代表英联邦更大的经济利益，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如果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英国将会使英联邦国家感到失望。基于这样的风险，英国总是精明地在事前不做承诺，而后再根据实际需要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这注

定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道路难以平坦。这根植于英国的内心，因为它过去非凡的影响与其从心理上与欧洲分离这一牢固的传统紧密相关。

英国在战后的历任首相当中，虽然没有丘吉尔般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22]，但都是英国历史经验与时代特点的完美结合者。丘吉尔对英国与欧洲的描绘为其在战后历任首相奠定了基础：“在我们看来，一个更加富足的、更加自由的、更加满足的欧洲共同体只会带来好处和希望。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梦和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是并不属于欧洲。我们同欧洲联系在一起，但不失去自己的利益。”^[23]但是，当英国的利己主义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出现在麦克米伦时代时，西欧比起战后初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欧欧共体国家的共同繁荣对英国发展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诱因，而英国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同节奏和地位的经济发展。英国经济在西欧已经开始落后了。英国的贸易增长率只有欧共体贸易增长率的一半。虽然英国推动组织了一个欧洲自由贸易组织，主要由北欧国家组成，但是并没有获得像欧共体那样的令人羡慕的数据。经济落后必将带来政治风险。当英国看到西欧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导致政治影响不断提高时，甚至在规模上直追美、苏时，英国已经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经贸领域来看待自己加入欧共体了。而且英国加入欧共体失败会被世人认为是整个西方难以团结，这对美国和英国的影响最大，而且基于英国比美国更加依赖美英特殊关系，所以，英国将成为西方不团结的最大的牺牲者。

所以，英国应当强化自己在西方的地位，也要将欧洲的重要性提至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英国的根本意图不是向欧洲靠拢，而是在寻求新的经贸发展机遇与提高英国在美欧之间地位的平衡。所以，在法国和联邦德国不断联合并加强欧洲地位的独立性时，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进程注定了充满曲折。

然而，也许是英国注定要成为美欧之间和美苏之间的双重平衡者。所以，当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英国的作用得以强化。因为英国对美国坚定的支持是美国可以赢得古巴导弹危机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当美国准备对古巴周边海域实施海上武装隔离时，英国面临的角色有三个：一是必须在国际社会上明确而坚定地摆明自己支持美国的立场，苏联必

须“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去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以及其他进攻性武器”^[24]。二是防范苏联在欧洲采取武装措施来回应美国在古巴海域实施的武装隔离，从而在欧洲导致新的紧张局势。三是与美国不断保持沟通与协调，并不断向美国出谋划策。

当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海上武装隔离时，英国担心长时间海上封锁会伤害中立国的利益，并且使盟国出现分歧。更重要的是，最终交换条件时，苏联将迫使美国放弃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基地为代价来换取苏联的让步，而最终苏联又在古巴拖延时间以形成导弹力量存在的既定事实。所以英国建议美国立即对古巴实施入侵，最终占领古巴。

当然，英国倾向于美国立即占领古巴，理由是：“决定性军事行动的最佳时机在于危机早期，不宜拖延，更不能犹豫不决。”^[25]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认为：“如果肯尼迪这样做，就会在谈判中成功阻止赫鲁晓夫对西柏林提出的要求。”^[26]英国令美国担心苏联在欧洲，例如柏林制造事端来向美国施压，从而使西方处于要么发动全面战争，要么在欧洲陷入危险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的困境，美国必须注意苏联在欧洲的动向。由此看出，英国虽然在为美国出主意，而且进行坚决的支持，但最担心的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在欧洲安全问题上让步。

英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美国，历史已经告诉人们，美国既没有占领古巴以防止美苏之间必须走向战争，也没有牺牲欧洲的安全，即使后来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秘密条款，苏联从古巴撤出全部导弹半年后，美国立即拆除了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然而，美国部署于土耳其的导弹本来就是已经老旧并计划拆除的。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英国的确高估了苏联的决心与威胁，当英国担心长时间海上武装隔离难以达到效果，而且引发苏联在古巴加快导弹部署形成实战能力的速度时，苏联并没有采取主动性的措施，只是处于焦急与犹豫当中，最后决定希望美国给它以体面撤出的台阶。英国建议美国占领古巴一反英国在柏林危机感中的理性与冷静，这只能说明英国对美国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的依赖。而且随着苏联军力发展速度的加快，经过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后，英国感到欧洲安全越来越有赖于美国的保护。

当美国武装隔离正式开始后，苏联的部分船只调头，但是却加快了导弹阵地的修筑速度，这又使英国认为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达到迫使苏联撤走导弹的目的。此时的英国，似乎才真正地回到了以前总是正确的立场上，因为美苏互不让步使局势紧张，并导致联合国介入。当联合国呼吁美苏之间为缓和紧张局势作出努力时，英国的提议不仅符合国际社会的期望，也符合了美国的利益。为了保证紧张局势实现实质性缓和，那么就必须：“一是终止武装隔离就必须采取检查制度，必须确保运送武器的船只实际上不会驶入古巴；二是由联合国或是其他独立权威机关来进行检查，并制止主要军事设施的修建工程；三是美国应当继续进行军事调动与部署以便应付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27]应当说，英国向美国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美国的首肯。然而，危机事态却有所恶化，因为苏联导弹阵地已经完工，部分导弹已经安装就绪。英国提出如果美苏谈判，可以拆除英国本土的导弹阵地为条件换取苏联撤走在古巴的导弹。

英国此举的确高明，一是在局势紧张之时，试探美国维护对自己乃至欧洲的安全承诺的决心；二是避免美国陷入苏联要求美国拆除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来换取撤走古巴导弹而背上在苏联压力下牺牲盟友利益的名声；三是美国导弹即使拆除，对欧洲导弹部署体系也并无影响；四是英国可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理解；五是英国的“大局观”得到美国的尊重，最后甚至承诺如果要采取残酷措施一定会先与英国商量。

英国因为在前两次柏林危机中对于谈判的提议使英国获得了成功，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也同样寄希望于谈判，但没有想到的是，美苏之间因为双方都出于对核战争的避免而没有直接谈判便开始缓解了危机。这样使英国人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避免了因为谈判而导致更多的让步。

英国对美国的支持是决定性的，不仅在于外交和实质性的行动中，更多的是在协调盟国和向美国提出具有实效的意见。这对于英国加入欧共体具有决定性的助推作用。英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值与法国和联邦德国处于谈判的关键时期，英国在美国解决危机中的正面作用对法国和联邦德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法国和联邦德国看到了英国和它们一样重视欧洲的安全，反对美国牺牲欧洲安全来进行交换。自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开始，英国加入欧共

体的进程日益加快，而且美英关系更加紧密，这使英国在接下来的缓和年代享有了欧洲国家中最大的战略红利。

缓和年代：实力依旧时的深沉

英国通过在两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较为成功的协调，尤其是当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后，英国对于美国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使英国成为更加重要的平衡者。美英特殊关系得以确立；英国与西欧关系趋于稳定；英国在冷战格局中仅次于美、苏、中大三角的地位，这三个因素使英国在缓和年代成为西欧国家中最大的受益者。

英国不显山露水地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之后，既避开了与美国同样陷入困境的风险，又在西欧与苏联之间的缓和中不断调整与苏联、西欧的关系。同时，英国从来没有改变美英特殊关系的基石性地位。当美国逐步从越南战争中缓过来后，英国在撒切尔首相手中将美英特殊关系推向了新的、更加紧密与协调的层面。此时，英国对美英特殊关系不仅仅停留在战略基石层面，而是上升到了战略文化层面。美英特殊关系使英国打赢了马岛战争，并在结束冷战的过程中成功扮演了关键角色，使英国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丧失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随着日本和联邦德国相继成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法国追求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地位而不断努力，英国则给世人以江河日下的感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美国处于越南战争结束不久后的战略被动时，因为苏联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使得美国更加需要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支持以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当里根上台后，美国一改前几任总统对苏联偏于软弱的立场，开始采取强硬立场，这使英国看到了巩固美英特殊关系的机遇。

撒切尔与里根几乎是一前一后上台执政，两个领导人相似的政策立场，甚至是相似的个性使美英特殊关系的发展显得更加耀眼。撒切尔上台之初便将美英特殊关系置于最为优先的位置，甚至于1982年在议院辩论中称：“英

国应该认识到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是欧洲自由的最后保证。”^[28]既然英国支持美国在欧洲部署可能导致紧张局势重新出现的战略核力量，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进行支持的呢？在美国处理在伊朗扣押人质危机时声援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与美国共同于第一时间予以谴责。里根上台不久，英国便率先允许将 160 枚美国巡航导弹部署在英国，一个月不到，撒切尔访美时，公开声明支持里根关于建立快速部署部队的计划。

当然，英国因为提升美英特殊关系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马岛战争中，美国对英国的支持便是明证。

英国对美国的支持使美国在马岛被阿根廷强行武装占领时，如果不帮助已经加入欧共体的英国，就会面临相当被动的后果：一是令整个西方对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示质疑。西欧其他国家会认为英国如此坚定地支持美国，然而当英国出现危机时，美国却没有帮忙，何况其他与美国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呢？二是当时的冷战处于里根上台后的僵局期，如果美国不帮助英国，不仅令苏联轻视，而且还会影响遏制苏联的整体战略部署的稳定性。

当然，此时英国也不能强行利用以前对美国的支持而向美国提出请求“支援”，否则会被美国认为是“道德胁迫”。英国最好的方式是令美国“主动”作为调停者。因为对于美国的冷战全局而言，英国和阿根廷的地位孰轻孰重，不言自明。丢了英国，可能会使整个西方失望，而丢了阿根廷却不至于影响到冷战全局，即使阿根廷这个非北约盟国，甚至是美国在南美洲最重要的盟友倒向苏联也比不上丢失西方那样的后果。

即使没有撒切尔与里根那样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美国在权衡英国与阿根廷时，也明白其中利害。

马岛对于已经没有全球战略的英国而言，并无关键性意义，但在阿根廷突然武力占领后，如果英国没有将其收回，英国的政治声誉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在美国和苏联冷战格局中的地位、对欧洲和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将会遭到严重削弱。本来英国国内经济就出现了发展疲软和失业率上升的问题，马岛危机将会使政府面临巨大的国内危机。所以，英国的目标便是收回，别无他途。当然，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也许阿根廷认为英国会默认马岛丢失的事实，也许英国无力收回，也许英国难以得到美国的支持等），既然阿根廷武

力占领马岛本身就意味着不会在马岛问题上让步。所以，美国在英阿之间的调停，其失败的结果是注定了的。

当英国决定出兵马岛后，北约盟国除意大利因为国内有很多阿根廷移民后裔而难以全力支持英国之外，英国得到了西方全部可能的支持。美国为英国提供了英国特混舰队需要的导弹和卫星侦察，法国切断了与阿根廷的军火贸易，其他西方国家也履行了盟约。最为关键的是苏联当时已经处于困难期，而采取了中立立场。

英国在海外军事行动的能力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弱化，马岛战争使全世界都看到了英国仍然强大的军队和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而且还有国民心中深厚的民族荣誉感。首先，在危机爆发的第三天，英国便派出了由航母、潜艇和先进战机、登陆后的部队组成的具有完整的三栖作战能力的特混舰队。在战争中，特混舰队军官的指挥素质、士兵的战斗技能和勇气，以及所有官兵对武器操作的专业水准都是世界一流的。战略指挥与前线战役、战斗指挥层次分明、关系清晰、权限合理，这反映了英国军队的素质在世界军队中仍然处于首屈一指的水平。其次，英国在外交上也表现得既坚定又灵活，英国始终没有宣战，而是宣布开始敌对性行动。没有宣战，英国就可以不用承担宣战带来的法律责任，而且使英国在国际社会中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因为宣战便意味着英国要受到诸多国际法的限制。英国在特混舰队进入马岛海域实施封锁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明和宣示中，其措词并没有咄咄逼人之语境，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而获取了国际同情。当然，英国的殖民者心态在马岛战争中是掩盖不了的。

马岛的胜利使英国更有底气来运作美英关系。而且英国在马岛战争中的胜利，至少是间接地影响到了冷战。因为英国可以凭借马岛战争胜利后国际地位的提升在苏联和西欧有更大的作为。

马岛战争的胜利使撒切尔在国际和国内受到更少的羁绊来实施对苏战略。撒切尔本人对待苏联的意识形态与丘吉尔如出一辙。而在马岛战争后，撒切尔却开始极力接触苏联，这明显地显示出英国的意图。自从马岛战争结束，直到1989年的五年间，撒切尔与戈尔巴乔夫会晤达到6次，比在第二届任期内形成了缓和氛围的里根还要频繁。当然，英国与苏联加强联系不仅

使英国成为美国新一轮对抗和遏制苏联的更加重要的助手，而且使英国从苏英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经贸实惠。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苏英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0% 以上。完全可以肯定，英国与苏联加强接触，对于促使苏联在后来一再让步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肯定地认为，英国与苏联加强接触是西方促使苏联走向解体的重要助推因素。

英国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与西欧的法国和联邦德国是不一样的，这使英国可以加强对法国和联邦德国在西欧问题上的影响力。撒切尔主张政治和经济分开，在经济上，欧洲各国贸易政策应当更加协调，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但是在政治方面，虽然主张欧洲各国要加强团结，但反对欧共体变成“欧洲联邦”而削弱任何一个独立国家的平等主权。这样的主张是有合理性的，经济上实现互惠是欧洲各国共同的诉求，而在政治上主张必须坚持各国主权不能削弱。这是因为英国担心，如果欧洲联邦得以成立，那么法国和联邦德国这些大国就会将其他小国吸纳，届时，世仇已经和解的法德可能会对欧洲大陆形成垄断地位，那么英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就会下降，而且英国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协调者的地位也会下降。这说明，西欧一体化的趋势和英国加入欧共体这两大因素并没有促使英国改变独立于欧洲之外的战略诉求和心理习惯。当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英国仍然坚持现实主义政策，西欧政治一体化看起来有些遥远，英国没有必要为过于遥远的事情投入过多。但是，当西欧的经济发展迅速，欧共体所有成员国都成为受益者时，英国自然也不可能脱离这一大势。英国在重重现实压力之下，终于摒弃了英镑超然的货币地位，于 1990 年 10 月正式加入欧共体统一的汇率机制。

纵观英国在冷战时实施三环外交政策的各种战略，主线就是在美、苏、西欧之间有明显立场偏向、目标明确清晰具体：利用美英特殊关系来谋求英国的全球地位，并且在苏联威胁下实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每当美苏陷入危机，英国便要通过影响美国的立场来缓解危机，从而使苏联最终妥协，在缓和年代，英国又抛弃意识形态的成见，不断调整对苏战略，对苏联加强接触，使苏联不断在美国和西方的节奏下逐步退让，最终解体；英国在西欧问题上既保持独立性，又参与到西欧一体化事务当中，不仅有着经贸等实惠的考虑，还有同时提高对美国 and 西欧地位的深层次考虑；英国对待英联邦国

家，虽然国力日衰，但是极力维护，不仅主动求变，而且有时也确实顺应潮流，及时“放手”，避免更大的被动。

从总体上看，英国最核心的成功战略是如何在弱势之下来加强对最强者的影响。如果英国没有美英特殊关系，那么英国将会彻底沦为边缘国家，因为英国独立于西欧之外，也无法影响到苏联，更何谈全球影响。然而，英国如果缺乏对西欧和苏联的影响力，又难以使美国在危机年代和缓和年代都日益倚重英国。可以说，英国是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得最为完美的前霸权国家，也是人类历史上首个从霸权位置上跌而不倒的前霸权国家。英国根据不同的情况主动求变的战略也使美英特殊关系远远不像世人认为的那样牢不可破。美国也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对英国的影响甚至是控制，也从来不愿意让英国事事出风头，而且还要让英国明白，英国必须获得美国的尊重与许可，否则英国将难以再现大国荣耀。当然，英国的自由程度与日本在美国的管控下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英国不仅是美国的助手，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的矫正器，而日本只是美国的助手，本质上并无发言权。

英国是一个变革能力非常强大的国家，也是对历史掌握得非常深刻的民族。它的弱点是基于现实和可见的未来进行事后反应，而不是超前预置措施。这一点，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具备宽宏的视野。但是英国人比美国人对风险更加敏感，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更加敏捷。这也是美国对英国倚重的根本原因。根据英国人的性格和美英特殊关系中所展现出来的务实精神与妥协技巧，完全可以判断：英国在美国处于危机时抛弃美国的可能性要大于美国在英国处于危机时抛弃英国的可能性。但是，只要美国足够强大，英国便不会出现判断的错误。

第五章

身处巅峰的美国

从被动走向霸权

“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地位比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英国还要强势。这对于一个只有不到两百年立国经验的年轻国家而言，的确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也正像所有处于实力顶峰的国家一样，美国在强势时又陷入了越南战争的陷阱，几乎丧失了“二战”的胜利果实。在尼克松和里根时代，美国又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纠错历程。“二战”的胜利使美国自负，而冷战的胜利使美国自信。这就是从尼克松到里根时代，美国摆脱被动地位的价值。而随之而来的“9·11”事件后，美国又会怎样使用强大的实力呢？

美国的强大起始于欧洲纷争，但根源来自于善于制造外部优势的内部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由一个跃跃欲试的旁观者真正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美国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力量，不仅仅是出于对领导地位的追逐，而是基于它内在的经济需求，美国一旦离开了全球市场，离开了中东等其他重要能源的支撑，它的经济也将毁于一旦，无法持续发展，持续繁荣。全球化的市场，一体化的贸易和能源供给的稳定和平衡，不仅关系到美国的繁荣，更关系到它的存活。所以，美国面对所有国家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心态，当然，也有对“异己者”的蔑视与敌对的心态。这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为了保证领导地位，必须使市场稳定、使能源供给稳定，使地区保持繁荣。其他地区一旦开始贫穷、混乱，甚至被它心中认为的所谓的敌人控制，它总会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反映的是美国对自身实力的超强自信，逐步变成了挥霍国家优势的自负。当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时，美国的另外一种强大体现出来了，那就是美国能够自我纠错。正如一艘巨轮，转变方向的难度远小于一叶小舟大，美国在另外一个足可摧毁自己的强国的压力下，仍然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其实美国能够纠正错误也是其强大实力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回孤立主义立场的教训。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时，各国都签订《凡尔赛条约》，唯有美国没有同意《凡尔赛条约》，等于是任由欧洲形势发展，不受美国制约，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影响欧洲秩序的权力，这也就证明了一旦欧洲失控，美国利益必将受到伤害。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的时候有矫枉过正之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撒手不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又管得太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太战线拉得太长，以致二十多年来，它在欧亚大陆基本上是疲于奔波，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中，美国首次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停战，导致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政治和军事威望受到损害；而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又陷入长达十二年的战争泥潭，在与苏联的实力对比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却处于冷战对抗的被动与劣势当中。尼克松时代是纠正错误的开始，而里根时代则是纠正错误后的受益时代。当美国赢得冷战，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又一次实力顶峰之际，美国开始了真正的塑造全球格局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美国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现在还不好预测。历史告诉人们，世界不可能只有一个永久的中心，但通常是中心的演变决定着世界的演变。

尼克松时代：以退为进的缓和

冷战爆发后的二十余年间，经过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双方都意识到，如果再出现危机或战争，双方都很可能被迫去打一场双方都无法承受的核战争。巨大的安全压力，使双方几乎同时产生了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愿望。尤其是苏联，二十余年间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每到危急时刻都退让和妥协。西欧国家已经感受不到苏联的实质性威胁，因此也不愿意再使用巨额的社会财富与苏联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

此时，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如果不顺势缓和，就可能脱离盟国而被孤立。而且，中苏分裂这个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也为尼克松推动缓和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缓和的对象是苏联，利用苏联失去最大盟友的战略机遇

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意在向苏联施压。

缓和不是放弃霸权地位，而是改变争夺霸权的方式。尼克松的缓和战略使美国能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战略手法来遏制苏联，通过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来“套住”苏联，这说明缓和战略以小退求大进，是新一轮更高层次、更广泛的遏制战略的前奏。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已经陷入泥潭，继续坚持越南战争的阻力已经超越了美国体制内任何一位总统可以拥有的最大战争意志。一是由于伤亡巨大带来的国内反战运动、国内社会对美国传统信仰与制度的质疑、国会内党派斗争等因素，使在任总统受到不可承受的攻击，导致战争预算削减，军队士气低落。二是由于战争久拖不决，使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受辱后趁机开始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影响到了美国领导全球的信誉与地位。中国的核力量发展形成了对美国实质性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日益突出。中东的巴以矛盾造成的石油危机使形势进一步复杂，美国面临着被切断石油供应的危险。三是盟友经济实力高速发展的同时，独立倾向明显。由于担心美国长期陷入越南战争，容易忽略苏联威胁，西方盟国抱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政策，这些因素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的离心倾向日益凸显。

越南战争的长期化使美国意识到失去全球领导地位的风险。面临着巨大的战争泥潭，美国只能选择撤军，但又不能在失去尊严的情况下开始和完成撤军。尼克松的做法是：

其一，强化对北越的军事打击力度（扩大地面、空中的打击行动和反叛乱行动，应用所谓的“疯人理论”，即“过度使用军事力量”），为撤军谈判争取尽量多的筹码。通过强化打击对手的“软肋”或使对手失去强力手段是谈判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战场上拿到的果实，在谈判桌上是不会失去的，这是历史的铁律。

其二，利用苏联的缓和愿望与苏联展开谈判，将限制战略武器、经贸援助、裁军、越南战争问题捆绑在一起谈判，利用经贸优势、总体军力优势、道义优势来缓解由于越南战争导致的被动局势，从而向苏联施压，让苏联影响越共对美国的策略，使越共逐步接近美国所期望的谈判立场。

其三，开展“美、苏、中”的三角外交。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减少中

国对越共的支持，而且也向苏联显示，如果不和美国的立场接近，就会被孤立。

其四，促使西欧、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缓解国内经济、政治压力和国外军力部署压力。

这种策略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主要风险有三个方面：

一是苏联人“不买账”的风险。如果苏联继续支持越共，威胁中国，迫使美国降低谈判的“要价”，尼克松本人在国内的威望会受到严重损害，导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会出现相当大的阻碍。

二是盟友不配合。西欧、日本既不希望美国减少安全责任，又不愿意增加自身的安全责任，美国仍然要背负沉重的外部军事、道义压力。

三是中国由于历史积怨和台湾问题拒绝美国推动关系正常化的诉求。

但上述三个风险一个也没有成为现实，这说明美国不仅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还具备非常有效的外交策略与技巧。

尼克松对苏联采取的是公开方式，在推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同时，高调宣扬要与苏联进行谈判，使世界走向缓和。其目的就是在政治和国际道义上把握主动权，如果苏联拒绝谈判，就会使苏联承担破坏谈判和拒绝和平的责任，对持续冷战对抗造成的紧张局势负责，苏联便会成为世界舆论和国家社会中的“孤家寡人”。准备和平的举措都是高调的，只有准备战争的举措才是低调的，这是国家间的政治现实决定的。本着切实的谈判意图，尼克松在就职典礼上提出：“经过一段对抗之后，我们现在进入了谈判时期。”^[1]

尼克松对中国采取的是秘密方式。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基辛格多次通过秘密渠道联络中国政府，争取中国的支持来孤立苏联。这样既可以防止因信息泄露而遭到苏联的破坏，又可以使中国领导人避开在公开渠道无法避开的意识形态和历史积怨的羁绊，还能防止盟友利用意识形态问题质疑美国能否坚持民主价值观的“政治信誉”。

尼克松在积极安抚盟友的同时，也主动与苏联的盟友接触。安抚自身的盟友可以使他们在美国的领导下承担更多的责任，配合尼克松建立新的全球均势战略，而接触苏联盟友则是根植于美国的根本态度，比如通过罗马尼亚向越南传话的同时，大谈美国与罗马尼亚的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意图

不言而喻。

战略错误的认知与纠正行动在大多数国家里难以平行起来。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总统、政府官员可以不受监督和制衡地作出决策与执行决策。政党竞争和制衡、公开的媒体、独立的学术力量（教育、科研、学者参政）等因素使政策的错误很容易暴露于公众视野，并招致强大的反对力量。任何一个错误的决策与政策在极端方向上都不可能“走远”。美国变被动为主动，其国内“纠错功能”功不可没。虽然美国遭遇了危机与困境，但仍然保持着超强的国际地位与综合实力，不得不承认美国战略决策制度的合理性，使得美国能够快速化解外部形势变化与既定政策战略之间的矛盾，及时灵活调整。

“美国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利益轻重缓急的客观判断，陷入了对威胁过度反应的境地。”^[2]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困境也产生于此。从冷战开始直至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美国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作出过多的承诺。由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过于简单，认为所有“威胁”都关系到生死存亡，从而对世界上任何它认为于己不利的事态进行过激反应。在所有国家利益中，安全威胁是根本威胁，然而并不是所有“危险”都能产生实质性的威胁举动或效应。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应对威胁的最佳战略是根据利益来界定威胁，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消除威胁。

决定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因素是地缘政治和文化（民族性格、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为现实利益也是以地缘政治和文化为基础的利益需求演变所致。从地缘政治考虑，美国不希望甚至反对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独霸资源或独大的国家或集团，尤其是能够既在太平洋方向有控制力，又在大西洋方向有控制力的国家或同盟。苏联需要出海口，而能够遏制其出海口战略的国家又只有美国。俄罗斯人天生缺乏安全感，容易走上扩张道路，使所有欧亚国家感到威胁。而美国天生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拯救者”自居。因此，它们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美苏两国的地缘政治现实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注定了两国的过去，也注定了两国的未来。

美国决定推行缓和战略，并从越南撤军，也有地缘政治的考虑。越南在当时的美苏对抗中，缺乏足够的地缘政治价值。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是防止

“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认为如果沿着欧亚大陆的东端，从中国到东南亚，再到南亚大陆，共产党政权相继上台，对美国资本主义阵营将会构成巨大的威胁。而当美国逐步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后，却发现共产党并没有自己曾经认为的可以推动“多米诺骨牌”的能力，反而逐步认识到，美国即使丧失了中南半岛，相对于美国的军人生命、价值观和声誉的丧失，损失并不大。越南距离美国的战略重心——欧洲非常遥远，更不用说美国本土了。如果在西欧、加拿大、墨西哥发生一场越南战争，美国就不可能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撤军。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是意识形态的激情所致，而退出越南战争却是地缘政治的现实所致。

帮助孤立者摆脱孤立是夺取外交主动权的最好方式。中国是苏联对外边界线最漫长的国家。在冷战期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矛盾点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两个大国间都没有的。如果美国能够联合中国共同对抗苏联，那苏联会被彻底缠住。尼克松对此重大关联早已了然于心。让苏联的地缘政治近邻孤立或陷入愤怒，只能增强苏联的地缘政治力量，无论中国与苏联是远是近，只会使苏联增强可以制约美国的力量，而使美国少了一个潜在的伙伴。所以，美国起初缓和中美关系的步骤是巧妙地鼓励苏联阻止其与中国建交。

中国在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事件后，同时感受到美苏巨大的安全压力。所以，从策略角度出发，为了巩固国家安全，中国必须在美国苏两家中选择一家进行妥协。如果此时苏联主动缓和中美关系，那么很可能美国便没有机会争取到中国了，但是苏联缺乏美国灵活调整政策的能力和意志。如果苏联专力经营欧亚大陆内部，促进欧亚大陆的和谐和共同发展便很可能孤立美国。当苏联针对中国和美国同时展开咄咄逼人的姿态时，中国自然会更加愿意、也更加容易和美国走近。

缓和战略暂时缓解了中国的安全压力，双方开始在台湾问题、对苏关系问题、联合国地位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产生互相谅解。中国领导人在心理上增强了反制苏联威胁的底气。但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是有限的，因为中国的安全问题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国对台湾问题和中苏关系的表态都非常模糊。

美国缓和战略开启了中国逐步由封闭走向世界的大门。在新中国建立之

初即被迫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在越南间接对抗，这些举措无论是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都增强了对外部世界的敌意，无意中也使中国自我封闭。因此，当美国主动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中国在主观上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而只将其看作外交的胜利。因为联合国席位于 1971 年解决了，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美国总统又正式来访。中国认为尼克松访华向苏联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如果苏联继续侵犯中国，中国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虽然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如果按照事实逻辑进行推理的话，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苏联再强硬下去，美国很难说不会将中国作为与苏联谈判的筹码。这反映了苏联人具有的俄罗斯欺软怕硬的内在文化特性，也说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家、战略家向具备全球视野的治国大师的转变。

美国实施缓和战略并不意味着主动进行和平演变，而是美国一贯推行其价值观的必然。无论何时何地，美国都会借机推动价值观的传播。但作为现实主义者，尼克松并不指望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能够在短短数年间接纳“民主”思想。所以，其缓和战略对中国的态度是对苏斗争的地缘政治事件，而不是推行“民主”的举措。美国承认中国通过几千年在亚洲厚积起来的“威望”是让美国望尘莫及的，也正是这种“威望”，是美国解决亚太地区棘手问题所必须借助的。

美国的缓和战略选择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基于中国在欧亚大陆东端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在解决地区问题中的特殊作用。如果美国能够利用中国这种影响力和特殊作用，不仅可以介入地区事务，而且还可以增强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全球性大国必须要重视与地区性大国的关系，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让地区性大国孤立于全球之外，全球性大国也不可能具有全球性影响。这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向世界开放始于 1972 年，逐步改变对亚太影响力的使用方式也是始于该年。中国与美国走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为没有支持越共统一越南，失去了对今后统一越南并取得执政地位的越共的信任。所以，中国为了现实利益的交换而失去了一个近邻朋友，为以后苏联和越南同时与中国交恶埋下了伏笔。美国并没有将台湾问题和中国支持越共问题进行对等交换。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可能想不到：即使北

越没有解放南越，越共也可能会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狭隘地认为中国背叛自己转而倒向苏联。如果已成为既定事实，那么中国北有苏联，南有越南，美国在万里之外，日本强邻在侧，安全形势也会恶化。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在衡量中国安全与发展的所有因素时，来自苏联的威胁和台湾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反映的是美国并没有同中国进行短期性的对等交换，反而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利益交换问题。从某种角度上看，美国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是围绕美苏关系的平衡，抬高与苏联缓和“要价”或压低苏联“要价”而采取的“迂回策略”。

美国缓和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时值苏联正在大力扩充战略武器库及强化欧洲的导弹部署。因此，缓和战略的特色之一就是谈判来迂回遏制苏联。《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是尼克松时代的产物，是美国的战略武器优势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强势面前逐步消失时，为了限制苏联而签订的。而到了小布什时代，美国的力量优势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而日益强化，为了避免自身受到限制而又退出该条约。可见，美国对待条约的态度永远是现实的利己主义。

缓和战略使美国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虽然没有完全阻止苏联加快扩充军力，但利用了苏联、东欧在经贸问题上的“软肋”，使苏联被美国设置的一系列国际议题“缠住”，美国从单纯的地缘政治遏制转变为地缘政治遏制与国际体系遏制并重。地缘政治遏制是“单打独斗”，而国际体系加地缘政治遏制则是“求之于势”。

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也反映了遏制战略的僵化。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实施遏制战略是坐等苏联内部出现问题而胜利。遏制战略没有考虑到如果苏联主动在某处突破围堵会使美国应接不暇的后果。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即为明证。按照基辛格的观点，就是“共产主义会寻求在一些点上的突破，选择对美国来说具有最大政治和战略复杂性的地区作为目标”^[3]给美国出难题。

遏制政策僵化地按照地缘政治环境来构建合围的军事部署态势和建立苏联外围的经济优势，这实质上使苏联可以相对自由地采取反制措施，在美国力量薄弱地区（如贸易线、能源重要地区）采取行动，使得这个包围圈变得

脆弱。除非美国有足够的能将苏联势力范围的周边都变得民族和谐、生活富裕、政治清明、军力强盛，否则只能是无休止地将外交资源、文化资源、军力资源、信誉资源白白浪费在苏联采取行动的地区。

所以，遏制战略只是打下了美国的实力政策的基础，利用军事和经济优势遏制苏联。却没有重视发挥制度、精神优势来创造一个国际秩序。任何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威胁从本质上是不确定的，灵活性和多能性是制定战略的基本原则，因为对手不可能主动举手投降。

不得不承认美国处于任何一个实力顶峰国家都容易陷入的困境当中。在过度扩张和孤立之间左右摇摆，源于对国家利益缺乏整体的、有针对性的认知。过度扩张导致实力资源任意挥霍，孤立导致放弃责任、丢弃盟友，丧失尊严与荣誉。无论何种战略，都将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基本的战略姿态是不放弃责任，但要改变承担责任的方式，将共同利益变成共同责任；基本的方式是暴露、攻击对方的软肋，告诉对方：“我有能力发现、制造你的软肋并使用你无法预知后果的方式进行攻击，同时，我也有能力帮助你克服软肋。”将多个问题联系起来一起解决，用一个问题来促进其他问题的解决。大国之间的问题，通常超出大国之间本身，大国之间的合作竞争也会超出与之紧密相连的问题和地区，这正是尼克松缓和战略对遏制战略的超越。

尼克松对于缓和战略具有双向心态，基辛格认为，尼克松主义是“一种令人难以认同的冷战思维和对国际力量结构的清醒认识之间的混合”^[4]。尼克松反对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容不得有些许动摇。他认为美苏冲突“不是集中于有关利益和权力的争吵，而是涉及人类命运的竞争”^[5]。所以，在美国陷入越南窘境，苏联逐步强势之时，仍然在心态上毫不退缩，坚持遏制苏联、增加对苏联的影响力。但他又不是蛮干，而是在对全球性力量对比清醒认知的基础上调整斗争手段，当时的全球力量对比情况是：美国力量相对衰落、盟友力量增强、中国因素尚未使用、苏联外强中干。抬高盟友、撤离泥潭、联合中国、分化东欧、缠住苏联等措施没有被孤立地使用，而是配套使用。

尼克松的缓和战略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增强盟友的作用与地位，减少此前承担的不必要的义务，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而且与中国共同开启了中国

进入世界的大门，增强了美国的战略地位，中美关系正常化揭开了苏联衰落的序幕。并且，“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将使莫斯科立场转化，而非趋于强硬”^[6]。

缓和战略既是尼克松迫于盟友独立倾向日益增强、自身麻烦缠身、苏联威胁日益增大等诸多严酷现实而作出的现实和理性的战略选择，同样也是利用中苏阵营分裂、美国仍然是世界首强、资本主义世界将苏联的东欧集团作为共同威胁这些战略机遇而采取的主动变化的战略措施。尼克松制定缓和战略反映的是美国对外界变化的敏感，由此而产生的灵活政策。如果尼克松继续坚持上任前的政策，等国力继续相对下降时再行缓和之策，那么缓和则会变成求和，将会面临苏联、西欧、日本更多的要求。此时，美国主动收缩战线有利于把握主动，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值得重点关注的方面，放弃无休止、无章法的资源挥霍，避免无价值的消耗，转而利用自身的制度、技术和现有实力的优势，调整国际体系，利用苏联经济力量的薄弱，束缚其“手脚”。缓和战略对遏制战略的超越是由单纯地使用军事力量遏制苏联，转变为综合使用军事、外交（结盟与瓦解）、经济力量、道义力量消融和限制苏联。

尼克松的缓和战略也首次使用了美国一直以来都反对的均势制衡手法。但他没有将缓和与均势之间的关系看作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也不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是一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因为现实总能战胜历史传统。“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7]通过缓和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均势，一改由美国单独承担责任的局面，建立由美国主导，以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中国五大力量中心为支撑的世界新秩序，这是对传统欧洲梅特涅体系的超越。梅特涅体系是以欧洲封建正统的价值观作为统一的思想基础，大国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与矛盾，而尼克松缓和战略设想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以共同的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实力地位为基础的大国协调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希望与苏联之间形成“共同克制和共处习惯以及到头来的合作习惯”^[8]。美国不仅要强化与西方盟国的联合，而且还要以实力为基础，开始与苏联谈判，并用中、美、苏三角关系束缚苏联。因为“从经济角度看，只有美国是世界第一，说到强国只有两个超级大国……考虑到经济方面和经济潜力时，

现今的世界有五个中心”^[9]。所以，“美国的资源无法控制世界上每个问题的演变，再也不能以资源去代替思考了”^[10]。大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世界的问题，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大国因素。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无力控制世界形势的发展，是因为美国对其他大国的影响力弱化。美国的缓和战略旨在使美国拨出越南战争的泥潭的同时，还通过主动发起谈判、调整伙伴关系，利用对方阵营分裂之机瓦解对手同盟，来增强对大国的影响力。将注意力重新放到重要问题上来，以实力为后盾，软性地使用硬实力，将大国“牢牢拴住”。

缓和战略不仅使美国卸下了越南战争的枷锁，还减少了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的成本。因为随着西欧经济复兴和实力增强，苏联出于分化美欧的考虑而主动产生与西欧缓和的意愿，使美国对欧洲安全的负担急剧减轻。缓和战略还利用中苏分裂，进一步孤立了苏联。所以，缓和战略使美国将战略重心重新聚集于苏联，充分发挥经济复兴后日益强大的盟友的作用，赢得了盟友的继续支持和中国的谅解，能够重新主导和塑造新的国际体系。

这其中美国强大的国力是根本原因，但是缓和战略在操作上也是成功的。美国的缓和战略使盟友利用重新恢复的繁荣承担起更多的安全责任，巩固了同盟。反观苏联，不断加强对东欧的控制，虽然在经济上提供了帮助，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伤害了盟友的感情与利益，并且一味追求与美国平衡军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对等，丧失了发展经济、民生、科技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可能利用美国的战略收缩抬高要价，因为自身的软肋比美国还多。苏联之所以表现出进攻势头，更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低估了美国的实力或者高估了自身的实力，而是一种心理上虚张声势的现实反映。

里根时代：重振国威的灵活反攻

里根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是美国摆脱越南战争导致的困境最后时期的“反攻”。里根上台后面临的形势是：对内，由于“水门事件”而使国内产生政治道德滑坡，并且引起民众对政治家甚至政府的怀疑；卡特总统的平庸

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美国武力解决驻伊使馆人质事件的计划由于飞行事故而搁浅，导致军队士气持续低落；越南战争的后遗症尚未退去。对外，则是西欧和日本经济继续走强，导致美国的领导地位相对下降；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出现了“美国难以招架”的国际印象；人权外交软弱无力并遭遇抵抗，美国的价值观优势受人质疑。

面对如此困境，里根的“反攻”战略虽然是冒险之举，但这不仅反映了里根的政策方向，而且也是美国民族性格的必然。从美国立国后的历史中不难发现，面对未知的前景和困难时，美国人很少被动应对或委曲求全（除少数时期外，例如第二次美英战争时期，签订《杰伊条约》也是迫于发展经济而暂时性让步）。尤其是南北战争结束后，随着奴隶制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美国开始大规模开发西部、大力发展与西欧和亚太的贸易。美国人天性乐观、富于进取、喜好挑战权威，挣脱束缚的特质非常强烈。因此，在经历了丢失中国大陆、输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元地位遭受挑战和冲击、伊朗人质事件等蒙羞性事件后，开始反弹。里根提出“重振国威”是基于自身实力，也是民族性格使然，也与里根个人息息相关。

里根个人的政治立场属于保守主义。早在20世纪40年代，里根个人就已经形成了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看法，认为苏联就是罪恶的化身，并且这种认知占据了他个人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他几乎天生就认为“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对立。在他的个人记忆中，连好莱坞也已经被斯大林当成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渗透的基地。完全可以认为，在里根的内心几乎天生感到美国与苏联的敌对。而且从里根的个人性格来说，他不喜欢受到传统束缚的天性也使他在处理对苏问题上自然会超越经验，不追求妥协，以强硬回击来重获优势。天生的反共产主义斗士加上近乎僵化的保守观念，使里根从内心里便难以接受所谓的“缓和”和“收缩”。在他看来，缓和、收缩就是美国对苏联的姑息、妥协、退让，只会让苏联利用美国的一厢情愿来发展军力，影响世界的和平、安全、繁荣。

大国的战略“急转弯”是最难的，因为战略的转变不仅需要自身实力、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更需要适应主要对手境地与实力的改变。能否抓住有利的时机，果断实施战略转向不是来自于往往可能导致机会丧失的自觉行

动，而是主动感知的敏锐判断。里根敏锐地抓住了苏联的弱点：在经济上，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弊端已经开始“发酵”，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成堆；在政治上，老年领袖制度使领导人频繁更迭，影响了政局和路线的稳定，导致执政党的领导威信受损；在军事上，由于强力扩充武器库，导致军力膨胀的表面下出现了常规力量相对下降而战略核力量又由于美国的制衡无用武之地的窘境；在外交上，由于入侵阿富汗招致国际舆论谴责，陷入孤立境地，并且由于久拖不决，财政压力、国内社会压力、外交压力、华约内部离心压力剧增。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处于表面强大而实际上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的冷战攻势已经是“强弩之末”，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意志与美国展开新的对抗。

凸显对手弱点的最佳战略就是显示自己的优势。里根就是充分利用美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独特优势，提出重振国威，恢复美国的实力与自信，并且由遏制转为超越。里根始终认为，西方不应该仅仅遏制共产主义，而应该超越共产主义。所以在苏联向外扩张实力，输出意识形态的时候，美国一改以往袖手旁观的姿态，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将苏联的扩张“推回去”^[11]，制造“苏联的越南”，并且大力推动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经济，对苏联军力扩张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

里根虽然对苏联言辞强硬，并且总是采取“人身攻击”的方式，但是一直有意避免和苏联直接对峙，也没有在实施过程中故意激怒苏联，而是利用苏联对外扩张而使其陷入泥潭。这就是低烈度战争理论。

美国由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享经济优势、军力优势，发动旨在“拯救”西欧和其他“自由世界”的马歇尔计划的超级强国，“沦为”只能进行战略收缩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任凭苏联挑战强国地位和进行与自己利益相悖的扩张，美国是心有不甘的。但是在相继经历了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后，美国业已明白，如果和苏联、中国等大国发生正面对抗，可能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不仅面临巨大风险，而且还会有来自国内和盟友的压力，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因此，如果不能正面“突破”，从“侧面”入手便自然而然成为战略选项。在对苏联具有决定性地缘政治意义的地区和国家为苏联制造“困难”，拖住苏联，最好能成为苏联难

以自拔的“泥潭”。这就是低烈度战争理论的核心。

美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发现苏联在东欧及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很难受到外部威胁，而里根又不愿意缓和，坐视苏联的对外扩张，只能在第三世界地区与苏联展开争夺。第三世界拥有丰富的能源、生产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是开展贸易与投资的广阔市场，对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许多第三世界毗邻战略要道，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如果让苏联掌握了第三世界，则是让苏联“卡住西方的脖子”，这是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另外，美国在朝鲜、越南等第三世界地区陷入泥潭，从而导致巨大的损失和被动，对美国是刻骨铭心的失败，出于这种深刻体验，它希望苏联在第三世界也陷入泥潭。

低烈度战争策略既避免造成与苏联“迎头相撞”的僵局与危局，又使苏联在“拉长战线”的同时顾此失彼，诱使或迫使苏联犯错误。

其一，如果与苏联正面“交锋”，容易导致“古巴导弹危机”式的严重事态发生。这种严重事态会对美国造成更多不利。因为苏联正处于道德和实力“滑坡”阶段，遭到国际舆论的包围，东欧阵营也加剧了离心倾向，一旦爆发美苏之间的核危机，使国际舆论聚焦于美苏之间可能爆发的、导致人类灭亡的危机，而转移对苏联弱点的注意力，这容易使苏联摆脱道义和外交的“低谷”，使美国难以利用国际力量和资源来遏制苏联。

其二，利用苏联在第三世界或者边缘地带的扩张是“物美价廉”的战略。美国使苏联陷入泥潭，令其扩张目的难以得逞，使苏联威信下降并动摇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加剧了苏联国内矛盾和危机，使苏联“雪上加霜”，不需要美国付出更多资源和冒更大风险来削弱苏联。

其三，可以利用第三世界中的反苏力量来巩固和扩大美国的阵营及国际影响力，并压缩苏联的势力范围，加剧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

其四，抬高了里根的支持率，有利于里根推行其内政外交措施。鉴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和大量伤亡，美国民众和政治家们对美军进入第三世界地区作战非常敏感，甚至到了脆弱的地步。如果美国在第三世界地区支持反苏力量，可以避免使用令美国民众和政治家非常忌惮的直接出兵方式来达到对抗苏联的目的，这体现了里根政策的智慧和效果，非常有利于提高政

策的支持率。

美国低烈度战略只是出于抗苏需要，不是直接派兵介入，而是对亲美力量提供武器、资金；指导训练，进行情报支援和行动咨询等。但是美国公开进行低烈度战争也损害了美国的声誉，因为在美国支持的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信奉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而是利用美国的援助获取独裁政权。

里根的低烈度战争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按照低烈度理论，在阿富汗、柬埔寨、中南美洲、中东和北非都支持反苏力量，并在这些地方或者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或者打击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力，基本上贯彻了里根设想的“推回去”战略。里根采取的是“釜底抽薪”，使苏联难以以有限的国力支撑过长的“战线”而加快了弱点的暴露。因为一个病态的人是经不起经年累月的过度疲劳的。里根的低烈度战争理论的成功，与其说是体现美国的实力和制度优势，不如说是利用和扩大苏联的弱点。

人权外交是利用人权问题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从卡特总统开始，美国利用人权问题作为外交工具，并将推广人权作为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军力扩张、日本和西欧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而独立倾向日益明显、第三世界国家利用美苏矛盾“两边骑墙”、自身国力相对下降等因素，美国急需开辟“新战场”。从意识形态领域出发，将意识形态作为外交工具来与苏联进行争夺，从而维护霸权地位，成为美国必然的战略选项。

人权外交的实质是从内部瓦解苏联集团，通过树立自身的人权形象，在第三世界或者边缘国家和地区培养亲美力量，共同围困苏联和东欧。人权外交虽然始于卡特时期，但将其发挥至极致的是里根。“里根政府的人权政策不是孤立主义，不是放弃主义，而是根据美国的价值标准和国家利益积极行动。”^[12]里根认为：“维护人权事业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13]里根在当选为总统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对人权问题的考虑如同军备控制一样重要。国务卿舒尔茨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阐述人权外交问题时说：“我们认为人权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我们在想到美国和

我们所维护的东西的中心，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维护我们的理想。”^[14]人权外交使美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情况指手画脚，并且最为主要的是，支持和鼓舞了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持异议的政治反对派，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鼓励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

里根在第一任期内对苏联的战略重点是扩充军备，实现“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将人权外交放到突出的位置，而在第一任期末期和第二任期内，将人权外交、缓和（主要表现在美苏首脑多次会晤并进行多次限制军备竞赛和武器的谈判）、部署“星球大战”、低烈度战争战略并列在一起综合实施。里根的言辞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在实际行动中现实主义色彩却非常浓厚。只有等到美国对苏联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外交影响力的优势恢复以后才开始与苏联缓和。但缓和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放松继续强化军备与实力，而是继续强化里根在第一任期内扩充实力的成果，继续扩大军事优势，并利用戈尔巴乔夫进行新思维改革的“契机”，大力对苏联推行人权外交。

人权外交的实质是将人权话题作为战略工具，不仅着眼于搞垮苏联，而且企图赢得“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道德的普遍承认”^[15]，从而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所以，里根不是简单地按照“人权”画线，确定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程度或敌对程度，而是以“人权”的理想主义旗帜为美国的现实利益服务，配合“以实力求和平”和“反攻”。里根任期内的人权外交对象聚焦于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人权状况虽然不如意，但对美国对抗苏联有所帮助的国家，并不是一味采取威胁停止援助等可能恶化外交关系使其倒向苏联的人权外交方式，而是利用它们在制度和法律上的不完善，诱导它们的政府走向“自由化”，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它们国内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和学术力量。在第三世界的人权外交中，人权外交与低烈度战争理论相得益彰，成为削弱苏联的影响力，并拖住苏联，甚至使苏联陷入泥潭的重要战略措施。

里根推动人权外交的力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美国总统，并且在人权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作风。一方面，攻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对外破坏苏联的国际形象，对内则是动摇苏联共产党的

执政基础。比如延长美国之音节目的时间，将其称为：“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共产主义的黑暗中点火的力量。”^[16]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存在人权问题但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国家中的人权问题则充耳不闻，任其为所欲为，配合冷战攻势，彻底孤立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利用人权问题来标榜美国“自由”“民主”的形象。

里根政府之所以对有人权问题的盟国采取顶多是口头批评的态度，是因为里根政府认为：“用一个更坏的政权取代一个坏政权，或者用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政治局取代一个腐败的独裁者，这均无济于人权事业。”^[17]使用人权外交确实使苏联政府在国际社会中遭遇一定程度的窘境，也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受到了损害。

没有军力、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优势，旨在体现制度优势、文化价值观优势和国家信仰的人权外交便成为“建筑”在沙丘上的房屋。里根的战略是建立在构建硬实力的基础之上，在取得对苏军事优势后，便利用这种优势塑造利于美国主动缓和的氛围，高调宣扬“和平”“民主”“人权”等高尚的口号，使苏联融入到美国以实力优势塑造的国际体系中，软化、弱化、融化苏联。

自从冷战开始以来，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已经表明：美国如果放弃中东，就相当于放弃全世界。中东是欧亚大陆的枢纽，并有丰富的石油。全球争夺的重心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争夺的重心在中东，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缘价值也需要视中东“归谁支配”而定。得中东者得天下。

里根的中东政策将“防止苏联采取行动”作为基本目标，强化美国的军事存在，并且通过军事援助来增强中东盟友的实力以防止其倒向苏联，还要求西欧介入中东事务，成为美国在中东抗衡苏联的重要助手。因此一改自尼克松至卡特时期的中东政策，里根将争取持温和立场的中东国家的支持改变为要求中东国家与美国保持“反苏联战略一致”。即谁支持苏联或者投靠苏联，谁就是美国的敌人。这等于是利用以色列来充当“前锋”，在进一步倚重以色列的同时，也强化了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安全责任。这样做的风险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激化阿以矛盾，持温和立场的中东国家会因为美国的

行为感到为难；另一方面，加强美国的军事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偏袒以色列，可能会动摇亲美的中东国家的亲美立场，而使美国在中东丢失毫不犹豫的支持。这对于美国的国力及其在中东的战略技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但是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则意味着不惜进行低烈度战争，打击激进国家和力量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削弱苏联的影响。

阿以矛盾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美国弱化苏联在中东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必须使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认识到，阿以矛盾的缓和有赖于美国而不是苏联。如果美国能够解决苏联解决不了的难题，自然会提升战略地位。因此，缓和阿以矛盾便成为里根在中东排挤苏联势力的主要方式之一。美国还可以利用缓和阿以矛盾与相关国家保持接触，增强影响力。因此，美国一边要力挺以色列，一边要安抚与以色列有历史积怨的阿拉伯国家。因为无论是温和的阿拉伯国家，还是激进的阿拉伯国家，都可能因为阿以矛盾而葬送美国的中东政策。

里根的中东政策实质上是“踩钢丝”。在“钢丝”的两边，一边是以色列，美国对它负有道义和价值观上的责任。另一边是阿拉伯国家，美国不能离开它们的支持。这种情况下，里根不能选边站队，如果选边站队，迟早也会两边尽失。美国只能就事论事来解决阿以矛盾的一系列问题。一是最大限度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并进行斡旋，力促双方认识到“武力不能使任何一边获利”。二是要明确支持两边可以接受的立场和行为，增强对两边的影响力。三是在一定意义上主持“公道”，不仅尊重人道主义立场，还要尊重中东地区内的宗教与文明。四是必须牢牢把握住那些地缘政治因素明显、影响力大、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如沙特、埃及等。

当以色列意图发动“黎巴嫩战争”^[18]时，美国对战争行为的态度非常关键，既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与利益，又不使以色列的战争举动导致阿以矛盾扩大。所以，美国采取模糊的“绿灯”政策，即：认可以色列主动攻击黎巴嫩，但希望以色列在成为黎巴嫩挑衅的受害者后主动实施攻击。当时的国务卿黑格默许了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的作战计划，但要求以色列不要采取主动进攻。黑格对黎巴嫩战争前来访的沙龙说道：“除非你们（以色列）成为挑衅的受害者，并达到世人会很容易理解你们进行报复的受害程度。”^[19] 这番

话表明的立场是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战争，但希望以色列在成为“受害者”后发动战争。这也很容易让其他阿拉伯国家认为美国“指导”以色列寻找开战借口。而总统里根认为，这种言论会导致阿拉伯国家激进的反应，并会歪曲美国在中东主持“公道”的形象。虽然里根为挽救不谨慎的外交言论作出解答，但是并没有阻止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因为黑格对沙龙的表态等于向全世界说明，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在世界舆论特别是中东舆论中，美国可能被贴上支持以色列屠夫的“帮凶”。

因此，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一经爆发，美国便在中东地区处于孤立地位。因为阿拉伯国家几乎一致认为是美国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为了平息阿拉伯国家高涨的反美情绪，此时的美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帮助以色列尽快结束攻击行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平，然后再安抚阿拉伯国家。这样的战略选择既可以帮助以色列，使全世界其他盟友看到美国维护盟约的“信誉”，也可以尽量减少阿拉伯的抱怨和反对力度。但这样的战略一经实施，仇美力量自然会极大膨胀，会影响到中东亲美的温和国家的立场，从而破坏美国的中东全体战略布局。二是控制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使其尽量降低作战强度，尽量减少军事打击的附带损伤，尤其是平民伤亡和宗教设施的损伤必须减至最小。这样可以得到中东亲美的温和国家的理解，但是同样会刺激反美力量。两种选择，无论哪种都会激起反美力量的兴起。所以，美国在黎巴嫩战争后，其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处置反美力量。一方面，美国必须得到中东亲美的温和国家的理解，另一方面，必须使中东反美力量得到遏制。这就需要巧妙地利用以色列的作战行动来打击反美力量，而不是使以色列发起的黎巴嫩战争被视作侵略战争。

美国能否在中东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两边安抚的关键是苏联能否给予中东反美力量足够的支持。如果反美力量得到苏联的强力支持，美国必将很难在中东国家和以色列之间“长袖善舞”。如果反美力量并没有得到来自苏联的足够或者期望中的支持，那么反美力量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双重打击下，会使苏联失去在中东的影响力。当以色列开始攻击叙利亚后，苏联却背弃盟约，没有履行军事支援的义务，被阿萨德认为是只顾赚钱而不顾盟友利益的自私自利、毫无责任感的大国，于是宣布接受以色列的停火条件。这使中东国家

心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苏联在内心里惧怕美国。历史证明也的确如此，因为苏联担心爆发与在背后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再到古巴导弹危机，每当美国动真格的时候，苏联就会由于担心与美国爆发直接碰撞而犹豫不决，甚至退让，要么“出卖”盟友，要么在盟友面前“蒙羞”。

由于苏联对盟友的软弱支持，使美国获得了增强美国主导地位的最佳时机。黎巴嫩战争证明了美国在中东和平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它使中东和全世界产生了这样的印象：美国决定战与和。美国不是要改变对某些中东国家的远近，而是重在安抚反应强烈的国家。黎巴嫩战争后，巴解组织被迫撤出黎巴嫩，只能在美国的压力下选择和谈让步。

美国一方面提出有利于以色列的安全设想，敦促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另一方面又驳斥苏联关于“美国破坏中东和平”的指责。

苏联在叙利亚和巴解组织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伸出援手，成为黎巴嫩战争最大输家。使苏联在中东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在阿拉伯国家中的政治和军事信誉急剧下降。曾经寄望于苏联的中东国家和领导人对与苏联签订的军事条约和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产生质疑，甚至一些持激进的亲苏政策的阿拉伯国家也开始疏远苏联向美国靠拢。这直接使美国可以主动适时地，而不是被迫地调整中东政策。

黎巴嫩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美国在中东的道义地位下降，但美国在总体上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断地安抚温和的中东国家，尤其是支持巴勒斯坦自治，表明美国可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策略性地主持正义，使自己在中东的损失比起患得患失和自私的苏联要少很多，让中东国家看到美国既在保护以色列，也不允许它过于“胡作非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美国制定和实施更为灵活有效的中东政策和战略提供便利。因为考虑到“阿拉伯人在黎巴嫩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极度失望、彷徨而感到无路可走”^[20]，里根在黎巴嫩战争结束的第一时间内，就发表了一项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政策性声明。声明显示，美国非常精明地照顾了阿拉伯人的面子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从而也增强了在中东国家中“主持公道”的形象。

黎巴嫩战争中的软弱无力使阿拉伯国家开始务实，在战后便通过标志着

阿拉伯民族对以色列政策转向的《菲斯宣言》，由“不承认、不谈判、不和解”到“共同努力实现中东地区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这种表态其实是含蓄地承认以色列为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该宣言一经发表，便受到世界主流舆论的欢迎，然而却遭到了以色列人拒绝。以色列认为它并没有将巴勒斯坦置于可以被以色列接受的地位。因为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头等威胁。而该宣言却表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自然是难以接受。以色列的强硬回应也使阿拉法特认识到武力斗争不可能迫使以色列接受自己的主张，开始改变武力求独立的政策。

美以关系是盟友关系，但并非主仆关系。以色列发动战争的目标是将巴解组织驱逐出黎巴嫩境内，使巴解组织难以利用黎巴嫩作为基地威胁以色列。美国虽然一直避免因为以色列的过度动武而使持温和立场的阿拉伯国家“离开”美国，甚至使战争行动扩大至美苏对抗，但也要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诉求。支持以色列、强硬打击反美力量、使苏联暴露色厉内荏的本质，对于美国在中东乃至世界上“反攻”苏联取得了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

里根的对苏战略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然而，基础性措施是在经济领域内。

里根坚信美国式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相对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上台之初，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使里根在实施对苏经济战略时面临很多障碍。但是在1982年年底经济开始复苏后，里根立即着手将美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作为战略资源，系统制定并实施了对苏经济战略。美国“采取了一项包括经济战在内的全面战略，用以攻击苏联的弱点”^[21]，而且还是“一场无声的战役，与盟国一道开展工作”^[22]。

美国对苏联的经济优势主要反映在如何使苏联经济的脆弱日益暴露，主要包括：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国家财政支出和进行投资、技术密集型产业失衡和过度依赖能源出口来换取外汇资金。因此，相应的是，美国为使苏联难以有充足的资金来平衡财政支出，总是采取各种措施减少苏联的外汇收入和压缩美国公司对苏联的信贷。在美国的经济“压迫”下，苏联经济的脆弱性暴露了出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先天不足。双方都难以改变对方之时，首先必须改

变自己，解决自身的问题。进入冷战对抗僵持时期的美苏，谁能够首先优化自身，谁就能够占据主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经济实力的需要，因为它束缚了民众参与经济的热情和创造力。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病百出，戈尔巴乔夫急需进行经济改革，因此需要外部的和平环境，也需要来自外部世界在金融、投资、民生、科技、贸易等方面的支持。而对于苏联这样的国力规模和根植于强国心态的民族自尊心，有能力对苏联进行可以接受的外部经济支援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它们主导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是苏联的“软肋”，也是里根在美国经济复苏后拥有强力的经济实力对苏联态势“逆转”的主要“突破口”。影响大国的经济是动摇和影响其对外战略和立场最根本的杠杆。在冷战时期，经济斗争的目的服从于战胜对手的战略，双方追求的是“己方越来越主动和强势最终赢，对方越来越被动和弱势，最终受到自己控制或者干脆认输”的结局。所以经济斗争的目的在于损耗对方的国力基础，并且和情报斗争、文化斗争、军力竞赛、地缘政治博弈紧密结合。

二是应对策略缺乏灵活性。里根对苏联的经济斗争最为显著之处就是通过增加军费来刺激苏联也增加军费。里根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提出“重振国威”的口号，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举动，其中就包括增加军费。这使苏联也为了追求所谓的军力平衡而增加军费，使苏联本来已经恶化的财政收入更加捉襟见肘，从而使苏联本已弊病百出的经济更是千疮百孔。美国每年的军费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不到GDP的6%，而苏联的这一数字高居12%以上。里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军费，足以挑动苏联领导人维持军力平衡的神经，使苏联增加两个以上百分点的军费开支。里根上台后，军费急剧增加，“从1979年到1985年，美国的实际军费开支上升了50%”^[23]。1988年，美国军费为3080亿美元，苏联为3000亿美元，8年内美国军费占GDP比例在小于苏联的情况下，与苏联的军费开支持平。可见，对于追求军力平衡的苏联来说，并不是没有意志来维持与美国相适应的军费增长，而是经济日益困难导致了军费增长远远被美国甩在身后。里根增加军费的做法使苏联像一位已经背负沉重负担的行路老者仍然不停地被迫

增加身上负担一样。在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发展经济所需的其他经济资源已经捉襟见肘。这一点，从戈尔巴乔夫急于推行新思维改革和与美国开展裁军和限制武器竞赛谈判上便可以看出。但是面对苏联的“诚意”，里根不愿意在刚刚重获优势时便开始缓和，使苏联可以利用缓和重新调整政策而东山再起。如果苏联不是一味地与美国通过增加军费开支来确保心理“安全感”，而是以经济承受能力为标准来改革军费使用机制和提高使用效率，那么美国的经济武器能否如此高效必定存在疑问。

里根不仅迫使苏联去花费足以影响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资金，而且还极力压缩苏联经济收入的主要渠道。比如，通过影响石油的价格来减少苏联的主要外汇收入。当苏联的经济弱点已经暴露无遗时，美国对沙特和科威特等亲美国家中的“产油大户”软硬兼施，使它们增加石油产量，造成国际能源市场上原油价格下降，从而使苏联的外汇收入急剧下降，使苏联的经济如同“屋漏偏遭连夜雨”。

美苏之间的贸易量较小，可以采取“非赢即输”的经济斗争方式。如果美苏之间具有庞大的贸易量，互相依存程度很高，美国便难以采取经济斗争手段来对抗苏联。苏联的问题在于内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扼杀了社会活力，使经济停滞，外部没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体系。苏联与东欧国家自成一体，难以形成规模性的市场体系。可见，真正的经济优势不是经济总量，而是能够占有的市场规模、市场机制和制度的构建能力、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综合起来就是使别人依赖的能力。

小布什时代：制造不可预见的动荡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面临的是秩序正处于重构所必经的混乱不堪的世界。美国的经济和科技、军事实力继续保持着领先，而且因为冷战的胜利，使美国的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加快。然而，当小布什上台时，美国虽然处于力量顶峰，但却没有处于格局中的顶峰。此前，美国的力量和格局中的双顶峰是在里根时代。克林顿之所以失去了格局中的

顶峰位置，是因为在它当政的八年中，美国并没有完成对美国处于全球主导时的位势以及如何保持主导者位置进行规划和实施。美国参与世界秩序的构建，要么只是对世界焦点性事务的应景，如出兵索马里，要么是在地区冲突爆发后，匆匆地组织一场战争，如波黑战争、空袭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由美国领衔，彰显美国的领导地位。克林顿时代结束后的美国，并没有完成内心的转变，美国如何成为新的领袖，一个不同于罗马、哈布斯堡、英国的领袖，这一课题并没有在美国人心中形成，虽然他们极喜欢，甚至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领袖。

布什上台时，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来挑战美国的地位，但是，美国也不是无所不能。因为战后的美国没有受到挑战的时间仅仅只有不到十年。冷战过程中，美国受到挑战是因为越南战争的泥潭导致的苏联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而冷战后，似乎在东欧的民族问题、中东问题、东亚“台独”引发的台海危机问题上，美国都处于一个世界上“非我莫属”才能解决的地位。美国的弱点却很少被人知道，美国自己难以找到，其他大国也难以找到，但却被恐怖主义分子找到了。“9·11”事件的爆发，说明了美国的弱点。当然仅仅从少数几架飞机撞坏了美国的几幢大楼便认为美国的弱点是国土安全的话，无疑是受到了表面现象的误导。自从全球化时代开始后，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出现，每个国家的国土安全都已经漏洞百出。人员、资本、信息、技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比以前更加自由地进行流动，给每个国家以新的机遇，当然也会带来威胁。“9·11”事件的爆发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9·11”事件之所以被部分美国人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24]，那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9·11”事件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也许从偷袭造成的伤亡和行动方式上看，二者确有相似之处。但将“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从战略层次上进行人为的等同，却是昧于时代的误导。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是美国介入乱世将其改造的开始，而“9·11”事件是美国冷战胜利正处于力量之巅时塑造新型格局的开始，况且这一历史阶段尚未结束，结局尚不能作出预判。

仅从这一意义上看，“9·11”事件远比珍珠港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加深远。后者产生的是一个战争的胜利者，而前者产生的是和平的主导者。后者

是确定的，而前者是不确定的。欧洲战乱将美国卷入，甚至从一定的意义上看，美国希望“被迫”卷入，而和平时期的变局是美国使“各国无论自愿或被迫，都卷入其中”^[25]。“9·11”事件使冷战真正成为历史。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阶段：该阶段的历史行为结束后，效应却如此之快地消失了。罗马衰落，欧洲大陆开始纷争，直到中世纪后的三十年战争才开始新的民族国家争霸；英法争霸结束，英法、英俄、英德海陆之争持续百年，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彻底完结。

无视无辜生命而采取极端措施的基本都是弱者。基地组织就是弱者，是一个令人无法同情甚至令人不齿的弱者。然而，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当时代发展到如此多样化程度时，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大国来塑造世界秩序时，必然会在各个地区和文明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公。显然，美国如果要想成为新的人类历史上的新领袖，就必须解决历史上所有霸权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既要追求对世界的控制，也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历史上的霸权将前一个问题解决得很出色，但霸权之所以最终寿终正寝，是因为无法解决后一个问题。

从历史延续的本质来看，美苏的冷战对抗只是英法、英德、英俄对抗的扩大和延伸而已，其决定对抗格局演化的根本因素仍然是地缘政治，因为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是政治、经济、军备竞赛，甚至是文化领域内的博弈。冷战使美国专注于传统的大国博弈，却忽略了影响世界战略格局的新成分不断涌现。这一思维习惯仍然延续到“9·11”事件爆发后。所以，布什时代的两场战争是美国用传统方式来解决新型问题的必然结果。尽管战争的武器是最新型的。

当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美国正处于被同情、被理解的国际舆论当中。这使得美国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并未受到指责，甚至还得到大量的国际支持。然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对于世界影响最大的不是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迫使基地组织分散逃至山中，而是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冷战后直接将军事力量进驻到了欧亚大陆腹地。这使美国真正形成了欧亚大陆全盘性的军事部署。此时的美国不仅达到了力量的新的顶峰，而且处于格局中的顶峰，美国利用阿富汗战争对中亚各

国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使邻近中亚的俄罗斯和中国感到了来自美国的新的压力。

在冷战结束后，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得两个欧亚大陆最大的国家解决了历史积怨，有利于欧亚大陆的态势稳定。然而，正当中俄开始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不断扩大影响力时，“9·11”事件爆发使美国进入中亚后，中亚的形势便立即开始复杂起来。美国需要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持赞同立场，至少不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布什上台后，便宣布单方面退出冷战时期美苏签订的 ABM 条约，为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排除了国际法理障碍，以形成新的军力优势。而中美关系也因为“台独”问题和南海撞机事件变得艰难曲折。所以，当美国进驻中亚时，既对中俄形成了新的压力，也使中、美、俄之间达成新的妥协。美国不能在“台独”问题上刺激中国，也不能在 ABM 问题、北约东扩问题上刺激俄罗斯，当然，中国和俄罗斯不能利用地利，尤其是俄罗斯不能利用传统的相近文化来影响中亚对美国的支持。

其实，对于美国而言，中、美、俄三个大国在中亚地区达成妥协是符合其现实利益的。首先，美国并没有在 ABM 条约、北约东扩等问题上出现根本立场的变化，也没有在台海问题上放弃维护现状的立场，对于中俄而言，美国在中亚的反恐战争，也可以减少在敏感问题上的压力而争取必须的稳定态势。

美国看似在反恐战争中稳住了中国和俄罗斯，但也加剧了中、俄对美国戒心。这等于使美国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要继续扩大反恐就必须取得中、俄的支持或者不反对，而在中亚的反恐战争如果拖延，那么在 ABM 问题、北约东扩问题上就会遇到俄罗斯的强力反制。美国必须“扩大战果”来扼制中俄，甚至控制欧亚大陆。也就是说，当美国进入中亚稳住了中俄之后，那么就必须继续强化对欧亚大陆的控制，否则美国进入中亚就不仅是陷入战争泥潭，而且还要受制于中俄，从而导致其他问题处于被动。因为中亚国家不可能站在美国一边而疏远中俄。

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战争爆发了，尚不清楚扼制中、俄在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但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的确标志着冷

战时代彻底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从近代开始直到冷战结束，甚至在冷战结束后至“9·11”事件爆发前，所有大国争夺东欧、中东或者中亚时，都会遇到其他大国的制衡。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却没有遇到其他大国的制衡。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仅仅在外交表态上提出反对，然而并没有实质性的制衡行为。美国的单边武力行动使得全世界认为美国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来改造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最终成为欧亚大陆的主导者。也许美国人自己也这么认为，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伊拉克战争使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超群，令人叹为观止的先进军事技术以及国内的战争动员能力、国民士气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萨达姆政权很快便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战略运筹却乏善可陈。因为美国并没有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强化对欧亚大陆的控制，反而使自己处于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战争泥潭，在其他诸多问题上都陷入被动，或者至少是失去了有利的条件。

美国唯一有利的条件就是没有任何国家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制衡。然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中东政策失去了最后的灵活性，中东政策灵活性的丧失，使美国再也不可能利用阿以矛盾在中东获得主导权，而只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来塑造中东格局，这无疑使那些传统亲美的中东国家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心态和立场。它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迥然不同，如果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中东格局，使中东国家都走上美国式或者与美国相似的政治制度，这里面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内部政治动荡将会使它们面临巨大的压力。然而，萨达姆政权在战争发动仅仅一个月便垮台了，这又使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如日中天。美国使中东亲美国国家没有选择的时候，美国就要承担中东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因为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和卡塔尔等亲美国国家如果因为民主化进程而出现动荡，那么美国在它们国家的驻军地位将很可能难以保证。

美国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推出了大中东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美国传统的理想化的意志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中东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这已经决定了美国不想中东乱局出现却在制造中东乱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来，美国几次失败都是因为自己理想化的意志。美国因为理想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塑造欧洲秩序失败而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丢失了中国大陆，又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每次当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时，也是美国最容易犯主观上的理想主义病的时候。大中东计划的弊病就是过于“美好”。美国希望所有中东国家都开始走向不同程度和不同速度的民主制度，美国希望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新伊拉克能够成为中东各国的样板，中东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以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为主要的经济发展体。但是美国仍然像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样，忽略了后果和代价而只注意到了美好的前瞻。

美国对推出大中东计划，时机的把握是恰到好处的。如果大中东计划推动后，各国出现问题和矛盾激化时，美国仍然处于如日中天的地位，那么美国的压力会小很多。然而，当各国出现问题和矛盾时，也是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和士气下跌时。当布什开始第二个任期后，同时进行的两场战争长期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美国国内的民众对战争的热情已经由初期的高度支持变得麻木和反感，更重要的是两场战争使中、俄两个大国进一步稳定了它们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而且俄罗斯还利用因为战争而飙升的油价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中国利用台海日益平衡的形势，集中精力谋求经济和科技发展，使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日渐增强。日本经济仍然出现停滞，对于东亚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欧洲因为北约东扩，虽然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多，但问题和麻烦也在增多。美国的盟友日益困难而对手却非常顺利。此时美国的强势地位开始动摇，虽然仍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超越它，但是两场战争的长期化并没有为美国带来期望中的战略收益。而美国又不能在新伊拉克没有成型、大中东计划刚刚开始启动时退出中东，那无疑是承认自己的失败，这导致越南战争的阴影重新出现。

美国越是在中东力推大中东计划和加快伊拉克重建，越是反映内心的焦急。而急切地推动大中东计划和伊拉克重建，又会导致诸多复杂问题不断积累和异化，虽然民主化进程得以推动，但那些亲美国家难以回避国内社会矛盾，反而制约了它们支持美国的力度，使美国在中东受到支持的根基出现松动。

当然，美国只是遇到了困难，而不是丧失对欧亚大陆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与格局的顶峰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叙利亚、伊朗和利比亚等与美国处于对立的国家不仅起到了明显的心理震慑作用，而且在地缘政治上完成了对它们的战略围堵。当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利比亚便宣布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叙利亚表示愿意就反对基地组织展开合作，伊朗宣布发展核能仅仅用于和平目的。而当伊拉克开始重建时，美国在伊朗东西两端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均驻有重兵，在叙利亚东端也驻有重兵，与以色列一起加强了对叙利亚和伊朗军事威慑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发动这两场战争，不仅巩固了传统的美英特殊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使美日同盟得以扩大其适用范围，美国拥有了一个在全球性角色中的另外一个助手——日本。

不能简单地判定在两场战争中，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是赢家还是输家，因为政治、经济、军事因素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中东是美国全球战略不可或缺的支点，在中东的影响力是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标志，这一认识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文化而不是选项。

伊拉克战争与其说是美国的战争，不如说是小布什的战争。这场战争深深地打上了小布什及其团队成员的个人风格烙印。小布什内阁团队肯定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战争内阁团队，他们不仅恰好处于特殊的时代，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学识丰富、思想深刻而独特，丰富的经历造成的独特个性使他们在美国政治家中“鹤立鸡群”，鲍威尔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黑人高级将领、身经百战的英雄，几乎参加了从越南战争以来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并起着关键作用；拉姆斯菲尔德两次执掌五角大楼，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设计师，立场强硬保守，而治军思想却异常开放和前沿，由于迥然不同的鲜明性格，所以经常鲜活地出现在世人面前；而相对于他们，还有一个低调和神秘的赖斯，她没有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那样的资历与派头，但她用深厚的学识和内敛的性格影响着小布什。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将萨达姆推翻，并推出大中东计划，美国的主要举措是围绕推动伊拉克民主体制的建立而重塑中东战略格局，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改造。

但是，有许多不同之处必须引起人们深思。首先，国际形势不同，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改造，处于美国和苏联爆发冷战之始，美国改造联邦德国和日本，不仅有经济上的考虑，而且还有直接明显的地缘政治意义，使联邦德国和日本成为抗苏“扩张”的桥头堡，苏联对联邦德国和日本基本上没有渗透的可能。也就是说，美国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改造无外来制衡，只需利用苏联的外部威胁，根据德、日民族特性因势利导即可。而这次改造伊拉克，是在美国已经赢得冷战后，无外部地缘政治力量制衡之下进行的。伊拉克也不存在外部威胁的情况，无论是国际媒体，还是伊拉克民众，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冷战期间，意识形态阵营分明、独立、互相攻击，而冷战后，经过一系列事件巨变，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已不再互相攻击，美国对伊拉克的改造不会遇到意识形态的压力。其次，德、日直面美国强大的冷战对手，而伊拉克仅有伊朗和叙利亚两个脆弱的眼中钉，其余皆亲近美国，美国改造伊拉克必将在叙利亚和伊朗产生不可估量的意识形态影响，两国国内稳定受到族群矛盾、社会矛盾的冲击成为必然。再次，从德、日和伊拉克国内处境看，联邦德国和日本败于世界大战，而且均为单一民族，民众一心向往重新崛起，而伊拉克不同，国内族群不一，萨达姆代表的少数逊尼派统治多数的什叶派，矛盾长期积累，在美国改造伊拉克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所爆发。

我们不能去猜测美国决策者心中怎样考虑，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改造伊拉克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对于美国的挑战已经不是保持强势的军事存在。保持军事存在反而为反美力量在阿拉伯世界扩大影响提供了口实，美国的挑战在于伊拉克国内矛盾是否快速弭平，这取决于伊拉克能否实现稳定，取决于伊朗和叙利亚的国内矛盾何时激化，激化到何种程度，才会在反美立场上软化，并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妥协。

伊拉克地处另外两个美国的手——叙利亚与伊朗之间，叙利亚地处海湾腹地，阿拉伯国家中央，其周边多为像沙特、也门这些均与美国联系较密切的国家，且经济实力不强，外交影响力有限，对于美国在中东军事战略部署威胁不大。而伊朗地处中亚边缘，是美国中东与中亚战略的一个屏障，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利益影响较叙利亚大，而且两国关系紧张，因此可以断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下一个焦点是伊朗，而不会是叙利亚。

但美伊是否有战事，则取决于六个方面因素：(1)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2)美国对以色列的控制能力；(3)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战争后期的战备程度；(4)伊拉克国内局势走向；(5)伊朗未来领导人的政治倾向；(6)朝鲜等其他敏感地区热点问题是否妥协。从这六点因素可以分析出美伊关系的走向，但美伊之间的底线暴露得越来越清晰，在它们口头对抗越激烈时，往往也是最容易妥协之时，美伊走向的基本面是缓和，而不是对抗，伊朗最终也将会在核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至此，美国完成了新一轮的对欧亚大陆的格局塑造，冷战中因为苏联的存在，美国不能染指欧亚大陆腹地，而冷战后初期，美国忙于塑造收编东欧之后的新欧洲。终于因为“9·11”事件而进入欧亚大陆腹地。所以，当美国开始使伊拉克重建步入正轨时，对伊朗的底线也越来越清晰。应当说，美国要想塑造在欧亚大陆腹地的霸权，那些早已存在的问题迟早需要解决，美国只是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使那些早已存在问题浮上台面而成为焦点。

美国从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于2011年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同年在利比亚战争中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当“主力”，再加上在已经持续了两年的叙利亚战争中基本上没有出手，甚至“只打雷不下雨”，2014年只是等到伊拉克境内极端组织形成气候时才勉强出手。从这些表象看来，美国似乎正在经历着越南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甚至可以得出美国已经衰落的结论。但如果任由这种肤浅的认知支配，可能会犯下巨大的战略错误。今天，当我们看到中亚和东欧的颜色革命、中东北非动荡、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伊拉克境内极端组织沉渣泛起等这些均发生于欧亚大陆腹地的一些事件时，应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判断美国是否衰落为时过早。当然，美国的地位正在发生改变。未来若干年后，历史会表明美国仍然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世界秩序。这些事件的爆发正是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世界秩序的结果。

冷战结束前，欧亚大陆的外围和边缘各个地区的格局，均为美国主导，只有大陆的腹地，美国尚未具备足够影响力和塑造力。“9·11”事件爆发，恰好为美国提供了向欧亚大陆腹地进发的机遇。十三年来，阿富汗战争使美国进入中亚，成为中亚和苏联地区内爆发颜色革命的主要外部原因；伊拉克

战争后，美国提出大中东计划，引发中东民主浪潮，促成中东北非诸多国家政权下台并产生政治动荡；奥巴马任期内，美军击毙拉登并重创基地组织，使中东恐怖力量残余变异为宗教激进组织。这些事件说明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缺乏整体连贯的大战略，而且在处理局部问题上存在重大失误，但不能说明美国正在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实质上也是美国从欧亚大陆东端塑造秩序的地缘政治之举，虽然最终退回到岛屿链上，但并没有削弱美国在欧洲、中东、日本等地区的影响力。当今的美国也许在经历了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失败后，退回到了欧亚大陆边缘。但美国的地位仍然取决于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而不是某个局部问题的得失进退。

当美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地位已经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时，美国对于美日同盟的改造更显美国全球战略已经成熟。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中东时，美国希望充满矛盾和争端的亚太地区的态势趋于稳定。然而，美国却使导致亚太不稳定的因素不断积累，而且是美国故意拖延问题的解决。亚太地区的矛盾和争端，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从南到北都充斥着大量的“火药桶”。

首先，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压制，其根本意图不是使两岸走向和平，而是利用中国同样需要时间谋求经济发展的契机尽量安抚中国，从而使“台独”的激进举措越来越少。“台独”在台湾内部的思想土壤却始于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上台，两岸不仅存在历史积怨和现实的统独之争，而且还开始出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甚至是民族感情层面的问题，“台独”由持分裂立场的政党行为扩散到民众心理层面。只要“台独”存在，中美博弈便存在，而中美博弈存在，不仅对于中国是压力，对美国的全球地位也同样是压力，这是中美双方的隐患，不仅伤害对方，而且还容易被他人利用。

其次，美国不断深化美日同盟，将日本由一个地区性助手变成全球性助手，使日本在没有与中国取得在历史问题上达成谅解的基础上走向了对立面。走向远洋的日本和日益崛起同样需要走向远洋的中国，开始在海洋、海岛争端中出现矛盾激化。而且美国一再开始表态，美日同盟适用于钓鱼岛，使美国只能借助超强的实力地位充当平衡手，而难以在长远上在中日之间谋求

利益的最大化。美国此举，表明美国已经失去了对东亚秩序中的核心因素——中日关系的主导能力。中日只能朝着更加紧张和冷淡的方向发展，一旦美国需要中日缓和时，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来使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代价和风险也会越来越大。而中日关系的紧张，使朝鲜和俄罗斯、韩国等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立场与举措不一，导致东亚地区更加复杂。其中，最大的连锁反应就是朝核问题成为影响未来东亚秩序的试金石。

如果将来美国的地位衰落，一定是从亚太地区开始，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塑造远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欧洲的塑造，甚至还不如冷战之后对欧亚大陆腹地（中亚和中东）的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欧洲的塑造是在西欧已经成为废墟，而各国对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护“嗷嗷待哺”之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当然能够得以实施。对欧亚大陆腹地（中亚、中东）的塑造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其他大国和力量制衡的情况下实施的，所以尽管举步维艰，还是“摆平”了敌对性国家，使伊拉克由敌对走向亲美，使伊朗处于更大的压力之下。而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它希望东亚走向和平，却从来没有着手消除导致紧张和冲突的因素，反而是不断使用平衡牵扯之术，掩盖矛盾和回避问题。更重要的是，东亚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真正的伙伴，也没有从内心持亲美立场的大国，要么是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有志难伸的大国，要么是暂时与美国对抗无益的大国，要么是时刻希望美国衰落的大国。美国在全球地位的未来取决于它如何解决东亚的问题。

第六章

成败难评的法国

守护历史与开辟时代

任何时代总会出现重塑历史的英雄。“二战”之后的法国，便出现了戴高乐。法国不能代表欧洲，但戴高乐的主张反映了欧洲历史中法国到底有多重要。每个大国都是与众不同的，法国追求美苏对抗中的独立与平等地位，有理想主义之困。但为法国奠基后的理想成为一以贯之的现实追求时，法国的地位开始凸显了。当戴高乐的后来者无一不追求独立、平等时，法国亦不断自我调整。当萨科奇担任总统后，法国的灵活前所未有的，这也确定了法国的基调。

法国位于欧亚大陆西端，北部是英吉利海峡，西北是比斯开湾，西南是比利牛斯山脉与西班牙接壤，南部是地中海，东南是阿尔卑斯山与意大利、瑞士相邻，东部是不高的阿登山脉、比利时平原与德国、卢森堡、比利时交界，首都巴黎位于东部边界不远处，大部分人口也居住于此。这个地缘政治现实决定了法国必须要从海陆两个方向来运作战略。东部不能有强国出现，而西部不能与海上强权对抗。历史上的法国之所以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主要原因是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民族陷入四分五裂，而每次法国功败垂成（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都是因为英国强大的海权。当德国强势统一并崛起后，法国便陷入安全和战略地位的两难境地。

然而，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秩序的重要影响者和塑造者。法国还是民族国家的开端之国，正是发端于法国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的形成，使国家由宗教氏族型的群体变成具有能够孕育特色文化的民族型国家。从国家转型和自身文化特色的塑造而言，法国是欧洲，甚至世界上的领风气之先的国家。法国自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并成为欧洲重要一员开始，始终努力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中心。然而法国也是悲壮的，法国只能在欧洲大陆陷入混乱时，才能依靠某个天才般的领袖来担当重任，领导法国走向欧洲权力之巅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开创了法国在欧洲历史上最为辉煌

的时期，当然也开创了席卷世界的海权与陆权争霸历史。以后的英俄、英德争霸都只是英法争霸模式的延续罢了。然而，也正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出现，使得法国在他们之后必须出现像他们一般雄才伟略之人，方能使法国重回欧洲大陆舞台中心。法国可以四处征伐，但难以主导欧洲局势，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拥有强大海权的英国总是倾全国之力反对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称霸独大国家或者联盟；二是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使法国边上出现了一个好战的巨人，法国必须压制比自己更具潜力，甚至更加强大的德国才可能重拾历史上的威望。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便向德国纳粹投降，这是法国民族耻辱的最低谷。法国由欧洲秩序的重要影响者变成了欧洲秩序的边缘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在战争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美国、苏联和英国和在战争中百折不挠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成员。而法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当然，法国仍然具有自己的优势。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并没有开始，但是美英与苏联之间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缘政治斗争的延续，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成为对抗苏联的重要助手和战略屏障。在欧洲，英国已经无力单独通过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来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果实。德国已经分裂，苏联可能利用具有数量优势的常规力量随时通过德国向法国进军，如果这一噩梦成真，那么无疑对美、英而言将会是一个灾难。美国虽然对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为不屑一顾，然而，美国不仅需要英国，还需要欧洲大陆上的法国与联邦德国成为对抗苏联的重要助手。从经济上看，法国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如果因为战争的破坏而陷入经济灾难，那么美国将不仅损失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而且还可能出现社会动乱，导致美国极为担心的意识形态左倾。

对于英国而言，法国是平衡欧洲大陆力量体系的重要助手，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法国几乎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英国一致。再加上丘吉尔个人的威望，英国对战后法国的支持与提携使法国仍然是西方大国俱乐部的成员。组建联合国时，法国不仅是美、英的重要助手和追随者，而且是抗衡苏联影响力的坚实杠杆。所以，法国虽然经历过投降的屈辱，但仍然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只是其影响力不再可能与美、英、苏相提并论。第二次世界大

战刚刚结束时的法国，只能成为一个追随者，而不是在欧洲大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参与者。

戴高乐时代：老英雄的民族梦

战后初期的欧洲，经济凋零、社会动荡，法国的急迫之务是发展经济和构建可靠的社会秩序。而当法国的经济开始复兴，英国已经失去了欧洲的领导地位，德国处于战败后的分裂之状，整个欧洲因为美苏冷战的战略挤压而俨然成为傀儡时，法国的雄心壮志开始重新燃起，开始追求更加独立的地位了。作为一名法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戴高乐重新执掌法国后，便开始了使法国成为欧洲中心的努力。法国意图主导欧洲并不能脱离总体的时代背景，即：“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使作为西方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和仲裁者的西欧黯然失色。”^[1]

法国要提高自己在西欧乃至欧洲的地位，首先要使欧洲摆脱美苏之间的冷战格局，但是这样的设想在当时难以实现，因为具有难以实现的设想，所以在许多时候，法国的努力并没有产生期望中的效果。首先，法国无法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法国的财政高度依赖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在安全上依赖北约。其次，法国无法对其他西欧国家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力。自身依赖美国，如何影响同样依赖美国的西欧其他国家呢？再次，如果法国提高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仍然需要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和认可，然而美英形成特殊关系的过程中，同样也追求自身在西欧的影响力，怎么可能帮助法国呢？它们只是希望法国成为控制欧洲的帮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领导法国走向独立的戴高乐担任法国的国家元首。戴高乐的个人性格中充满着法国传统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在他个人身上体现的就是民族英雄式的个人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身为职业军人，敢于向法国军队落后保守的作战思想挑战，推出了装甲战思想，如果法国能够及时运用戴高乐的思想，纳粹德军可能很难使法国在六周之内屈膝投降。法国投降后，戴高乐在法国境外组织了反纳粹德国运动，追求法国

的重新独立。戴高乐具有法国式的民族英雄所具有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充满着理想、敢于为理想献身，但是经常昧于现实；才华横溢但性格倔强，甚至恃才傲物；对法国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推崇至极，但在效仿他们时有时缺乏变通。显然，戴高乐并不是领导战后初期的法国进行和平建设的最佳领导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担任法国政府主席不到一年的戴高乐便被迫下野。因为领导国家进行和平时期的建设与全面战争时期的追求胜利不一样，尤其是在刚刚度过一场战争浩劫后进行建设时，需要心态上的主动转变，即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战争胜利的心态转变为团结各种力量和运用各种资源进行妥协和协调的心态。

戴高乐下野并没有丧失他的影响力，当然他本人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对法国的责任。在他下野并在法国政坛沉寂的十几年中，仍然在为复出做着充分的准备。从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系列举动中，已经反映了他个人的倾向。出于对未受到美国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回应，他刚刚上台便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和苏联结盟。二是发起反对德国复兴的运动。法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了国家重新独立，然而战争一结束便不与美国商量而在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自然令美国无法容忍。在他于1958年重新上台时，便把他的治国理念付诸实践了。“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2]这是支撑他作出所有战略决策的基点。其实，根据他这样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表述，便可知他当政时的法国，战略就是历史荣誉的回归与历史教训的反省，通过超越历史的方式来回归历史。

既然是回归历史，法国的目标就是追求对于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外的独立的实力地位。在戴高乐时期，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然而戴高乐凭着个人对法国历史的理解，使追求这个目标的努力对法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近代欧洲的外交语言使用的是法语，法国可以被认为是近代欧洲治乱的符号与晴雨表，法国追求和平则欧洲和平，法国追求战争则欧洲会陷入战争，尤其是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和军事天才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曾令所有欧洲大陆各国都低下过高傲的头颅。法国在欧洲甚至在全世界，不仅拥有广袤的殖民地，而且法国的文学、艺术和建筑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也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当时美国才建国不到两百年，而且是在法国的帮助下从英国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苏联脱胎于在西方人眼中野蛮落后的俄罗斯，而且意识形态与整个西方敌对；英国历来没有被视为欧洲人，而且在历史上总是法国的对手，当它面对俄罗斯和德国的挑战时，如果没有法国的支持，早就处于下风了。这些历史事实造就的心态，因为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投降经历，自然会刺激法国人寻找历史的荣誉感和恢复大国地位。

当然，单枪匹马的法国要想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成为另外一股力量，务必达成两个条件：首先，法国必须推动西欧的团结，并且成为西欧团结的原动力，使法国成为西欧的领导者，联合西欧以整体的力量来取得与美、苏、英平等的地位。其次，法国必须防止西欧总是受到苏联的威胁，从而在安全上必须依赖美国，要达成这个目的，法国至少必须保持独立的防卫能力，尤其是核力量的独立性。

这两个条件对于法国而言，都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首先，西欧各国不可能离开美国而跟随法国。20世纪60年代后，西欧各国基本都实现了战后经济恢复，甚至出现了经济腾飞的趋势，西欧正是需要扩大经贸的时候。显然西欧自身市场难以完全满足西欧各国的需要，它们仍然需要与英国、美国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尤其要与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其次，法国本身也不可能离开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为法国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美国 and 英国两大市场对于法国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再次，20世纪60年代初正处于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紧张时期，法国显然在面对冷战的紧张局面时，其影响力难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甚至就对美国和苏联的影响力而言，法国相对于英国都处于弱势。最后，法国的军事力量无法对西欧提供保护，西欧要求美国的保护，甚于要求法国的保护，而且从根本的实力地位看，法国同样也需要美国提供保护。

从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来看，法国远不可能成为能够领导西欧并使西欧成为第三极的支柱性力量。从西欧的总体情势出发，德国是战败国，而且处于冷战对抗的最前沿，其受到的束缚是西欧国家中最大的。英国从传统上就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难以将西欧整合为一个整体。法国在冷战对抗中，处于联邦德国之东，欧洲大陆之西，进退自如，而且是西欧最大的

国家，又是西欧大陆国家中唯一的常任理事国。从常理而言，法国应当是西欧整体中的支柱性力量。然而，法国经常与美国出现矛盾，又在欧共体中故意对英国申请加入制造障碍，致使美、英故意在欧共体中制造联邦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平衡，不仅牵制法国，而且牵制联邦德国。欧共体中其他国家在美、英、法之间均保持平衡。这使得法国经常处于尴尬位置。一方面，总是显示自身与美、英的不同立场，但最终都会因为危机爆发而与美、英妥协，接受美、英大部分主张；另一方面，在欧共体中，法国经济总量被联邦德国超过后，便难以保持对其他西欧国家更强的影响力，致使西欧国家利用法国追求独立地位的诉求，在美、英、法之间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每当法国与美、英立场不同时，苏联便看到分化美欧的良机，极力在欧洲不断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使法国反而更加难以脱离美、英的影响。

然而，法国对自身独立地位的追求却使法国赢得了相当高的国际声誉。戴高乐加速了战后已经启动的法德世仇和解进程，法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和解及西欧内部最后一点内斗的因素得以消除。这不仅有利于法国加强对西欧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而且使法国可以与联邦德国一起，提高在美、英、苏三个大国之间的地位。法德世仇的和解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从战后国际格局的现实看，冷战对抗中的两大阵营中，任何内部矛盾都要让位于阵营之间的矛盾。美苏矛盾导致的西欧与苏联的矛盾要求所有西欧国家之间摒弃前嫌，服从于冷战需要。冷战，尤其是核武器出现后的冷战，使所有大国都变得更加理性，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仍然没有过去。如果不及早解决历史积怨和矛盾，反而使自己陷入被动。而且，随着德国战败并处于分裂当中，法国已经拿回了普法战争中丢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而联邦德国也无法对这两个导致法德争端不断的地方进行争夺。更重要的是当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时，法国和联邦德国均感到有必要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互补、互利、互惠。即使没有戴高乐这样的追求法国独立地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法德世仇和解进程也会加快。

法德和解使双方都成为受益者。自从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便一直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成为德国的西线战场，深受其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更是屈辱向德国投降。在法国心中，无意间对德国

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法国需要压制德国，但是美、英、法三国都在联邦德国驻军，而且联邦德国已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法国是没有理由用传统的方式来压制联邦德国的。法国在欧洲大陆获得强势地位的基本条件就是德意志境内的四分五裂，当德国分成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后，法国面临的压力极大减少。法国需要以新的方式来压制联邦德国，既可以避免联邦德国重新威胁法国，又使联邦德国处于冷战对抗的前沿，在成为法国的屏障的同时也需要法国的支持。所以，法国通过与联邦德国和解世仇，使法国取得主动地位。

当然，法国对于法德和解的期望也获得了联邦德国的支持，使法国得以推动欧洲在冷战格局中的独立地位。所以，戴高乐说：“我们坚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间的密切合作将使欧洲成为建设世界的基础。”^[3]这意味着，法德和解使法国和德国应当互相帮助，寻求在美、英、苏面前更大的发言权和自主权。尤其是处于冷战最前沿的联邦德国，在两次柏林危机中感到的压力都是最直接的，法德和解意味着联邦德国的意见可以获得法国的支持，而不是必须事事忍气吞声的战败国。当然，最重要的是法德和解使西欧国家的大市场得以加速形成，“1 + 1 > 2”的市场效应立即在西欧区域内形成。西欧在经济上可以自成一体，减少对美国和英国市场的依赖。这是所有西欧国家希望出现的局面，可以和自己距离最近的市场进行融合，既避免了相当多的政治和经济障碍，而且还增加了自身的安全感。

法德和解是法国追求独立地位的跳板，但是法国相对于美国、苏联和英国的独立地位，并不可能脱离整个西欧。所以，法德和解的作用就是在联邦德国仍然受到冷战最前沿地位的束缚之时，法国可以拥有较多的自主权来推动西欧联合。如果西欧实现以法德为轴心的联合，那么法国无疑可以通过强化在西欧的影响力，获得对冷战格局更大的影响力。然而，法国的問題就是高估了法德和解产生的战略效应。只要法国把独立地位建立在西欧联合之上，那么法国就需要西欧其他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脱离美国和英国的影响。而正处于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面对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时，怎么可能摆脱美国的影响，甚至有时候，美国绕过英、法直接和联邦德国沟通。而且美国和英国更加重视联邦德国的立场与态度，因为它们不想被苏联认为联邦

德国被西方盟友轻视。这样的互动使法国对美、英的内心隔阂更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在当着戴高乐面阐述英国的立场时说：“您要知道，如果我们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一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您还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大海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大海。”^[4]这种直白的近乎带有侮辱性的表态使戴高乐终身都难以将英法关系作为完全的同盟伙伴关系。所以，当英国提出申请加入欧共体时，戴高乐几乎是本能地表示反对：“英国有朝一日将加入共同市场，但毫无疑问那时我将不在位了。”^[5]

因此，法国是欧共体成立后最为排斥英国的西欧国家。从直接意图来看，法国要追求独立地位而需要增强在西欧内部影响力时，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无疑会冲击法国在西欧的地位，因为它认为英国就是美国的“马前卒”兼“军师”，是美国干预欧洲独立的助手。而且，法国有意阻止英国顺利加入，可以向英国增加其他方面的压力，使英国在其他问题诸如法国军队与北约军事指挥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对法国让步。然而，法国排斥英国不可能成功。

首先，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美国需要英国加入欧共体来牵制西欧的独立倾向，而且基于美国强大的影响力，美国的支持便意味着许可，导致其他西欧国家难以完全和法国立场一致。其次，英国加入欧共体对所有成员国实现现实利益具有正面作用。英国加入欧共体可使欧共体拥有更大的市场、经济总量和更多的发展机遇，这对于法国也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一些西欧小国不希望法国在西欧内部过于强势。比如1962年4月法国推动西欧政治联盟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小国向戴高乐提出：“在英国没有加入共同市场以前，决不签订这个条约。”^[6]

法国最终采取了明智的选择，在英国加入欧共体问题上并没有丧失最终的正确立场。当时的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之间因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英国与西欧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市场走向一体化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法国僵化地坚持阻止英国加入欧共体，不仅违背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大潮流，而且对其他西欧国家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至少也会使其他西欧国家认为法国阻止英国加入会使西欧失去了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反而使法国的地

位受到削弱，丧失长远的影响力。法国如果阻止英国成功加入欧共体，那么便意味着欧共体将会仅限于西欧，只是一个地区性组织，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但如果吸收英国加入，就会使欧共体不断利用英国的影响，甚至利用美国的影响走向全球。

其实，法国在西方集团中拥有比英国更加优势的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形成美法特殊关系比形成美英特殊关系更加有价值。英国在西欧国家中不具备法国那样的心理认同。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而言，法国比英国在西欧国家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冷战格局中，美国需要西欧作为欧亚大陆东端的桥头堡，以遏制苏联，法国具有比英国更加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难以与联邦德国形成对抗苏联的战略纵深，而法国直接接壤联邦德国，可以既帮助美国制衡联邦德国，又可以作为联邦德国防御前沿的纵深支撑。然而，法国并没有与美国形成良好的美法关系。法国追求独立性的主张和举措，使美法双方都难以取得最佳的双边关系。对于美国而言，法国是同盟体系内不听话，甚至是拆台的伙伴；对于法国而言，美国则是具有法国不能接受的主宰欧洲的野心的国家。

戴高乐不像英国发展三环外交政策的领导人那样务实，英国可以灵活地接受实力下降时甘当美国配角的现实。而戴高乐出于对民族历史的极高推崇而产生的强烈的民族自尊，使其不甘心成为美国的“跟班”。这反映的不是戴高乐的个人性格，而是整个欧洲的历史延续。西欧接受美国的领导是一个新的历史开端，而当法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有核国家后，立即宣布保持核力量体系的独立性，并且退出北约军事指挥体系，只保留政治成员资格时，只能说明欧洲的历史延续并没有完全结束。既然欧洲的历史没有结束，那么也意味着西欧走向一体化的步伐不可能顺利，当然，法国要取得西欧盟主的意图也愈加难以实现。

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系统”^[7]，并且拥有独立的核力量并没有改变冷战对抗格局，因为法国的常规军力和核力量足以改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但是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指挥体系，拥有独立的核力量，反而使法国在西方集团内部提高了地位。正如戴高乐所言：“如果没有它，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

星国。”^[8]

法国不需要像英国、联邦德国那样，必须在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基础上来影响美国。这对法国实力地位的增强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如果法国对美、英言听计从，最终会对它们俯首贴耳。法国本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向德国投降，如果再在勉强获得战胜国地位后，又成为随声附和的跟随者，美国和英国可能更加不会重视法国的立场与意见。法国甚至会被降格至战败国联邦德国之下。

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僵化地固守意识形态而忘记了民族地位。戴高乐同样如此。法国要争取在西方的地位，就必须使其他国家看到，法国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可以做大家都难以做到的事情。法国不仅要增强在西方内部的实力地位，而且还要超越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抗的束缚，与苏联、中国，甚至其他国家改善或者发展新的关系，以扩大法国的全球影响力。

戴高乐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作为重要的战略举措，从赫鲁晓夫于1960年2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访问法国开始，法国就与苏联就德国问题展开讨论，而且与苏联签订了技术和文化交流协定。借助与苏联改善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全面开展了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法国此举不仅获得了影响力和经济实惠，而且对于世界局势的缓和具有探索性价值。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之间开始走向缓和。而当两个超级大国走向缓和时，其他国家才开始走向缓和，但它们无疑落后于法国。此时的美国虽然对法国心有不快，但也因为需要同苏联缓和，不得不接受法国“擅自行动”的事实。而且因为法国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使西欧在美国与苏联开始缓和后，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最典型的是联邦德国开始采取新东方政策，通过经济优势来谋求对苏联和东区的影响力。如果说，西欧在经济上走向一定的自主性是从欧共体开始的，那么在政治上走向自主性就是从法国推动法德世仇和解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开始的。

戴高乐在对待法国的历史遗产方面并不是僵化的，也会根据法国的实力地位和各方面的实际进行灵活调整，比如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问题上。戴高乐看到，如果不结束这场政治上处于被动、道义上陷入低谷的战争，那么战争最终的结果就是法国将不仅失去北非的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力，而且

谋求大国地位的努力也会前功尽弃。所以，法国主动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等法属殖民地的独立地位，并且通过这些“让步”与前殖民地国家发展了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甚至保留了法国在一些重要地方的军事力量。法国采取这些灵活的战略举措，是符合兴起的广大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的大潮流的，这使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得到改观，产生了难以用经济和政治标准来衡量的战略红利。

当然，法国也并没有成为西欧的盟主。正当戴高乐认为法国领导欧洲的责任“适合它的才能、符合它的利益，并且和它的力量是相称的”^[9]时候，他的根本错误不是高估了法国的国力与影响力，或者其战略目标和战略设计过于理想化，而是从来没有看到西欧已经成为全球化大潮中的一部分，西欧不可能独立存在，成为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制高点。西欧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法国领导西欧的真正着力点，在于它使西欧成为世界的哪个部分，而不是独立于世界大格局中的另外一个部分。戴高乐对于如何领导西欧的战略思维和眼光仍然局限于西欧一隅，甚至在追求独立性时仍然使用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传统制衡方式来实现。这说明了戴高乐的策略仍然是历史经验的延续，而不像同时期的肯尼迪、麦克米伦、施密特那样具备走在时代前沿的思维和眼光。然而，戴高乐在冷战格局中，有意与其他西方国家区别开来的做法，却给僵化的两极世界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决定世界事务时新的力量，戴高乐积极推动与苏联缓和，也使法国成为缓和的受益者，而且在其任期内与处于大国体系中孤立境地的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使世界由仅仅局限于美苏之间的大国意志，扩大为世界所有大国意志的体现。尽管这不是取决于他的个人作用，但他的诸多战略举措，使法国没有在战后的地位下降，反而上升了，仅此一点，便可以得出历史性结论，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高乐只是法国的民族英雄，那么戴高乐复出之后，成为了欧洲甚至世界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戴高乐的伟大之处是使欧洲可以正确地超越历史而走向正确的未来。因为他开启了“从既定事实出发，使欧洲国家相互接近，从经济、文化、技术，着手一块一块地打碎铁幕”^[10]的进程。戴高乐对于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和构建一体化的欧洲，使欧洲独立于美国和苏联之外的努力，成为冷

战时期法国的各任当政者进行决策的基础，而且是不可更改的基础。直到密特朗时期人，冷战结束前后，甚至是希拉克时期，法国一直遵循的是戴高乐制定的政策基调，中间或许有针对具体问题的微调，但是法国对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体系与框架从未超越过戴高乐时期。法国的地位不完全取决于实力，而是“坚持不懈地推动了一个多极世界”^[11]。

萨科奇时代：新时代的调和者

“法国不应该听凭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国的摆布。”^[12]这是戴高乐为法国定下的基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会脱离西方集团而走向中立，这种基调只是法国提高在西方集团地位，防止法国被美国主宰、被英国压制的方式。当冷战结束，戴高乐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希拉克担任总统后，法国由冷战时站在西欧的立场上争取美国之外的独立地位变成了站在欧洲的立场上争取美国之外的独立地位。因为欧洲一体化由西欧扩展到了东欧，法国要想继续坚持独立于美国的地位，便需要推动欧洲的独立。所以，在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中，法国仍然坚定地支持西方的整体行动，但不断地有意与美国保持距离。然而，当希拉克卸任时，法国与德国、俄罗斯共同反对但仍然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导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法国面临着一些新的形势。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各个大国的国际地位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美国比冷战刚刚结束时更加强势，不仅在欧亚大陆边缘建立起可靠同盟，而且因为在中东、中亚也深度渗透，处于力量顶峰；英国因为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积极与美国共同出兵作战，特殊关系得以巩固，英国可以获得美国的鼎力相助；德国自从统一后，经济总量、人口数量的优势，以及身处中欧，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中影响最大的国家；俄罗斯随着普京上台担任总统，又因为石油价格上涨，在政治趋于稳定后，经济开始恢复，并与中国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加上雄厚的军力基础，逐步在恢复往日的雄风；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迅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

此时的法国显得有些相对弱势，甚至因为和德国、俄罗斯等反对伊拉克战争，在决定北约东扩、欧盟东扩等重大事务中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此时的法国急需调整自己的角色与位势，确保戴高乐奠定的欧洲主导性大国地位。萨科奇时代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萨科奇时代的出现，本身就在法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在希拉克卸任后，那些在戴高乐时代成长起来、深受戴高乐主义影响，甚至不知不觉地模仿戴高乐个人性格和行事作风的政治家（德斯坦、若斯潘、朱佩、巴拉迪尔等）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萨科奇成长于新的时代，自然既反映了法国的变化，也会推动法国的变化。

萨科奇 28 岁便成为经济发达且名流云集的纳伊市市长，并受到希拉克青睐和提携，成为法国的政治新星；他 34 岁时又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次年，又当选为信奉戴高乐主义的政党的第三号人物，党内地位仅次于主席希拉克和总书记朱佩。一帆风顺者总是比那些历史坎坷者更加容易摆脱自身历史经历的影响。从自身政治经历看，他受到了政坛领路人希拉克的提携，后来又“背叛”希拉克支持希拉克政敌，尔后又与希拉克尽弃“前嫌”，导致萨科奇从信奉戴高乐主义的左翼政党起家，但却对戴高乐主义进行了力度最大的改造。

萨科奇成为新一届总统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严峻的，法国的相对地位在下降，而不是上升。不仅因为伊拉克战争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法国在主导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弱化，而且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成堆，法国处于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法国最大的危险就是被日益向外扩展的北约边缘化，从而降低在欧洲的地位。

在北约国家中，美国的主导地位随着北约东扩而越来越巩固，那些新加入北约的所谓新欧洲国家，不断与所谓的老欧洲国家采取不同立场而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基于此，如果法国想要保持在欧洲的地位，就必须提升对北约的影响力，而提升对北约的影响力，就务必在政治上仍然是北约成员，重新加入北约的军事体系。而对于法国加入北约这件事能否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美国。

所以，萨科奇首要的战略举措便是修复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冷淡的美法关

系。当然，美国虽然对法国在冷战时总是“闹独立”不满，但仍然需要获得法国各方面的支持。所以，当萨科奇上台后，在法国修复美法关系的意图非常明显时，美国当然予以积极回应。2007年担任总统后，萨科奇不仅决定上任后的第一次假期在美国度过，而且在度假后不久就接受美国的邀请正式访问美国，并受到美国高规格的接待，甚至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次年，法国便决定向阿富汗增派600名士兵，并一改希拉克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立场，对该计划表示谨慎支持。

萨科奇修复美法关系的意图就在于加入北约。因为北约不断突破欧洲的防御范围，而在展开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时，如果法国仍然徘徊在北约军事体系之外，那么法国便有沦为看客的危险。而且，法国虽然是北约的政治成员，但不是军事体系成员，尽管参加了北约主导的军事行动，但是因为实力地位的原因，而无法对北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力。更加不合理的是，法国每年要向北约提供的资金分别高达北约非军事预算总额的15.3%和军事预算总额的13.8%，法国出了钱但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回报。当然，从海湾战争开始，美国军队一直保持强大的优势，而法国军队与美国军队的差距越来越大，法国急需获得提升军力的新的机遇；并且法国可以利用对北约的影响力推进法国主导的欧洲防务，否则当欧洲防务与北约防务产生对抗的可能性时，不仅不利于欧洲防务，而且还会损害法国的影响力。

2009年3月17日，法国国民议会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辩论后，最后以329票支持、23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体系的决定，这意味着法国在戴高乐时代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并不是与戴高乐时代的断裂，而是新的延续，并且是在戴高乐时代的基础上更加有利于法国提升国际地位。此前法国不是北约军事成员，所以当法国主导欧洲防务时，使其他欧洲国家担心法国控制其防务和美国担心欧洲防务削弱北约的影响力。法国加入北约后，法国推动的欧洲防务与北约防务开始融合，欧洲一体化防务的进程开始加快。法国加入北约军事体系，使法国对北约的问题拥有否决权，这在美国不断强化主导地位时，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况且法国还面临着恐怖主义等一些自身难以独立解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法国加入北约等于使法国拥有了打开了诸多难题大门的钥匙。

枢纽一活，全盘皆活。法国加入北约的战略红利立即获得证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开始了英法两个国家的防务合作。英法防务合作是“二战”结束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国合作。自从冷战开始后，英法虽然同为西方集团，但地位截然不同。英国具有美英特殊关系这一财富，而法国出于自身地位需要，经常与美国保持距离甚至有意制造距离。法国对英国的影响始终不大，尤其是戴高乐退出北约军事体系后，西方集团的内部事务出现问题时，法国对英国几乎是本能地反对。这一状况持续到伊拉克战争后。然而，从法国加入北约开始，英法实现了防务合作，英法军队共用航母起降战机、军舰可以为对方护航、英国核弹头送到法国进行维修保养、组建联合特遣部队等这些举措，已经超越了北约的合作程度。这使法国可以利用法德关系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又能以法英防务合作来提升对美国的影响力。同样，英国也可以通过英法防务合作，在提升自己对法国的影响力时，也使美国看到英国的独立性，英国可以追求更好的平衡。英法防务合作使双方都具有更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2011 年中东、北非出现政治动荡，这对于西方又是一个机遇。中东、北非历来关系到西方的核心利益。1991 年的海湾战争，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用“石油，石油，还是石油”，作为对美国出兵海湾意图的公开回答，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首当其冲的目标，是要保卫自己的地缘战略地位及相关利益，虽然北非对美国不如中东那样敏感，但美国仍然将与中东紧密相连的北非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区域。

中东、北非也关系到欧洲国家的切身利益。欧洲特别是西欧高度依赖中东、北非的石油。法国每年消耗石油的 92%，德国的 98% 要靠进口，而中东、北非石油占到其进口总量的 80% 以上。而且，中东、北非是欧洲的邻近地区。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意大利与中东、北非国家联系紧密，均有数百亿美元的投资。特别是法国，与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均有大宗武器买卖合同。此外，欧洲，尤其是法国有约几百万的中东和北非移民。如果中东和北非动荡不止，将会直接影响欧洲的稳定。

卡扎菲这个西方宿敌如果平叛成功，不仅会巩固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且更加可能在北非这个战略地缘板块中加强战略地位，甚至直接威胁美国

和西欧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和实际战略利益。所以，西方在中东、北非的共同利益决定了当中东、北非动荡时，必须联合干涉。

而利比亚爆发内战对于法国无疑是一个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良机。因此，几乎是没有经过严肃的商量，只是表面化地走了北约的程序，法国便充当了北约打击利比亚的主导者，其主要战略意图是彰显法国在欧洲的领袖大国地位。而且地中海有巨大的战略利益，法国一直以来都在力求组建地中海联盟，利比亚的地理位置承东继西，处于苏伊士运河与直布罗陀海峡的黄金分割处，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处于西方地中海航道的腹部位置，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欧洲国家一直把非洲作为自己的后院，而利比亚位于非洲北部，距离法国本土千余公里，是距离利比亚最近的大国，利比亚局势的走向会对法国在欧洲国家中的地位和地中海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如果不能对利比亚内战进行积极的干预，那么很可能使组建地中海战略联盟的设想落实。法国是主张干涉到底的积极鼓吹者。

美国由于在利比亚的战略利益不如法国那样敏感，但出于维护北约同盟关系和历史积怨（洛克比空难、卡扎菲长期执行反西方政策、支持恐怖主义）的考虑，也参加了西方联军，但是美国认为军事打击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并没有派出有限数量战机参与精确打击，在北约接手后，只负责进行空中加油等后勤保障任务。

如果没有以北约的名义出兵，法国能否“单干”不好判定。但是从法国角度看，法国主导北约发动利比亚战争，说明了法国在北约内部的地位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长期化后的战略调整。这两种状态之间既有一致之处，也有深层次的矛盾之处。

两种状态的一致之处在于法国主导的利比亚战争，与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的两场战争和推动大中东计划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西方在冷战后，塑造全球格局的步骤的深化，而且越来越注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博弈，以意识形态为主轴，推动全球向西方的民主制度趋同。

“9·11”事件以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利用这两场战争加紧了对欧亚大陆腹地的控制。其重大的成果就是：在中亚爆发了颜色革命，在中东推行了民主化改造战略。这两个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又影

响到了东欧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一度激进地试图加入北约，导致的俄乌天然气矛盾和俄格军事冲突可以作为明证），应该看到美国在推行“民主制度”方面并不是如当时的布什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而是遇到了很多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文化差异、历史传统以及地缘战略对手，但还是取得了较大进展。在经济上，通过能源合作与开发开始在中亚建立一体化的自由市场，通过参与中东石油开发开采加强了国际原油市场的一体化；在政治上，使部分具有长期保守传统的中亚、中东、东欧国家加快了民主化进程，并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推进这些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所以，当中东、北非等伊斯兰国家内部由于社会矛盾激化而出现民主化运动浪潮后，它们认为获得自身利益的战略机遇到来的心理便正常合理。因此，法国主导利比亚战争是整体西方国家推动全球性“民主化”运动的必然。也就是说，法国在美国处于疲劳状态下，暂时挑起了西方领导全球的“重任”。其实，如果法国不挑起这个重任，西方便没有国家能挑起主导利比亚战争的“重任”了。经过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整体经济低迷，财政上很难宽松地出资打仗，并且西方的政治氛围也不利于发动新的战争。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结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口号成为其赢得选举的重要原因，他不可能在没有完全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前，再承担战争长期化的风险；英国的立场紧跟美国，当美国没有走在前台，而且还没有涉及自己的利益时，英国几乎就是个旁观者；德国因为历史原因，不可能在北约内部成为发动战争的主导者。北非历来就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国内大部分外来移民来自北非地区，法国在北非建有军事基地，并且是北非最大的投资国，法国不可能希望在利比亚这个重要的北非国家爆发战争时，其他西方国家借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提升影响力。因此，法国必须成为北约发动利比亚战争的主导者。

如果仅仅从北约的政治现实看，法国成为利比亚战争的主导者是保证西方的影响力和法国地位的举措。然而，利比亚战争的爆发在欧美之间形成了新的微妙关系，只是在当时难以察觉，甚至今天也难以察觉，但一定会在将来显露出来。

欧盟在2011年已经扩大至25个成员，人口已经达到5亿，超过了美国，

其 GDP 和国土面积也超过了美国。不言而喻，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加深，使得欧洲由美国的盟友变成了潜在的全球竞争者。而如果美欧成为竞争对手的话，那么中东和北非这些对于美欧均有重要意义的地缘政治板块，便是美欧争夺的枢纽。

如果将中东与北非进行连接，那么它们的地缘政治价值将超过中东或者北非单个板块的价值。它们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界，扼守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和黑海等要冲之地；同时又因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成为“世界石油心脏地带”。因此，获得中东、北非的主导地位是任何一个全球性力量获得地位的基石。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实施“大中东计划”的民主化改造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与欧洲确保中东、北非地区的战略地位的需要存在深层次的冲突。所以，法国基于要在欧洲充当领袖的战略考虑，对利比亚率先进行军事打击就在一定程度上有与美国争夺中东、北非地区影响力的战略考虑。而且，邻近的中东、北非地区是欧洲赖以发挥其全球性影响力的战略要地，而在美国拿下伊拉克、构筑大中东新秩序、全面主导中东后，如果不能在北非取得主导权，那么欧洲崛起和成为全球性重要战略力量的前景和未来将会蒙上阴影。

但是，从利比亚战争本身看，萨科奇上台后，调整了法国对美国的立场，亲美倾向明显，为弥合美欧矛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利比亚战争又为美欧关系的弥合提供了契机，在战争开始空袭数日后，就由北约接手指挥权。使美国既能够走到幕后，避免“走在前台”的副作用，又让萨科奇在外交上由于“果断出手”而得分。因此，利比亚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北约同盟关系，也修复了因为伊拉克战争而遇冷的美法关系。伊拉克战争中，法、德、俄等大国反对，赞成并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只有英国、日本、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而利比亚战争中，大国的基本立场比起伊拉克战争时期更趋一致，虽然在北约内部德国和土耳其强烈反对空袭，但德国仍然准许美军依托其设在斯图加特的非洲司令部对空袭初期的西方国家军队进行整体指挥协调，而土耳其在提出反对立场后的数小时内就改变立场，赞成空袭利比亚。一方面，就利比亚来说，卡扎菲政权长期执行反西方政策和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确实是造成其政府在国际上处于外交孤立的境地的根本原

因；但从另一方面，即大国关系来说，其基本的利益需求却是趋于一致的，尤其是奥巴马上台以来，美欧关系重新修复、美俄在稳定战略平衡上有所表现、俄与北约的关系正在逐步恢复、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趋于稳定。虽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引发局部动荡、国际恐怖活动不断、网络安全危及世界发展、经济安全问题（油能源安全问题凸显、油价上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国际性金融危机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日趋严峻，但是大国关系体系的框架正在重新稳定却是不争的事实。大国关系的稳定是造成地区安全事务基本立场一致的根本原因。重大的国际事务处理需要遵守潜在的“大国协调”原则。显然，法国主导利比亚战争不仅迎合了大国间共同利益增多的潮流，更有利于法国地位的提高。

虽然法国在萨科奇时代，在中法关系和法俄关系方面受到诸多诟病，但是萨科奇时代的法国相比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处于一个更加灵活和主动的位势。这两个时代都是法国为了维护大国地位而展现的不同侧面，当然法国仍然只是形势的适应者，而不是主导者。它对自身位势的调整更多的还是形势所迫，只是法国的地位永远不能被低估。

萨科奇时代是对戴高乐主义进行重大修正的时代，而不是颠覆的时代。在戴高乐时代，虽然根本立场上与美、英一致，但又积极和苏联、东欧、中国发展关系，这样的举措在冷战期间的缓和时期是法国追求独立大国地位的体现，也是法国追求独立大国地位的保证。然而，只要是危机年代，法国仍然会受制于与西方一致的根本立场，而陷入两难。一方面，美、英均不同意法国的主张；另一方面，苏联只是利用法国追求独立大国地位而对西方进行分化瓦解，并不会受法国态度的影响。戴高乐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国走向了僵化，特别是危机爆发时。到萨科奇时代后，萨科奇的根本意图不是将重点置于使法国达到与美、英一致的地位，而是通过强化与美、英的协调与合作，加强对美、英的影响，最终服务于法国追求欧洲领袖地位的根本战略目标。如果法国既可以依靠法德主轴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可以不断加强美、英的协调与合作，那么法国在西方的地位早晚会令英国感到将会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法国比英国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来发展美法关系，法国对欧洲的影响大于英国，如果美国只是利用英国来协调与欧洲的关系，显然不

如利用英、法来共同协调与欧洲的关系更有效。法国与德国已经共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主轴，德国不可能在不配合法国协调的情况下，独立发展与美国、英国的关系，法国对德国的影响已经成为法国保证大国地位的基石。未来的法国地位如何，不是取决于法国与美、英的协调与合作，而是取决于法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与美英强化协调与合作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而使欧洲走向全球。

然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说明欧洲仍然处于美俄两大力量之间，法德为主轴的欧洲既不能脱离美国制定的框架，也难以消除俄罗斯影响，只能起居中调停之责。欧洲此时的作用有些像冷战时危机爆发频繁时期的英国，既要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又要与其不同，还要在美苏之间进行协调和缓冲。欧洲要走向全球，务必先完成矛盾争端的协调与缓冲，而这又取决于法国如何作为。也就是说，欧洲走向全球之时，便是法国真正实现历史超越之时。

第七章

把历史当镜子

对中国的启示

借鉴别人的历史，首先要找到历史中的共性。任何大国的角色转变都是建立在地缘政治的既定天然条件和民族文化遗产现实的基础上的。中国海陆二元的先天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要走陆海一体，而不是陆海分割的地缘战略。海权战胜陆权的历史证明了陆权的发展方向，欧亚大陆秩序的一体化将会使海权走向衰落。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每个时期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是有益的。所以，中国的地缘政治天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超越历史，实现角色的转变。

中国几千年来作为东亚的中心其实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要求周边藩属国向中国称臣。二是抵御来自北方彪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与掠夺。从明、清两朝开始，中国面临海陆二元的地缘政治格局，尤其是晚清时期的中国成为海陆大国争相撕咬的对象。中国其实习惯了那种军事弱者和文化强者的心态，以及抵御武力进攻和经济掠夺的抗争者的心态。如今中国不仅要有军事强者、文化强者的心态，而且还要从抗争者变成主导者和帮助别人消弭矛盾的平衡者。这一转变诉求，必须要拥有超越自身的战略思维。

超越自身有三个阶段：一是自我主动反省；二是以他人为师的模仿；三是进行前瞻性的创新。

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很难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完成这三件事情，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对三件事情的规划都难以做到完整。近代中国之所以久经衰败与耻辱就是因为对这三件事情缺乏完整的规划。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痛定思痛的反省，以西方为师模仿西方的技术与企业组织；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和《辛丑条约》的耻辱后，又模仿西方的制度和政治思想；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而遭辱后，又主张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科学”的文化。中国始终在世界激荡的风云中亦步亦趋，从内看，不经历败辱则不知反省，从外看，反省过程又因为外敌而中断，以

致既不知自我反省也不知以谁为师，更谈不上如何完成对自身历史的超越与创新，所以，导致政治动荡此起彼伏，国家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生存颠覆之患基本消除，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走上政党建设的轨道。时至今日，在向新的民族的新的历史高度攀登之际，必须自问如下：我们对自己有无主动反省；有无向他人学习，又应当怎样超越自我。

从新中国建立直到冷战结束，作为夹在美苏两大超级强权当中的弱者，自然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利用一方来反对另外一方，甚至在受到威胁时出现战略摇摆。而当冷战结束，中国实力飞速发展之时，中国再无战略摇摆的内外条件，如何利用海陆二元的地缘环境兼收并蓄、趋利避害，保持民族特性与自我超越，将是巨大的考验。尤其是当今时代，中国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门槛，中国必须接受时代的考验。

如何向强者学习转型

回顾中华民族在近两百年来诸多外部威胁导致的生存危机，以及在面对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如果只是停留在对落后的封建制度的责怪，以及对弱肉强食的世界的鄙视上，那么这根本不能算是民族反思。纵观中华民族重生和新生的两大历史阶段，我们会发现，无论什么样的国际社会，我们都难以避免被其他国家卷入矛盾之中。当我们周旋于国际社会的矛盾时，总是被动地适应别人赋予我们的角色，这个过程不知挫伤了多少民族自信、损害了多少民族天赋、浪费了多少民族心血。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大历史阶段中最大的教训。

而在今天中华民族的第三阶段即将开启时，必须做准确而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已经处于由附和者、跟随者和适应者向参与者、塑造者转变的历史关口。

历史证明，主动塑造自己的角色者往往不是最强者，也不是天生最幸运者。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是经过被别人赋予角色这一历史阶段而主

动塑造角色的。

两百年来，中华民族由落后者走向领先者，由应变中被动的适应者走向求变中主动的塑造者。之所以出现如此复杂的情况，原因有两个：一是世界秩序始终处于周期越来越短的重构当中。欧亚大陆及其周边海域从未有过真正稳定的秩序，而欧亚大陆内部却连接得越来越紧密。在西欧从海上向全球扩张，欧亚大陆出现俄罗斯向东部扩张时，东欧体系崩溃，欧洲战争频繁，欧亚大陆腹地的民族矛盾如同火山喷发。直到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势其威超越任何一个民族。在“9·11”事件后，世界格局重构，导致乱象丛生，欧洲尚且稳定统一，然而欧亚大陆腹地和东端却尚未定讫。当世界越来越小时，一处乱则全球乱，一处不稳则全球不稳，以欧洲模式推动世界变革，导致两次世界大战，而以美国为主导也是难免混乱，世界必然在未来进入另外一种以推力为主导的变化当中。这种推力，既不同于欧洲的殖民之需，因为过于残酷而缺乏认同；也不同于美国的商业之需，因为过于重视短期实利而忽略长远。这种推力到底是什么，当前来看尚不明晰。

如何在角色转变中塑造自己是中华民族的首要课题。角色转变充满着各种风险，法国、德国、俄罗斯这些强盛国家纷纷在角色转变中迷失，酿成大错，并非它们自身不够强大，而是它们似乎不擅长角色转变。

法国在黎塞留时代成功地转变角色，由一个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阴影下的二流国家变成欧洲秩序的有力构建者，之后便很少有成功的国家角色的转变，无论怎样努力，总难以逃脱欧洲和平和均势的破坏者角色。先是路易十四四处征伐，使法国成为欧洲众矢之的；再是拿破仑独力支撑法国大革命后的孤立危局，最终战败；经过休养生息，刚在克里米亚战争有点起色，但不久又败于雄才伟略的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最终沦为二流国家。此后，法国只能跟随英国，虽然“一战”惨胜，但国力和自信已经在强大的德国面前耗损殆尽，致使“二战”初期便耻辱投降。“二战”后，在戴高乐时代又期望成为独立后欧洲的中心，但在美国成为西方盟主的情况下，影响力总是有限，在一系列问题上造成被动。

德国统一后，由欧洲强国中最弱势地位突然成为欧洲政治中心，心态突变而丧失了应有的理性。在俾斯麦去职后，开始四面树敌。先是威廉二世好

大喜功，同时对英、法、俄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与英国展开海军竞赛、与俄罗斯交恶于东欧、激化法德世仇，最终败于“一战”；后是希特勒野蛮扩张，同时与美、苏、英大国为敌，最终在“二战”结束后陷于冷战之中的分裂状态。

俄罗斯亦是如此，从欧洲边缘崛起后，不断向四周扩张，在“一战”后变成了苏联，经过“二战”胜利，又由欧洲边缘大国变成地跨欧亚的大国，最终变成欧亚大陆之强大的权力中心、世界一极的身份。但苏联在战略上完全继承了俄罗斯的衣钵，无任何变更，最终于冷战中陷入中、美、日、欧的包围之中，在内外交困中陷入灾难。

这三个海陆大国角色转变不成功原因是，作为陆海大国，地缘政治复杂性决定了它们比美、英、日等纯海洋国家更难超越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历史经验，而且，不同的国际位势导致了地缘政治的优劣转变。

历史上，大国崛起式的转型有两种模式：一是欧洲模式，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崛起时，都是通过发动充满危险的战争走向崛起的；二是美国模式，美国利用欧洲列强的矛盾，甚至故意激化欧洲列强的矛盾，最终凭借两次世界大战“坐山观虎斗”而成就今天的地位。

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因为在不同于前人的时代里行前人之路，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既不可能成功，还可能重蹈前人之危局。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个由初生的弱者到世界最强者的转变。中华民族没有像美国那样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但是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历史的确值得中国深思。

美国的地缘政治条件使它可以远离整个欧洲的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大西洋作为一个巨大的鸿沟和障碍，在美国刚刚建国之初面临的主要风险只有统治大西洋的英国海军。美国的弱势也反映在它的海权上。因为在立国之初没有强大的海权，而这个国家又需要外贸，它的海外贸易完全暴露于欧洲列强的海军之下，尤其是英国海军，缺少海军的美国在海外贸易上处处受到制约。然而，幸运的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为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不可能把全部精力用于扼制正在崛起的美国身上。

所以，美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教育等。当然，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不能得罪英国，不能使英国感到任何敌意。除了不让英国感到有敌意之外，对其他欧洲列强也尽可能地忍让。所以，美国毫不犹豫地持中立立场。如果美国介入欧洲大陆的纷争，不仅减少了美国的贸易，而且会造成要么与英国为敌，要么与欧洲大陆上其他强国为敌的局面，而美国无论与谁为敌，都将成为英国的附庸。因此，美国必须游离于欧洲列强的纷争之外，而不是介入其中。但是美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地处于超脱地位。实际上，处于中立立场的美国同样是危险的。

有时候，示弱可以制造好运。美国采取的孤立主义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然而，因为美国国力弱小，必然受到其他国家的轻蔑。出于市场扩张的需要，所有列强不仅带着轻蔑的态度和美国打交道，而且试图将美国拉入自己的控制之下，让美国成为它的附庸。更加令美国感到揪心的是曾经的盟友法国的态度。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与美国结成共同对抗英国的同盟，对美国独立具有关键作用。但法国的根本目标是为英国制造大西洋上的对手，分散英国给法国的压力。然而，当美国在独立战争结束后，法国仍然希望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来对抗英国。欧洲列强无情残酷的现实主义态度深深地刺激了美国，这也成为美欧之间产生巨大的心理鸿沟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时的美国不可能奢望得到任何外部的援助，而且应当小心翼翼地处理与英国甚至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关系。虽然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不断，但在对欧洲采取孤立主义立场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但是出于对危害的认识不同，也导致了在执行孤立主义政策时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对于欧洲来说，美国是独立的，它的地缘位置决定了美国可以执行孤立主义政策，统一的孤立主义不仅得益于前几位开国总统的威信，而且得益于欧洲出现的各种离奇的纷争，更为重要的是，孤立主义其实是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的一种方式。虽然那个时候的美国并没有想到在欧洲取得主导权。然而，美国不可避免地要与欧洲发展贸易。孤立并不代表僵化的“孤立”。后来的一系列历史证明，孤立主义更多的是美国以实用和灵活的态度来处理欧洲的事务。对于它来说，中立就是贸易的最大化，多边贸易的最大化。

当然，孤立并不代表安全。比如 1812 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由于英军

的入侵和美国的弱小，美国的白宫都被英国人烧了，而且签订了美国独立以后第一份屈辱性条约——《杰伊条约》。然而，这一条约虽然牺牲了美国的尊严，但是却为美国不断地积累国力赢得了时间。

孤立主义为美国赢得了时间，我们不能说孤立主义的成功完全来源于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还有美国人的智慧和它自身弱小的无奈。当然美国并没有白白浪费这种地缘政治优势。在美洲大陆上，并不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可以具有这样的地缘政治优势。加拿大、阿根廷、墨西哥、巴西都是美洲大陆上的强国，可是它们并没有成为世界大国，反而成为美国手下的被保护国。美国的幸运不是因为处于北美大陆，而是因为北美大陆国家弱小，如果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也像欧洲列强那样，美国便不可能利用地缘政治优势，使自身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充分进行和平时期的制度、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构建。

美国在建国之初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它会成为世界霸权，直到它越来越强大以后，自然而然地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大陆的利益扩张。起初，美国并没有霸权心态，而只是一个中立的、为维护本国利益希望周边国家稳定的国家。在美洲大陆上，只有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与欧洲文化相近，而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与欧洲的文化制度完全不同。但是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与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的美国息息相关，所以美国人提出不论是北美还是南美，美洲大陆应该有一个和欧洲大陆不同的制度和利益诉求。

此时的美国在完成大陆扩张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国力，而且日益需要拉丁美洲这个广阔的市场，而美国对它的开发与利用又取决于美国在美洲大陆的地位，这就产生了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如果欧洲继续在美洲大陆扩大殖民，占领美洲大陆的市场和掠夺美洲大陆的原材料，无疑是对美国利益的一种侵犯。因为，此时美国国内的经济的发展急需向海外市场拓展，邻近的美洲各国自然成为开拓海外市场的首选。

经济诉求必然会得到政治支撑。门罗主义使美国得以排斥欧洲对美洲大陆的侵犯和介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塑造了美洲大陆的秩序。比如，它在处理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的领土纠纷时，明显采取了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这

有利于增强它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塑造它在美洲的公正形象。

所有国家向外拓展时都是从近邻开始。近邻不稳，则无法走得更远。门罗主义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近交方能远攻，作为一个新生的、刚刚走向崛起的国家来说，稳定周边关系到它能够走向更强或是前功尽弃。如果西半球的局势不稳，那么美国就会变为第二个英国，大部分的霸权时间里都忙于欧洲而无暇他顾。美洲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竞争在美洲大陆上的地位，不像在欧洲的英国面临的都是非常强大的对手，在每个时期都有对它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对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来说，不幸的并不是美国越来越强大，而是美洲越来越稳定。这样无论美国是否强大，也会出现一个更强大的美洲，久而久之就会从欧洲的影响力中逐渐摆脱出来。

因为门罗主义的推广，美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美国在美洲排斥欧洲，利用了它的地域优势，也利用了欧洲人作为殖民者惯有的毛病——各自为战、矛盾丛生、目光短浅。

门罗主义对于美国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不仅是美国主导了美洲大陆，而是美国可以在亚洲超越门罗主义，实行门户开放。在亚洲，美国没有地域优势，而且作为后来者，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强大起来的美国又需要亚洲这个大市场。所以，美国提出了一个“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理念。基本原则是：确保清朝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要求清政府开放更多的城市以打开更多的贸易空间。这实质上是美国利用经济力量大打道德牌，从而介入对亚洲市场的争夺。当时，欧洲列强和日本对清政府动辄割地赔款，不断地欺辱。所以，当美国一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时，自然会得到希望“以夷制夷”的清朝的积极响应，美国在中国是所有列强中利益增长最快的。

在亚洲，美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和其他列强相抗衡，但是它的经济力量已经成为塑造亚洲秩序的一个有力杠杆。但美国在亚洲不断强势的地位自然会遭到旧有强势者的反对，所以“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胜利，远远超过了欧洲列强任何一场战争对胜利者的意义。为了获得一个进入西太平洋的桥头堡，美国第一次在西半球之外使用了自己的军队，在当时那场战争并没有引人注目，但作为一个新兴的强国和一个日益衰老的老牌强

国之间的碰撞，仍然反映了世界秩序变革的萌芽。

如果美国在那场战争中打败了，那么美国在亚洲执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是不可能的。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胜利，使欧洲列强再也不敢小看美国，纷纷把美国作为拉拢和争取的对象。美国的海军舰队在19世纪中期占领了日本，而在19世纪末期，力量又延伸到了西太平洋的南部。当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又成为主要的调停者，其意义不可估量。

此时的美国，在西半球是一个秩序的塑造者，而在亚洲则是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在欧洲是贸易不可或缺的伙伴，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在这种全球性的国家中，孤立主义的思潮还有它的生存价值吗？不，孤立主义的终结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症候，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主义便应运而生。

在孤立主义发展的时候，也就是国际主义思想孕育的时候，因为孤立主义本身只限于政治上避免介入其他大陆的纷争，而在经济上不断加强联系，通过贸易不断发展和交织，经济利益非常有必要在政治上加强影响力，因此要推动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局势越发紧张，孤立主义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不可能因为固守一种政策而丧失实际利益。美国需要稳定贸易秩序，因为当欧洲成为一片废墟时，美国不仅失去了市场，而且经济破败的欧洲还会为美国制造麻烦。所以，美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符合自己的理念和利益的欧洲。所以，当美国在欧洲列强中保持中立的时候，它必须作为一个和平的斡旋者，成为一个诚实的调停者、和平的维护者，解决欧洲的麻烦也是为了它自己。

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至少是出于贸易和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需要和平。此时，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成了世界工业的翘楚，美国必须通过塑造新的世界秩序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实力和需求。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进行紧张局势的调解。日俄战争谈判就是在美国举行的。俄罗斯和日本都是美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它们主要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对俄罗斯来说，它与日本和美国的矛盾，是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市场和原材料；对日本来说，它和美国的竞争不仅是东北的市场，还涉及西太平洋的海权。对美国来说，日俄

战争的爆发最佳结果是使日本和俄罗斯都受到削弱，从而使美国坐收渔利。但美国又不希望战争长期化，因为战争长期持续，对中国东北及清政府将是一场灾难，足以摧毁中国的经济和损害中国主权，这样美国不仅丧失对中国的影响力，而且会使美国在中国的市场得以削弱。所以，在一个缺乏互信的年代，美国是最佳的居中调停者。英国在当时是日本的盟国，如果英国居中调停，俄罗斯不会接受。此时，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经显而易见。

经济富裕和对市场不断开拓的诉求，促使美国必须由西半球走向东半球。当时的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秩序取决于欧洲的秩序。美国的战略重点必须置于欧洲。但美欧之间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现实诉求差异，使美国对欧洲秩序的塑造起初并不成功。在亚洲，美国已经不可能在日本和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自从日俄战争胜利后的日本，已逐步成为美国的威胁，如果美国可以和日本共同来主宰亚洲的话，历史将被重新改写，但是两个国家文化不同，对利益的诉求不同，所以美日之间不可能在太平洋上和平共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实际上是处于两难之中，而不是乐此不疲地发“两边渔利”的战争财。首先，英、法、俄和德、奥虽然大量购买军火，但是军火贸易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战争使整个商品市场萎缩。而且，美国到底应当怎样选边站队？这是一个难题。选了一边的话，就会使另外一边成为敌人，从而贸易被切断，而且一旦美国选边站队，那么就必须保证战争获胜，否则，美国所遭受的损失难以用数字来计算。

威尔逊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出现。据威尔逊本人说，美国加入战争的目标是为了消灭战争，制造和平，而不是参加哪一方的联盟。秘密外交、殖民地经济竞争和争夺、敌对性同盟才是美国的敌人。但现实情况并不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美国采取中立原则更加有利于英、法、俄协约国集团争取美国的贸易和援助，因为它们有着更强大的海军，而德国的海军难以出入于北海。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力量对比促使美国越来越远离德国，而越来越倾向于英、法、俄。而且一旦德国战胜，英、法衰落的话，将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最终加入了协约国一边。

美国在“一战”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个：一是美国的中立政策扩大了军火

贸易，这无疑助长了战争双方的实力而拖延了战争结束的进程。二是威尔逊主义太过理想化，在一个拥有长期的战争权谋和残酷的现实主义的欧洲提出那么高尚的口号，无疑是一种天真，“14点计划”^[1]在欧洲完全是曲高和寡。这使美国作为一个战争胜负的决定者，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安排战后秩序。所以，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总统满怀希望地来到欧洲却忧心忡忡地离开了欧洲。

强大之前，处于争斗中的欧洲有利于美国。而在强大后，一个均势但和平的欧洲肯定有利于美国。美国希望在战争结束后，欧洲经济能够尽快恢复。欧洲经济能否复苏，德国是关键。因为德国人口在欧洲最多，在欧洲国家中具有最大的市场，而且德国境内并没有受到战火的蹂躏。最重要的是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在欧洲地缘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德国复兴，不仅可以带动中欧和东欧，甚至西欧的经济复苏，而且复苏后的德国将会变成抵抗苏联的坚强屏障。德国实质上对于美国来说具有欧洲枢纽的作用，如果德国稳定，那么整个欧洲秩序将会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战后的“杨格计划”和“道威斯计划”的焦点在德国，而不在法国的原因。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而且法国比其他所有盟国承担了更大的风险。美国没有把援助法国作为援助欧洲的重点，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英国。英国的传统政策就是维持欧洲大陆均势，当德国战败和苏联被彻底孤立后，法国可能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援助欧洲的重点实际上已经使美国和英国站在了一起，美国和英国成为对手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14点计划”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美国已经开始主导欧洲了。美国在战后支持欧洲复兴的计划破坏甚至违反了《凡尔赛条约》。这一点足以说明欧洲已经难以离开美国。

美国在欧洲的强势显然还影响到了它在亚洲地区的位势。美国对欧洲秩序的塑造实际上不在于欧洲秩序，而在于亚太关系。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它弱小的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已经变成苏联的俄罗斯彻底地退出了国际政治舞台。所以在太平洋上只有两大势力，一是美国，一是日本，虽然美国“14点计划”在欧洲造成了尴尬的境地，但美国在亚洲令日本感到压力陡增。《海军公约》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使日本遭到孤

立，这是美国“一战”后获得的另外一个重大的战略收益。这迫使日本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软化对美国的立场，要么对美国更加强硬，日美关系已经无法保持现状，而且美国处于绝对有利的位势。如果日本在美国变得更加强大之前对其进行压制，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它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甚至要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不可能支持日本对抗美国，而且俄罗斯虽然需要日本保证其远东安全，但是日本参与了西方国家联合武装干预俄罗斯的战争，使得日俄之间毫无和平可言。也许那时的日本没有感受到它的孤立地位有多么糟糕，但是它也许能感觉到美国正在不知不觉地迫使它作出一个决定它命运的选择，要么投降，要么发动战争。但此时美国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日本对美国采取软硬兼施的态度时，美国却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绥靖态度，这无疑刺激了日本对中国采取更为激进和强硬的政策。

美国对凡尔赛体系的失望使其退回到孤立主义当中，而在亚洲却日益占据强势。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1929年。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已经崩溃，再加上《凡尔赛条约》对德国苛刻的惩罚使得德国境内民族主义重新燃起甚至开始扭曲。当欧洲陷入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之后，希特勒上台，实际上德国发生改变不仅对近在咫尺的法国和苏联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距离较远的英国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都产生了影响。这时美国已经看清楚了，未来的希特勒执掌下的德国将会成为世界的战争之源，然而此时的欧洲甚至和美国之间龃龉不断，使它们不能协调行动，一致应对德国发生的巨变。

正是因为经济危机，美国对于欧洲大陆的影响力产生了萎缩。此时，欧洲形势的发展促使美国不可能像“一战”前那样略带暧昧地处于中立。从意识形态出发，美国自然会偏向于英、法并反对德国纳粹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操纵《凡尔赛条约》的英、法，因为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甚至伤害了美国的利益，并且在债务偿还上出尔反尔，使美国再也不可能像“一战”时那样热情地去帮助英、法，甚至部分美国人对英、法产生了反感。美国对德国和苏联的态度是仇视，对英国和法国的态度是不满。但是，欧洲的乱局对于美国来说却是机遇，如果欧洲失去了它们维护自己作为世界中心地位的意

识、能力和机遇的话，那么美国将会取而代之，美国需要欧洲的繁荣和稳定，因此，谁发动战争，谁就是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不能塑造欧洲的顺序，那么美国也就不能塑造全球秩序，但是幸运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第二个威尔逊，他比威尔逊更有智慧、更有坚忍力，而且更加懂得现实政策。

美国和欧洲之间隔着大西洋，但是它们之间的利益往来早已跨越了大洋，如果美国退出欧洲大陆不去影响欧洲大陆的话，那么欧洲会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其秩序最终会因为几百年以来争斗的延续而混乱，然而孤立主义思潮阻止了美国领导人想介入欧洲局势的步伐。当时的罗斯福总统绝对是一个具备全球和长远目光的伟大领导者，他断定欧洲不断恶化紧张的局势将会殃及美国。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不仅仅是因为投资，虽然它来自于欧洲的安全风险由于欧洲的混乱而大大降低了。但是，美国开始在谋划新的全球秩序，起点是威尔逊，而萌芽状态却是老罗斯福。在他们之前，美国历届总统将欧洲看作主要的贸易对象和投资场所，只是从经济层面和安全层面来进行考虑。然而，从罗斯福时代起，美国对欧洲的顺序安排超越了经济和安全层面，则是从整个地缘政治来考量。

当“二战”结束时，美国成为全球力量。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力量，不仅仅是出于它对领导地位的追逐，而是基于它内在的经济需求，美国一旦离开了全球市场，离开了中东等其他重要能源的支撑，它的经济也将毁于一旦，也会无法持续发展，持续繁荣。全球化的市场、一体化的贸易和能源供给的稳定和平衡，不仅关系到美国的繁荣，更关系到它的存活。所以，美国为了保证领导地位，必须使市场稳定、能源供给稳定，使地区保持繁荣。如果其他地区一旦开始贫穷、混乱，甚至被它心中认为的所谓的敌人控制，它就会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

“二战”后的美国应当说是吸收了“一战”的教训，当“一战”结束时，各国都在签订《凡尔赛条约》，唯有美国没有签订《凡尔赛条约》，等于是任由欧洲形势发展，不受美国治理，等于是美国放弃了影响欧洲秩序的权力，这也证明了一旦欧洲失控，美国的利益必将受到伤害，当然，“二战”后的美国在吸收“一战”错误的时候有过往矫正之嫌，“一战”后美国撒手

不管，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又管得太多，所以从“二战”结束直至越南战争，美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太战线拉得太长，以至二十多年来，美国在欧亚大陆基本上是在疲于奔波。

如何形成战略思维优势

战略转型导致新的战略优势，而战略举措的成功又在于战略思维能否形成优势，战略思维领先者，战略转型才能成功而获得主动。

国家的战略思维优势不同于个人的思维优势在战略问题上的体现，虽然国家战略思维优势需要决策者和辅助决策者的战略思维优势，但是从国家层面而言，战略思维优势在于使国家超越历史，而从决策者和辅助决策者而言，战略思维优势在于使自己学会独立思考。推动国家转型，仅仅依靠精英人物的独立思考远远不够。

在以前弱肉强食的丛林年代，弱者自然是受害最多的，而今天开始告别丛林法则时，强者就不一定会受益。这就是战略思维僵化不变导致优势变成劣势的结果。实力已经处于强势，而思维仍然站在弱者的基点上，使自己不断遭到孤立而陷入被动。统一时的德国就是如此，当俾斯麦仍然将法德世仇置于德国政策的基点时，英国和俄罗斯便随时可以利用法国来牵制德国，迫使德国让步。从本质上看，统一后的德国仍然受到均势格局的限制，当需要突破均势格局时，又显得势单力薄。如果从俾斯麦开始，德国的战略着眼于改变均势格局，而不是仅仅将均势格局作为战略思维的基点，那么历史也可能改写，德国也就不可能被法德世仇和德俄关系捆住手脚。

德国的脆弱地位来自于弱者的思维，而不是强者的思维，尽管俾斯麦建立的伟业在当时无人可及，但他并没有使德国的思维随之改变，只是德国利用均势格局进行投机的策略而已。所以后来的威廉二世看起来好大喜功般地囿于成见而树敌，最终走向世界大战。德国从统一开始，就不应当高估法德世仇导致的影响，使德国永远被“必须孤立法国”的思维束缚住，使得德国在英国与俄罗斯面前，既被它们利用法德世仇牵制，又想随着实力不断增强

争取更加主动的地位，所以日益走向僵化。

战略思维的优势在于敏感地意识到自身实力变化带来的地位变化，从而产生心态变化的动力。转型战略的优势也正是在心态上，根据实力地位变化而变化，当实力地位变化时，思维也随之变化，而思维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实力地位的变化。战略思维优势的形成，首先在于向主动的战略心态转变。

所有具有主动的战略心态是战略思维优势的首要前提，不固守历史传统，而是积极、务实和灵活地调整战略举措，使自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正如英国在战后根据自身实力地位下降这一现实，推出三环外交战略，主动由格局主导者向秩序的重要参与者转变，而不是一味僵化地固守主导地位。英国积极构建美英特殊关系，利用美国的实力地位来获得英国所需要的欧洲大陆均势。而且英国仍然在美国和西欧之间充当平衡手，以提高自身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英国的角色转变在于它的战略思维优势，从不拘泥于静态的历史经验，而是深谙历史，把历史当作动态的连续的过程，使自己的战略都是历史的提升而不是同层次的循环。

主动的战略心态，就是当自己处于弱势或者被动之时，也善于培育强势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正如尼克松时代的美国，当美国处于冷战对抗的弱势时，主动提出缓和，使美国虽然陷入越南战争，但在苏联对外扩张之时，仍然可以利用经贸问题、军备控制谈判问题缠住苏联，而且主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利用中苏矛盾争取中国共同对抗苏联。这说明美国虽然处于被动，但心态上从未放弃主动地位。主动的战略心态不是基于实力的绝对优势，而是基于对实力地位的准确认知而对格局与态势的准确判断。战术层面上经常有以弱胜强，而战略层面上却没有以弱胜强。然而，战略层面的思维中，对于实力的认知却与战术层面不同。战术层面上，决定实力的各种因素几乎是可见的，哪怕在精神层面上，士气高低也是直接可以感受的；而在战略层面上，决定实力地位的各种因素非常难以准确感知，尤其是当利益互相交织时，是敌对性因素还是合作因素难以准确进行衡量与评估，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经常是同一时期内同一因素的不同表现。

形成主动的战略心态是非常艰难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超越历史的艰难。本国和本民族历史上的伟人造就的历史遗产，是后来人继续强国的

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但是由于时势的变化，如果后来人又固守它们的精神遗产，那么又可能使之变成包袱。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历史上的伟人奠定的基础。每当格局转变或者国家位势处于激烈动荡之时，都需要新的主动的战略心态，但很容易受到责难、甚至是误解。所以，每次战略转型对于大国而言，都是痛苦的煎熬。只有那些意志超出常人和更有远见卓识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才能推动战略转型。二是观念改变的艰难。时代的变化总是快于观念的变化。每次世界出现重大变化时，绝大部分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世界变化之前。从这个观点看，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而不是未来的人。获得优势的人是主动转变观念，或者比别人更快和更容易转变观念的人，但这种人之于整体国家和社会中，又特别容易导致曲高和寡式的孤立而最终难以获得必要的支持，致使国家变化的实际情况和战略思维产生的政策就像两个不同的人的腿被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主动的战略心态转变产生的力量巨大得已经超越了人们的理解能力，所以才出现了行动的步伐总是与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每一次大国进行战略转型时，思维的优势难以发现。因为没有转型的痛苦，或者没有感觉到正在转型时，人们很少去主动地发现思维的劣势。

大国的战略转型与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转型不一样，转型是检验思维，而战略转型却是接受思维的检验。因为战略转型当中，战略思维的优势迸发出来的前瞻预见能力、开拓精神、创新能力能否使国家自觉地不断警醒自己，向现状挑战，永不止步非常关键。富有优势的战略思维是国家整体转型的基石。正如吉田茂首相时代，先有吉田茂主义的出台，才会有日本战后的转型成功。

在国家转型的历史上，成功的战略家很少，而富有优势的战略思维所产生的战略思想更少。所以，思想的影响比统帅的影响更大。统帅也需要运用思想的力量来成就伟业。思想的力量决定了国家转型的深度、广度、速度。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旁观者，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这一角色的转变过程中，美国仍然是历经千辛万苦。因对自身实力过分自信而失去中国，并先后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导致在冷战对抗中陷入被动。这个历史时期中，美国并不乏优秀的战略家，

但他们仍然根据自己的理想化的主观认知，而不是世界格局的客观现实对秩序的变化进行评估，才导致对国力的挥霍。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几个错误，根源是没有及时将心态由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旁观者调整到基于现实格局的主导者的心态当中来。

形成战略思维的优势，首先需要在权力顶层激发思考和革新的活力。当国家需要战略转型时，旧观念是第一个，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障碍。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实力下降时仍然具有超过自身实力的影响力，那是因为它比别人更快地革除了旧观念。大国转型的战略优势，其第一优势是思维优势。思维的优势可以使大国走上成功的道路，虽然成功无捷径可走，但是转型失败的国家都是选择错误的道路所致。

思维优势迸发出的力量取决于使用者，而不是思维本身。大多数拘泥于历史经验的战略家总是习惯于受到固定成规的限制而忽略了内在精髓。思维优势的力量在于打破另外一种思想的过时的权威，这比思想迸发出应有的力量更加艰难。当商鞅提出“王不法古”时，当张居正提出“治世无定律”时，则意味着要和强大的旧思想做斗争。旧思想代表着以往的成功，使人领略到先贤们的成就，更主要的是，在旧思想引导下，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收益。而新思想，要鉴别其将来能否成功，不仅尚需不可知的时日，而且更加至关重要的是，即使是主张新思想的人也未必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和贯彻。尼克松时代的美国提出五大中心说时，虽然切中了当时的现实格局，但是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反对力量并不比赞同的少。反对的人认为尼克松主动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挫伤了美国的自信。但是，后来的历史却证明了尼克松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采取的缓和战略的举措，开始使美国重新赢得主动。这样的历史毋庸置疑地反衬着对立的思想，导致了对立的力量。

深刻的思想就像矿藏，越尽力挖掘迸发出来的能量就越大。当它被埋藏在深处时，在等待着同样深刻的头脑开发和使用。成功的转型者，都是把思想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所以，历史上没有尽善尽美的转型，但是却有经年不衰的转型战略。

大国进行战略转型有两个根源：一是对手和格局的压力；二是内在的自觉。历史上大多是前者。然而，自我内在的自觉更显可靠，也更容易形成战

略优势。当然，在压力很少，或者没有察觉到时，自觉的战略转型可能因为缺乏明确的指向而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模糊，这个时候，战略思维能否形成优势对未来的判断和转型目标需求的确定，以及转型的决心对于转型能否坚定地走下去尤为关键。

战略之于转型，正如罗盘之于茫茫大海中的航船，而历次战略转型的成功都来自于思想的释放与激发。

今天最危险的，莫过于死抱昨天成功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昨天成功的经验阻碍着国家新的战略转型。

当今时代，当全球化发展进程加快，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道路时，我们越应当“冷眼旁观”。当各个国家都在向同一条道路拥挤时，其实质是领先者的开拓和战略转型在引领其他国家，使其他国家基本的转型道路要么是对其进行模仿，要么是对其进行参照。这些都是跟随，而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样的转型现状，不是各国的“群舞”，而只是领先者的“独舞”，其他国家会被遮住战略视野，始终被别人牵住鼻子。这反而背离了战略转型的初衷。

重大事件给人的启迪是转型思想的传播与繁衍。历史的力量是使人辨别正误，而思想的力量在于破除迷信。当人们迷信一种模式时，总会被历史所误导，被现实所击败。革命道路如此，转型道路亦如此。当我们回首所有的转型时，不难发现，每次成功的转型都是行前人未行之路而成功，而几乎每一次失败都是迷信于某种“成功的真理”。

模式从来没有被固定过。每一种模式本身就同时存在着成功和失败的基因，只是因为探索者对模式的选择和使用决定着模式的价值。模式成功的探索者都是从来不受模式约束的。抓住那个本质的目标，思想上追求天马行空。前人或者别人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但绝不能受到某种模式的框定。

为什么人们总是被模式吸引？因为人们很少去考虑“什么不是转型”，所以才出现了总是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如果军队转型仅仅主要是注入新的技术元素、组织元素、思想元素，那么其成果仅仅是原有能力的增强。因为仅仅是注入新鲜元素，本质上只是使完成以前的任务具备了更多的手段和更好的方法，这是模式道路的延伸。在武器装备上嵌入了新技术或者具备新装

备，并且改变了编制体制，形成新的作战思想，但如果仅仅是原有能力的增强，并无对空白处的弥补和补弱，根本谈不上质变。

真正的转型，不仅是原有能力的固强或者补弱，更是能力结构的转型和优化。这不是某种模式的延续能够做到的，而是突破模式的结果。我们不妨回顾历史，古今中外的转型中，火药产生线性战术，导致拿破仑机动作战的成功；总参谋部的出现，导致了战区指挥的成功；海权论和制空权理论的出现，导致了协同作战的出现；卫星和航天飞机、计算机的出现，产生了网络中心战思想。这些阶段中贯穿于始终的转型，根本不是原有能力的增强，而是能力结构的扩展。能力不断产生新的拓展，模式的突破才是真正的转型。

转型探索的是如何使自己成功，而不是使某种模式成功。不同的起点、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军队职能使命，决定了模式不能套用。成功者自有模式可创。当秦孝公接受了商鞅提出的“王不法古”主张时，就意味着变法已经成功一半，因为思想的力量破除了迷信前人模式，从而被激发至极限。

思想得以突破模式的限制是因为对理论、组织、技术、能力等各个方面的优化与整合，保证我们至少拥有一个方面的决定性优势，或者拓展我们的能力结构，以凸显对手能力的劣势。受制于模式可以增强某一项能力或者弥补某一项缺陷，但不能使能力优化，原有能力再强大，也可能无法适应未来的需要。例如美国的转型只是局限于增强核打击能力和常规大战能力，那么又如何适应冷战结束后的前沿存在的战略需要，又如何适应反恐战争中对小快灵作战能力的需求呢？

凡是学模式的，都失败了，凡是掌握思想精髓的，都成功了。思想僵化的人才会相信，自古以来的国家战略转型只有一种或者固定的几种模式。转型模式的固化使得转型者成为一个步行者，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而转型模式本身则是使转型者成为一个飞行者，由一种空间转换到另外一种空间。步行者只能看到或者探索前方的路和山峰，而飞行者看到是整个空间。两种不同的视野体现着思想的不同力量。

成功的模式不止一种，然而失败的模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对别人的照抄照搬，革命如此，军队转型亦如此。没有脱离本国国情的转型模式，各个国家转型之所以选择不同的道路，其中的精髓就在于不拘泥于某一模式，而是

通过坚定的目标来寻找思想，借助思想的力量，而不是受到某种模式的束缚。

转型从来不是对历史的模仿，然而却最容易陷入历史迷雾。每个战略家都希望超越历史，然而鲜有人不受到历史经验的束缚。应当接受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在继承历史经验和开拓新的时代之间也永远需要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平衡。当时代前进时，那些在历史上阻碍转型的因素并不一定会随之消失，它们甚至在某些时代的阴影中隐藏下来，当新的转型事业启动时，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出现。当然，时代的前进同样催生转型的动力时，积极的经验和理论，又开始焕发新的活力。

如何获得地缘政治优势

所有拥有战略思维优势的国家都对自身的地缘政治条件有着深刻的认知，从而趋利避害。自身独特的地缘政治的天然条件，必定具有别人难以拥有的优点，也具有别人不会拥有的弱点。然而战略思维却不一定认识到它们，而且总是僵化静止地认知自己的地缘政治条件，即把优点和弱点人为地分割。强弱转化的原理在僵化的战略思维里总是找不到发挥作用的机会。以苏联为例，相对于广袤的领土而言苏联的出海口较少，这种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苏联如果仅仅是经营周边，那么苏联会保持绝对强势。如果苏联向外拓展，那么必须与海上大国保持友好关系才不会受制于人。在冷战对抗中，苏联与美国的争夺范围超过周边时，苏联必然背负战线过长的沉重负担。苏联，包括历史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在强大后走向失败而导致命运起伏巨大，都是向外扩张或者战线延伸过长所致。它可以利用处于东欧边缘的西方大国不能直接反对的优势对周边巧取豪夺。它是不断走向强大的，而当它越过了对周边不断巧取豪夺的界限而受到西方大国的直接遏制时，俄罗斯便走向挫败，这是因为俄罗斯领土辽阔，具有防御性纵深。所以，当其他大国深入其领土进攻它时，俄罗斯可以利用领土辽阔拖垮敌人，而当俄罗斯向外扩张时，辽阔的领土却使俄罗斯远离力量中心，难以有强力的后续力量保持

进攻锐势。俄罗斯命运的起伏来自于对强弱转化原理的运用，使之发挥出最大的战略效应。

从地缘政治优势来看，近代中国对它的丧失正是因为历史上过于讲究对传统的继承，才导致地缘政治思维的僵化，无固边、无藩属则无安全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总是处于被动应对这态，无制衡、无道义则无地位的思维方式又使中国总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这样的地缘政治思维方式，就是心中下意识地树敌的方式，以怀疑、恐惧、排斥的心态，即使外部的人出于友好，也会因为中国的心态而导致出现敌对性的互动。因为地缘政治思维的不改变，对外部本能性的以敌人的思维认知来确定双方的互动起点，中国难以拓展对外的影响力。即使商品走出去，心态也难以走出去，中国便没有真正的朋友。

这说明中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本身就有很强的局限性，它难以突破自身作为天下中心地位所导致的局限性。中国处于“天下中心”的僵化认知，使中国总是以维护自身“领土安全与中心地位”的思想束缚着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举措，总是在“以藩属国作为外围安全屏障”“以夷制夷”“防海守陆”等防御性和被动性的举措中循环。中国在秦朝以后，逐渐失去了春秋战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地缘政治举措，现在正是需要将中国传统地缘政治战略进行超越的时期。因为中国已经确定无疑地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当中国花了近两百年融入世界的历史中后，中国人“天下中心”思想的历史惯性也已经基本消失，中国制定超越历史的地缘政治战略的时期已经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

当然，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世界也不像春秋战国时期，如果仅仅是简单地套用合纵连横和远交近攻等较适合于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思维，那么中国同样会昧于现实。在近代，正因为中国仍然以旧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应对新的世界，所以丧失了地缘政治的优势，从而遭受了民族性的巨大屈辱。而如今，中国正在伟大的民族复兴征途中，必须对地缘政治思维进行重构，以使自己能够形成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

当今的世界已经不是大国之间在同等位势上的竞争，既不同于近代欧洲以来的均势格局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也不同于冷战时两极对抗的世界，同

样也不是单极世界，而是一个各个大国在不同的位势上既非充分合作又非零和博弈的复杂世界。中国的传统地缘政治较适用于一个态势稳定和相对固化的世界，那么在今天世界态势处于前所未有的动态当中时，中国又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形成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呢？

中国能否真正地放眼世界取决于能否从世界历史的实践出发批判那些看似经典的教条。世界从古至今，在全球格局中，古代就是几个孤立的地区，每个地区都存在一个中心：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心是中国；西端的中心先是地中海，后是中欧；欧亚大陆的南端，中心一直是印度；欧亚大陆的腹地，先是犹太民族，后是阿拉伯民族。自从西欧发生了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后，西欧通过向全球的扩张使各个地区连接起来的同时，也使各个地区以前的中心开始衰弱。世界连成一片后，世界的中心只有欧洲，而欧洲又处于各个大国的“内斗”当中，当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首强后，伴随着冷战的开始，世界中心又移向了美国与大西洋地区。美国在西欧与东亚对苏联紧紧遏制时，中间虽然有过被动之势，但是大部分时间处于主动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真正的世界中心。然而，以前欧洲作为中心时，世界的焦点也在欧洲的格局中演变与动荡，而美国成为中心后，世界的焦点也一直飘忽不定地游荡于欧洲、东亚、中亚、中东等。这说明地缘政治的条件是天然的，但是地缘政治的地位是可变的。优势和劣势的转化看的是地缘政治思维对格局和战略的影响。地缘政治的思维绝对不是对地图或者地球仪的固化性认识。其实，自古以来，从地缘政治力量的格局演变看，世界没有固定的中心，当然也就没有固定的中心地带。

地缘政治条件的天然性从来没有决定过大国到底是什么角色？当几乎所有战略家都把“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2]奉为圭臬时，那些旨在控制心脏地带的国家从来都是陷入泥潭而难以自拔，因为当所有人都聚焦于同一地缘政治板块的价值时，往往是“制高点”变成陷阱之时。古代的蒙古、现代的苏联都牢牢占据了对东欧的主导地位，但均无一例外地因为战线过长而陷入衰败。不是东欧和那些所谓的“心脏地带”令大国衰败，而是那些总是习惯性地高估某一个板块的地缘政治价值的国家往往

容易忽视价值背后所蕴含的风险而衰败。

近代以来，西欧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各个孤立的地区中脱颖而出，有两个因素：一是西欧形成民族国家后，出现了激烈的内部互相竞争，而内部竞争导致对资源的占有诉求，需要向外扩张；二是西欧处于欧亚大陆边缘，没有受到其他地区力量中心潜在的吞并与文化侵蚀。各个孤立的地区中，欧亚大陆的东端、南端的中心都没有挑战者，它不可能面临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也就不可能扩大对资源占有的诉求，当然，也就不可能向外扩张。当处于欧亚大陆腹地的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成为中心时，内部的单一民族在并未受到外力打击时更加团结，当然在没有挑战者的情况下，日益走向保守和没落，分裂也只是在西方力量到来之后。而西欧将全球领导地位让位于美国，其原因也有两个：一是民族国家之间内斗，导致美国可以坐享安全，集中力量发展国力；二是西欧向外进取的文化在美国得到移植并且有所创新。从这个历史来看，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变化当中的。所有崛起的国家都是从边缘地带起家，并且最终取代中心地带的。大国之间争夺中心地带，从来没有胜利者，相反正是那些争夺边缘地带的大国总是灵活自如地可进可退，立于不败之地。

占据中心地带以形成地缘政治优势往往是自身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结果，而不是形成地缘政治优势的条件。地缘政治优势的丧失或者劣势被他人利用，根植于大国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把地图当作简单固定的图形。中心地带从来不是图形的中心位置，而是事态的中心位置，边缘地带从来不是图形中心的边缘位置，而是力量分布的边缘。美苏冷战的重心在德国、中欧、东欧，但真正决胜的地方却是在东亚、中东、中亚。美国陷入越南、苏联陷入中亚的阿富汗、中国与美国共同遏制苏联等地缘政治价值对于冷战攻守之势的影响，比中欧和东欧更具决定性影响力。

美国依靠在北大西洋和东亚等欧亚大陆外围沿海地带（近海岛屿）构筑包围圈来遏制苏联取得成功，也使人们看到了所谓的边缘地带的决定性意义。边缘性地带之所以可以保证美国对苏联的有效遏制是因为美国掌握了强大的海权。边缘地带的价值取决于海权，而要形成海权，那么就必须具有全球行动能力，虽然发展海权可以推动全球行动能力的形成，但是发展海权就

意味着要维护全球性秩序，这样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英国几次三番地遭到陆上大国的挑战，其地位最终被美国取代，说明英国的衰弱不是因为陆上大国的挑战，而是在受到陆上大国挑战时却难以维护全球秩序，而且美国在没有受到陆上大国挑战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比英国更加能够维护全球秩序的天然条件。英国处于大西洋北端，如果要维护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秩序，显然不如同时面向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美国。冷战年代，美国之所以能够最终有效遏制苏联，是因为苏联根本不可能集中精力来挑战美国，因为另外两个陆上的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大国与之对抗，中国和西欧（甚至包括中欧和联邦德国），使苏联潜在的出海口被堵住，而且苏联通过欧亚大陆腹地伸向印度洋的通路也处于被夹击之势。也就是说，苏联在距离冷战胜利最近之时，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挑战美国，而美国距离冷战胜利最远之时，也可以利用边缘地带和强大的海权来遏制苏联。

从英法百年战争开始，两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者和冷战的胜利者均是海权占据绝对优势者，但这并不代表海权的重要性压倒陆权。海权只是在保证陆权真正出现的基础上，才能使企图取得陆权的国家陷入难以自拔的“内斗”。而作为意图获得陆权的国家，最大的敌人不是海权大国，而是其他潜在的陆权争夺者，海权的拥有者只是陆权秩序尚未确定的受益者。这导致另外一种历史：陆权之所以难以出现是因为陆地民族国家众多，当导致争斗不已时，海权便可以将分散于维护全球秩序的力量集中起来压制一个意图获得陆权地位的国家或者集团。所以陆权与海权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海权形成后，维护成本更高，而陆权一旦形成，维护成本则相对较低。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英国和美国两大海权国可以先后称霸全球，陆上大国，比如俄罗斯、德国、中国却没有呢？因为海权的维护可以具有更小的竞争压力，一旦形成便可以称霸全球的海洋，而陆权的维护必须面对更多的对手，不仅有来自陆地的，还有来自海洋的，导致竞争更加激烈。海权的最终任务是获得陆权，如果没有获得陆权，那么海权体系早晚会的坍塌。包括美国在内，如果没有获得对陆地的支配权，随着陆地各国的竞争减少，交通和通讯不断发展，陆地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维护全球海权的成本将会使之成为负担，而不是增强力量。发展海权最终是为了获得陆权。

世界历史表明，除蒙古之外，欧亚大陆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陆权，甚至连欧亚大陆的陆权竞争者都没有出现过，苏联在大部分时期，只是专注于东欧和远东，这是它的周边。而俄罗斯在鼎盛时期，拿破仑战争后的俄军直达巴黎时，他们也只是欧洲的宪兵，对于东方毫无影响力。

今天，随着欧亚大陆内部产生剧变，从冷战结束开始，东欧、中亚、中东等欧亚大陆腹地开始出现政治制度剧变，政治制度剧变必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各个地区加强联系的基本动力和欧亚大陆内部大市场已经初露端倪。也就是说，陆权体系已经孕育而出，海权体系随时可能崩塌的时期已经成为潜在的可能。正如西欧在全球殖民时，所激发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最终促使殖民地摆脱西方一样，美国在欧亚大陆市场的意识形态的输出和传播，无疑也会使它们出现两股趋势：一边模仿美国的意识形态而需要美国，一边出现民族主义而不自觉地排斥美国。这两股趋势，哪种将会占据主要地位，取决于欧亚大陆内部在多大程度和多快速度上推动一体化，无论动力是来自自己还是来自外部。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统治了海洋则是统治了世界，因为海洋包围了内部处于分裂和内斗的欧亚大陆；而未来也必将告诉人们，欧亚大陆走向一体化也就是欧亚大陆包围海洋的过程。

中国作为一个海陆二元大国，既要发展海权，又要维护陆权，其实非常容易陷入陆海地位之争的陷阱当中。即中国容易疑惑，到底是海权为先还是陆权为先，是海权为主还是陆权为主，与其在它们的地位之间“徘徊”，不如将其准确地定位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国发展海权的目的是陆权，从长远看，欧亚大陆腹地的一体化趋势已经出现萌芽，中国作为欧亚大陆腹地的直接关联国，根本的生存和地位取决于中国在欧亚大陆中的地位。所以，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要想得到发挥就要确保以发展海权为手段，以发展陆权为最终目的。否则，总是空洞地讨论海陆并举、海陆兼顾等抽象原则，会不自觉地陷入海陆交织的思维乱麻当中。海权为陆权服务的战略有三个要点：一是缓冲来自欧亚大陆腹地动荡导致的对中国的压力。欧亚大陆的政治动荡对于中国的长远影响是消极的，而欧亚大陆的政治动荡均根源于海上全球性大国，中国为了缓解欧亚大陆腹地政治动荡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必须从海上争取地位，使海上大国减少对欧亚大陆腹地政治动荡的刺激。二是在欧亚大陆

腹地交通体系和能源输送体系尚未建立之前，中国必须依赖海洋的贸易线和能源输送线的稳定，确保财政收入和维护国家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转，从而有充足的资金和稳定的政策来推动欧亚大陆交通体系和能源输送体系的建立，进而推动欧亚大陆腹地大市场的建立。三是发展海权来提高对其他欧亚大陆大国的影响力，欧亚大陆腹地周围均存在陆地大国，或者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力决定着未来的中国将在欧亚大陆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中国在欧亚大陆大国中面临太平洋，具有最长的海岸线和最多的港口，北可以通过白令海峡伸向北冰洋，南可以濒临印度洋，是欧亚大陆中最具发展海权的天然优势的国家。中国对海权的发展将使其他欧亚大陆的陆上大国增加对中国的依赖。

虽然当今的中国应当以海权为战略重心，但从长远看，绝不能为了海权而发展海权，否则无疑是在舍本逐末。如果把历史简单地等同于逻辑，那么一个非常浅显但看起来却很精辟的道理总是很容易浮现：海陆二元大国必须避免海陆同时陷入两难，即要避免海陆同时陷入与强大对手对抗的境地。但当我们深刻地分析历史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多么肤浅。海陆两难境地的真正实质是，只要在陆上与强大的对手对抗，那么在海上也会与强大的对手对抗，反之亦然。冷战时期的中苏，近代的法德，无一不是如此，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海权才能全力应对陆上大国。然而，中国的天然条件就是海陆二元大国，中国最大的风险是，只要海陆中的一个方面与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抗，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同样会出现另外一个强大的对手。中国不能将海陆分开，也不能在海陆上树敌，否则是自找麻烦。现在要在将陆权作为远景目标的基础上，将海权作为重心。但是，作为重心的海权，其意义不是使中国成为全球性的海上霸主，或者参与决定海上秩序的重要成员，其意义的本质在于使中国可以提高对欧亚大陆腹地事务的影响力，并且消除欧亚大陆上的陆地大国之间内斗的因素，使中国的根基更加牢固，中国的长远发展更加具有广阔的空间。

大国在角色变化过程中，教条地看待所谓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或者教条地将海权和陆权割裂，会使应该具备的地缘政治价值丧失殆尽。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于成为各种力量互相平衡的缓冲与协调者。而地缘政治的劣

势在于如果偏向于哪一方，就会疏远另一方，最终会在两边摇摆中丧失利益最大化的机遇。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如果世界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那么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然而，现实是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并没有发生也不会成为现实。以往像欧洲那样的世界中心的鲜明地位已经没有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成为地位和价值鲜明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未来的世界没有像欧洲在近现代那样的中心，也没有政治上处于中心地位的，如尼克松所说的力量中心。世界成为一张网，所谓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网上的流动“结”。

中国应当在一定的时间内拥有自己的战略重心，但应当防止在解决战略重心问题时，将战略重心简单地当作地缘政治中心。

中国要形成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避免自己成为周边争端的矛盾焦点。二是推动全球性集体安全。中国的周边争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普遍存在，如果贸然急于求成，会使自己成为矛盾焦点，容易导致所有大国甚至周边国家自觉地形成阵线来加以孤立，使中国周边麻烦不断而浪费不必要的资源与精力。中国被周边争端所困得不偿失，因为中国既不能专一发展海权，也不可能专一发展陆权。中国必须追求海洋地位与欧亚大陆地位的平衡，使两种地位相得益彰。如果中国被周边争端束缚，那么在陆地上会受制于陆地大国，在海洋上又会受制于海洋大国，从而陷入左支右绌的被动地位，而且任何导致与陆地或者海洋大国对立的形势，也会使中国处于危险的为他人“火中取栗”的地位。中国周边争端既涉及海洋海岛，也涉及陆地边界问题。

中国要想获得地缘政治优势就应当使自己超脱于周边争端，将目光投向全球。欧亚大陆仍然是全球性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冷战的结束，使欧亚大陆西端经过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和欧盟成员增加等事件，由北大西洋沿岸向东欧延伸，呈现出一体化趋势，而且一体化趋势已经形成。在“9·11”事件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中亚和中东开始出现政治性动荡，意识形态受到西方强烈影响，中亚、中东和北非数国均发生政局动荡，政治制度日益趋向于西方。而当中国开始崛起，中日关系因为海洋海岛争端趋于紧张，再加上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美国、欧洲重新出

现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博弈。这说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震荡带经过一百年演变，已经开始由西欧向东欧转移，现在已经东移完成，政治震荡带已经由中东—中亚—东北亚构成。这三个地缘政治板块中，中东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阿以矛盾；中亚随着阿富汗政局趋于平稳，而且中亚五国与中俄、北约等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处于平衡状态，确定性因素逐步超过了不确定性因素；东亚格局已经形成平衡，虽有热点争端，但是因为美国超强的外力介入，东亚地区难以产生秩序的颠覆者。所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震荡带中，最为敏感和脆弱之处仍然为东南欧—中东这一弧形地区。东南欧为美欧与俄罗斯进行博弈的新焦点，而中东仍然是美国一家主导。

中国要在欧亚大陆中运作好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而不让地缘政治的天然条件变成劣势，就必须在美、俄、欧之间成为平衡者。而在美、俄、欧之间进行平衡，不仅要发展多边贸易，还要参与到它们的地缘政治斗争当中，从而增强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力。

中国需要在中间地带和两个新型战略制高点来提升自己作为协调者和平衡者的地位。

位于美、欧、俄之间的中间地带包括东南欧（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东、中亚、中国、蒙古、日本等国，这些国家的走向与立场对于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具有决定性意义。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安全，谁可以在这个中间地带具有影响力，谁就对美、俄、欧三者之间的平衡地位具有决定性。此时，中国能否在中间地带提升影响力，对于中间地带的事务具有杠杆性作用，无疑会比其他地缘政治力量有更大的发言权。当中国与美、欧、俄关系稳定时，其地缘政治优势的将来在这个中间地带上，而且中国在中间地带具有最大的优势。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与俄罗斯邻近，而且在文化上几乎同文同种，处于美、俄、欧之间距离最近之处，是焦点所在。要么依附于其中某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要么处于混乱与分裂的边缘，没有成为平衡者和协调者的可能。中东地区矛盾众多，只能受到大国影响和主导，难以影响到其他大国。阿以矛盾、伊朗问题等事务使中东难以自我整合为一个团结的地缘政治力量而形成对外的影响力。中亚地区没有出海口，所在地区的民族文化缺乏对外拓展的内在诉求，而且“9·11”事件之后，中

亚只能在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处于周旋状态。另外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同样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力量。蒙古没有出海口，而且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中间难以有向外部拓展的空间。中国和日本比中东、中亚、蒙古更具优势，然而，日本受到历史地位的影响，在美国面前毫无灵活性可言。中国不仅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广大的纵深地域，东接日本，西连中亚，南至印度，就天然的地缘政治地位而言，是美、俄、欧之间最具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地缘政治力量，如果中国在稳定中美、中俄、中欧关系的基础上，在中间地带增强影响力，那么中国将处于进退自如的状态。

当然，美、俄、欧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就是北极。随着北极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其在美、俄、欧之间的地缘价值开始显现。它不仅是三者之间最短的海上和空中交通线，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全球性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美、俄、欧也是环北冰洋国家，它们之间在北极的博弈将会对其他问题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

除去环北冰洋国家之外，中国、西欧、日本是三支与环北冰洋国家利益联接最为紧密的地缘政治力量，鉴于它们三者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完全可以作出判断，北冰洋秩序构建的艰难程度和复杂程度，在未来必将超越中东、波斯湾和南海。而中国在三者当中处于最不利的位势。

北极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价值几乎是全球中最一致的区域，如果说地球是一间屋子，美、俄、欧等主要人物在争夺屋子的所有权时，谁能够占据在北极的主导权，就相当于占领了屋顶，可以对所有对手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北极是美国、俄罗斯、欧洲共同安全的最为脆弱之处。如果让美、俄、欧三者达成安全态势上的妥协，甚至形成三者的集体安全，那么在世界事务中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便会降低，当然，其中包括中国。中国必须抢在美、俄、欧达成妥协之前介入到北极当中。中国不能仅仅依赖太平洋和印度洋航线来维持经济和安全，否则虽然拓展了影响力，但也增加了受制于人的机会。中国必须确保北极成为“公海”，而不是大国的势力范围，成为它们的武器试验场、军事基地网、钻井平台和向其他国家抬高要价的筹码。

中国应当联合其他非北冰洋沿岸国家共同努力推动北极的非军事化，召开北冰洋地区会议，形成非排他性的北极秩序。如果北极秩序由个别大国的

军事行动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无疑会导致排他性的北极秩序出现。应当推动北极秩序构建过程中的去军事化，虽然这一努力并没有可靠的基础，北极地区的去军事化进程非常曲折，然而对于日益依赖海外市场和能源供给的中国而言，北极如果被少数几个大国垄断，中国将会在传统的海外市场和能源供给上更加受制于人。

北极当前并没有出现更加有利于大国妥协而获得主导地位的趋势，相反，因为国际法的局限和对北冰洋海底有关地形信息的不统一，导致相关大国正在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采取单方面行动，有的甚至已经使北极成为一个新的军事力量部署的支撑点，这对于北极秩序的构建是危险的，而且是有害的。北极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将适用于其他地区和海域内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搬用于北极，而且所有直接相关的大国之间，要么是冷战对手，要么缺乏历史传统的联盟，要么就是立场惊人的一致。所以，要达成包容性很强的北极秩序将会非常艰难，中国刚好也可利用这些国际关系的差异从中平衡与协调。与其北极秩序被少数大国垄断，那么还不如处于混乱之中。因为，中国的北极战略和中国的东亚、东北亚战略因为白令海峡而联接起来。因此，如果北极被少数大国所垄断或者主导，中国的北极航线将受到美国、俄罗斯，甚至日本的扼制。

北极应当成为国际社会构建新型公共区域的样板，中国应当成为推力。北极秩序的发展变化不能成为近代以来国际秩序变化的翻版，少数大国的妥协与博弈推动了秩序的构建，北极秩序从一开始就应当有利于大多数相关国家。虽然这一设想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但是必须成为北极秩序相关国家的共识。

中国起到平衡者角色作用的另一个制高点是太空。当苏联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后，美苏冷战开始进入高潮，这说明太空成为决定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杠杆。虽然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在太空上对其他国家一骑绝尘，然而太空却是美国全球霸权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太空军事化已经形成既定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的领先者却成为美、俄的跟随者，所以不应当仅仅依赖于自身力量提高中国对未来太空事务的影响力，那样既费力又难以达到使中国的太空地位得以提高的显著效果。

一方面，中国应当成为合作的推动者，中国可以分别加强与美、俄之间合作，也可同时推动中、美、俄三方合作，或者中国积极参与美俄太空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成为太空新成员合作的领导者，中国可以联合巴西、印度、日本等拥有航天技术的国家成立新型的太空合作组织，成为它们与美、俄之间的联接者与协调者，推动大国间的太空商业开发合作和太空轨道合作，甚至太空碎片与废弃物处理的合作，最终形成在海洋领域的国际太空公约。

当然，中国必须拥有自己在太空中的独立地位，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而且更应当体现在战略层面。中国拥有独立的战略和与其他大国进行合作本身是不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自己的技术另辟蹊径。太空目前为少数大国所主导，然而却是一个秩序空白的公共空间。目前的太空只有力量对比而毫无秩序构建，这说明，太空大国在进行太空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只有个别的利益诉求、自我道德约束和技术力量的纯博弈。所以，中国的太空战略仍然在于使自己拥有一个更加具有自主性和对太空秩序构建具有更大影响力的战略地位。

如何超越民族文化传统

世界是在变化当中的，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也是变化的，忽视这点是走向思维僵化，因为阻止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必须要发生的变化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扼杀。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当中，对于战略的取向偏向于两个极端：一是以守土者的心态谋求和平，所以会导致防御型和强调德化周边；二是以主导者的心态来谋求同一，所以，中国难以吸纳和包容外部更加强大和先进的文明。而当今的中国需要以开放者的心态来构建秩序时，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改造应当，也必须置于突出的位置与高度。当今世界自然需要每一个国家都成为一个开放者，参与到秩序构建当中来，中国也应当考虑如何在心态上使自己更开放，以及如何构建秩序。

放眼世界，自从欧洲开始全球扩张和殖民以来，全球化的国家中，几乎

所有地区都存在着两股潮流：一是对欧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模仿，最终在政治制度的构建上与欧美趋同；二是根据自身的民族主义推动的发展谋求自身民族的利益与位势。这两股潮流，最明显的莫过于两件事情：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兴国家大量出现；二是近二十多年来，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而且那些爆发政治动荡的国家，要么本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要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体系崩塌后独立的。它们与美国和西欧不一样，始终在忠于民族还是忠于政治制度之间难以稳定。

实际上这两股潮流都不可能绝对化，只能在民族传统和与民族传统相悖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而且现有的许多与民族传统相悖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其实并不相悖。对于所有正在对民族进行重构的国家而言，对外来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态度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只是民族国家对于如何谋求生存、地位的道路而已，它并不是民族本身。然而，正是在引进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过程中，民族本身也开始发生变化。

当然，民族的命运也取决于如何在引进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时，能否对自身形成新的超越。民族文化与政治制度是互相影响的，很难分清楚到底是民族文化形成政治制度，还是政治制度产生了民族文化。但是，每次政治制度的巨变又必然性导致民族文化出现变化，至少是潜移默化的变化。坚持僵化的政治制度，民族文化便陷入衰弱，而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又如此重要，决定着民族的命运起伏，不得不说，这是所有民族面临的难题。事实证明，当政治制度趋于稳定时，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审视，那么会在导致制度僵化的同时，使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位势产生根本性的动荡。而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审视，又不能脱离其传统和政治制度的现实框定。因为民族文化不仅是那些古人写在书上的语言，更是具体的、现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尤其是当一个大国在经历角色转变时，必须将心态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转变置于转型战略的基础性地位，使转型具有正确的基点和深厚的底蕴。一句话，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心态，采取合适的立场，做合适的事情。

中国自从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以来，历经两次政治制度巨变。前一次

是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面临风云突变的国际社会，民族文化不断吸收外来的，主要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在邻国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后，中国又吸收了与资产阶级迥然不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股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在相同的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后一次是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国际秩序的日益稳定，中国也开始了现代化探索的道路，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最终引领中国由穷弱之国向民族复兴进发。从1911年到1949年，国际秩序正在由多极走向两极的发展当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在经受国际巨变带来的国内巨变。而在1949年之后，国际秩序开始稳定后，中国内部因为各种政治性缘故出现了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应当不仅仅从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策略方面，更应当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新的自我审视。

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直到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动荡，欧亚大陆腹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股欧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在形成新的潮流的同时，使所有与之相异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国家和社会均受到冲击。如果仅仅是苏联解体和东欧政权更迭，或许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动荡等孤立性事件仅仅是冲击波，但当我们把它们联系起来后，会发现从欧亚大陆腹地的北端向东南延伸，直至中东和中亚，仅仅会停留在中亚吗？与中亚直接接壤的中国会在什么时间受到影响呢？其实，等中国受到影响的时候，中国已然发生了变化了。中国已经在受到影响，只是还没有形成震动性的冲击罢了。

中国的命运依赖于意识形态的稳定，本身就需要保持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稳定性，但面临已经形成潮流的冲击波时，如果等到危机爆发再“决一死战”一定会为时已晚。中国面对外部的冲击，不是构筑“防波堤”式的应对，而是应当增强自身制度的活力，而增强自身制度的活力的根本在于激活民族文化和性格中的内在活力。中国必须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上独树一帜，但又不能成为民族孤岛。

几千年来中心地位使中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中以“忠厚长者”自居，这样的心态既是对自身古老文明和生存意志的肯定和骄傲，也说明了对自身地位固化，甚至是僵化的认知。直到现在，中国仍然存在“忠厚长者”的心态。这中间又因为晚清和民国时代饱受侵辱，又产生了一种弱者心态。两种

心态的结合，使中国总是在自负和自卑之间摇摆。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长者”式的年代了，而是正值壮年，也不是弱者，而是走在自强的大道上。它脱胎于富有文明和自身独特文化的封建中国，既不同于中间具有过渡意义的东西杂汇的民国时代，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重构时代。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新的年代，一个对自身个性和文化更具自信和理性的超越意义的年代。中国必须有独特的地位，那么首先就必须要有独特的文化。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进行选择，也不是对外来文化的取舍，因为扬弃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过于抽象。

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要激发活力，就要给民族注入团结和变革的基因。中国民族文化中最具变革基因的年代是春秋战国年代以及春秋战国之后。中国走向大一统后，因为封建社会对文化天然多样性的侵蚀，使中国由中原文明的强者走向弱者，当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并融入中华民族后，中国的民族文化不仅缺乏变革，而且缺乏团结。当欧亚大陆西端的西欧和北端的俄罗斯崛起后，中国在屈辱之下反映出来的弱小正是因为既不团结也缺乏变革所致。当中国历经千百劫难而行至今日的成就，中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出现之时，必须在民族文化中重新注入团结和变革的基因。这一观点反映在本书主旨内容中，就是中国在国际秩序激荡的当今，应当怎样转变角色，这是一个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课题。

国际秩序的变革必然导致各个国家，哪怕是领头雁型的国家出现思想的变革，虽然它们自身的变革对于国际秩序的变革具有原动力作用。中国在国际秩序中不断寻找合适的位势，首先必须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培养善于变革的“习惯”。善于和敢于变革的民族必然是对别的民族影响最大的民族。

中国的传统思维中有两个互不关联的民族文化要素：一是长期性的主导者的心态。中国通过超强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纵使军事羸弱经常败于对手，但可以德化周边，将其吸纳入中原的民族文化体系，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便由此而来。二是短期性的现实矛盾利用者的心态。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要么利用列强矛盾以夷制夷，要么是在冷战中利用大三角关系，或者中苏同盟对抗美国，要么是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近代和冷战中，都出现

了短期性的现实利益交换，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层面，只是策略性地运用而已，并无超越性。这两种心态演化到今天，中国虽然自信，但却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配角的位置，所以，总是别人更新行动，中国必须应对而处于被动之态。中国仍然忽略与他人发展心理认同，而仅仅停留于现实利益交换，这使得中国必须时时刻刻面对物质利益陷阱和别人以极端的现实主义的物质利益衡量得失来交换中国所需的立场。友谊靠钱难以买到，这个规律在国家层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两种心态只会导致中国侧重于努力令别人认同自己，而没有足够重视如何来使自己认同别人，所以中国能够走向自强，却不能增强认同而提升中国走向全球的影响力。中国在文化变革导致战略转型方面无疑要向英国学习，由一个失败的主导者变成成功的平衡者。英国的战略成功，其核心就是平衡二字，而平衡并不是无原则、无立场地处于摇摆状态的平衡，而是基于利益和安全，对于具体问题的灵活和可控的方法与思维。而要实现平衡二字，那么便需要知道世界的权力中心在哪里。

中国实现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变革与转型，其核心是使自己增加对美国的心理认同，平衡的做法是既不要设置心理鸿沟，又要保持特殊性。如果中美之间增加或者形成心理认同，那么所产生的影响力将会超越英美之间的心理认同所产生的对于世界秩序进行重构的动力。美英之间的心理认同实现了权力转移，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就是使英国可以利用美国的国力最大化维护自身利益，而美国则利用英国的价值来维护霸权，甚至赢得冷战，推动世界走向冷战的结束，从而加快全球化进程。而中美之间出现心理认同将会使世界的中心由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惠及的人口数量将远超冷战结束后所惠及的人口数量，形成的大市场远超西欧和大西洋区域。中美增加心理认同将会使世界文明得到新的层面的提升和拓展。以前的心理认同都是出自相似的民族文化，而中美之间的心理认同是在差异极大的民族文化间，意义更加深远，不仅超越了基于共同威胁和共同的物质利益的短期交换，而且还对世界格局的演化具有裂变性的飞跃意义。

当然，中美实现心理认同不仅使中国和美国各自变革的内在动力更加强大，而且中国也会成为更大的受益者。因为中国可以通过与美国互相的心理

认同来增加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影响力，避免因缺乏心理认同而导致将宝贵的资源用于无谓的对抗或者陷入无休止、无意义的麻烦当中。

最主要的是通过与美国互相的心理认同，可以激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为在美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当中，变革的“基因”是最为丰富的。中国对美国的心理认同是激发自我的变革能力。

当然，中国与美国实现心理认同，不是对美国的民族文化进行简单模仿和不加选择的取舍，更不是西化，或者只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和渠道，是两个文化差异极大的国家之间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处的新型模式。

如果认为中国主动推动中美间的心理认同就是中国跟随美国，那么无疑会导致另外一种判断，中国要以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为代价来形成中美间的心理认同，这是肤浅地认知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必然结论。从深层次看，中国保持独立性和民族性是对中美心理认同的基础，而且中美互相间的心理认同更加有利于中国保持独立性和民族性。因为只有增加了认同，美国甚至全世界才能够在不需要中国过分主观地进行自我宣扬的情况下，认识到中国的地位与价值。因为仅仅单纯地进行自我宣扬，旨在令别人对自己产生心理认同，不仅效果差，而且是一厢情愿地浪费宝贵的精力与资源。对别人主动产生心理认同的过程，也是中国日益站在新的不断提升的高度中审视世界的过程，在激发民族文化内在活力的同时，也使政治制度的内在活力得以不断激发。

心理认同的最终作用是别人承认中国的个性、独特的国际位势与不可取代的战略价值。所以，中国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心理认同，中国即使主动形成了对别人的心理认同，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作用不可能因为互相心理认同而发挥期望中的作用。近代历史中，当欧洲各国都处于同样的封建制度时，各个国家的君主甚至具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但是依旧战祸连连。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具有心理认同时又出现了冷战威胁；当欧洲开始由西欧一体化扩大为欧盟的整个欧洲的一体化时，“9·11”事件的爆发又使欧洲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从欧洲这个各国之间互相心理认同程度最高的地区看，其历史命运并没有因为不断出现更大范围的心理认同而变得更加安全与和谐，相反，形成心理认同后，出现的问

题反而更加复杂的棘手。

心理认同之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是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平视他人。然而，心理认同形成的速度与整个国际社会日益开放的速度相适应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带来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变革的另外一个问题。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变革能否与国际社会，或者战略格局的演变相适应？有些超前发展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虽然看似美好，但是却难以适应缓慢、甚至停滞的国际社会的现实及其传统观念。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莫过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摈弃秘密外交、均势理念，树立集体安全、民族自决等观念，这对于现实政治大行其道的欧洲，要么被认为伪善，要么被认为天真而被否定。应当说，威尔逊对欧洲爆发大战的根源的判断是准确而又深刻的，但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并未被欧洲认可。这说明美国的民族文化中并未获得欧洲国家的心理认同。美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超前于欧洲甚至世界，使得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壮志未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超前的国家都是推动世界转型的原动力，也是国际社会新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即使这没有成为历史上的铁律，也应当是一条极具参考价值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当今国际事务日益开放和透明，参与国际事务的力量已经由单纯的政府组织变成多元化的力量和组织，战略格局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地交叉于各个领域，而且各个领域之间的互相影响越来越大，谁能够看得更远，谁成为最大受益者的可能性越大。

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超前有两个作用：一是使国家可以获得超过实力地位的影响力和实现超过实力地位的战略目标；二是使国家不需要运用实力便可以实现目标，当实现同样的战略目标时，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超前而形成的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了实现同样目标的成本的大小。中国到目前为止还不具备对西方产生非实力地位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所以，中国总是要付出与目标相应的代价，甚至付出高于目标的代价。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超前性，更加容易将形象中有利的一面进行外化，不仅具有使对方景仰自己的功能，甚至还有使对方受到有效威慑的作用，从而在思想和格局中都处

于主导者的心态和地位。

中国不是实力最强的，但要学会利用实力地位来实现战略目标，来经营自己，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超前性，其价值就在于此。中国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具有超前性的基础是使自己具备足够的公信力，而不是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在周边矛盾尚未解决和缺乏全球性的影响力作为支撑的情况下，运用威慑性影响力容易使自己走向被动，当然不是排斥威慑性行动，甚至还需要超前性的威慑性行动，但即使使用也是为了使自己具备更大的公信力。

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从近代开始，缺乏通过解决大家的问题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习惯。从客观上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弱者地位，无法解决大家的问题，甚至还会成为大家的问题。然而，从历史延续的观点看，中国正因为无法解决大家的问题，总是聚焦于自己的问题，才使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多，导致处于被动的弱者地位。

中国要看到自身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在看到国际体系对自身的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自身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否则便会陷入地区性战略思维导致的命运怪圈。全球化使国际社会越来越体系化。“国际体系的结构本身，对群体或国家力图变革该体系的能力和意愿影响极大。”^[3]国际体系的出现使国家必须正确认识国际体系，才能认识自己。

国际体系就像一个系统，是单元互动而形成的整体。体系构成的标准是单元的互动要达到影响彼此的程度。因此，国际体系的内涵有三个要点：一是国际体系内的单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等紧密程度不同的联系；二是这些联系是复杂多样的，而且是能够影响到对方（一方或各方）的内政外交政策；三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发展变化必将影响到其他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影响程度取决于该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与影响。

每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与国际体系其他成员都是以地理为基础（平台）、以科学（思想和技术）为手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联系的。因此，认识和分析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地理和科学（思想和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因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互动都是通过这两个基础性条件或载

体来进行的，而且受制于这两个因素。大多数国际组织都是地理相近的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组成或原创的，就连联合国也是地缘政治的结果，美国的全球战略思维以及苏联、英国在欧洲、中东、远东的地缘政治战略决定了联合国的产生。

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实力的分布，重心位置说明了主导性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实力延伸的位置。

各个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根本意图是受益。因此，当大家都发现“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时而合作，时而竞争，且不断相互作用”^[4]时，国际体系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对国家或者政治实体间共同利益的创造与容纳。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利益满足共同需要的载体。共同利益表现为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国际体系应时代而生。有什么样的共同问题，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各个国家利益交织的结果也形成了国际体系内的运行规律。在这里面，利益一致是根本动力，利益冲突只是实现共同利益的一种途径。国际体系的演进存在于国际体系解决共同问题的能力逐步增强的过程中。因此，认识国际体系的基本方法是认识国际体系的演进。

“历史并非线性演进，其形式往往是并无因果关系的事件联合造就的。”^[5]国际体系内的一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问题的变化（发展、产生、消失等都属于变化），但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变化都会引起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可以认为，各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位置不同，造成其他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反应也不同，对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大国变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自然比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大，其他国家都是根据大国的变化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分析国际体系的变化，首先分析发生变化的源头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位置。所以，分析国家体系的思维与系统性思维的方法具有同一性，必须要有层次性思维，将层次性思维与要素性思维相结合，并以发展的过程性思维为维度来分析考察国际关系。

国际体系中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巨变的因素，这是人类历史中所包含的天然基因。系统环境的演进是有序的，但表现出来的无序性、偶然性和突变性特征却非常明显。认识国际体系的切入点就是抓住那些造成突变性的事件

或者因素。两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9·11”事件、中东和北非政治动荡等几个历史过程中的节点，对于认识国际体系具有重大的价值，使人们从无序的、偶然的、突变的事件中去考察国际体系的演进，指导对未来的预测。看似无序，实为有序，这主要是因为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所致。世界力量分布的不平衡性是绝对的。力量分布决定着国际体系结构。找到改变主要力量分布的因素就能发现国际体系的演进规律。不平衡的状态被打破，成为相对平衡的状态后，国际体系完成了一个周期的演进，世界前进了一步，相对平衡被打破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国际体系又完成了一个周期的演进，世界便又前进了一大步。改变旧国际体系是世界前进的基本方法和规律，或者说，世界发展前进的基本规律作用的表象就是原有的不平衡被新的不平衡代替。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否演进取决于美国的主导性地位的变化，美国在一超多强中的地位决定了未来国际体系的走向。现实情况下，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和实力对比并不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国际体系的演进缺乏颠覆性因素，因此是相对平衡的。但并不代表世界上不会出现挑战它的地位、尊严、根本利益的力量，只有当有一个这样的力量出现时，新的不平衡才可能出现。但关键的问题是以和平的方式挑战，还是以战争暴力的方式挑战，或是坐等其衰落，现在还不明朗。所以，挑战的力量总是会存在，除非美国创造的秩序有利于所有国家，至少有利于所有大国。

按照系统论的理论观点，系统演化是越来越复杂的进程。系统内各个要素的互相影响的程度加深，最终在系统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系统本身也产生了整体变化，转向对立面。国际体系同样如此，经历着“不平衡”和“相对平衡”之间的循环转化。从历史发展经验看，随着国际体系演进的循环进行，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秩序也越来越稳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作用力也逐渐弱化。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传统的丛林法则消失并不代表世界大势顺利地向有序化、趋同化、一体化发展，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反复甚至是倒退。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在局部问题上出现了日益尖锐的争端（争论），如全球气候问题、核扩散问题，使得全球一体化、有序化、趋同化进程充满了困难和挑战。但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全球在一体化、有序化、趋同化进程中也产生了深入发展的更多的历史机遇。

国际体系的内耗，如狭窄的军事战争同盟、世界大战、长期敌对关系（冷战）等越来越少，这是国际体系演进的突出特点。将来的国际体系内，国家职能可能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不仅是为本国人民服务，还要让本国资源为全球化服务。这就带来了国际体系内部，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互动？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又对国际体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各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均基于一定的利益与需要而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这就是国际体系与国家的互动根源，国家因为国际体系的变化而调整实现利益的方式，从而影响国际体系，而被影响了国际体系产生变化，又导致国家根据情势的变化调整利益实现方式甚至利益范围或范畴，这又使国家发生了变化。以利益为需求、基于国家实力和认同为主要方式的国际体系与国家的互动构成了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内涵。

国际体系的变化均是从局部开始，尔后遍及全体。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可能从一个侧面开始，如新的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一场战争的胜负等都是产生国际体系变化的关键。国际体系成员地位的变化，又引起了国际关系的重心变化，从而引起格局的变化，接下来又产生了国际关系性质内容方式的巨变。

国际体系的作用（结构效能）取决于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而各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内在特点又决定了它们之间互动的走向。因此，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结构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而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又要影响到各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特点与互动。因此，国际体系对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影响实质上是由体系与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特别是主导性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决定的。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实质上也是由国际体系与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特别是主导性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决定的。认识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认识国际体系与主导性国家或者是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国际体系的存在与运行反映的是实力最强国家的意志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因此，分析国际体系的有效方法是从分析国际体系重心来分析国际体系结构。重心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内政、外交、价值观、制度、对外方式等代表并决定着国际体系

的发展方向。

国际体系的内涵非常复杂。从影响范围来看，具有强烈的层次性，包括世界性的、地区性的；从要素构成看，国际体系具有多个侧面，各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有各个方面的互动，如政治条约、经济条约等；从发展路径来看，国际体系演进在近代、现代、当代的历史阶段中深深地受着根源于本身内部的规律的支配；从存在状态来看，国际体系拥有多种功能，包括构建和平、实现协作、制造同盟和对抗冲突。所以，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利益的一体化、全球化、地区一体化趋势，从本质上说不具备超越国家权力的职能，而是主权国家进行自我利益实现的途径或平台，切不可认为国家要消除。相反，利益一体化、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更加固化了国家的存在。全球化的作用是国家自我利益实现方式的拓展而不是国家的终结。因为国际体系演进的根本动力是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个体演进和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

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寄于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现实与未来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方面的互动成就了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现实与未来。国家形成于利益主体化的过程，即利益在一个特定群体内的稳定实现。利益主体化的延伸就是主权的形成，而利益的一体化又是形成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推动力。由于交通、通信、人类思想观念（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民主思想、电报电线、计算机等）的突破性发展，各国的利益开始连接，各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岛屿”，而是“大家庭”的一部分。

从全球范围看，古代国家对生活资源的分配与争夺导致地区化，比如大国的出现或者地区性组织的出现。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是因为商业的扩充与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联系，比如全球性殖民体系的出现。现代以来的国际体系是由于各种信息和能源（资源）在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之间分配和共享而产生了利益一体化，比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或对抗成为主流说明利益的连接方式是排斥的，或者说还没有找到连接共同利益的切入点。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益一体化日趋强势。冷战的结束，其根源是人类利益一体化的洪流埋葬了冷战，而不是美国西方集团战胜了苏联东方集团。从历史纵向上看，如果从个体出发，谁符合利益一体化的

大势，谁按照利益一体化的趋势制定和贯彻战略，谁就会主导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9·11”事件等关键性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利益的一体化。利益的一体化促进了发展动力的一体化，各国的发展动力要趋同，发展方向也同样要趋同。世界贸易总量的急剧扩充就是明证，东方古国加入世界主流体系就是明证。每一次战争或对抗的结果都是消灭或弱化了阻止利益一体化的因素，促进世界文明的整体发展。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按照这个思维路径来确定自身利益。正是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战略，才塑造了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国际体系结构。针对同一个国际体系，不同国家有不同反应。这就带来了国际体系如何构建国际秩序的问题。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的国际体系，没有一个类似于世界政府那样的绝对权威的超国家组织机构存在，导致了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从而造成了弱肉强食和安全困境。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那么世界将来最终只剩下一个最强者。然而为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体系总是在多国之间出现一定的稳定性和平衡状态？为什么霸权时间远远少于均势和制衡的时间？这说明国际体系中，虽然没有一个为国际体系所有成员接受的权威力量，但由于多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互动，一定存在某些“自然契约”。自然契约的结果就是国际秩序。

历史的作用均是自然因素作用的延续。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都不可能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也就是说一国或者政治实体的战略不可能不受别的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影响。影响的方式可能是被动强制性的，也可能是主动合作性的。国际秩序从本质上说并不完全是国家之间强制得来的。国际秩序只是说明了国家间互相影响、互相需要、互相制约，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分工制度”。被动强制或主动合作或二者结合都只是实现并体现这个国际秩序的途径。

系统环境有自己调节能力，要素也有这样的能力。一定的国际秩序下，各个国家都会选择于己有利的政策，这就是世界大势决定国家走向的基本原理。国家制度决定着它与世界融入的程度。对一个秩序的肯定就代表着国家承认世界大势和融入国际秩序。决定在面对一国之政策时，或分析世界走向时，不能忽略国家的自我调节能力，虽然不能高估一国的自我调节能力，但

分析国家自我调节能力也是制定和贯彻战争的思维任务之一。国家内在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思想观念、政府及精英阶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考察一国对世界秩序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指标。但霸权国家或主导国家的自我调节并不只是考虑自身的问题，它需要从整体国际秩序中考虑。

国际秩序中的分工制度反映的是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国际体系的演进将利益一体化转化成大势所趋。然而，随着国家间互相依存程度的增加，国际关系运作不断规范，合作日益成为主流。不能忽略一个基本事实：国家安全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或者政治实体仍然将合作和利益一体化当作谋求优势和基本方式。虽然将国际关系的本质看作对抗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出于对竞争可能所导致的对抗甚至是战争的担心，也使有些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只是将合作当作一种体现竞争，甚至是对抗，谋求优势的方式。因此，不能单纯和简单地分析合作性的国际秩序，忽略了个体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独立、不容侵犯的基本认同，况且历史感情、价值观、政治制度方面的互相认同程度并不是对等的。这说明历史进程中的趋同越来越强烈，不可阻挡的进程却不是坦途，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也产生于此，受益不是平均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意味着强国受惠，这是分工的结果。国际社会中等等的国际关系的作用是加强互相联系与依存程度，没有绝对平均的条约，对于国际秩序的稳定付出的越多，收益相对会更多，国际社会中的共同利益也会更多，国际制度问题也应时而出。

作为国家间互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6]的总和，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中共同利益的生成者，反过来说，共同利益必将促进国际制度的产生。随着共同利益的扩大，国际制度也应当扩容或更加灵活化。国际制度虽然是国际社会中妥协的产物，但是正因为妥协所反映出来的共同利益成为了国际制度的基础。如果利益完全相悖，则建立国际制度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认为冷战时期的美苏处于对抗中显然利益相悖，但仍然达成了许多条约和协定。这正好说明了美苏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不是利益相悖的结果，反而是利益一致的结果。美苏任何一方如果离开了对方的制约或影响，则自身安全利益绝不可能实现。试想如果美苏任何一方意图或决心通过打核战争来消灭对方，则另一方失去安全的同时，自身也无安全可言。共同的安全威胁催

生出国际制度，而国际制度中容纳和扩大共同的发展利益、共同的民生利益、共同的价值观，这些共同的因素又促进国际制度的扩容。不能否认，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而且主权国家政府都是将国际制度作为实现利益的工具。但是，工具随着效能积累，而且积累至实现利益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式的程度时，国际制度便超越主权国家的战略选项，成为主权国家基本的战略取向。

有人主张“通过国际制度进行国际合作，进而达到有效治理”^[7]。但是，国际制度并没有强制性，这在历史上成为教训的素材非常丰富。正如盟约对强者或者认为强者一方的约束总是比弱者的一方少一样，国际制度对大国的约束取决于大国对国际制度的尊重程度，而这种尊重程度又取决于违反国际制度后的利益受损程度。如果大国认为违反国际制度的收益大于遵守国际制度的收益，那么国际制度可能就形同虚设。但是，应当看到自从近代以来，破坏现状的国家或者意图破坏现状的大国从来都没有因为对盟约、条约、均势现状的颠覆性意图而收益，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俄罗斯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而且冷战的开始，并没有因为美苏对抗而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权力真空，任何一个地区的大国如果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也会受到美国或者苏联的反对和压制甚至是惩罚，如苏伊士运河危机和马岛战争。冷战结束后，国家间互相依存程度加深。当大国破坏国际制度不仅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自身利益也会遭受超过收益的损失时，国际制度内在逻辑的强制性才开始产生力量。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验证了这一点，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破坏了石油供给体系的平衡，威胁到了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石油安全，国际制度便开始显著地发挥作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制度的强制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但是国际制度的强制力并不是平均作用于每个国际体系成员的。由于每个国际体系成员在地缘政治环境、民族文化和战略等方面的差异，国际制度产生的强制力不同。比如，当今时代除美国之外的重要发达经济体和争端热点问题都处于欧亚大陆上，那么欧亚大陆发生的与大国紧密相关的事件自然会有全球性影响。“9·11”事件后的全球性反恐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心问题，是因为所有大国均极为关注。大国投入的力量与资源越多，国际制度

形成的作用力就越大。

国际制度是典型的“看人下菜”。各国根据不同的事务，不同的地缘政治态势，不同的地位和文化科技影响力而得到不同的关注，在发生有悖于各国利益的事件后所得到的反应自然也不同。这也使各国产生了这样的担心：即认为自己承担过多而收益不相适应。而且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不担责任或者少担责任而获得相对更多的收益。“搭便车”的心理是普遍的，但是“搭便车”会受制于人，而且有的大国因为自身影响力会允许小国“搭便车”。但是大国却不能“搭便车”，因为大国存在更多的利益交织，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难度更大。大国需要不断推动国际制度的优化：一是推动形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和平竞争的机制和规则；二是主导帮助弱势国家的行动；三是自身必须带头尊重制度和遵守规则；四是推行出轨则受罚规则。

如何处理安全与和平

“安全意味着和平及和平的维护。”^[8]从霸权国家或者依附于霸权的国家的角度看，这个论点极为正确和深刻，然而，放在整个格局中，便会显得曲高和寡。因为大国之间天然性的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国际格局总是容易陷入动荡当中。统一后的德国，在追求安全时却使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均感到和平受到威胁。当然，也可以认为德国是追求不切实际的国际地位，使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感到安全受威胁，而最终导致和平的丧失。如果德国仍然满足于普鲁士的地位，那么德国又如何追求安全呢？而美国在崛起之前，其安全的实现与欧洲列强的纷争直接相关，试想如果英法和谐相处，共同在北美拓展殖民地，那么美国又如何诞生，又何谈崛起呢？追求安全从来都不能将和平置于安全之上，否则既没有安全，也没有和平。未来的中国安全，取决于今天的中国如何利用当今总体上处于和平的时代。中国不能将安全建立在当今的和平年代中，虽然中国是和平的受益者，但周边其他国家同样也是受益者。如果中国需要成为别人的成功伙伴，那么

中国就必须善于缔造新的和平，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安全。如果中国希望自己成为地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一员，那么中国就必须利用当今的和平来实现自身安全。

中国缔造新的和平是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而实现自身安全却只能满足于成为地区大国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既有的和平基础之上，因为中国必须成为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性范围内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就必须将现有的和平既当作机遇，也当作门槛。机遇，是中国必须抓住现有和平做好战略设计；门槛，是中国在进行战略设计时，其目标是超越现有的和平。

冷战结束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今天中国周边的和平仍然没有超出雅尔塔体系的结果，意识形态的对立使西太平洋海域内国家和地区缺少真正的互信，海洋海岛争端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开始时便遗留下来的，实力格局仍然是地区内大国互相形成战略平衡而域外大国成为仲裁者。雅尔塔体系的结果就是以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态势为鸿沟，在没有问题和争端时，各发展各的，有了问题和争端，又是各说各话。

力量均衡和地缘政治态势界线分明，一体化动力难以内生。中国未来的价值在于令可能恶化为零的博弈力量均衡和与邻为壑的地缘政治态势转变为内化共同体的诉求。要实现这个诉求，必须避免地区性霸权，至少要避免地区内其他国家认为存在追求霸权的诱因。然而，东亚地缘政治板块内的海洋海岛争端，对能源供给的竞争总是容易使各方出现争端即霸权诱因的认知。

霸权诱因与互信缺乏总是相辅相成。东亚会沿着欧洲的轨迹变化吗？欧洲近代以来几百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冷战，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仍然步履艰难，但是在这些过程中，欧洲内部各国矛盾尤其是导致战争和霸权的诱因在逐步消融。未来的中国所在东亚是不是能够在经历一些代价惨重的战争后，才能就各种争端进行历史性解决呢？如果大家都难以经受战争带来的伤害和可能性的风险，那么又应当如何在争端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走向共同体呢？所有争端最终都被误认为是霸权诱因，导致互信缺乏的恶性循环都将得到解决。

中国的安全与和平不是建立在应对争端当中，而是建立在推动走向共同体或者一体化上，让共同体和一体化的内部动力来消融各种争端。中国不当被人认为是在追求地区主导力量，而应当被人当作一体化的动力。在地区内成为一体化的动力，才能够在全球形成更大的协调作用。避免争端被认为是霸权诱因对于中国处于不断增长的实力地位特别重要。

在全球化时代，争夺势力范围、保一方太平、再图长远的战略已经过时了。历史上，“一个国家力量的增长和它的扩张趋于相互强化，因为扩张增加了经济盈余，同时扩张的国家可获得更多的资源”^[9]。这一条历史经验不适用于中国。

当美国开始强大却又缺乏足够的实力与欧洲争雄时，美国开始实施门罗主义，即将美洲当作是美洲人的美洲，拒绝欧洲列强对美洲染指，保证美国的势力范围，使其成为美国向欧亚大陆“进军”的跳板。中国既缺乏那样的时代条件，也不具备那样先天性的地缘政治优势。

从内战的结束直到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美国可以完全享有欧洲列强因为互相争斗而难以脱身的得天独厚的时代条件。那时正处于“英国治下的和平”，英国奉行“光荣孤立”的传统政策，欧洲大陆强国要么处于均势的约束之下，要么处于打破均势的努力挣扎当中。英国努力维持不断遭受挑战的均势，因而欧洲列强无力控制美国。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进入大国协调时代，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继续执行光辉孤立政策，和俄罗斯、奥地利共同维系着基础脆弱的均势。然而在近东、中亚、中东和远东，英国遇到了俄罗斯的挑战，发生克里米亚战争。德国统一后，经过俾斯麦克制谨慎的大陆政策后，德国开始实行世界政策，使英国遇到了欧洲大陆上最强劲的挑战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 100 余年的历史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除了征战于欧亚大陆之外，基本无力再以强力手段干涉美洲事务。当美国崛起并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后，英国只能同意，而不能贸然反对。因为美国即使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主导美洲事务，那么也可能在欧洲找到可靠的盟友来牵制威胁美国的国家。总之，“欧洲国家间的吵闹，才让美国有了真正的安全”^[10]。而且，正因为先天的地缘优势也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的最初阶段并没有迫使美国面临通常的难题，即寻求各种方式去资助其统治

地位”^[11]。

中国面临情况迥然相异，海陆双线的安全压力和挑战使中国四周都存在着强大外力压制的可能性。一旦霸权国家认为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势力范围，便会产生“霸权体系基础正在松动”的危机感。出于这种危机感，霸权国家必将加强对中国的安全压力和竞争压力，中国可能在压力之下进行反弹性的政策转变，也可能在退让后使对方增加更大的压力，这样的互动使任何一方均会不确定对方的下步举动而最终会走上零和博弈状态。就像两个互不相信的人，由单方怒目相视开始，变成双方怒目相对，进而最终发展成为互拔手枪并瞄准对方。

美国的先天地缘政治条件是历史上大国中除罗马之外最好的。东西有两洋作为天然阻隔，使欧洲列强难以成为强邻，南北为墨西哥和加拿大两个温和、没有野心的国家，美国现在境内的50个州在立国之初基本为黑奴或者土著人，文明思想没有得到开拓，自然成为建国之初13个州的拓建对象。美国地大物博，没有强邻，还有两洋作为屏障，如果控制两洋，能保证进可攻、退可守。而中国缺乏美国那样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像历史上所有海陆二元国家一样，难以集中力量专注于陆地或者海上。在陆地上，存在着与一个核大国的边界争议，面临着境外民族和宗教的分裂危害，还有一个随时可能导致爆发冲突，甚至是核冲突的邻国。在海上，中国从南到北的海岸线之外都存在与邻国海洋权益和海岛主权争议，对其依赖程度与日俱增的海外航线和海外市场（包括海外资产）并不能受到自身完全控制，潜在的威胁在时刻困扰着中国。这些矛盾争端的复杂程度和根源深度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大国。

中国转型战略的基本要点是不能使所有国家都误认为中国由于崛起无论是主观意愿或者是客观条件都正在形成或者建立势力范围。但是，中国在世人们眼中的形象却又不是中国单方面主观意愿下的行动所能够改变的。因为在很多人心中，仍然出于对历史经验的敬畏而认为“富国现实变得难以控制，然后变得危险，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12]。基于这种认知，中国与周边国家，主要是大国之间难以建立基于共同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战略互信。中国与其他大国基本上是竞争关系，与其他国家，如

东盟国家存在争端时，也难以有寻求良性谈判、和平解决的外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崛起必然会遭到身边诸多的麻烦。如果强行冒进解决，只会“引火烧身”。

西太平洋上沿欧亚大陆一侧，从北到南，充斥着难以理清的矛盾争端。中国和日本均无足够的能力来推动西太平洋地区争端的解决，欧洲无暇于西太平洋事务、俄罗斯和印度都希望西太平洋混乱以收渔翁之利，美国是最有能力推动争端朝着最终解决的方向发展的。如此形势下，美国又使中日僵局难释、南海各方僵持，无异于自觉置自己于近代欧洲之英国地位而将不自觉的中国逼成德国。西太平洋争端日益不可驾驭，如果恶化为地区冲突甚至局部战争，欧洲纷争而美国渔利的历史必将在西太平洋重演。只是今天是西太平洋纷争，美国再无渔利之可能，只会陷入无休止权衡与重构关系陷阱当中，而渔利者必为俄罗斯、欧洲和印度。当然，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西太平洋之争的恶化将令世界重回混乱之态。

西太平洋地区诸国吸取了两次大战前后欧洲的教训，各大国均以准备大战来追求和平，最终危机爆发，各国只能以大战的方式解决。当今，西太平洋上的争端，各国仍然将武力解决作为公然解决问题之道，一旦爆发危机，只能以武力解决。残酷的现实政治作风在世界经济新引擎和文明新发展的西太平洋由潜而显，这不是某个国家和集团的挑战和悲剧，而是所有国家的挑战和悲剧。

美国吸取了英国维护欧陆均势的教训，英国是出事再反应，美国则是事前塑造。美国在“二战”后，通过改造日本、推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诸多岛国走向“民主化”的举措，使西太平洋国家出现心理认同，有利于形成稳定秩序。然而，心理认同难以在中美之间产生，中国自古以来的宗主国心态延续至西太平洋争端时，美国只能处于平衡者，而不是塑造者的地位。

当西太平洋的岛国成为卫星国时，美国就必须把应对危机的即时反应当作常态化行为来运作，防止卫星国失控，这一举措又令中国卫星国有乱来的冲动，使美国意在防范危机，却适得其反。

中国军力构建必须围绕的基轴是美国军力，即具备既可以挑战美军，也可以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如果中国的军力足可以挑战美军，那么在欧亚

大陆上便存在着两支可以挑战美国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即使不结盟，那么也可以使欧洲、印度、日本等力量产生微妙的位势变化。如果中国军力能够与美国协同作战，即使只是配合性能力，而非联军行动能力，那么在欧亚大陆内部的那些国家同样也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注释

NOTES

第一章

[1] 德意志统一后，俾斯麦为了孤立和打击法国，策划德皇与俄、奥两皇结成同盟。1799 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取得了法国领导权，此后法国横扫欧洲大陆，控制了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荷兰，击败了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这引起了欧洲大陆的恐慌。在法国大敌的面前，欧洲三位最强势的君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结成同盟，史称“三皇同盟”。1873 年 6 月，俄奥两国皇帝签订《兴勃隆协定》，约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同年 10 月，德皇也加入这一协定，从而形成第一次三皇同盟。通过同盟，德国实现了孤立和削弱法国的目标。俄国加强了在中亚地区对付英国的力量和西部边疆的安全保证，使俄奥当时在巴尔干的矛盾有所缓和。柏林会议后，德俄关系恶化。俾斯麦为了防止俄、法联合，使自己两面受敌；而俄国也想联合德国在近东和两海峡与英国抗衡，因而在 1881 年 6 月 18 日俾斯麦与俄、奥两国大使在柏林又签订了三国协定，为期 3 年，1884 年续订，1887 年废除。史称第二次三皇同盟。协定规定：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国作战时其他两国应守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对土耳其欧洲领土的任何改变须经三国共同协议；三国承认封闭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原则，务使土耳其不得将海峡供任何交战国作军事活动之用。另外，三国又签订一项附加的协议书，规定：奥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保留随时吞并权；三国不反对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合并。协定和协议书是秘密的，1920 年才被披露。1887 年协定期满，因俄、奥在巴尔干冲突加剧而未再续订。同年，俾斯麦另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此条约维持到 1890 年。

[2] [英] A. J. P. 泰勒，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260 页。

- [3] [德] 冯·俾斯麦, 杨德友、同鸿印译,《思考与回忆》(第二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05页。
- [4] [德] 冯·俾斯麦, 杨德友、同鸿印译,《思考与回忆》(第二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05页。
- [5] [英] 艾伦·帕麦尔, 高年生、张连根译,《俾斯麦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0页。
- [6] [英] A. J. P. 泰勒, 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8页。
- [7] 俾斯麦离职后,负责德国外交事务的新领导人宰相利奥·冯·卡普里维因缺乏外交经验,主要靠外交部一批专家的判断作出决策。这些人包括参事荷尔斯泰因、拉施道和副外交国务秘书贝尔竭姆,其中荷尔斯泰因的作用最为突出。荷尔斯泰因等人主张面对可能的俄法同盟的前景,决定不再续订德俄《再保险条约》,而是巩固三国同盟,寻求与英国的友谊,即推行外交“新路线”。新路线政策最初的出发点是,德国必须直接面对俄国的敌意和法俄可能结盟的现实,全力加强同英国及德国盟国的联系,只要德国与英、意、奥等国结成巩固的外交和军事集团就能够在大陆上确立起遏制和压倒法俄集团的优势。
- [8] [美] 罗伯特·A. 帕斯特, 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5页。
- [10] Hans - Ulrich Wehler,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 - 1890*,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172.
- [11] Hans - Ulrich Wehler,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 - 1890*,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172.
- [12] [英] A. J. P. 泰勒, 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9页。
- [13] Gordon A. Creg, *Germany in 1866 - 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25.
- [14] William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s and the Alignments (1817 - 1890)*, New York, A A Knopf, 1931, 224.
- [15] 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 - 1914)*, London, Routledge, 1976, 26.
- [16] Andreas Hillgruber, *Germany and the World War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
- [17] J. Ellis Barker,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15, 64.
- [18]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New York, A. A. Knopf, 1968, 117.
- [19] Geor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 - Russian Relations 1875 - 1890*, Princeton, 1980, 177 - 181.
- [20] 意大利和法国争夺北非,奥匈和沙俄争夺巴尔干,而法、俄都是英国在地中海的劲敌。德国宰相俾斯麦竭力鼓励英国和意大利、奥地利合作,力图把它拉进德、奥、意三国同盟,共同对付法、俄。1887年2月12日,英、意约定维持地中海以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的现状。意大利支持英国在埃及的政策,英国支持意大利在北非的政策。英、意要在共同利益问题上实行全面合作,但“这种合作的性质必须由它们在实行合作时根

据具体情况来决定”。这意味着，一旦意、法进行战争，英国可不给予意大利军事援助。奥匈于同年3月24日，西班牙于5月4日先后加入该项协定。史称第一次地中海协定。在保加利亚危机期间，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奥、意三国大使协议合力支持土耳其抵抗沙俄的侵略。在俾斯麦的推动下，1887年12月12日英、奥缔结协定。4天后，意大利也加入进来，三国商定共同维持近东现状，保护黑海海峡和确认土耳其对保加利亚及小亚细亚的宗主权，共同抵制俄国影响在土耳其的增长。并规定：如果土耳其抵制俄国在上述地区的非法举动，三国将立即就应采取的措施取得协议。如果它们认为土耳其串通或纵容俄国的非法举动，就暂时占领土耳其的一些地点，是为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协定中没有明确规定英国承担具体的军事义务，由于它坚持行动自由，没有同法、俄发生武装冲突。而随着英、德矛盾的发展，英国转向法、俄，协定丧失意义。

- [21]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第52页。
- [22] [德] 冯·俾斯麦，杨德友、同鸿印译，《思考与回忆》（第二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
- [23] [德] 科佩尔·S. 平森，吴友发译，《德国近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85页。
- [24] E. ZLudwig, Bismarck, *The Story of A Fighter*,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34, 505.
- [25] Hildebrand, K. Das Vergangene Reich, *Deutsche Au 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1871 - 1945*, Berlin, Oldenbourg Verlag, 1995, 874 - 897.
- [26] A. J. Ryder,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ck to Brana't*,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73, 51.
- [27] Norman, Rich, *Great Power Diplomacy, 1814 - 1914*, McGraw Hill College, 1992, 252.
- [28] A. J. Ryder,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ck to Brana't*,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73, 37.
- [29] [英] 约翰·洛尔，杨杰译，《皇帝和他的宫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 [30] [德] 艾米尔·路德维希，杨成绪、潘琪译，《德国：一个具有双重历史的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347页。
- [31] 英国海军必须保持足以与两个敌国的联合舰队作战的实力。
- [32] [美] 保罗·肯尼迪，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249页。
- [33] 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210.
- [34] Gorden A. Creg, *European from 181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2.
- [35] H. W. Ko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German War Aims*,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 Ltd. , 1984, 97.
- [36]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 - German Antagonism, 1860 - 1914*,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390.
- [37] Dat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57.

第二章

- [1] [日] 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同时代史》(第二卷),东京:青木书店,1990年,第9页。
- [2] [日] 吉田茂,韩润堂等译,《十年回忆》(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0—11页。
-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 R. U. S.), 1945—1946, VIII. 1974, 267—273.
- [4] 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山和约”,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所签订的条约,并于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该合约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合约声明:日本承认朝鲜半岛之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旧金山和约》是身为战败国的日本确立战后再次崛起和确立国家走向的决定性和约。因《旧金山和约》签订时,身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被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排除在外,故中国政府自和约签订至今均未承认过《旧金山和约》。
- [5] Conference for the Conclusion and Signature of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 277.
- [6] [日] 吉田茂,韩润堂等译,《十年回忆》(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17页。
- [7] [日] 吉田茂,韩润堂等译,《十年回忆》(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2页。
- [8] [日] 吉田茂,韩润堂等译,《十年回忆》(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2页。
- [9]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0页。
- [10] [日] 猪木正道,高詹燦译,《吉田茂传》(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47页。
- [11] 《蒋总统秘录》第七卷,台北:中央日报,1985年,第3119页。
- [12]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37页。
- [13] [日] 吉田茂,韩润堂等译,《十年回忆》(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6页。
- [14]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 [15] 摘自日本1973年10月5日《朝日新闻》。
- [16] 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推行的改善与苏联、东欧关系的外交政策。“新东方政策”反映联邦德国在国际形势缓和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独立的外交,提高国际地位的倾向。“新东方政策”对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实质上以联邦德国的地位和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德国统一为目标,它是联邦德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向东欧和苏联推行自己战略的具体表现。新东方政策虽然立足于西方,但却自主地发展了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这是联邦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新发挥重要作用的开端和标志。其主要内容:(1)承认战后欧洲各国的现有边界,改善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2)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表示愿意实现两国

关系的正常化，并表示愿意以和平方式谋求国家统一。

- [17] 摘自1973年外务省《外交蓝皮书》。
- [18] 1983年1月，中曾根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在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即对战后日本的国内国际政治进行总结：改变国民政治意识，去掉战败国的阴影；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核心，在财源分配上腾出力量，加强对外援助，以发挥日本对争取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作用，确立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
- [19] 1983年7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故乡群马县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提出，日本不仅要做法经济大国，还要做政治大国。
- [20] [日] 信夫清三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31页。
- [21] [日] 中曾根康弘，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第1页。
- [22]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防止侵略战争重演，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联合国宪章》中对日本、德国等战败国所订立的相关约束性条款。这主要指的是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的规定。其中第107条规定：“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战时敌国主要是指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家。
- [23] [日] 中曾根康弘，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第4页。
- [24] [日] 中曾根康弘，金苏城译，《新保守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
- [25] 1985年7月，中曾根访问法国时明确提出日本的“国际国家四原则”：（1）不做军事大国；（2）竭力维护自由贸易体制；（3）对发展中国家和真正的不结盟国家予以理解与合作；（4）加强日、美、欧联合，以此为中心开展太平洋、大西洋合作。
- [26] [美] 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华宏勋、孙苗伊译，《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 [27] 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1月访问新加坡期间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

第三章

- [1] No. 1321, Telegram from the Charge in Sweden (White Hous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3, 1918. FRUS, 1918, Russia, 476.
- [2] No. 1321, Telegram from the Charge in Sweden (White Hous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3, 1918. FRUS, 1918, Russia, 476.
- [3]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苏联封锁西方占领区通向西柏林的通道而引起的国际危机。根据“二战”期间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的协议，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及柏林。柏林位于苏占区，东柏林为苏占领，西柏林为美、英、法占领。美、英为了扶植双占区，稳定战后混乱的德国经济市场以对抗苏联。于1948年6月18日在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发行“B”记马克。苏联针锋相对，6月22日在东柏林发行“D”记马克，并作为整个柏林的流

通货币。西方于 23 日下令将“B”记马克引入柏林西区。国际局势顿时紧张,爆发了“柏林危机”。6 月 24 日,苏联切断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西方国家对西柏林实行空中运输供应,封锁失去实际意义。双方经过长期斗争后,于 1949 年 5 月达成妥协,苏联作出主要让步。5 月 12 日封锁结束,危机渐趋缓和。柏林局势虽然紧张,但双方都没有下决心走向冲突,而是通过谈判解决危机。

- [4] 即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使众多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和平过渡。
- [5] 摘自赫鲁晓夫 1955 年 5 月 18 日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上的讲话。
- [6] 选自《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131 页。
- [7] 选自《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204 页。
- [8] 摘自苏联 1962 年 12 月 31 日《真理报》。
- [9] 1949 年 9—10 月,西、东德分别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二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柏林。1948 年柏林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区仍由美、英、法三国占领,但整个柏林市均在东德境内。西柏林离联邦德国约 177 公里,有铁路、公路、水路和空中走廊相连,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开放。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断地对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进行渗透。西柏林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哨城”。
- [10] 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赫鲁晓夫刚刚结束访问美国不久,正在大力宣扬因为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而获得的成果时,美国却派 U-2 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
- [11] 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赫鲁晓夫时代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年,第 557 页。
- [12] 摘自 1964 年 6 月 25 日苏联《真理报》,1964 年 6 月 24 日同丹麦实业界人士的谈话。
- [13] 赫鲁晓夫交还中国旅顺、大连两港,将苏中合资的四个公司的苏方股权卖给中方,增加对华的援助项目,将在华展出的先进机床赠送给中国等。
- [14] 其具体体现就是:1969 年华约发出和平呼吁。同年 10 月,美苏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71 年 1 月,美苏签署《禁止在海底及洋底及其下面设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同年 9 月 3 日,苏、美、英、法四国在西柏林签署《柏林协定》,解决久悬未决的西柏林问题。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后,借助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于同年 5 月访问苏联,访问中发表了《苏美联合公报》,并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等文件。美苏两国还就防止海上事件、科技合作、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医学和卫生合作、探索和利用宇宙空间合作等方面决定开展合作,并且决定建立苏美贸易联合委员会。
- [15] 1975—1977 年间,美国向欧洲增派了两个旅的陆军部队和六个空军联队,并部署更多的战术核武器。1977 年,苏联为了在欧洲加强自己的核优势,开始部署 SS-20 中程导弹。苏联在欧洲本土和东欧集中了四分之三的陆军,将 90% 的中程导弹和 80% 的远程导弹对准西欧,与此同时,在西欧的南北两翼实行钳形包围。1979 年北约就西欧接受美国的中程导弹作出了“双重决定”,即一方面由美国在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分期分批地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 II 战术导弹,另一方面同苏联谈判,逼其撤除 SS-20 导弹,以换取美国停

止这一部署。

- [16] 在非洲，苏联利用古巴军队卷入了安哥拉内战。苏联支持的“安人阵”打败了美国等支持的“安盟”“安解阵”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立即得到苏联的承认。1976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谴责“安哥拉是一种美国无法接受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将对和平与稳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1976年10月，苏联与安哥拉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为期20年。1977年3月，苏又与莫桑比克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为期20年。1977年7月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为争夺欧加登地区爆发了战争。苏联放弃了过去一贯对索马里的支持，和对厄立特里亚要求从埃塞俄比亚独立的支持，转而利用古巴军队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美国支持的索马里，并帮助埃围剿厄立特里亚游击队。埃最终获得胜利。1978年11月，苏与埃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为期20年。1978年4月，苏联击落一架韩国客机，又引起一阵苏美关系紧张，卡特宣布改变美国从韩国撤军的计划。与此同时，苏联还把手伸向了东南亚，苏支持越南反华排华，侵略柬埔寨。苏给了越以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把越南拉入了经互会。苏也从越得到岬港、金兰湾等军事基地。1978年11月，苏与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1979年春，中国对越自卫还击，苏联站在越南一边，支援越南，谴责中国，苏越结成战略盟国。在中东，1976年8月，苏联同伊拉克签订军事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苏进一步向伊提供先进武器和派遣军事技术人员；协调双方对整个地中海和波斯湾的政策，苏在伊建立一个空军基地。1978年6月，苏联再次利用古巴军队在民主也门策动了军事政变。1979年初，伊朗发生了反美的伊斯兰革命，苏联表示支持，反对美国干涉。苏联利用美国陷入伊朗人质事件，不用代理人，而是直接出兵其南部邻国阿富汗。
- [17] 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提出了“高边疆”战略。他上台后组织力量进行专门研究，1982年3月正式公布。“高边疆”战略的内容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部分，军事上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于1983年3月正式公布。经济上美国打算建立太空军事基地。与此针锋相对，勃列日涅夫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和远洋海军，苏联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到1978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已占世界首位。这些新的军备竞赛使苏联在经济实力不如美国的情况下，军费开支相当于美国的2倍。同时还要维持华沙条约和经互会。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开支在国防上和巩固华沙条约体系上，苏联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些。仅为这些目的的正式开支就占苏联年预算的23%。
- [18] 1978年4月，阿富汗亲苏的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杀死达乌德，建立新政府。之后，大批苏联军政人员以“顾问”名义控制了阿富汗军队、政府和企业。12月，苏联与阿富汗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但不久阿人民民主党内部发生了内讧，阿明取代塔拉基夺取了领导权。但苏联对阿明不信任。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搞掉阿明，扶持亲苏的卡尔迈勒上台。由于阿富汗地处通往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要道，有切断西方石油命脉的危险，并且打破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力反对。
- [19]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述弢、王尊贤、范国恩、袁坚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 [20] 摘自苏共二十大报告。

- [21] 摘自苏共二十七大报告。
- [22] 据统计, 1949 年至 1985 年, 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2%—14%, 占财政开支的 30% 以上, 苏联 60% 以上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都集中于军事部门。
- [23]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 苏群译, 《改革与新思维》,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 第 121 页。
- [24] 1987 年 12 月, 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 苏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苏联不仅同意销毁部署在欧洲的全部 SS-20 导弹, 还同意销毁苏联部署在亚洲的这种导弹, 此举受到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普遍欢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 1989 年重新开始的欧洲常规力量裁军谈判, 1991 年 5 月签署欧洲削减常规军备的条约。
- [25]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 苏群译, 《改革与新思维》,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 第 144 页。
- [26] 摘自苏共十九大报告。
- [27] 1972 年至 1981 年, 苏联对东欧的贸易补贴总额达到 1019 亿美元。
- [28]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 述弢、王尊贤、范国恩、袁坚译,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第 892 页。
- [29] [美] 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胡发贵、胡传胜、陈刚、朱珊译, 《重组的世界: 1989—1991 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 177 页。
- [30] [美] 兹·布热津斯基,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第 77 页。
- [31]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 苏群译, 《戈尔巴乔夫言论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第 312 页。
- [32] [美] 亨利·基辛格, 顾淑馨、林添贵译, 《大外交》,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0 年, 第 738 页。
- [33] [美] 亨利·基辛格, 顾淑馨、林添贵译, 《大外交》,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0 年, 第 738 页。
- [34] [俄] 尼·伊·雷日科夫, 徐昌翰译,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年, 第 10 页。

第四章

- [1] David Gowland, Arthur Turner, *Reluctant Britai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1998)*, London, Taylor&Francis Group, 2000, 11.
- [2] Ritchie Orendale, *The English – Speaking Alliance: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minions and the Cold Wa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79, 14.
- [3] Helen Lownie, *The Illustrated Rise &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NewYork, A. A. Knopf, 1999, 2931.
- [4] Warren I. Coh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York, A. A. Knopf, 1993, 29.

- [5] 陈乐民,《战后英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 [6] Alex May, *Britain and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91.
- [7] 周琪、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 [8] Anthony Gorst, Scott Lucas,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931 - 1961*, London, The Pinter Publisher, 1991, 227.
- [9] Francois Crouzet, Francois Bedarida, *Britain and France Ten Centuries*, Dawson & Son Ltd, 1980, 13.
- [10] Howard, *Britain and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Hampshire, 2002, 193.
- [11] Michael F. Hopkins, *The Price of Cold War Partnership: Sir Oliver Franks and the British Military Commitment in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History, 2001, No. 2, 39.
- [12] Anthony Gorst, Scott Lucas,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931 - 1961*, London, The Pinter Publisher, 1991, 227.
- [13] Beschloss, Michael R. Mayday, *Eisenhower, Khrushchev and the U - 2 Affair*, New York, Harper&Rove Publishers, 1986, 162.
- [14] 1958年11月,苏联同时给美、英、法三国递交了内容相同的最后通牒式的照会。照会宣称:苏联准备同民主德国谈判移交柏林权力的问题,建议三国在6个月内结束对西柏林的占领并将其设为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由联合国监督。届时,苏联将同民主德国单独签约移交权力。在照会中,赫鲁晓夫警告西方不得采取威胁和平的挑衅行为。
- [1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as Abbreviation), Diplomatic Papers, 1958 - 1960, Berlin Crisi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82 - 83.
- [16] [美] 艾森豪威尔,樊迪、静海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1956—1961)》,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第383页。
- [17] Cabinet Conclusions 11 (C59) Minute10, 19 February 1959, CAB128/33.
- [18] Cabinet Conclusions 13 (C59) Minute2, 27 February 1959, CAB128/33.
- [19] Cabinet Conclusions 14 (C59) Minute1, 4 March 1959, CAB128/33.
- [2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1 August, 1961, Frus 1961 - 1962, 362.
- [21] [英] 哈罗德·麦克米伦,山东大学外文系译,《麦克米伦回忆录》(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93页。
- [22] [英] 德里克·W. 厄尔温,章定昭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121页。
- [23] Heater. D, *Britain and the Outside World*, London, The Pinter Publisher, 1976, 46.
- [24] Prime Minister's Office, 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British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s Office, 21 October 1962, 180.
- [25] Nigel J., Ashton Kennedy, *Macmillan and the Cold War: The Irony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86.
- [26] Nigel J., Ashton Kennedy, *Macmillan and the Cold War: The Irony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75.

- [27] [英] 哈罗德·麦克米伦, 章定昭译, 《麦克米伦回忆录》(六),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年, 第196—197页。
- [28] Paul Sharp, *Thatcher's Diplomacy: The Revival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105.

第五章

- [1] 选自尼克松的就职演讲。
- [2] [美] 约翰·加迪斯, 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 《遏制战略: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 第293页。
- [3] Henry Kissinger, *Diplomatic*,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22.
- [4] [美] 威廉·伯尔, 庞伟译, 《基辛格密录》, 北京: 远方出版社, 1999年, 第9页。
- [5] [美] 理查德·尼克松, 刘炳章、卢佩文、隋丽君译, 《角斗场上》,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0年, 第341—351页。
- [6] [美] 亨利·基辛格, 顾淑馨、林添贵译, 《大外交》,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年, 第696页。
- [7] [美] 亨利·基辛格, 陈瑶华、方辉盛、赵仲强、钱乃复、江瑞熙、帅鹏译, 《白宫岁月》,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第70页。
- [8] 摘自基辛格1976年2月3日在旧金山的演讲, 转引自(美)约翰·加迪斯, 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 《遏制战略: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 第296页。
- [9] Kenneth N. Watz,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Kansas City, Missouri, 1971, 13.
- [10]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Boston, 1994, 102.
- [11] Robert D. Schlzinger, *Diplomacy Since 190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33.
- [12] 摘自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于1984年版2月22日发表的题为《人权与美国对外政策的道义原则》的演讲。
- [13] 摘自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于1984年版2月22日发表的题为《人权与美国对外政策的道义原则》的演讲。
- [14] 徐崇温, 《人权问题》,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年, 第276页。
- [15] 张宏毅, 《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9页。
- [16] 张宏毅, 《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65页。
- [17] 里根政府在1981年10月提交国会的《人权备忘录》。
- [18] 1982年6月6日, 以色列因为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武装暗杀, 出动陆海空军十万多人的部队, 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是自四次中东战争以来,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 战争期间出现了由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贝鲁特大屠杀。
- [19] [美] 卡斯珀·温伯格, 傅莹、施晓慧、杨燕怡、邵文光、沈国放译, 《前美国国防部长

- 温伯格回忆录：为和平而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96页。
- [20]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
- [21]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 56.
- [22]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 93.
- [23] [美] 罗伯特·A. 帕斯特、(美) 斯坦利·霍夫曼、(德) 约瑟夫·乔菲，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七大百年外交风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 [24] Thomas L. Friedman, *World War III*, The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2001.
- [25] Cal Thomas, *Putting Moral Equivalency to Rest*, The Washington Times, 15 September, 2001.

第六章

- [1] John C. Rule. *Critical Issues in History Volume: 1648 to The Present*, Bos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67, 789.
- [2] [法] 夏尔·戴高乐，陈焕章译，《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 [3] [法] R. 马西普，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戴高乐与欧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1页。
- [4] [法] R. 马西普，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戴高乐与欧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9页。
- [5] Derek W. Urwin, *The Community of Europe: 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 Harlow, Longman, 1995, 151.
- [6] [法] 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希望回忆录》（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 [7] 法国在1959—1965年期间，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拒绝美国在法储存核弹；拒绝把军事航空纳入北约的空防体系，等等。最重要的是，1966年2月，法国表示将退出北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因而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就必须相应地撤出法国领土。1967年，法国官方甚至提出了将原来的单向防务战略（主要防备来自东方的威胁）改为全方位防务战略（防备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方面的战略）。
- [8] [法] 夏尔·戴高乐，《戴高乐言论集》（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105页。
- [9] [法] 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希望回忆录》（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 [10]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182页。
- [11]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法国是关键》，宾格姆顿大学布罗代尔中心，2003年，第106页。
- [12] [法] 夏尔·戴高乐，《戴高乐言论集》（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

464 页。

第七章

- [1] 1918 年 1 月 8 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并分致各国。1918 年 1 月 8 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在对国会所发表的著名演说中，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认为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计划。随后，这“十四点”被采用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主要内容包括：(1)公开订立和平条约，无秘密外交；(2)无论战时与平时，公海航行绝对自由；(3)取消国家间的经济障碍并建立贸易平等条约；(4)充分互相保证，各国军备必须减少至保证本国内部安全的最低水平；(5)调整对殖民地的要求，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6)德国撤出俄国，调整俄国问题；(7)德军撤出比利时，恢复比利时之独立性；(8)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9)根据民族性原则，重新调整意大利边界；(10)奥匈各族自治，允许独立；(11)同盟国撤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12)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自决；(13)恢复波兰之独立性；(14)成立国际联盟以维持世界和平。
- [2] [英] 麦金德，武源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134 页。
- [3] [美] 罗伯特·吉尔平，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85 页。
- [4] James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 [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4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277 页。
- [6]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 [7] [美] 罗伯特·基欧汉，门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0 页。
- [8] [美] 卡尔·多伊奇，周启朋译，《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 283 页。
- [9] [美] 罗伯特·吉尔平，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46 页。
- [10] Thomas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3.
- [11] [美] 罗伯特·吉尔平，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72 页。
- [12] [美] 约翰·格里斯宾，朱善萍译，《历史焦点》（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78 页。